

一葉知秋

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g1966.com; www.wengewang.org)内部交流, 请勿公开传播



本書圍繞着1968年發生於北京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這一著名事件，論述了「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諸多問題；並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興衰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了「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運動的由來和走向，群眾組織的結構和取向，群眾派別的分歧和武鬥，群眾與非群眾之間的互助，以及「紅衛兵情結」和紅衛兵運動評價等方面。本書試圖從中國大陸單位性的群眾層面來展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方面面，力求對「文化大革命」種種矛盾的揭露置於群眾性的和基層性的事實之中。

唐少傑，男，1959年11月生於山東省濟南市。高中畢業後，以「知識青年」身份下鄉務農。1978年2月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77級本科。1982年9月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研究專業方向為馬克思早期哲學思想。1985年7月至今，先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後於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2002年8月至2003年7月，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有多篇論著和譯著發表。

ISBN 962-996-126-1



9 789629 961268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一葉知秋
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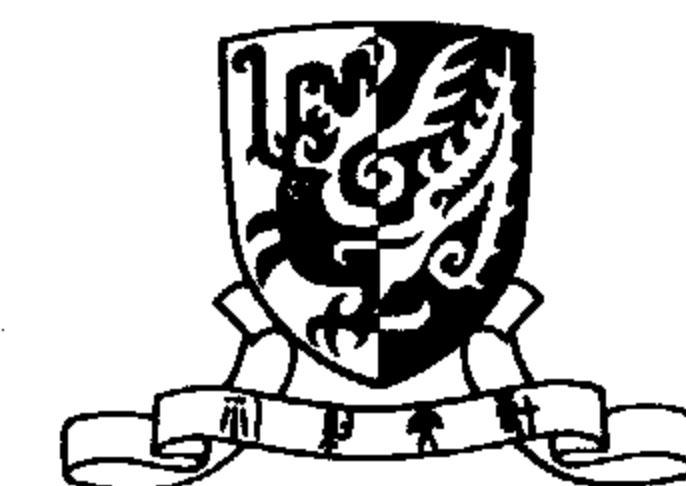
中國文革研究網(www.wg1966.com; www.wengewang.org)内部交流，請勿公開傳播，謝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八)

一葉知秋

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葉知秋——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996-126-1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hineseupress.com

An Episo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1968 Hundred-day Wa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Chinese)

By Tang Shaojie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996-126-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by The Local Printing Press Limited, Hong Kong

目 錄

序 言	vii
第一章 大張撻伐——清華大學 1968 年 「百日大武鬥」紀實	1
一 起因	1
二 過程	14
第二章 風起雲湧——「文革」在清華大學折射出其 第一個高潮	33
一 從清華大學 1966 年 12 月 25 日的「大行動」到 1968 年的「百日大武鬥」說明了甚麼	34
二 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狂瀾萍蹤	47
三 「文革」：清華大學災難的淵藪	64
第三章 眾擎易舉——「文革」為甚麼是群眾性的	69
一 從清華大學的「文革」看「文革」的群眾基礎	70
二 從清華大學的歷史看「文革」的歷史源流	78
三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民「革命」	86
第四章 畸重畸輕——「文革」初期群眾與非群眾 的互動	95
一 領袖與群眾的互動	96
二 「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互動	115
三 中、基層幹部與群眾的互動。幹部問題是清華大學 「文革」初期的焦點	132

第五章 眾志成城——略論「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和取向	151
一 清華大學「文革」兩派——井岡山兵團和「四一四」及其建制與報刊	151
二 「文革」群眾組織的界定和功能	158
三 「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	171
第六章 見微知著——「文革」群眾思潮的分歧及評析	189
一 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的分歧	190
二 評析	219
三 簡論「四一四思潮」	232
第七章 犖犖大者——略論「文革」的群眾運動	245
一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敲響了「文革」初期群眾運動的喪鐘。1968年是「文革」群眾運動的頂點	245
二 「文革」群眾運動的歸宿——武鬥	251
三 從「群眾運動」到「運動群眾」——簡論「文革」群眾運動的模式	260
四 「文革」群眾運動中知識份子的多舛命運	272
第八章 歧路亡羊——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失敗	287
一 歷史的怪圈：從1966年5月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興起到1968年7月底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後運動紅衛兵主流的衰敗	288
二 歷史的反思：談「紅衛兵情結」	296
三 歷史的輪回：評價紅衛兵問題	306

跋 念茲在茲——「1968年」的幾點啟示	315
一 從「文革」十年看「1968年」	316
二 從中國20世紀百年看「1968年」	320
三 從中國21世紀初始看「1968年」	323
後記	325
補記	329
參考文獻	331
索引	339
北京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主要區域圖	349

序言

本書所研究和論述的主要問題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除標題外，不加引號)中的群眾問題，即通過對1968年4月下旬至7月底發生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這一事件的記述和評析，著重刻畫出以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形態出現的文革。本書不是致力於對領導和決策文革的上層，而是基於對文革期間的一個基層單位文革個案所作的研究，力求從這一典型的個案當中，再現和反思當年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諸多問題。

文革爆發已經30多年了，結束也已經20多年了。文革出現於20世紀，如今已經進入了21世紀。對於文革的研究，國內學者克服種種困難和不利因素，力爭早日結束那種「『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¹的局面，努力在21世紀之初，初步形成中國人自己對文革的系統批判和全面把握。回顧國人至今對文革的研究和評述，從總體上，注重文革上層政治問題的著作及紀實文學遠遠多於文革下層群眾問題的研究論著，儘管前者對於透視和把握文革的歷史整體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不去盡力挖掘和剖析文革的群眾問題，文革研究總是顯得殘缺不全或蒼白無力。因為，一個極為重要而明顯的事實就是：文革是一場億萬中國人民群眾參加或置身於其中的運動。

1 廖蓋隆：《〈大動亂的年代〉序》(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

文革群眾運動最複雜而又最深刻的方面在於：它既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運動群眾」的運動，又是億萬群眾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動機而進行的運動。文革群眾運動中所呈現的文革領袖與文革群眾的互動、文革上層領導的目標和願望與文革下層群眾的行為和動因的互動、文革領袖權威的集中性與文革群眾力量的廣泛性的互動等等，都使文革成為一場無比曲折、無限多樣的群眾運動。即使是在文革過去多年之後，文革也是中國政治領域和大眾文化生活中一個永久的話題，一個值得永遠探索和研究的課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不研究在世界歷史上極為罕見而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文革群眾運動，如果不以研究文革群眾運動為參照或為前提，任何形式或任何種類的文革研究都難以達到對文革本質的準確切入，也不可能達到對文革整體的透徹把握。

當然，對於任何群眾運動都應加以具體分析和具體對待。評價和研究群眾運動的尺度何在？在於任何一場群眾運動是否有利於或者實現群眾自身的歷史進步、歷史解放。整個文革群眾運動的鼎盛時期不過兩、三年，但這一運動卻給文革的和文革之後的歷史留下了長長的影子。在文革之際和文革之前，我國理論界對於群眾運動大都是給予肯定和人為的拔高。經過文革，人們清醒而又痛切地意識到，像文革這樣的群眾運動決不能讓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這裏，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不應僅僅限於對文革及其群眾運動抱有一種價值上的評判或一種道德上的義憤，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著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為一場極為廣泛的、曾經贏得億萬群眾參加、認可和積極投入的群眾運動，它為甚麼是可能的？它為甚麼又是必然的呢？進而，這又使我們從理論思維的高度上去反思和探尋如下問題：人民群眾創造、推進社會歷史發展是否僅僅指人民群眾正面的

歷史性活動而不包括負面的歷史性活動呢？實際上，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應該包括人民群眾的自身反省、自身批判和自身變革。具體地說，人民群眾在文革歷史中的主體作用是通過逐漸認識並且逐漸克服自身錯誤甚至自我異化的過程而實現的。文革中的群眾問題，大大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理解，有可能使我們第一次去正視人民群眾在創造、推動歷史時自身的失誤和磨難，並且從中反思和汲取無窮的教訓。

研究文革群眾運動最有益的著眼點之一應在於研究文革群眾性事件。

如果說文革群眾運動與1949年以後歷次群眾運動的最大區別就是：後者是由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自上而下地有序進行，黨是群眾運動的主幹；而前者在文革初期則是由毛澤東直接號召和發動起來的，自下而上地無序進行，自發性的群眾組織一時成為群眾運動的主幹，那麼，文革群眾組織既不是中國共產黨傳統意義上所領導的群眾組織（如共青團、婦女聯合會、工會和民主黨派），也不可能是游離於文革時期中共黨的領導已轉化為毛澤東個人的制約之外的群眾組織。這樣一種沒有黨所領導但卻受制於毛澤東個人的群眾組織是研究和分析文革群眾運動的關鍵或基線。因為，只有透徹地研究和具體地展示這種群眾組織的性質、結構、功能和取向等等，人們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文革群眾運動（包括群眾性事件）的特點、規模、層次和意義。

文革中有無數個群眾性事件，這裏所說的主要是指那些對文革進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如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或者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如1968年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群眾性事件往往標誌著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發展程度、政治運作水平和文革的某些內在機制，透過一些重大的群

眾性事件，既可凝聚地表現出文革發展所經歷的階段和轉換，又可具體地折射出文革過程所蘊含的危機和變數。1968年春夏，清華大學發生的百日大武鬥就是如此，它的意義和影響已遠遠超越出清華大學乃至北京地區。

毫無疑問，百日大武鬥是清華大學文革期間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一事件不僅與幾個其他重大事件一起代表了清華大學文革的歷史及過程，而且由這些事件體現出清華大學對文革的進程乃至對中國當代歷史的發展所具有的直接作用和深刻影響。清華大學作為一所大學，一個社會教育單位或部門，它對文革的直接作用和深刻影響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對於所有其他單位或部門來說是無出其右的。清華大學在文革歷史中所具有的深厚的實踐「個性」和獨特的理論「亮點」，它所具有的典型而又豐富的個案內涵，它所具有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都有待我們及後人去加以開掘和探索。作為文革個案之一的清華事件的綜述和評論，本書也可以算是把百日大武鬥歷史地、追溯性地展現給學術界同仁和後人的一次嘗試。

本書以1968年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基點，分章闡述下列幾個問題：第一章是全景式地記述百日大武鬥的起因和過程；第二章論述文革初期清華有關經歷以及文革給清華帶來的某些災難；第三章主要是以清華文革為例，探討文革的複雜基礎和歷史源流；第四章以清華文革為典型，討論文革中的群眾與領袖、群眾與當權派、群眾與基層幹部的互動；第五章以清華文革兩派的結構和功能來闡述文革群眾組織的界定和取向；第六章專門討論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的觀點和思潮的對立，以及「四一四思潮」的內容和影響；第七章著重討論文革群眾武鬥問題和群眾運動模式問題；第八章以紅衛兵運動在清華大學的興衰來反思和批判紅衛兵運動；最後是概括性的結束語。

儘管在文革研究領域裏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東西，儘管對這一研究本身而言還有許多令人尷尬、困惑和棘手的方面，但是令人十分喜悅的是，在近些年來，文革群眾問題的研究，無論在宏觀的高度把握上還是微觀的深入分析上，無論是在整體的拓寬還是在專題的開創上，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例如，徐友漁先生對造反派問題的研究，印紅標先生和李輝先生對紅衛兵問題的研究，宋永毅先生對文革諸多群眾思潮的研究，王毅先生對文革群眾問題中的傳統文化因素的研究，王友琴女士對文革暴力問題的研究，王紹光先生對武漢地區的文革群眾的研究，李遜女士對上海文革工人造反派興衰史的研究，楊健先生對文革時期的文學藝術特別是民間文學藝術的研究，劉小萌、史衛民先生和定宜莊女士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等等，都對我本人的文革群眾問題個案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示。

本書在敘述中採取倒敘的方式，即由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這一事件引申出文革群眾問題的方方面面。這種敘述方式有可能給某些讀者帶來不便，甚至造成這些讀者對本書結構有著若干意見，但是，我個人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突出與百日大武鬥相關聯的諸多問題，力求使廣大讀者由此及彼，見微知著，進而反思和評判文革群眾問題。同時，本書以1966年6月至1968年8月清華大學的文革歷程為主線，旨在展示清華文革初期的方方面面，力求以小見大，由點到面，再現出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諸多問題，尤其是文革在像清華大學這樣一個高等學府中的某些特點和屬性，為人們考察和瞭解文革為何會在1968年發生轉折提供借鑒或方便。

本書是作為關於單位的文革個案研究的初步嘗試，它主要著眼於文革群眾問題的地區特性、思潮流派、群眾類型、文化專題等方面，這與其說同我在清華大學工作有關，不如說清華

文革本身的典型而又重大直接決定了我的文革研究必須首先「啃」下清華文革這塊「硬核」，再加上我在清華大學的一些文庫裏發現清華文革史料異常豐富並且保存得相當完好，更促使我下決心去開墾清華文革研究這塊園地。本書就是依據清華大學圖書館、檔案館、校史組等機構中所藏清華文革資料、文件、檔案、報刊等等而寫成的。這裏，有必要談談我所遇到、所關心的一些方法和問題。

一、事實的客觀性

在我所接觸到的文革歷史資料和所採訪的當事人中，經常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同一個事實及同一個事件的林林總總的方面，哪些是客觀性的，哪些是非客觀性的，即在當時文革中客觀實在地發生或存在過的方面與後人所回憶、記述、評說的方面之間的「差距」。儘管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是歷史生活與歷史研究在形態上不可避免的差異，但是，「客觀性」的問題涉及面對同一個歷史事實時，由於形勢的變化，時代的變遷，人物的沉浮，評論的深化，當事人和研究者們捨棄掉了哪些方面甚至是「遺忘」了哪些方面，而過分地凸顯或遮蔽另一些方面呢？在文革研究中，就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愈是剛過去不太久遠的事實，其歷史的客觀性和研究的客觀性就愈常常令人生疑或爭論不休。例如，在有的文章或回憶中，人為地貶低或抬高事實的某些方面，隨意地誇大或無視事實的另一些方面，甚至不惜以研究者或回憶者今天的心態、口吻、處境和利益「製造」一些方面，這樣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文革研究和回憶中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某個事實、某個事件隨著其當事人的命運變遷而脫離或者有悖於它們的客觀實在性。這些都大大有損於研究的正確性直至事實的準確性。

儘管人們在歷史研究中注重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是在實際的研究和回憶中，如果把「當代史就是一切歷史」作為出發點，那麼這種研究的價值和回憶的真實則要大打折扣，其事實的客觀性問題就會削弱或消失。我讀過一些回憶文革風雨歲月的書，對其彷彿以 20 世紀 90 年代平常之心「生活」於 60 年代不平常之時，並以前者「剪裁」後者，深感驚愕。

「客觀性」要求歷史的研究和回憶必須從「真」出發，才有可能使歷史的研究比較全面。對於文革來說，事實以及人物本身的客觀歷史地位不是以它們及他們在文革前和文革後的興衰沉浮為根本轉移的。對於這些事實及人物的歷史性臧否首先應以客觀性為前提。

二、評價的多元性

敘述歷史「故事」不易，講明歷史故事的「道理」更難。對於文革這樣相對較近的過去了的歷史來說，不僅在當事人與非當事人之間，而且在當事人與研究者之間、作為回憶者的當事人們之間以及研究者們之間肯定會出現不同的敘說和評價，也肯定會出現對一系列事實和問題的不同看法和意見，尤其是像對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性事件這樣範圍廣、涉及面大和影響深的問題，更是如此。

在我的採訪和收集的材料中，當事人的不同敘說和評價，對同一事實及事件的截然相反的態度和體驗，直接提出了評價的多元性問題。對我個人來說，僅僅顧及到這些不同的評價是相互對立的、完全不相容的，還是把每一個評價看成可供觀察和反思過去歷史的某個視角點或某個切換面。眾多評價恰恰由於它們的不同，才有可能使它們各自分別地作為構成觀察和反

思過去歷史的總圖景當中的某條「經線」或「緯線」，也恰恰由於所有評價的總和，才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處於一種開放的、動態的和隨時有待檢驗和修正的狀態之中。對某個評價來說，僅僅採取一維的或單向的態度，例如，僅僅是從道德上做出善與惡之分，好與壞之辨，還是把這一評價加以多維的或多向的總匯，映現出其政治學、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更不用說歷史學了）總體性的因素。

當然，我在敘述和研究中不會把某種評價當成唯一的、至上的和固定的標準，而是力圖展示那種關於在諸種歷史的可能性中成為必然或現實的可能性的評價。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基於那種關於成為必然或現實的可能性的評價，我也力圖從理論層面上揭示出那種關於潛在的或者作為某些傾向的或轉化了的各種可能性的評價。評價的多元性往往就是方法的多樣性，評價與其說是不斷加以證明的，不如說是不斷加以證偽的。評價的證明與證偽、評價的可檢驗性與其可修正性都是相輔相成的。

三、問題的敏感性

由於文革研究在目前中國國內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困難，所以文革群眾問題不僅涉及到現今與文革有這樣或那樣瓜葛的人，還涉及到文革研究與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之關係。

在我的採訪中，常遇到某些當事人對自己所經歷的文革某段非凡經歷（即使是受苦受難的經歷）念念不忘，每每加以動情而不能自己，依自己的見解大加讚揚或極力咒罵，情緒化的東西也是他們最為敏感、最為重視的東西，因為他們曾經為之付出了青春、熱淚和鮮血。有人直言：你研究文革群眾問題就不怕冒犯群眾嗎？不怕得罪你周圍那些經歷過文革的群眾嗎？

另一類被採訪者帶著疑慮的眼光說，關於文革兩派，中共中央關於徹底否定文革的總結中不是已說過了嘛，文革兩派都錯了，今天研究文革群眾問題，與今天大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有甚麼直接的聯繫呢？這類研究會給加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甚麼益處呢？

「得罪」或「冒犯」不是可以回避歷史研究敏感性的可以成立的理由，歷史研究的開放性和多樣性已經給這個所謂敏感性的問題做出了回答。個人親身經歷或體驗只能增加有關事實及事件的經驗性，但並不意味著可以保證關於歷史見解的可靠性。

「——苦難向文字轉換為何失重？

——『不可說』的自詡是否『不能思』的自欺？」²

人們與文革有這樣或那樣的瓜葛並不能形成阻礙文革群眾問題研究的理由，這反而會促使我個人去探尋在這些做法背後的原因。

文革的破產是改革的源頭，文革的結束是開放的起點。每當現今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向前邁出巨大步伐時，人們都會不禁以各種方式、從各種角度去反思文革、批判文革，從對文革的否定和反動中去汲取力量，從而義無反顧地加速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在此意義上，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確，文革作為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為 20 世紀人類生活的一個著名事件，其意義和影響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不僅是 20 世紀後半葉的，而且也會延續到 21 世紀上半葉；不僅是現代的，而且也是傳統的，甚至還是所謂「後現代的」。如果把關於文革群眾問題的研究與今天

²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頁 301。

的現代化建設加以對立，那也不過是文革的思維模式及其習性在作祟。對此，我個人提出的反問在於：是深入研究包括群眾問題在內的文革諸多問題會有益於推動和擴大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還是回避文革問題、拒絕反思文革問題會加速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呢？

四、意義的深切性

社會歷史是由諸多的群眾運動所構成，至少是由群眾性的歷史活動所構成的。正如著名學者黃仁宇先生在其代表作中所說的：「大歷史的著眼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³這種著眼當然也應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負面」貢獻，或者注重「負面」的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因為，後來的大歷史及後來的群眾運動包含了對上述「負面」的「消化」、理解和變革。

所以，我再次重申，本書以1968年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主線，向廣大讀者提供文革初期在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單位裏的大致經歷，力圖展示出一個文革初期的形態歷史或歷史形態，即一個凝聚了的、體現在清華大學這樣一個領袖與群眾、中央與基層、幹部與群眾、群眾與群眾等諸多矛盾交叉、危機四伏的歷史形態，從而表明文革的必然失敗和徹底破產。還是套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的歷史機緣。」⁴

3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頁271。

4 同上，自序，頁6。

最後，我要以著名學者徐友漁先生在1996年文革爆發30周年、結束20周年之際所作的深刻反思來結束我的這個序言：

30年前發生的一切，是中國人永遠擺脫不了的惡夢，這夢魘糾纏了我們10年，又追隨了我們20年。有人恍然返回夢境，就心中滴血；有人則千方百計想遺忘它。傷口可以癒合，境況可以改變，但民族的記憶卻不能消亡。如果我們裝聾作啞，子孫後代會瞧不起我們；如果我們假裝過去甚麼也沒有發生，恥辱也許擺脫了，但尊嚴也不復存在。一個不敢直面過去的民族，有甚麼資格要求未來？30年的經歷，30年間的巨變，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考，足夠我們鑒往而知今。⁵

5 徐友漁：〈文化大革命30年祭〉，載《焦點》，深圳，1996年7月號，頁10。

第一章 大張撻伐

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紀實

1968 年 4 月 23 日至 7 月 27 日，發生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是文革期間首都北京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廣和意義最深的群眾武鬥，它不僅成為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對於文革的進程以及文革群眾運動的命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 起因

1966 年 6 月初，清華大學文革運動開始。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影響下，清華學生開始張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6 月 8 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出了一支由 528 人組成的全國最龐大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工作組以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葉林為組長，冶金部副部長周赤萍、林業部副部長楊天放為副組長。6 月 9 日，工作組宣佈「奪權」，代行校黨委職權，對所有清華幹部「撤職罷官」。清華幹部統統「靠邊站」，人人必須過關檢查。6 月 13 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宣佈了北京市新市委關於停止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一切職務的決定，並由工作組代行學校領導職權，由工作組成員接管清華各級組織。實際上，中共中央書記處已於 6 月 10 日做出了撤銷蔣南翔一切職務的決

定。¹從6月12日至16日，先後有103名清華幹部、教師被戴上高帽子遊街示眾。儘管工作組力圖遏制嚴重的打罵、污辱幹部和教師的現象，但它還是把112名幹部定為「走資派」，16名教授定為「反動學術權威」，50多人被當成「牛鬼蛇神」。清華大學一時處於混亂、近於癱瘓的狀態。

工作組竭力把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納入他們的領導軌道和預定計劃，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受到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傾向的一些師生員工的反感、抵觸或抨擊。當時，對工作組權威的最大挑戰是來自

比工作組更為激進的許多青年學生，他們通過大字報等形式指責工作組。6月15日，工程化學系902班蒯大富等十幾名學生開會，決定與工作組抗衡。6月16日至25日，蒯大富等人多次貼出大字報，抨擊工作組及其領導人。工作組從6月24日至7月



1963年秋，考入清華大學不久的蒯大富。

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8。

17日多次在全校範圍內組織大會，批判、鬥爭了約50名「蒯氏人物」（即反對或批評工作組者），約有700多人在不同範圍被工作組不同程度地加以鬥爭。絕大多數學生寫大字報，事先都要由工作組審查底稿。一些學生遭變相管制，並發生兩起自殺事件（其中一起未遂）。蒯大富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開除共青團團籍，被隔離了18天。蒯大富先後以上告、絕食、出走等行動表示決不向工作組妥協。6月26日，工作組為了壓倒「蒯氏人物」反工作組的氣勢，組織了由上萬名師生員工在校內舉行的遊行示威，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等口號。

6月19日至8月3日，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先是以「蹲點」的名義後是以工作組組員的身份參加了清華工作組的工作，這更加顯現出工作組的特殊色彩。一度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非常關心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例如，劉少奇7月3日在聽取了自己的妻子和在清華大學上學的女兒劉濤有關彙報後表示：「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劉少奇還曾兩次夜間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

7月中、下旬，由南方返京的毛澤東在瞭解北京地區的文革情況後，嚴厲批評了劉少奇等人所謂工作組路線。清華園內的形勢開始急轉直下。7月22日和27日，工作組尚未撤離，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關鋒等就親赴清華園，看望蒯大富，並且表示了與工作組不同的態度。這也表明，毛澤東正在利用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問題上與劉少奇等人進行較量，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作為對抗劉少奇及工作組的前沿。7月底，毛澤東指示周恩來過問並關心清華大學的文革，

表現出對劉少奇及王光美在清華問題上的極大不滿。7月30日至8月3日，周恩來多次約見清華工作組負責人以及蒯大富等人談話。8月4日夜，北京市新市委在清華召開了工作組問題現場會，此會又稱「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辯論大會」。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陳伯達以及一些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人員等出席，周恩來並發表講話，批評了工作組的錯誤，為蒯大富平反。



1966年9、10月間，清華大學校內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等大字報。

總之，工作組在清華的所作所為在於：力圖把文革納入1966年以前的政治運動的模式。工作組不僅無法知道毛澤東發動並且領導文革的確切意圖，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其50多天的短命史中，給清華文革發展造成了它自己無法解決的後果：一是把清華幾乎所有的幹部打入「另冊」，把他們當成文革的主要對象。這樣，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失去了一支強有力的支柱性的隊伍，而這一點依據文革初期的宗旨是完全必然的，即文革是一場「革那些革過命的人」的革命；二是工作組按照過去的政治

運動的做法，對於那些不滿意工作組的群眾加以打擊甚至迫害，這就在清華學生中形成了與工作組直接對峙的少數激進群眾，他們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釋放出了工作組所預料不及的政治能量，其代表人物就是蒯大富。在一定意義上，文革初始的蒯大富的「政治生命」是由工作組直接「造就」的。當然，工作組的命運更主要的是由文革所鑄成甚至所註定的。

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出身幹部、工農家庭的學生成立了反對該附中領導人以及回應文革的名為「紅衛兵」的組織，先後貼出了三張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熱烈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毛澤東的這封信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前述的最初兩張大字報成為8月初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有關文件。8月份之後，以「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²為真諦的紅衛兵運動及其組織風靡中國，震撼世界。

清華大學本科生的紅衛兵組織出現於工作組被正式撤銷之後。8月8日，唐偉等一些學生成立串聯會，討論工作組性質並批判其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被稱為「八八派」的人於8月22日組成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8月9日以幹部子女為主的、深受工作組影響的一些學生成立串聯會，只批判所謂黑幫分子而回避工作組的問題，這些被稱為「八九派」的人於8月20日組成了「清華大學紅衛兵」。還有一些較小的紅衛兵組織相繼出現。9月24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告成立，立即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青睞和提攜。當時僅有十幾

2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載《紅旗》雜誌，北京，1966年第11期。



1966年12月25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在天安門前進行的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遊行」。

人的井岡山紅衛兵發表了一系列聲明，提出了三大口號：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批判「清華大學紅衛兵」，為「蒯氏人物」平反。相比之下，應該說只有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抓住了清華當時文革的癥結所在。

1966年7月底至11月，清華大學處於相對的無政府狀態。當時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和「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主席團」先後出掌學校局勢，但這些被稱為「三臨」的清華紅衛兵機構並沒有得到廣大學生的一致承認和擁護。由於文革形勢的發展以及中共中央領導層內部的情況，以黨和國家若干領導人的子女劉濤、

賀鵬飛等人為主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始終處於被動狀態，其主要負責人於9月29日宣佈自我罷官，一部分成員轉而成立造反兵團支持蒯大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分裂為八八總部和臨時總部。相比之下，井岡山紅衛兵不斷壯大，很快發展到數千人，最重要的是它已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支嫡系部隊。證據有二：一是蒯大富9月6日出任「首都大專院校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紅衛兵三司」或「三司」）召集人，「蒯司令」的大，不脛而走；二是張春橋12月18日約見蒯大富，授意把鬥爭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引向社會。為此，12月19日，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兩個總部宣佈合併，召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立大會。12月25日，清華大學5000多名紅衛兵和教職工在北京許多著名的公共場所舉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遊行示威。由此，井岡山兵團崛起並成為在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獨佔鰲頭和在北京乃至全國一領風騷的紅衛兵組織。

然而，自成立之日起，兵團內部就包含著分裂的因素。兵團總部成立第三天，就有唐偉等三名總部委員因分歧而宣佈退出。形成兵團之一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早在1966年8月，就在工作組批鬥蒯大富一事上持中立態度，認為蒯大富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新左派。隨著兵團成立後各縱隊勢力的發展，由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紅衛兵（井岡山縱隊）與另外三大縱隊（毛澤東思想縱隊、八八縱隊和東方紅縱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這主要表現在對文革的理解、形勢評估、工作方法、權力分配、幹部政策、對文革前的清華評價等方面，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幹部政策。這些伴隨著兵團成立、發展而來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致使兵團於1967年4月發生分裂，出現了井岡山兵團總部和「四一四串聯會」兩大派別。在清華園內，前者還被稱為「團派」、「老團」，後者為「四派」、「老四」。因而，在廣義

上，兵團包括團派與四派二者在內，即使四派的正式名稱也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狹義上，兵團特指與四派結成對立關係的團派，反之亦然。團派使自己區別於四派，以兵團正統自居，同時四派也自視為與團派平起平坐的兵團主流。兩派的分歧和矛盾不斷升級，導致雙方走向衝突、武鬥，並且最終導致它們各自組織以至整個兵團的瓦解。在1968年4月之前，兩派的關係發展大體上代表了清華文革初期的走向：

一、1966年12月底到1967年3月為分歧階段。兵團確立了自己在清華的主導地位不久，原井岡山紅衛兵加緊擴大和鞏固自己的勢力：一是對非井岡山紅衛兵加以限制，以團結、聯合為由，將那些不滿於兵團總部某些主張和策略的組織指責為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甚至給昔日盟友扣上「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的帽子，下令解散敢提批評的戰鬥小組；二是對自己的嫡系大加照顧，即使他們犯了「錯誤」，也內外有別；三是以「我」為中心，下令解散非井岡山紅衛兵縱隊，強化自己的集權；四是否定「清華幹部特殊論」，認為清華幹部必須自己站出來「亮相」才能定性，卻又獨自給清華校級幹部「定性」並決定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針對這些，非井岡山紅衛兵認為，造反派不等於革命派，奪權前與奪權後的紅衛兵不能一概而論，井岡山紅衛兵不能一統清華天下，包辦一切。非井岡山紅衛兵積極、廣泛地與井岡山紅衛兵爭權奪利。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使兵團內部從未達到思想上的統一，儘管迫於壓力，兵團總部多次進行所謂整風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兵團面前：如何對待急於要求「解放」和工作的原清華中、基層幹部呢？

二、1967年4月至8月為分裂階段。1967年3月，《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評論員的文章以及調查員的調查報告，以清華

工作組為例，批判劉少奇在幹部問題上的「資反路線」。這在清華園裏引起很大反響。因為，文革剛進行了10個月，被工作組打入「另冊」的清華廣大中、基層幹部紛紛出來要求「平反」、「平黑」，要求「解放」和重新工作。他們的舉動，更主要的是他們的參與，影響到清華文革運動的走向。作為正宗的造反派之一的兵團總部，當然不會認可昔日幹部權威東山再起，也不會接受昔日幹部勢力捲土重來。大多數幹部自然紛紛轉入在兵團內與井岡山縱隊形成問鼎之勢的相對溫和的縱隊之中。4月14日，由五個縱隊組織召開、20多個戰鬥組參加的「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成立了「四一四革命串聯會」，借《紅旗》雜誌上的文章來批判那種否定一切幹部的做法。該串聯會隨後多次與兵團總部進行會場辯論和會場糾紛。前者要求為幹部「平反」、「平黑」，後者要求幹部自己起來造反，由群眾評定。4月29日，原團委副書記譚浩強、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等147名原中、基層幹部聯名發表致革命幹部的公開信。這封信是對「四一四串聯會」的回應和支持。兵團總部反駁說，譚浩強等人不是中央文革小組肯定的幹部，上述的信是「復辟舊清華的宣言書」。5月9日，「四一四串聯會」已不參加兵團的會議及有關活動，單獨召集會議。4月30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11人）成立，兵團總部封它為在革委會成立之前的清華臨時領導機構。兵團總部對「四一四串聯會」既打又拉，由不承認其合法到被迫承認，都是為了儘快建立清華革委會。5月12日和21日，謝富治（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來清華促使兩派達成聯合的四項協定，確定了擴大為22人的革委會籌備小組名單。四一四群眾指責自己代表的妥協，拒絕四項協議中關於必須執行革委會籌備小組和兵團總部決議的

條款。5月24日，兵團總部下發清華革委會成員討論名單，要求一定要在5月30日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四一四串聯會」針鋒相對，拒絕參加自己只佔少數的革委會籌備小組以及成立革委會的一切準備工作。5月29日凌晨，四一四廣播台廣播了四一四總部正式成立的消息，發表了成立宣言，標誌著與兵團總部決裂。5月30日，由於團派請求周恩來參加清華革委會成立大會，而周恩來得知清華兩派沒有聯合後轉給團派的是不便於參加的通知，最主要的是四派的致命一擊，致使團派的革委會之夢化為泡影。6、7月間，儘管兩派試圖聯合，但由於團派堅持必須執行四項協議，而四派堅持自己的總部與團派總部對等的原則，使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

三、1967年9月至11月為暫時聯合階段。迫於種種壓力，兩派9月21日成立了兵團聯合總部，並於11月8日才遲遲正式宣佈成立聯合辦公室、聯合廣播台、聯合政治部，取消各自相應的機構，組成由團派17人、四派16人為委員的聯合總部委員會。團派的一些人對此深為不滿，拉出了自己的組織「鬥私批修聯絡站」，聲稱要「鬥蒯大富的私，批四一四的修」，因為蒯大富急於要當聯合之後才有可能的革委會頭頭，而四派內部有人炮打陳伯達和中央文革小組，給團派排擠四派提供了口實。兩派的矛盾沒有因為暫時的、表面的聯合而縮小，反而愈益尖銳和擴大，發生了一些武鬥及衝擊對方會場、辦公場所的事件。兩派都已意識到雙方之間更大規模的武鬥衝突的不可避免。

四、1967年12月至1968年4月中旬為糾紛和武鬥階段。自1967年12月起，兩派的鬥爭愈益集中在如何評價文革前的清華及其幹部的問題。傾向團派的個別中層幹部認為，只有提出「新資產階級論」才能接觸清華運動的特點；有人提出開展「三大戰役」，即批判所謂原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領導人「呂應中道

路」、「批判新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批判前黨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兩派關於這一問題的分歧將於後面詳述，兩派的觀點交鋒此時已轉向行動中的衝突。在所謂「三大戰役」期間，團派召開多次鬥爭蔣南翔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大會，批判了原校、系一級的許多幹部和教授。由於原中、基層幹部大批倒向四派一邊，更直接的是由於團派風聞四派將推舉原中層幹部出任未來的清華革委會領導人（而團派麾下的革委會所謂「三結合」幹部沒有甚麼代表性），他們以一首林彪語錄被改為四派戰歌為藉口，於12月底下令通緝四派總部6名委員，其中1人被抓。12月24日，團派綁架、毆打和秘密關押了四派大力保護並推舉的呂應中，並於6日、9日和20日查抄了20多名站在四派一邊或同情四派的原清華中層幹部的家，其中一些幹部被打傷，一些被抓走。

在這期間，兩派之間發生了數十起小規模的流血武鬥。兩派互相衝擊對方的重地，大造聲勢，盡最大可能壓倒對方。12月25日，團派為紀念一年前的反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一周年進城舉行遊行宣傳，大叫要立新功，要為中共「九大」召開掃清道路，要讓造反派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次日，四派也進城遊行宣傳，直斥蒯大富想當中共中央委員，大拆團派的台。1968年1月3日下午，兩派為爭奪學生12號樓中的原四派一間廣播室，發生了第一次有數百人參加的大規模武鬥，武鬥直至次日清晨結束。1月30日（春節），任職四派總部宣傳部的羅征啟在家中被綁架，3月27日因不堪受折磨逃出關押點，團派匆忙於當晚抓走四派10餘名人員，加以關押、毒打。2月23日，四派在給中共中央有關方面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幹部問題是建立清華大學革委會的關鍵，提議讓清華原黨委委員8至10人進入革委會，斷定由「革命小將」擔任革委會第一把手是不適宜的，要求中央委派軍代表或其他人來擔任。4月4日晚，一直監視羅征啟家的團派保衛

組的幾個人抓走了羅征啟之弟羅征敷(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 28歲), 毒打後用擦車棉紗堵住其嘴, 塞入後車廂, 拉回清華, 活活悶死。4月14日、15日, 團派關押了所謂「羅文李饒」案中的文學宓、李康、饒慰慈、劉承嫻(皆為清華中層幹部, 與羅征啟一起, 支持四派的幹部政策)等人。作為報復, 四派對原電機系黨總支副書記、代書記陶森進行抄家, 把陶森綁架至四派佔據的科學館, 因為陶森代表31名幹部批評了四派的幹部政策。四派決定4月23日在禮堂召開批鬥陶森會議。4月22日夜, 團派決定與四派進行決戰, 誓死要把四派從清華園壓下去或趕出去。4月23日, 兩派開始了震驚中外的「百日大武鬥」。

團派之所以要發動大武鬥, 直接原因還有三點: (1) 3月24日中共中央公佈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後, 團派急於把他們與四派掛鉤, 鼓吹「楊余傅的黑後臺」就是「四一四的黑後臺」。團派頭目想方設法使中共中央直接過問清華問題。(2) 3月27日, 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鬥, 戰勝其對立面——北大「井岡山」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新北大公社」, 使聶元梓一派由武鬥前的不利地位轉變為武鬥後的有利地位。團派頭目想借用北大的經驗, 迫使中共中央表態支持自己, 從而一舉壓垮四派。(3) 團派急於要幹掉四派, 以實現自己獨霸清華的局面。3月底4月初, 團派上層就醞釀有關武鬥的問題。4月10日, 在團派舉行的紀念批鬥王光美群眾大會一周年的會議上, 蒯大富聲稱要與四派決戰到底。團派總部意識到, 只有通過決戰性的大武鬥, 才能解決清華校園內曠日持久、懸而未決的兩派對峙局面。四派抓走陶森, 點燃了團派發動大武鬥的導火索。

4月21日零時, 團派宣佈在四派根據地之一及關押陶森所在地——科學館周圍20米區域實行宵禁。同日1—2時, 團派

上千人在校園內遊行, 抗議四派抓走陶森, 路經科學館時, 一些人向該館投擲石塊。同日上午, 團派召開武鬥策劃會議, 對是否包圍、攻打科學館並給其斷電斷水進行討論。蒯大富認為, 清華兩派鬥爭一年多未見分曉, 最後解決總要伴隨大武鬥, 先下手為強, 誰早誰主動。團派作戰部部長任傳仲聲稱, 寧可傷亡500人, 也要攻下科學館。儘管會上有些人反對武鬥, 但還是通過了當日夜間包圍科學館的決議。會後, 團派幾個分部群眾經過討論, 拒絕執行此決議。另外, 北京衛戍區負責人聞訊趕來, 加以阻止, 致使當日武鬥未能進行。

4月22日, 為抗議團派頭目和某些群眾的「軟弱」, 團派廣播台以及前哨廣播台「罷工」。同日, 團派總部多次召開會議, 蒯大富分析形勢, 講明利害, 「只要我們挑起武鬥, 擴大事態, 就迫使中央表態, 於我們更主動。」「清華的問題不只是清華的問題, 非中央過問不能直接解決。」「沒有武衛就搞不了文攻」, 再不搞武鬥, 「革命幹部從此就要離開我們, 戰士們也灰心喪氣, 紛紛不幹了」; 「我們的隊伍就要分裂、垮台」。會上, 決定立即實施封鎖科學館、佔領禮堂的行動, 成立6人組成的「文攻武衛指揮部」, 並對有關頭目和隊伍做了分工、部署。為防止走漏風聲, 在當日夜間零點左右派人佔領禮堂並從暖氣管道運進長矛後, 會議人員才得以離會。由此, 團派正式拉開了百日大武鬥的帷幕。³

³ 中國國內一些關於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的文獻資料報導或記述有著明顯的錯誤:

金春明、黃裕中、常惠民編的《「文革」時期怪事怪語》(北京: 求實出版社, 1989年)一書中, 關於「清華百日大武鬥」一條, 把百日大武鬥開始的時間定為1968年5月30日。參見該書頁312。

二 過程

4月23日凌晨。團派在佔領禮堂、新舊水利館後，發出封鎖禮堂附近區域的「第一號通告」，指責四派向禮堂偷運480根長矛。清晨，四派佔領舊電機館、動農館、土建館、汽車樓。團派決定攻打舊電機館，這關係到在清華中心地帶禮堂區包圍科學館、分割與四派佔領的動農館之間聯繫的問題。兩派為爭奪舊電機館進行了6個多小時的武鬥，數百人參加，動用了石塊、瓦片、硫酸、長矛等，約有50多人負傷。在其他一些地方，還有零星的衝突。中午，北京衛戍區200餘名官兵進入清華制止武鬥。傍晚，北京市革委會、衛戍區發出《關於立即停止清華大學武鬥的聲明》。團派拒絕承認此聲明。

帶有大事記性質的《20世紀中國全記錄(1900-1994)》(廣州文化事務傳播所主編，吳少秋、陳方遠執行主編，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5年)，關於「清華大學紅衛兵連月血戰」一條，通篇錯誤，不堪卒讀。參見該書頁921。

地久、致武著的《血與火的教訓——文革重大武鬥慘案紀實》(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年)，關於「清華大學百日大血戰」的記述，有一些時間、地點、事件、數字等方面的錯誤。參見該書頁11-43。

丘引著的《蒯大富演義》，原載《中外通俗演義》1985年第1期，後收入《亂世狂女》一書(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6年)，關於「清華百日大武鬥」的該演義第九回，謬誤多處，令人好笑。參見頁255-61。

向祚鐵、侍衛華著的《清華大學演義》(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一書，關於「百日大武鬥」的記述與唐少傑1995年在《二十一世紀》10月號(第31期，香港)上發表的《紅衛兵運動的喪鐘：清華百日大武鬥》中的記述，在文字上如出一轍。參見該書頁419-28。

4月24日。四派衝進工字廳，破壞團派設在此地的辦公機構，加固科學館及其周圍的工事，毀掉團派前哨廣播台的電線和喇叭。團派發出實施自21時起在禮堂區戒嚴的「第二號通告」。團派指責解放軍宣傳隊和北京衛戍區「偏袒」四派。

4月25日。凌晨，團派給科學館斷水斷電，從幾處攻打該館，未成功。上午，四派近千人在校內遊行，抗議團派挑起武鬥，支持有關制止武鬥的聲明，並在科學館門前召開批鬥陶森大會。兩派不斷衝砸對方有關場所，搶佔地盤，構築工事、路障等，互有人員負傷。1968年2月24日才進駐清華的、由40餘名官兵組成的解放軍宣傳隊向兩派宣佈，除其主要領導人，全部隊員「暫時撤離清華」。宣傳隊不願過多地介入兩派武鬥，對清華局勢已無能為力。團派領導人寫了《向江青同志告急！！》，「彙報」清華武鬥情況。

4月26日。四派數次抄、砸團派一些教職員工的家。團派200多人攻打8號樓，未成功，多人受傷。同日，清華師生開始大批外流。

溫樂群、郝瑞庭主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中「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之升」，有幾處時間上的錯誤。參見該書頁18-27。

國外人士關於「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記述，有當年被稱為「美國友好人士」的韓丁(William Hinton)，於70年代初在文革時期中國有關部門組織和安排下，所作的關於清華文革的「採訪」而寫的《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Hundred Day War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該書是對清華文革初期一些當事人採訪的談話紀實，對於人們瞭解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沒有甚麼學術價值，而且該書帶有文革時期一些思想和觀點的局限。

4月27日。團派已佔領全校14座學生宿舍樓的11座，四派佔領了3座(5、8、12號樓)。團派還佔領多處樓房及食堂。四派僅佔領了一處食堂(9飯廳)。上午，四派人員姜文波(土木建築系給0班)乘看守不備，從2號樓三層關押點逃出，因團派人員追趕，被迫跳樓，頭部先觸地，死亡。團派成立了9人組成的「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並召開總部擴大會議，部署武鬥「戰區」、力量配置和任務等。

4月28日。在解放軍宣傳隊領導人主持下，兩派交換武鬥被俘人員。近日來，四派不斷從有關倉庫運走大批物資及糧食。團派發佈關於武鬥的總部擴大會議紀要，聲稱「用革命的暴力鎮壓反革命的暴力，痛殲四一四思潮，搗毀清華地下復仇軍」。這一紀要是團派的武鬥宣戰書。

4月29日。中午，四派100多人從清華36所糧庫搶糧，運至科學館。下午，團派200多人前去四派佔領的9飯廳搶糧，遭遇四派60多人的攔截，雙方用長矛、石塊等激戰。團派一輛卡車朝四派隊伍衝擊，從四派人員謝晉澄(自動控制系94班)身後壓過其右胸至頭部，謝晉澄當場死亡。至4月底，清華已有60%的人員離校逃難。

5月1日。兩派在解放軍宣傳隊主持下簽訂交換被俘人員協定，兩派代表發生毆打。團派攻佔材力館，次日又攻佔土建館。兩派又有多人受傷。

5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決定成立由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人負責的關於清華、北大等武鬥的調查組並開始工作。因有蒯大富在內，四派拒絕此調查組。上午，四派千餘人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抬屍(謝晉澄之屍)集會，聲討團派，揚言「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向蒯大富討還血債」。會後，舉行抬屍遊行，並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次日，四派摧毀團派一些

工事和路障，摧毀東區所有電話線路。四派廣播台開始通宵廣播。

5月8日。團派總部召開有關武鬥大會。鑒於四派不交出羅征啟等人，不釋放陶森等人和不拆除科學館工事，團派總部命令其「戰士」：一個工事也不許拆，一個長矛都不許交。

5月9日。解放軍宣傳隊代表向兩派宣佈其最後人員立即撤離。兩派都意識到，宣傳隊全部撤走後，武鬥必然升級。

5月10日。四派決定再次召開批鬥陶森大會。團派廣播台說要對此次大會採取意想不到的革命行動。清晨，團派切斷電源，對四派預定的會場各路口實行戒嚴，並再次攻打科學館，未成功。團派搗毀設在科學館附近的變壓器，切斷了電源，四派用早已備好的柴油發電機發電。四派把批鬥陶森大會移至動農館前舉行之後，團派「文攻武衛指揮部」緊急命令，調動四輛土裝甲車和200多武鬥人員衝擊會場。雙方動用磚頭、石塊、鑄鐵和鋼料製成的試驗物件、長矛等進行拼殺，四派還投擲了多枚土炸彈。兩派各有多人流血負傷。

5月14日。四派佔領焊接館。團派100多人攻打汽車樓，未成功。晚上，四派人員孫華棟(無線電系01班)騎自行車從動農館返回科學館的途中，被團派人員綁架至第一教室樓內，遭毒打，內臟完全被打壞，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兩臂打爛，約9小時後死亡。15日上午，團派人員把孫華棟之屍體送至阜城門外醫院後，逃之夭夭。一周後，四派得知並前去認領、調查。

5月15日。團派佔據清華校園與校外的大多數通道和校門。四派與校外的通道只剩下東門。

5月16日。兩派在毛澤東塑像前(原二校門處)交換數十名被俘人員。

5月17日。四派20多人抄查設在中南海附近的騎河樓(華招待所)處的蔣南翔專案組，搶走有關資料。四派佔領了清西主樓。團派佔領了9003大樓，旨在控制四派通往東門的路。四派攻打該大樓，未成功。次日，四派佔領了包括工程理系館在內的整個主樓。團派佔領了綜合機械廠。

5月19日。四派綁架團派總部委員陳育延至科學館，6後，因陳育延疾病復發，釋放。大武鬥期間，兩派各指責對要搞暗殺活動。團派虛誇地聲稱，四派組成暗殺團要暗殺蒯富等人。四派指責團派試圖綁架或傷害外出的四派頭目。

5月21日。團派100多人攻佔汽車和拖拉機實驗室，破壞輛汽車、6台拖拉機，搶走其他一些車輛。團派切斷通往四佔據的大多數樓館或車間的高壓輸電線。四派遠程奔襲團派領的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昌平縣境內)，搶走5輛汽車。次日，團派再次攻打汽車樓，未成功。該樓是四派生產土武的基地之一，也是控制通往南校門道路或威脅動農館的要塞。

5月26日。四派抬著孫華棟的屍體進城遊行示威，抗議派的暴行。

5月25日、29日。團派多次開會，商討並籌備以武鬥來「紀念」1967年5月30日團派革委會流產一周年，以發洩對四派破壞團派革委會成立活動之憤。團派確定以四派佔據的東區浴室為攻打目標。蒯大富等團派頭目多次對該目標進行實地偵察。東區浴室不僅是四派的糧倉之一，而且與5、12號樓互為犄角構成四派在清華東北區的戰略要地。拿下東區浴室，既可控制四派人員就餐的9飯廳，又可威脅5、12號樓，還可切斷東區主樓在校園牆外形成的交通小道。團派決定在四派未修建東區浴室工事之際發動進攻，並任命武鬥指揮，部署武鬥隊伍。

5月30日。3時(一說3時30分)，蒯大富在清華電廠拉斷總電閘，作為進攻信號。選擇此時顯然是為了「紀念」去年同一時間，團派廣播台廣播周恩來不能來清華參加革委會成立大會而致使成立活動夭折的通知。團派手持長矛、大刀等武器的200多人隊伍輪番進攻，東區浴室內的四派守軍拼命抵抗。4時30分許，主樓區的四派100多人前去增援，與團派阻擊隊伍在東大操場西邊路上遭遇。5時許，四派人員卞雨林(化學系003班)左肩胛中了團派射出的箭矢(一說體育比賽用箭)，約20分鐘後死亡(一說箭頭塗有氯化鉀)。5時後，四派第一次出動土坦克，掩護60餘人衝鋒增援，在東大操場西北角路口與許恭生(冶金系焊82班)指揮的10多人的團派隊伍交戰。許恭生在混戰和撤退中被絆倒，四派一些人上前用長矛亂刺，許恭生身上被刺中20多處，腿股動脈和肝臟被刺破，死亡。

團派東區武鬥隊伍充當攻打東區浴室的主攻，進攻分為四個梯隊：一梯隊試圖以梯子攀上浴室屋廳，二梯隊在9飯廳屋頂上向浴室投擲石頭磚塊，三梯隊在地面上用彈弓車射擊浴室並封鎖5、12號樓門口，四梯隊在浴室內燃起大火，致使該浴室燒毀。團派的進攻大約有四大波次，並把土炸藥包、輕機槍拿出來準備對付四派的守軍和援軍。團派試圖用土炸藥包炸毀前來增援的四派土坦克，因炸藥失效(一說四派切斷引爆線)，未成功。團派頭目幾乎全部親臨現場指揮或參戰，其武鬥指揮人員在9飯廳多次召開所謂前敵指揮部會議，協調攻打步驟。7時15分左右，團派使用燃燒彈、汽油瓶、硫酸瓶等從外部火攻浴室。9時許，團派隊伍從北、西兩邊攀梯進攻，把浴室守軍逼至浴室二樓屋頂，雙方展開拼殺。團派人員段洪水(修繕科工人)被刺中頭部，摔下身亡。團派有多人在屋頂拼殺中摔下重傷，其中一人癱瘓。久攻不下，12時許，團派調集數桶數百公

斤(一說一噸)汽油潑入浴室，塞入大量易燃物和乾辣椒，從內部燃起大火。消防隊5輛救火車趕來救火時，被團派阻止。團派的東、西兩支阻擊隊伍還與5、12號樓的四派隊伍多次交鋒。13時許，團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經過喊話勸降，最終使浴室守軍打著白旗下樓。

在團派攻打東區浴室之際，四派總部採取「圍魏救趙」之計，糾集大批人員，攻打團派佔據的第一教室樓。四派投擲燃燒彈、汽油瓶等，使該樓燃起大火。團派守軍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進攻。14時，四派總部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緊急報告，要求營救被俘人員，制止團派武鬥。

5月30日大武鬥持續近11個小時，是清華百日大武鬥兩派損失最大、傷亡最重的一次武鬥。團派投入300多人，死亡2人；四派投入300餘人，死亡1人。兩派共有250多人負傷。儘管東區浴室被團派攻下，但是僅有21人的四派守軍的抵抗卻使團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超出了此次大武鬥發動者的預想，並使得團派日後再也不敢向四派挑起大規模的武鬥進攻。當日深夜，5、12號樓的四派人員被迫撤至四派的「中心根據地」——焊接館。至此，團派控制了清華80%的地盤。

5月31日。四派總部發出關於武鬥戰略轉移的文告，就昨日大武鬥，指責蒯大富是清華的「頭號戰犯」，決心與團派血戰到底！5月30日大武鬥後，非武鬥人員大批離校。

6月1日。四派一夥人在西單張貼反對團派的大標語，與團派一夥人遭遇，發生毆打。次日，四派人在新華門對面張貼反對團派的大標語，恰巧被過路的團派20多人發現，雙方在新華門前毆打、械鬥，造成兩小時的交通阻塞。

6月上旬。兩派各自有給對方的據點斷電、斷水的襲擾活動。團派揚言7月份將把四派趕出清華，四派發誓決不退。蒯大富等去北京大學向聶元梓「請教」武鬥經驗，聶元梓再次強調政治勝利與宣傳主動的重要性。6月11日，團派「文攻武衛總指揮部」召開會議，反復討論武鬥形勢和武鬥策略，認為有三個問題根本不存在：一是對四派停止武鬥；二是四派放下武器停止武鬥；三是武鬥絕對不升級。團派已扣押四派70多人，四派扣押團派17人。

6月12日。原清華黨委統戰部副部長劉承嫻被迫害致死。劉承嫻於5月31日在200號團派專案組關押點跳樓受重傷，被化名後，輾轉數地，醫治無效。

自6月中旬至7月中旬，兩派常常不分晝夜地出動小股遊擊人員，武裝偷襲或騷擾對方據點，毀壞對方有關設施。例如，炸毀對方生產武器的機床；在對方生產武器的車間門窗懸掛手榴彈；對正在就餐或工作的對方人員進行爆炸恐嚇；難以列舉。

6月15日，針對5月30日大武鬥的心理影響以及為提高其武鬥人員的士氣，團派總部決定對其「文攻武衛大軍」進行「整訓」，主要內容：團派頭目做形勢報告；在各據點播放團派所搞的「羅文李饒」等人所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審訊錄音，以堅定同四派鬥爭的決心；請廣西、新疆及重慶地區的造反派頭目介紹武鬥經驗，強調以武鬥來佔據地盤、擴大勢力的重要性；發表團派總部關於兩個月的武鬥總結。次日，團派在天安門廣場召開集會，聲討四派，散發〈清華井岡山人就清華武鬥問題告全市人民書〉。

6月19日。15時許，8號樓外西南處的團派崗哨向四派佔據的8號樓樓窗開槍，武鬥升級，由「冷兵器」階段進入「熱兵器」階段即槍戰階段。

6月23日。團派總部召開擴大會議，通過兩個月武鬥的總結草案，決心「一手拿筆，一手拿槍」，保持「政治上軍事上的足夠優勢」。次日，為紀念蒯大富等人反工作組兩周年，團派一百多人分六隊奔赴天安門、北京站、西單、平安里、和平里、海軍大院、總後勤部大院進行痛斥四派的大宣傳活動。

6月下旬。團派人員從地下管道潛入8號樓，給四派自掘的小水井投入瀉藥（此樓自6月初就被斷水斷電），造成四派的守樓人員嘔吐、腹瀉、肢體無力。6月29日，8號樓的四派試圖突圍，未成功後，在樓頂上打旗語向焊接管的四派總部求援。次日清晨，主樓區的四派出動兩輛土坦克和80多人的長矛隊前往8號樓增援，遭到團派阻擊，雙方交戰，各有損傷；四派退卻。9時許，8號樓的四派全部人員撤往科學館，與團派隊伍在禮堂東面交戰，雙方動用了手槍、手榴彈、長矛、石塊等。四派投擲的數枚手榴彈炸傷團派10多人，其中1人腿被炸斷，另1人腸子被炸壞。團派總部遂決定武裝封鎖科學館，命令手下人員：凡有出入科學館者，一律開槍射擊。四派總部宣佈處於「一級戰備狀態」。7月上旬，團派總部針對下屬武鬥人員怕開槍打死人負責之事，多次聲明：「打死人由總部負責，不由個人負責」。

7月1日。團派總部下令，武裝封鎖清華東門及其周圍的通道。團派用試製的土迫擊炮轟擊科學館，未成功。次日，四派人員闖入北京體育學院，因為團派4月23日後把清華大部分汽車放入該院，四派搶走2輛摩托車，破壞9輛汽車，奪走數百公斤汽油，並抓走7名團派司機。

7月4日。2時20分許，設在聞亭（為紀念聞一多先生而建）上並配有探照燈、四周有電網和雷區的團派地堡崗哨，發現科學館後門附近有人影移動，黑暗中開槍擊中四派人員朱育生（土

木建築系房01班）。子彈從背部左肩胛打進，再由右胸右上部射出。科學館的四派人員發現朱育生躺在地上，他已死亡多時。

7月5日。9時許，外出運輸彈藥的四派人員乘團派警戒稍鬆之際，從一教樓與科學館之間穿過，進入科學館後門，設立在一教樓西北面小土山（原王國維先生紀念碑在此）上的團派地堡值勤人員發現後，開槍射擊，擊中正在科學館後門交通壕中修工事的楊志軍（電機系01班），子彈切斷右頸部動脈和氣管，口、鼻、頸部流血不止。四派廣播台緊急廣播，要求與團派談判，以便把楊志軍送往醫院搶救。團派前哨廣播台廣播說，只許四派談判代表1人前往禮堂。四派幾個人抬著楊志軍剛出科學館就遭到團派開槍狙擊。團派反復廣播，四派必須打著白旗，限定人數，到禮堂，按指定的路線送楊志軍外出治療。四派代表反駁說，人都快死了，不要提甚麼屈辱條件了。團派斷然拒絕。楊志軍在中彈後半小時左右死亡。

7月6日。團派發動猛攻，從四派手中奪回工字廳。11時許，楊述立（動農系實驗員）搭乘四派土坦克外出採購，在毛澤東塑像東側至主樓的大道上，遭到設在校衛隊的團派地堡的射擊，穿甲彈穿過鐵甲，擊中楊述立心臟大動脈。楊述立因流血過多，死亡。

7月7日。清晨，四派人員在清華園外1.5公里遠的雙清路，炸毀通往清華校內的3.5萬伏高壓輸電線杆多處，報復團派對四派據點進行的長期斷電，卻致使清華園及中關村95家單位停電4小時之久。下午，四派近百人在天安門前召開「呼救大會」，並抬著楊述立屍體，在天安門、前門、北京市革委會和公安局所在地以及使館區遊行，抗議團派暴行，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

7月9日。8時30分許，團派武鬥人員用大彈弓向科學館四樓（四樓基本上是木製結構）頂層上的廣播喇叭群支撐木架，拋擲燃燒瓶，燃起大火。四樓北、南部先後燒塌，站在禮堂屋頂都能感到火勢灼人。9時，設在科學館的四派電台致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緊急呼救。9時許，蒯大富發表了廣播聲明說，科學館沒有救了，命令四派必須保證被押的團派人員安全，敦促四派投降。11時又重播了此聲明。團派廣播台喊話勸降20餘次，說大火是四派自己放的，是「新的國會縱火案」等。10時許，消防隊前來救火，經團派一番檢查、刁難後，12時後才進入科學館。團派給消防隊下達規定：不許搶救四派人員，不許搶運四派物資。團派還派自己人化裝成消防隊員，進入科學館進行「戰場偵察」。團派限令，消防隊員必須18時前撤離。消防隊撤離時再次受到團派檢查，團派迅即重新封鎖科學館。

7月16日。四派從動農館挖掘通往科學館的地道（未完工）被團派從掘進處爆破炸毀。團派從炸塌處往地道內灌水、投擲手榴彈。此次爆破使四派總部營救科學館的突圍計畫最終破產。科學館內，慘不忍睹。兩具屍體無法運出，早已腐臭。20多名傷員傷口感染、惡化。整整100人在炎熱之中，為防止槍擊中彈，只能擠在樓道內生活。20多天裏，未運進點滴食物和蔬菜。臨時掘的一口水井，遠不夠使用。

7月17、18、19日。兩派人員在西單、前門、王府井等地互相撕毀對方的大字報、大標語，發生鬥毆。

7月18日。12時許，錢平華（自動控制系82班）從蘇州家中返京回校，因不知清華東門已被武裝封鎖，從該門進入後，行至西主樓東側，遭9003大樓上的團派據點槍擊。子彈從左前臂射入，從右前臂飛出，橫穿胸部，擊中主動脈，打斷脊椎及三

根肋骨，肺部多處穿孔，死亡。四派在主樓前工事的值班人員前去搶救時遭到狙擊。

7月上、中旬，清華校內，槍聲時起，爆炸聲不斷，共有10多人被擊傷。大武鬥期間，四派人員還在校電話室總機室附近的地下電話線路樞紐處截聽、記錄或錄音團派頭目及有關人員大量通話。兩派都到一些教授家中強行「借」錢，扣發部分教職工的工資，挪為武鬥資金之用。一些教職工還為自己所支持的派別募捐錢物。

進入7月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針對許多高等院校武鬥嚴重的情況，多次召開有關制止武鬥、宣傳並貫徹中共中央「七·三佈告」（關於制止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鬥的佈告）精神的有關會議，準備在中關村召開制止武鬥的群眾大會和派遣宣傳隊在高校所在地進行宣傳活動。謝富治指示團派提交關於制止武鬥的方案，並向團派頭目打招呼，說可能要派工人遊行隊伍進入清華宣傳。

7月6日至25日，團派數次召開總部會議，討論制止武鬥問題。團派一些武鬥指揮人員強調：「七·三佈告」不適用於清華；團派與四派的武鬥有特殊性；團派必須用攻佔科學館的既定事實來求得武鬥後的主動及有利地位。團派總部向北京市革委會等有關方面提出停止武鬥的三個條件：由北京衛戍區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員以及羅征啟、文學宓、李康、饒慰慈等人；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校制止武鬥，首先要拆除科學館工事；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及北京市革委會直接解決清華問題。團派對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制止武鬥的指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至少沒有做出應有的預測，更不用說做出切實的回應了。

相反，自6月下旬以來，勢力相對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後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派宣傳隊進駐清

華，或對清華大學實行軍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團派在清華的霸主地位，結束武鬥，從而結束自己在整個武鬥中的被動地位。

7月26日17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北京市革委會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的動員部署大會。市革委會的負責人和約有63個單位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個單位3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最初稱「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後稱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從各自單位出發，奉命開往兩派武鬥人員總共不足千人（一說600多人）的清華大學，進行制止武鬥、拆除工事、宣傳「七·三」佈告等文件的工作。該工宣隊的領導人實際上由中共中央警衛部隊（8341）在京一些單位的軍代表擔任，他們負有特殊使命。約9至10時，工宣隊各路隊伍抵達清華南門、西門（主要隊伍在此）及東門。工宣隊指揮部要求全部隊伍必須於11時開進清華校內。

團派上上下下對這突如其來、聲勢浩大的工宣隊，事先竟毫無所知（把數萬人的工宣隊訛傳成10多萬人），也沒有準備，但是他們十分明白，工宣隊的開進意味著團派稱霸清華的結束。團派作戰部部長任傳仲帶隊帶武器趕至西門阻攔工宣隊。後來，由於自南門等地先進來的工宣隊員開通西門，才使整個工宣隊於中午時分進入清華校內。工宣隊下屬的8個團，按照預先所定的計畫差不多同時到達各自執行的任務所在方位，以分片包乾而不是逐一推進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對兩派據點的「分割」和「包圍」，發起宣傳、喊話「攻勢」，以眾多的人勢（整個工宣隊與兩派武鬥人員之比約為50比1）把所遇到的武鬥人員團團圍住（實為扣住），進行宣講工作。同時，開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鐵絲網、電網等。

11時30分，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通知蒯大富（因蒯大富不在，讓人轉告）：工宣隊要開進清華，要團派大力支持工宣隊。12時多，從北京站接人剛剛回來的蒯大富在靜齋屋頂大聲斥責前來「包圍」的工宣隊，責問他們為甚麼不去主樓而來靜齋，表示決不放下武器，爾後召集團派總部會議。會議決定：一、緊急上告北京市革委會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據點抵抗工宣隊，必要時可使用武器。團派頭頭們已意識到團派到了生死關頭，他們通過打電話和派不易被識破的小孩穿過工宣隊的重重包圍隊伍，把抵抗的命令傳達到團派各武鬥據點。

14時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會「告狀」，結果與市革委會負責人大吵一通，他責問吳德：「誰把幾萬工人派到清華，把我們學校打得一塌糊塗？」他警告不要把清華井岡山當成「上柴聯司」（上海柴油機廠的一個群眾組織，1967年8月4日，被王洪文指揮的「工總司」隊伍打垮，——注）來打，「我們不是好欺侮的」，揚言如果要把清華井岡山當成「上柴聯司」來打，「我們就以死一拼」。晚飯後，在謝富治、吳德、工宣隊代表與蒯大富參加的會議上，謝富治命令蒯大富：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謝富治指示蒯大富與工宣隊代表一起立即回清華實施上述命令。

在清華，中午時分，工宣隊進入科學館，查繳四派武器，館內人員全被帶出。工宣隊抵近禮堂時，團派人員引爆電發地雷。經過談判，工宣隊被允許進入禮堂。在禮堂裏，工宣隊搜查出團派一些武器及武鬥工具。工宣隊還在甲、乙、丙所搜出團派大批雷管、炸藥、長矛和自製槍支等。工宣隊在電廠與團派守軍對峙，團派頭目下令開啟電網電閘，以阻滯工宣隊進入電廠。

13時多，靜齋（團派總部所在處）的團派隊伍在團派作戰部部長帶領下，用石塊、長矛等衝擊在靜齋後門的工宣隊，使許多工人掉進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並扣留了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的汽車、司機和公事包。15時許，40多名工人、軍代表先後被關進靜齋，遭到審訊和毆打。靜齋的團派隊伍襲擊甲所、乙所、工字廳的工宣隊；16時許，配合明齋等地的團派隊伍攻打大禮堂周圍的工宣隊；約天黑時，襲擊丙所。這支隊伍一天下來，使用長矛和手榴彈，連刺帶炸，致使100多名工人負傷。僅作戰部部長一人就用長矛刺中7名工宣隊隊員的腰部或腿部或臀部。

14時至15時許，團派60餘人在明齋驅趕工宣隊，刺傷、砸傷、炸傷數十名工人，把那裏的工宣隊趕至禮堂一帶。16時左右，這支隊伍在三院與其他團派隊伍一起向禮堂周圍的工宣隊發起進攻，動用了手榴彈、長矛、石塊、彈弓等，造成130多人負傷，一軍代表被炸傷，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約14時，工宣隊完成了對10、11、12號樓的「包圍」。15時許，宣傳隊開始進入10號樓，並與團派守樓者逐層對陣；16時許，守樓者兩邊夾擊，俘虜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樓。17時許，10、11、12號樓的團派人員同時「突圍」，向工宣隊衝擊，刺傷、炸傷、砸傷、打傷許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趕至東大操場，並破壞停放在那裏工宣隊的車輛，搶走工宣隊的一些食品、物資等。約17時30分，在10號樓一樓樓道內，王松林（北京第二機床廠副科長）被團派扔出的手榴彈炸死。18時許，天下起雨來，從10號樓撤至東大操場南端的張旭濤（北京541廠工人）被追趕的團派用手榴彈炸死。18時許，在撤至12號樓西北面場地的工宣隊中，潘志洪（北京市供電局工人）被追趕的團派用手榴彈炸死。

17時至20時，住在13號樓的數十名外地造反派進京上訪人員，在團派的鼓動下，用團派提供的武器，衝出大樓，加入追趕、襲擊工宣隊隊員的活動，致使一些工人受傷。

自午後至深夜，第一教室樓等地的團派武鬥據點，各自為戰，對其據點周圍的工宣隊頻頻出擊，用手榴彈等偷襲工宣隊臨時營地，綁架個別隊員，伏擊工宣隊要經過的道路等，使工人受傷人數增加。

21時左右，團派幾個頭目（蒯大富不在）在靜齋開會，決定深夜攻打9003大樓，他們以為工宣隊指揮部設在該樓。更重要的是，該樓是團派最大的武器試製、生產基地之一，樓內僅手榴彈就存有數百顆。約13時，工宣隊包圍該樓後，開始拆除樓外工事、障礙，並破開門障，進入樓內。團派30多名守軍不得不逐一樓層拼鬥，打傷10多名工人後，退至樓頂，待深夜團派的60多人增援隊伍趕來時，迅速衝下，用長矛刺死在三樓一房間裏休息的韓忠現（北京第一食品廠工人），打傷許多工人。約23時20分，樓外的團派人員開槍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膠四廠工人）。兩支隊伍裏應外合，內外夾攻，使團派重新佔領9003大樓，而樓外實際上有數千名工人待命。直至7月29日，團派在該樓頂上架起望遠鏡，每個樓角架起一門土炮，每個窗口處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彈、暖氣片等，大有決一死戰的架勢。中午，該樓團派打出大標語：「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生做毛主席的紅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紅小鬼」，「毛主席接見蒯大富是對井岡山人最大的愛護」，並將「蒯大富」三個字寫得大大的。該樓的團派直到7月30日中午才被迫由解放軍「保護」撤出，這也是百日大武鬥的最後一個據點。

約20時，與工宣隊代表一起返回清華的蒯大富被帶至清華園中學一間教室，與工宣隊的主要指揮者、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

會主任兼軍代表遲群等人商討停止武鬥事宜。經過爭吵，達成四項協定：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雙方約 22 時 45 分簽字後，蒯大富與 5 名工人代表、1 名軍代表前往設在明齋的團派廣播台播出上述協議。蒯大富把代表們擱置一旁，在另一房間召開團派頭目及有關人員 30 多人參加的會議。

蒯大富先講了形勢的嚴峻，又講了與工人對抗下去的危險性，他說：「我今天跑出去以後，到市革委會見到吳德，其他人沒有見到。吳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吳德告訴我，說我們打死了工人，打傷的工人特別多，北京大醫院已經住不下了。我們今天已經闖了大禍。不打死人還好辦，一打死人，我們向中央沒法交待。現在，工人對我們恨極了，要和我們拼命。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留在清華繼續和工人打，另一條是退出清華。」講到這裏，多數人反對逃跑，表示要留下來繼續打。蒯大富接著說：「如果我們留下來，也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明天我們用我們的全部武器、彈藥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傷就更不得了；另一條是我們打輸了，我們就可能被幾萬工人打得全軍覆沒，和『上柴聯司』下場一樣。這兩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們在北京，在毛主席身邊，這麼大的事件，中央馬上就會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辦了，中央會救我們。請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華井冈山在」。「我們跑出去，我們就是弱者，這樣，在中央面前，我們就好說話」。經過兩個小時左右的激烈爭吵，儘管有人提出拉隊伍去京郊山區打遊擊，但會議還是決定 7 月 28 日凌晨 2 時 30 分前，團派全部人員攜帶武器撤離清華（實際上，團派幾個武鬥指揮人員和個別據點並未撤離）。團派頭目及武鬥的大批人馬撤至北京航空學院，企圖給工宣隊一個難以呆下去的「空校」。

7 月 28 日。4 時左右，團派一支數十人的隊伍乘車撤往在昌平縣境內的清華核能研究單位 200 號，因司機數日未眠，駕車睡著，行至沙河附近，車翻入路旁稻田。一團派人員上車時把攜帶的手榴彈環拉出，以防外人截車。翻車時，手榴彈被引爆，炸死 2 人，炸傷 5 人。

1968 年 7 月 27 日，不是團派與四派的大武鬥之日，而是團派向工宣隊的血戰之日。在這一天的 12 個小時（從正午到子夜），工宣隊有 5 人死亡；有 731 人受傷，其中重傷 149 人（工人 139 人，軍代表 10 人），輕傷者 582 人（工人 552 人，軍代表 30 人）；被抓者 143 人（工人 109 人，軍代表 34 人）。工宣隊扣留了 100 多名團派人員。四派據點幾乎是全部向工宣隊敞開，不存在四派與工宣隊為敵的問題。「百日大武鬥」以團派撤離清華、四派認可工宣隊而工宣隊控制了清華局勢暫告結束。同時，「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致使清華大學的文革又一次在全國文革發展中成為轉折的關鍵點。

第二章 風起雲湧

「文革」在清華大學折射出其第一個高潮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是清華文革初期乃至整個文革初期的一個必然結果，它顯示出文革初期運動的癥結之所在。同時，它還體現出在整個文革十年中最初 27 個月（1966 年 5 月至 1968 年 8 月）的歷史最為豐富多彩、最為跌宕起伏、最為複雜曲折，也是文革群眾運動無與倫比以及群眾問題最為廣泛、最為深切的階段。西方學者把文革開始到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開之前的文革稱為「紅衛兵階段」，認為「正是在『紅衛兵』階段，毛所引發的政治危機陷得最深，混亂最嚴重，生命代價最高」。¹ 有的西方學者乾脆把文革的歷史劃定在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 4 月。的確，無論怎樣評說，若把文革第一個歷史階段定在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 4 月，那麼文革的第一個高潮是在 1967 年年初湧動，而在 1968 年夏末秋初結束的。毫無疑問，這個高潮是以席捲全國的群眾運動及群眾武鬥為浪頭的。文革十年史中的這三年，社會動盪和社會衝突最為劇烈，人民的損失和犧牲最為慘重。這一點僅僅從文革時期所謂「非正常死亡」（即不是被揪鬥致死、被武鬥打死，就是受迫害自殺致死）的人數集中於這一時期，就充分說明了文革這一階段鬥爭的空前激烈和殘酷。據統

¹ 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 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集體譯，頁 117。

計，文革時期，北京大學共有 64 人、清華大學共有 48 人「非正常死亡」，他們當中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死於這個時期。從清華大學這個階段的主要經歷中，我們可以「領略」文革第一個歷史階段的大致「風貌」及其特點。

一 從清華大學 1966 年 12 月 25 日的「大行動」到 1968 年的「百日大武鬥」說明了甚麼

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舉行了關於文革的工作會議，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進一步推向明處。1966 年 12 月 18 日，張春橋約見蒯大富，授意把鬥爭劉少奇、鄧小平問題公開引向社會。次日，在蒯大富主持下而成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簡直就是產生於當時中央文革小組鬥爭劉少奇、鄧小平策略的「溫床」之中，這也表明，自成立之日起，井岡山兵團就高度地受制於中共中央上層的鬥爭以及文革決策的運行之下。

1966 年 12 月 25 日，清華大學 5000 多名（一說 6000 多名）紅衛兵學生、教職員工分五路進城，上午 10 點在天安門廣場會合，召開「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對王光美等做了「缺席批判」。然後，又分五路，在天安門前、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進行「大宣傳、大遊行、大示威」，他們沿路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呼喊口號，召集短會，並派出 10 輛廣播車在城區內持續進行廣播宣傳，廣播了〈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反路線的十大罪狀〉。這次「大行動」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劉少奇必須向全國人民低頭認罪」等大標語



1966 年 12 月 25 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在王府井街頭進行反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的情景。

張貼在大街小巷，把所謂「徹底搗毀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之勢，廣泛地引向社會，為日後掀起更大的反劉少奇、鄧小平鬥爭鋪墊了社會心理及社會輿論的準備。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的《快報》向上面、清華《井岡山》報向大眾分別報導了這次「大行動」的情況。12 月 30 日傍晚，江青、姚文元、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向蒯大富及井岡山兵團表示「堅決支持」。

實際上，早在 1966 年 10 月底，蒯大富在清華幾派紅衛兵總部聯合舉行的會議上就講過，他成立「井岡山紅衛兵」，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他們要幹的兩件大事：一是揪鬥劉少奇、王光美，二是反對折衷主義，意指周恩來是折衷主義的代表。

10月9日，井岡山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八八紅衛兵三個總部開會籌備揪鬥王光美，蒯大富等上千人當日下午去中南海西門，要求揪鬥王光美，周恩來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去拒絕了蒯大富等人的要求。同日晚，在接見清華大學八個組織代表（蒯大富不在）時，周恩來表示：「王光美不能到清華去當場檢查，可以背靠背」。²在12月19日成立的大會上，井岡山兵團總部提出了三項聲明：「（一）強烈要求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二）薄一波必須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華交待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須在1966年12月31日前回清華還賬。」在12月25日的「大行動」中，井岡山兵團又多次廣播了這些聲明。

井岡山兵團矛頭指向薄一波，主要是6、7月間，薄一波多次來清華看大字報並看望工作組，因為該工作組的許多成員出自薄一波任主任的國家經濟委員會。薄一波在看大字報時與蒯大富相遇，進行了激烈的辯論。12月29日，井岡山兵團一夥人抄了薄一波的家，並帶走了一些文件及文件櫃。矛頭指向王任重，主要是王任重支持了8、9月間的「清華大學紅衛兵」有關活動。

1966年12月25日的「大行動」奠定了清華井岡山兵團尤其是後來的團派在文革中地位的基礎，也直接影響到它在文革的趨勢和命運。同時，這一「大行動」是假借清華大學廣大群眾之手而把清華大學放置於文革的風口浪尖上。從那之後，清華文革一次次典型的或非凡的事件，都表明了清華文革遠遠不限於清華校內。

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下卷，頁76。

1968年的百日大武鬥可以看作自文革開始以來的清華文革各種矛盾和危機的一次總爆發。這種以暴力形式出現的總爆發結束了清華文革長達25個月（1966年6月至1968年7月）的第一階段，也使從此之後的清華文革領導權由清華之外的工宣隊和解放軍軍代表所把持。從1968年之後，清華大學的文革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由清華造反派群眾所帶來的「個性」或特點，已與整個文革更加緊密地相統一了。清華文革頭兩年的激烈、複雜、廣泛、深刻而又混亂的程度是其後來七、八年的歷史階段難以企及或無法比較的。百日大武鬥的結局再次證明了清華文革不可能是清華人自己所完全左右的。

從1966年12月25日的「大行動」到1968年春夏的百日大武鬥，清華文革的發展至少說明了文革中四個重要的問題：一是文革中廣大群眾的可以利用；二是廣大群眾對於文革的利用；三是文革的地理特徵；四是文革的單位特性。

一、利用群眾

經過「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利用，清華大學文革群眾特別是造反派群眾成為從社會上掀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之勢的先頭部隊。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提出，如果毛澤東採取斯大林式的清算來對付他所反對的人，為甚麼他不用斯大林方法去做，反而用群眾動員方式，德里克認為，這「符合中國革命的遺產」。³我個人認為，這不是甚麼一般意義上的中國革命遺產的問題，而

³ 阿里夫·德里克：〈從歷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義〉，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七期（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1996年春季），頁32。

是由毛澤東所發動和領導的文革受到了來自黨內的制約。因為，眾所周知，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際和文革進行了幾個月之時就已深切地感受到，他所推行的文革在中共中央、在中共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內遇到了無形的而又巨大的阻力，他已不可能指望或者根本就不指望文革能夠在黨中央領導層以及在黨的各級組織裏得到無條件的支援和毫無保留的回應。實際上，到了1966年夏季，毛澤東確信，他所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一定會在廣大群眾中得到強有力的響應，而廣大群眾的參預又能使文革的進行和發展更加切合他本人的意願。毛澤東期望，文革在廣大群眾那裏形成一股黨內領導層其他人士無法抗拒、無法逆轉的洪流。設想一下，如果文革不是立足於廣大群眾，文革搞成所謂斯大林式的清算，那麼文革就與文革之前的諸多政治運動沒有甚麼區別，文革就很難成為文革。正是毛澤東在發動和領導文革時一次次地遇到黨內一次比一次更強大的阻力，毛澤東就只能訴諸廣大群眾。依賴群眾，利用群眾，過於相信群眾運動，並使群眾運動走向極端，這實際上是文革初期毛澤東文革政治的一個真正的、最大的奧秘。

顯然，把文革推向高潮，把打倒文革的最大對象劉少奇、鄧小平演變成廣大群眾的社會運動，這一突破口之所以最後選在清華大學，是因為自1966年6月初至7月底的清華文革直接受到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的影響，進駐清華的工作組「造就」了一批日後對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頗為不滿的、激進的乃至狂熱的群眾。所以，由清華這些群眾為主而組成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先頭部隊就在文革的「情理」之中。12月25日的「大行動」造成的一個普遍假像就是：打倒劉少奇、鄧小平而把文革推向高潮彷彿不是來自文革上層的鬥爭和策略，而是出於基層廣大群眾的要求。這裏所形成的一個文革心理定勢在於：除了毛澤

東之外，誰要是反對和抵抗群眾及群眾運動，誰就「理所當然」地是文革的「敵人」。

對於德里克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是採用斯大林式的清算，還是採用群眾運動，這關係到文革能否進行下去、能否擴大以及能否達到居於群眾之上的文革領袖及決策者們的目標。設想一下，包括1957年「反右」在內的文化大革命前的鬥爭之所以沒有成為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這並不是符合「中國革命的遺產」與否的問題，而是這些鬥爭與文革至少在形式上有著重大的區別，最主要的是文革初期，文革的運行在中共黨內受到很大的阻力。群眾運動是文革的重要所在。有了群眾運動，文革才會有如此之規模和如此之氣勢。

當張春橋12月18日向蒯大富授意進行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行動」時，張春橋以及他身後的中央文革小組肯定都已預想到未來幾日成立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所採取的行動意味著甚麼，會達到一種甚麼樣的效應。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注意力已遠遠不限於清華大學了。中央文革小組對清華群眾的利用實際上也給清華文革注入了某種必然性的「變數」。

二、群眾的利用

在我的採訪對象中，多數人認為，清華的文革是被中央文革小組等大加利用了，而少數人則認為，清華群眾也利用了文革，即利用與被利用是統一的。利用和被利用的主體與客體之區分主要是由文革不同時期、不同階層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所決定的，沒有甚麼確定不變的界線。

這裏要提出的問題是：對於同一時期的文革任務和文革形勢而言，對於不同時期的文革任務和文革形勢而言，廣大群眾的利用又有多大？這種利用體現到文革的每一個具體方面時又

有何種形式和內容？群眾的利用在大或小、強或弱、多或少等方面的差別實際上並不明顯，也不是關鍵性的或者始源性的方面，最主要的是，群眾的利用往往出現相似相近相同的特點。我個人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眾在文革前已形成的利益狀況和在文革期間由利益轉換而確定的新的利益格局（哪怕是暫時的）。基於自己的利益，廣大群眾對文革的利用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當然，群眾的利用主要限於所在的單位和地區，他們會盡可能地利用文革的條件和形勢，不但在自己的單位或地區進行各自的「小文革」，而且力圖超越單位和地區的限制，以使自己的「小文革」與全社會的「大文革」溝通和互動，既可以充分使自己的「小文革」升級和擴大來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又可切實使社會上的「大文革」具體納入到自己的文革目的，從而實現和滿足自己的利益。但是，群眾的利用恰恰是在文革之中進行的利用，而不可能是在文革之外的利用，所以對這種利用不應估計過高甚至任意拔高，因為文革中廣大群眾的盲目、輕信、狂熱和非自主性常常使這種利用到頭來帶來由群眾自己造成的「副產品」。

三、地理特徵

在很多情況下，文革的地理特徵不是指自然地理特徵，而是指文化地理特徵或者人文地理特徵。眾所周知，文革初期首都北京的文革地理特徵就不同於以產業工人為主力軍的上海文革特徵，也不同於當地軍區明顯偏向並支持具有保守傾向的群眾勢力的武漢文革特徵，更不同於自1967年春夏起就烽火連天、武鬥遍地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及重慶地區的文革特徵。相等地講，距北京愈近的地區，文革地理特徵的差異則愈小，而

北京較遠的省、市、自治區，不管有多麼大的地理特徵差異，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這些地區的造反派學生乃至整個學生的勢力遠遠不及北京。北京的文革地理特徵在於它的中央特徵兼學生特徵。

清華大學地處北京城區外西北，坐落在北京眾所高等院校和科學院研究機構聚集的海澱區，與北京大學毗鄰。清華大學距北京市中心，直線距離約有10公里。在文革那些特殊的歲月裏，清華文革運動若有甚麼大的風吹草動，都會傳播到清華周圍地區，並波及北京城內。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們鼓動清華群眾進城上街遊行，大造反劉少奇、鄧小平的聲勢，卻促使清華群眾在日後的文革中，特別是清華兩派群眾在百日大武鬥期間，動輒組成隊伍，進城進行遊行示威或宣傳蠱惑。又如，在文革幾次重大活動中，北京市來清華看大字報和學習經驗等等的人數屢屢達數十萬人，而在文革初的大串聯中，來清華的各地各界群眾數以百萬計。清華大學的文革地理特徵彷彿使清華大學成為中央腳下的一塊文革「樣板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清華大學文革的多次干預和直接影響也是全國其他單位無法相比的。

四、單位特性

清華大學作為一個教育單位，她還具有在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及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所有單位都具有的「單位」特性。清華大學文革的單位特性是我的研究所非常關注的重要方面。

這裏所說的「單位」是指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及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切社會成員各自所隸屬的某一社會群體或集體。曹錦清、陳中亞先生認為，這種單位與其成員的關係是保護與

服從、控制與依附的人身聯繫，而且這種單位具有相同的權力機構或相似的機構設置。這種單位是具有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多種功能的「小社會」，單位間只有縱向隸屬關係而缺乏橫向聯繫。所有單位都具有黨政合一的特點。「單位」是國家政權在各地、各級（部門）或各群體的具體的組織形態，它依靠行政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來加以維繫。「單位」通行的精神是集體主義（整體主義）和平均主義。對單位人所通行的是級別和準身份制（「身」，指「家庭出身」；「份」，指「本人成份」；故「身份」包括「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兩種社會屬性）。⁴這裏所列舉出的曾作為構成我國社會千百萬塊「基石」的單位的特性，主要是強調文革群眾問題中的單位特性。

就清華大學而言，自1949年之後到文革之前，她的「單位」特性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人們尤為關注：

首先，清華大學作為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所著名大學，她的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她的科學學術地位在全國所有的大學中，出類拔萃，名列前茅。幾十年來，許多青年學生都以考入清華大學或北京大學為榮耀，這些學生的家長、師長和親友也為此而自豪。清華、北大這兩所現代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不僅每年招考學生的錄取分數線是全國所有高等院校中最高的，而且她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成為現代中國教育事業的「模範」。從1949年至1966年，清華大學共有20748名學生畢業，居於同時期中國各個高等院校畢業學生人數之首。清華大學由從前師生員工僅有數千人的大學於50年代後期逐步發展成為

4 曹錦清、陳中亞：《走出「理想」城堡——中國「單位」現象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頁69-116。

有在校學生萬人、教職工超過6000人的大學，是整個50年代至60年代全中國規模最大的大學。清華在教學設施、教學管理、教學環境以及教材體系、科學實驗等諸多教學環節的條件和狀況，都達到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準。與此同時，清華大學的科學學術水平也居於國內領先地位。儘管清華的學科發展受到1952年院校調整的制約，但是，從1955年至1995年，中國科學院先是設立學部委員後是改為院士，經過五次評選，共有815人當選，清華學人有256名，佔31.4%；中國工程院院士312人，清華學人有64名，佔20.5%；其中，為兩院的雙院士有34人，清華學人有14名，佔41.2%。而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至今沒有設立院士）有64人，清華學人有18名（皆為40年代前學成），佔28.1%。從上面的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清華大學在現代中國教育和科學事業中的「分量」和作用。

其次，文革前，清華大學的幹部級別和幹部特徵在全國各高等院校中也是獨一無二的，甚至連北京大學也難以企及。自1953年起至文革開始，30年代曾就讀清華大學中文系、後來從事共青團工作的蔣南翔擔任清華校長，並從1956年後兼任校黨委書記。蔣南翔在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並先後兼任過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委員會主任、國家教育部副部長、高等教育部部長等職。清華校長的「顯赫」是其他大學校長所不及的。從這一點就不難理解，文革初期為何把蔣南翔當成教育界的最大「走資派」，也是最早被打倒的「當權派」了。在蔣南翔的領導和影響下，清華湧現出一支居於清華各個領導職位的「清華牌」的幹部隊伍，即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從清華畢業留校的學生幹部或骨幹。這支幹部隊伍的凝聚程度、管理才能和工作效率之高，甚至觀念意識和話語體系之同在各個大學中也是非常

罕見的。所以，可以體會，為甚麼文革伊始工作組進入清華首舉就是把清華幹部隊伍從整體上打入「冷宮」。不同於其他大學的黨政職能部門主要設立在學校一級（例如，系一級不設黨委而只有總支部或支部等），清華的黨政職能部門還設立在系一級，即系一級機構或單位就設有黨委、團委、教務科、學生組、行政科、人事科、財務科等許多職能部門。不僅如此，清華大學還陸續向其他眾多單位「輸送」了成千上萬的幹部。這一點同樣是其他大學所不及的。這一點還可由現今國內外所矚目的清華大學走出來的40多位上自中共中央領導人下至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或省、市、自治區領導人的事實所證明，而這些領導人大都是在文革前就讀於清華大學的。

再則，清華的單位特性臨近文革爆發時又有了一個顯著內容，這就是自60年代初以來，清華學生中出現了一批地高、能量大的幹部子女。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前夕，在清華讀的高級幹部子女有60餘人。這種狀況也是其他大學所沒有的。這些子女的父親分別擔任從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元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到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委）或有關省市、自治區黨政主要領導，或解放軍有關總部、軍兵種和軍首長等不同的重要職務。這裏，還不包括清華學生中那些難計數的中級幹部和基層幹部的子女。上述高級幹部子女不但著比普通學生更為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學習條件，而且即使比清華一般幹部來，還擁有更為多樣的資源和更為靈通、可靠資訊渠道。他們從自己的父輩那裏得到了種種關於黨內鬥爭經驗和方法的真諦或傳授，非常主動地干預了清華文革初始的面，並且理所當然地以「革命事業紅色接班人」的姿態，和工組一起，共同執掌了幾十天的清華文革「大局」。當時，這些

級幹部的子女給許多普普通通的師生員工一種「錯覺」，即把他們在文革最初幾十天的所作所為理解為文革的「正統」，彷彿這些子女直接體現了來自他們父母那裏的文革預想和文革方向。然而，一旦這些高級幹部子女由於其父母的厄運而失落，清華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造反派組織對這些高級幹部子女的文革舉措的「反彈」就不只限於清華一隅了。

綜上所述，清華大學的單位特性「自然而然」地使她成為文革這場首先向教育界、文化藝術界開刀的「革命運動」之下的「刀俎」。從作為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兩個「排頭兵」——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那裏，文革開始真正有了自己的群眾運動的機制、典型、特性、風格，有了自己的群眾組織的模式、運作、內涵、角色，一句話，有了文革的「試驗場」和文革的生力軍。

十分明顯，在文革前已成型的「單位」現象和特性也使文革呈現出「單位」的姿態，甚至在整體上，文革同過去的政治運動相似的是被「分割」成難以計數的、廣大而又分散的單位，即以「單位」為單位來計的無數個「小文革」。儘管歷史上、事實上眾多單位的文革的一致或相似遠遠大於或多於各個單位文革之間的差異，但是各個單位自身文革的「個性」卻不能為上述一致或相似所能包羅或窮盡，因為每一單位的文革對該單位的廣大群眾來說都是一部獨特的靈與肉的苦難史。我這裏用文革的「單位性」來指稱文革的「個體性」或文革的「個案性」。對於經驗的或實證的研究來講，這種「單位性」無疑比文革的整體性要豐富、感性、具體和實在得多，儘管我本人不是也不可能涉獵到所有單位文革的個案事實，但是，假若人們能夠歷史地和邏輯地展示出諸多具有典型意義的、代表了不同類型和不同層面的單位的文革，整個文革群眾問題的研究就會得到很大的深化。

然而，文革時期的單位又不同於文革前的單位。由於文革的特殊形勢，幾乎所有單位的某些結構和功能，更不用說某些特性，不是暫時消失了，就是格外「失常」或「反常」。文革初期，除了中共中央本身和人民解放軍作戰單位之外，包括外交部、解放軍總政治部、有關軍兵種機關以及軍隊院校、軍隊文工團體在內的差不多所有單位都陷入混亂、無序或動盪之中，差不多所有單位的黨政機構及其領導人被衝擊或被打倒。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單位的文革群眾組織在奪權之後力圖取代原有黨政領導，它們自身畸形地以「文革單位」而自居，通過自身組織的屬性來代表或充斥單位的特性。但是，文革的單位性使整個社會的文革群眾運動相對廣泛而又分散，卻使每一單位的文革群眾運動非常集中而又具體。文革的單位性所帶來的某些新的、暫時的結構和功能並沒有從根本上使廣大群眾走出自己單位的文革天地。同樣，只有單位，才構成了文革肌體的組織形態；也只有單位中，文革的生命才有了某種可寄生的「社會細胞」。

如何使文革前的單位結構和功能轉換成文革時期的單位結構和功能，這並不是由任何一個群眾組織所能自主決定和自主完成的。就這一點，文革的單位性彷彿是由單位之上的文革權力機構或是更高一層的權力單位所「賜給」的。可是，任何一個單位的群眾組織都不會限於本單位的文革，文革使廣大群眾從自己的單位出發去力求獲得一種超單位的特性或非單位的特性，以便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和時間過程獲得或保存自己的某種利益。不過，這種超單位的或非單位的特性常常也會帶來反單位的特性。例如，清華大學作為一個單位，她的文革已遠遠超出了她自身，她的文革單位性既可加以典型化而展示出來，被另一些單位「學習」（如「教育革命」的經驗）和借鑒，也可加以警示其他

單位而為它們所防範（如百日大武鬥）。同樣，像百日大武鬥這樣給清華帶來災難和損害的文革單位特性，致使在此之後的清華文革具有了更多更大的非清華的「因子」或「變數」。

清華大學作為一所久負盛名、擁有眾多特性的大學單位，她在北京地區、在中國所有大學中的影響可謂非同小可，舉足輕重。清華大學一旦被推上了文革洪流的浪頭，其「單位特性」，就不是清華大學自己所能決定的了。

二 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狂瀾萍蹤

文革頭兩個月，清華大學所經歷的風風雨雨，被清華造反派群眾看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短兵相接的一個陣地。隨著毛澤東斥責工作組，工作組撤離清華之後，清華大學很快又被當成「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反擊」的一個前沿。自1966年6月初至1968年7月底，清華大學的文革歷程高度凝聚式地體現出了文革最初兩、三年的特點，以清華自身如火如荼的群眾鬥爭折射出了文革第一個歷史階段即群眾運動階段的諸多方面。這裏，以清華大學在百日大武鬥之前所經歷的幾個重大事件或由其特殊活動而帶來的重大影響，展示上面提到的體現和折射。

一、「紅教聯」事件

「紅教聯」成立於1966年10月28日，由陶德堅（土木建築系教師，女）等幾位教師發起，最初共有成員30多人，絕大多數成員在文革前被定為有「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或者遭到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坎坷。12月中旬，「紅教聯」大量發展工人，成員

達 260 多人，並改名為「紅教工」，全稱由過去的「清華大學紅色教師造反聯合總部」改為「清華大學紅色教工造反聯合總部」。1967 年 1 月，「紅教聯」成為井岡山兵團下屬的一個教工組織，3 月中旬，因名聲問題，被迫自行解散，部分成員轉入團派。

「紅教聯」的影響有二：

一是「陳里寧事件」。1966 年 12 月下旬，「紅教聯」在北京紅衛醫院（原稱安定醫院）發現了保外就醫的犯人、原湖南湘潭市人民政府資料員陳里寧（33 歲）。陳里寧本人患有精神病，50 年代末就擔心劉少奇反毛澤東。60 年代初開始不斷寫信、寫日記，抨擊劉少奇，後被逮捕關押。「紅教聯」如獲至寶，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個別工作人員的首肯，與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醫學院和紅衛醫院的有關造反組織在紅衛醫院成立了為陳里寧翻案的「聯絡站」。1 月 6 日，這些造反派組織上百人衝進陳里寧被關押的公安部下屬的一所監獄，大鬧為陳里寧平反。1 月 11 日，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王力、戚本禹等人親臨紅衛醫院，上午接見各單位造反派組織代表，下午接見陳里寧等人，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鼓勵他們「必須徹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國有類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2 月，迫於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群眾的壓力，公安部給陳里寧開了「平反釋放證」，後開了「無罪釋放證」。

一時間，陳里寧被捧為反劉少奇的「英雄」，紅遍京城內外，四處講演，還來清華大學作了一場報告。「紅教聯」有關人員根據陳里寧的反劉少奇材料、日記、書信等編寫了一個話劇本《狂人日記》，廣為流傳。天津市人民話劇院一群眾組織將該話劇改編為《新時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也演出了該話劇。中央戲劇學院的幾個群眾組織編演同一題材的多幕話劇《敢把皇帝拉下馬》。1967 年 7 月底

月初，在中南海西門外的所謂「揪劉火線」上，一些群眾組織也演出《新時代的狂人》一劇，給「揪劉火線」上的造反派群眾助陣打氣。陳里寧自被釋放出不久，病態顯露，加上 1967 年 8 月底中央文革小組幾個大員垮台，再加上陳里寧昔日反毛澤東的老底又被揭出，公安部把陳里寧重新逮捕歸案。

「紅教聯」等搞出來的陳里寧事件完全是為了投機於當時的反劉少奇活動。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文革初期造反派群眾反政治權威的狂熱性和由此而傳散開來的狂妄症，「文化大革命使全國人民精神失常，卻使精神病人恢復正常」。⁵

二是「紅教聯」的極端觀點和主張。在清華文革初期，「紅教聯」是一個很小而又非常典型的、以教職員工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它在清華校外的名聲由於陳里寧事件遠遠大於它在清華校內的名聲。「紅教聯」在清華文革初期的主要影響是它提出了許多極端觀點和主張，即使團派廣大群眾對這些觀點和主張也刮目相看，而這些觀點和主張在團派一類的造反派那裏頗有市場。

「紅教聯」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個論」，即「文化大革命真是大變動，左、中、右大倒個」、「十七年的左、中、右顛倒過來了」，「現在的好人要從過去的壞人中去尋找」，「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動向，要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這種變動的必然性」。「紅教聯」一些人主張：「今天文革的左派要到過去的右派中去尋找，而今天文革的右派要到過去的左派中去尋找。」個別人甚至提出重新評價 1957 年的「反右」運動。「紅教聯」還提出了「政治地位決定論」，即「政治地位即職位高低，決定了政治態度」，

⁵ 林炎：〈「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 年 6 月號，第 35 期，頁 68。

進而斥責廣大幹部、黨員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會基礎」。「紅教聯」的個別人提出文革「奪黨權」的口號，聲稱「我們痞子就是要掌權」。

二、1967年1月6日「騙鬥王光美」事件

1966年12月25日，井岡山兵團在其「大行動」中發出限王光美10天內回清華作檢查的「勒令通知」。10天過後，兵團內的幾個人決定把王光美揪回清華，他們事前只是籠統地向蒯大富提出此事，並專門組成了30多人的「捉鬼隊」。該隊人馬於1967年1月6日下午出發，幾個人到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先以同劉少奇、王光美之女兒劉萍萍座談為名，把劉萍萍騙出，另20多人到西單附近的交通隊和北京市立第二醫院，控制了12部電話，在急診室設立了指揮所，一些人裝扮成醫生，佈置好後，打電話給王光美，謊稱劉萍萍遇車禍，腿被壓斷。王光美開始不信，派女兒劉婷婷和劉少奇警衛員來醫院查看。後來，「捉鬼隊」說服劉婷婷，讓她打電話，把王光美叫至醫院，令「捉鬼隊」頗感措手不及的是劉少奇本人也到了醫院。傍晚，「捉鬼隊」把王光美帶回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連夜在西大操場召開批判大會。王光美在會上和會後的一些反問和辯論令井岡山兵團的一些人頗感難堪。

周恩來知此事件後，立即派秘書趕至清華大學，並打電話催促蒯大富放回王光美。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和會後審問搞了大半夜，直至次日凌晨才放走王光美。在得知周恩來1月7日接見第七機械工業部群眾組織代表的談話中對這一事件大為不滿後，「捉鬼隊」在清華校內貼出了對周恩來表示不滿和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的長篇大字報。井岡山兵團的一些報刊大肆宣揚這種所謂「智擒王光美」的活動，後被其他許多外地和外校的紅衛兵小報加以轉載或者報導，流傳全國。

三、1967年4月10日「批鬥王光美」事件

如果說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毛澤東、周恩來還不同意批鬥劉少奇、王光美，那麼到了1967年4月形勢大變，全國性的各地奪權鬥爭已到了必須把劉少奇問題全部拋出的時候了。1967年3月底，戚本禹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聲討劉少奇的重炮文章，首次把劉少奇這位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諸多「罪狀」公佈於眾。井岡山兵團乘機決定在清華園召開示威性的、報復性的批鬥王光美大會，因為此時批鬥王光美已不會遇到甚麼阻力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同意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4月2日提出揪王光美回清華批



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在清華大學主樓前召開批鬥王光美的大會會場。

鬥的要求。⁶這時批鬥王光美，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個步驟。

4月5日，蒯大富把中央同意批鬥王光美的消息在清華作了傳達。井岡山兵團廣泛動員，多方準備。連續兩天出動宣傳車，在北京的一些街道和公共場所大造輿論聲勢，「邀請」廣大革命群眾於4月10日前往清華大學參加批鬥王光美大會。⁷

4月10日一大早，井岡山兵團還是以「捉鬼隊」等為主，把王光美從中南海家中押至清華主樓803室，進行了多次審訊，並逼迫王光美穿上1963年4、5月間她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度尼西亞時所穿的旗袍、高跟鞋、絲襪和所戴的草帽、墨色眼鏡，並戴上了事先特別製作的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項鍊。這種人身侮辱是按照江青等人的指使所為。江青對王光美當年外出訪問時的穿著大為不滿，如今她借清華井岡山兵團之手進行報復。實質上這場批鬥大會是通過批鬥、醜化王光美來打擊、醜化劉少奇。

同時被押來參加批判大會陪鬥的有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前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北京眾多高等院校、前駐北京眾多高等院校的工作組以及清華大學的300多名所謂走資派。從陪鬥的陣勢來看，「無產階級司令部」顯然認清華井岡山兵團加大對所謂「劉、鄧路線」上人物的打擊。

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人群流動的會場。北京各處聞訊趕來的號稱來自300多個單位共30萬人，大家

6 徐彬：《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74。

7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編輯部主辦（主辦單位名稱下略）：《井岡山》，1967年4月8日，特刊。

相擠看被批鬥的王光美，不少參加大會的人是懷著好奇心，「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結」。這場批鬥大會是形式多於內容，是清華井岡山兵團配合中央部署的批判劉少奇而演的一齣過於戲劇化了的鬧劇。這次批鬥的消息和照片廣為流傳，在國內外引起了較大反響。⁸

必須指出的是，此次批鬥王光美之後的第四天，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了「四一四串聯會」。至少，就像後來團派所指責的，四派從其醞釀和成立起，就對批判劉少奇、王光美等事情不感興趣。無獨有偶，就是在刊登戚本禹批判劉少奇的重炮文章的那一期《紅旗》雜誌上，關於清華工作組執行了所謂劉少奇「資反路線」的幹部政策的調查報告及評論員文章同時發表，這大大激發了四派早期人士就幹部問題而同團派分道揚鑣。因而，鬥王光美、批劉少奇都不能保證其後清華井岡山兵團自身不走向分裂、內訌和大武鬥而直至消解的下場。

四、1967年春季向全國派出的「記者站」或「調查組」

1967年4月4日，在首都大專院校師生代表座談會上，王力等人同意了清華井岡山兵團以首都「紅代會」（即「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紅衛兵記者的名義去外地調查和收集文革情況的要求，

8 1972年，僑居英國的周采芹女士（係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先生之女兒），飾演了根據這一事件而改編、攝製的八集電視劇《鬥爭對象》（*The Subject of Struggle*）中的王光美。該電視劇由英國電視公司Granada's TV Production出品，製片人為Leslie Woodhead。該劇在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周采芹女士由於其出色的表演而獲英國本年度最佳電視劇女主角獎的提名。參見Zhou Tsai Chin（周采芹）：*Daughter of Shanghai*, p. 163,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8。

並擬定了幾條派人原則。一周內，井岡山兵團總部先後向哈爾濱、長春、瀋陽、南京、杭州、重慶、昆明等地派出記者站或調查組，有關頭目還去上海、福州、廣州、武漢等地活動，多次參加當地有關「形勢討論會」、「座談會」，把北京文革高層人物的一些指示、講話散佈給地方群眾及代表，又把外地的文革情況，主要是軍隊支左、軍隊幹部及群眾的情況彙報給中央文革小組。

井岡山兵團派出的人員，儼然以「欽差大臣」或「文革特使」的身份，親臨許多地區或部門的文革第一線，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進一步惡化了當地的文革形勢，就是直接造成了當地文革的有關後果。他們的到來和干涉被外地的造反派看成是對自己的有力支持。這裏僅舉幾例：

「南京記者站」收集南京部隊的支左材料，指責南京軍區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了造反派」。該站人員還同當地軍事院校的造反派一起從事反對南京軍區及其領導人的活動。

「福州記者站」指責福州軍區「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該站人員同當地造反派頭頭一起鼓動大批群眾前去福州軍區機關靜坐、示威。

「四川記者站及調查組」的主要任務是著重瞭解四川的武鬥情況、軍區情況及軍工廠文革狀況，他們支持四川造反派代表人物劉結挺、張西挺，反對四川黨政軍領導人張國華、梁興初，反對當地的54軍，支持當地的「八二六派」。

「杭州記者站」是從以清華人員為主的「首都紅衛兵三司駐杭州記者站」改換過來的，他們在浙江日報社設立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報記者站」，該站人員以記者招待會、形勢報告會等形式大造反擊「二月逆流」的輿論，並針對浙江省軍區發表一系列抗議性的聲明、照會、備忘錄等。

井岡山兵團派出的許多記者站及調查組直接干預外省市的文革運動，引起了當地駐軍領導部門的極大不滿，受到中共中央有關負責人的嚴厲批評，因而不得不從4月底開始陸續撤回清華。但是，不僅仍有部分清華人員滯留外地，繼續插手當地文革事務，而且在7、8月期間的反軍、亂軍狂潮中，一大批記者站以聯絡站的面目捲土重來。這再次表明了井岡山兵團，特別是團派無愧為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支別動隊。

五、1967年夏季的反軍、亂軍活動

進入1967年春季，全國各地的文革運動大都受到當地解放軍及支左部隊的遏制，此時，軍隊問題已逐漸在全國性的奪權鬥爭之後而提到了文革議事日程上，即說到底，在1967年春季，文革彷彿進入了一個是軍隊制約造反派及其勢力，還是後者凌駕於前者之上的生死關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在1967年2月13日的政治局、書記處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又稱「大鬧懷仁堂」會議）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⁹中央文革小組當然不滿意軍隊的種種表現，有人提出了「帶著槍桿子的修正主義，比之沒有帶槍桿子的還危險」，「揪軍內一小撮」，他們開始鼓動起一個全國性的反軍、亂軍的狂潮。

清華井岡山兵團聞風而動，開始把自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解決軍隊的文革問題上。例如，4月，在清華成立了接待軍事

⁹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北京：國防大學，1988年），上冊，頁297。

院校造反派的接待站。兵團一些領導人心領神會地揣測中央文革小組以及中央某些黨政領導人彷彿要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軍隊問題的意圖，表示要先行一步，為中央解決各地的問題準備材料，「提出我們的意見，發揮我們的作用，起到我們的影響」，準備在解決軍隊問題上大幹一場。當中央文革小組某些要員在有關會議上，把徐向前、葉劍英的問題透露給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兵團認為時機已到，他們要向各地派記者站及調查組就是力圖把各地受到軍隊排擠或壓垮的造反派重新樹立起來，以清華井岡山兵團的作用，把全國各地造反派有機地聯繫或聯合起來，施展井岡山兵團此次「運動中心」之威力。兵團頭目們認為，文革發展下去，由於軍隊問題，很可能發生國內戰爭，應從思想上、行動上做好這方面的準備，要把全國造反派組織起來。這是在1967年春季派出記者站及調查組的一個宗旨。

震動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爆發後，團派幾乎全力投入了反軍、亂軍的活動。在這一點上，在全國所有的各個造反派中，團派所作所為可謂是非常顯著的。

7月25日，北京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舉行聲討武漢「百萬雄師」所謂罪行、歡迎謝富治和王力「凱旋」歸來的大會。出席大會的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廳裏對周圍的人說，武漢七·二〇事件「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正好抓住大做文章」。林彪對大會呼喊的「打倒軍內一小撮」、「打倒陳再道」等都舉了手。這些都被蒯大富看在眼裏，記在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蒯大富與王力並肩而立，蒯大富在與王力的一問一答中，蒯大富得知已到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時候了；認為全國「老保」行動那麼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感到王力對徐向前、葉劍英很不滿意，並從王力那得知原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將領，有的跟

毛主席走，有的則不然；蒯大富從王力對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福州軍區司令員）不以為然的神情中，認為許世友、韓先楚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這也是後來團派在南京、福州的聯絡站大反許世友、韓先楚的一個起因。

次日，蒯大富在團派總部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彪的講話以及王力與他本人的交談，並作了長篇動員發言。當日晚，這次擴大會議更對軍隊問題作了分析、討論，調整了工作班子，成立了「對外作戰部」及「軍事動態組」，負責向外地派遣「聯絡站」和負責各「聯絡站」工作。同時，派出10多名骨幹到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學軍」，加強軍事工作。團派頭目說，林彪要做接班人，有好多不服，主要是原紅軍第四方面軍的人。他們人多、力量大。武漢七·二〇事件就是原紅四方面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要把反他的力量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有的頭目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第三階段，就是揪軍內一小撮」的「武化大革命」的論調。

7月30日，在清華召開了由團派主持的所謂「全國造反派頭頭形勢討論會」。蒯大富發言說：「下一年的戰鬥任務就是專門解決各大軍區的軍權問題」。「陳再道的後台就是徐向前，讓我們把徐向前揪出來鬥倒、鬥臭」。「要拿起槍桿子」，他表示清華紅衛兵下去與外地造反派並肩戰鬥，直到取得最後勝利。蒯大富的這些講話傳到外地，被廣泛登在外地一些小報上，對外地的反軍活動起了不小的影響。

7月29日，團派總部就武漢七·二〇事件發表「嚴正聲明」，斥責這一事件「是有黑手操縱的，這隻黑手就是混進軍內的走資派徐向前。武漢問題是全國問題的一個集合點」。在8月3日第69期《井岡山》報上，發表社論〈打倒帶槍的劉鄧〉，社論說：「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勾結在一起、串通

7月下旬，四派也開始向外地派出「聯絡站」，並直接參加了當地的一些反軍活動。7月26日，團派還與四派一起去北京西山中共中央軍委有關機關的所在地遊行、示威。儘管四派在派出「聯絡站」的數目和規模上不如團派，但在反軍搶「功」方面並不遜色，又一次顯示出文革群眾組織的功利性和盲從性。

7月底8月初，團派外地派出「聯絡站」已有十多個，成員有數百人。四派也向外地派出了幾個「聯絡站」。清華此時受到去外地的影響而離校的人員已逾千名。比較著名的「聯絡站」活動有：

團派「福州聯絡站」把矛頭直指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發表了〈韓先楚是個甚麼傢夥？〉、〈韓先楚是人還是鬼？〉等十多篇文章，並在海防前線廣為散發。為此，周恩來嚴厲批評了該聯絡站。該聯絡站還支持當地造反派武鬥，參加他們搶運武器的活動，並與他們一起，抄了韓先楚以及福州軍區參謀長周世忠的家。四派「福州聯絡站」的一些人參加了攻打當地「八二九」派駐福州交際處大樓的武鬥，此次武鬥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眾人受傷。

團派「瀋陽聯絡站」於1967年8月7日同當地「八三一」派一起，衝擊並佔領了瀋陽軍區司令部辦公大樓達13天之久。當天，在瀋陽軍區大院內召開的「揪軍內走資派」大會上，團派的代表以「首都十八所院校」的名義發言，要「揪軍區首長」。該聯絡站人員還把「清華大學井冈山兵團」的大旗插在瀋陽軍區司令部辦公大樓上，並在樓內書寫了「瀋陽軍區必須大亂」等大標語。8月17日，該聯絡站與「八三一」派等一起在瀋陽市人民廣場召開了「向東北地區黨內、軍內走資派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會後進駐瀋陽軍區政治部，直至8月26日才撤出，並於8月22日抄了軍區政治部主任李伯秋的家。該聯絡站還收集和整理了

東北部隊的一些情況，加以匯編數期《瀋軍簡況》，被當地群眾組織複印、擴散，洩露了軍事機密。

團派「南京聯絡站」與南京大學「心中想念毛主席戰鬥隊」一起撰寫、發表了反對南京軍區及其司令員許世友的「急告全省革命人民書」。8月3日，在南京鼓樓廣場舉行的萬人大會上，該聯絡站頭頭宣讀了「緊急聲明」，呼籲群眾「快快武裝起來，拿起大刀長矛，拿起槍」，「武裝奪取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手中的黨權軍權」，喊出了「打倒許世友」的口號。該聯絡站參加了南京軍事院校「告狀團」調查許世友材料的活動，還參與並鼓動南京一些工廠、軍事院校的武鬥。四派「南京聯絡站」參加了南京軍事院校「紅司」召開的「聲討許世友、杜平反革命罪行大會」，並在會上發言，表示支持。

在撫順，團派作戰部部長參與了當地造反派組織「紅工聯」挑起的8月16日、17日的攻打撫順市中心的武鬥，此次武鬥致使12人死亡，百餘人受傷。與當地造反派一起，團派人員參加了8月17日搶劫國家第五機械工業部下屬的325軍火庫的活動，他們打著「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決死縱隊」的旗子，衝進軍火庫內，搶劫了十多噸炸藥以及槍支、彈藥和數十部車輛，打傷守衛軍火庫的官兵多人，搶走了一些醫藥用品等。

四派「長春聯絡站」鼓動當地群眾組織「揪軍內一小撮」，支持「長春公社」反對吉林省軍區及其首長的活動，參與了該公社搶劫當地駐軍武器的活動。

團派「武漢聯絡站」7月底8月初參加了當地造反派圍攻武漢軍區所謂保守派的活動。四派「武漢聯絡站」8月初進駐湖北省軍區，支持軍內造反派反對軍內保守派。

兩派聯合後的「常州聯絡站」參與策劃當地造反派組織「主力軍」9月11日發起的「武裝返回常州」的大武鬥。這場大武鬥持

續了7天，兩派群眾70多人死亡，百餘人負傷。武鬥中，炸毀了奔牛鐵橋，致使京滬鐵路停運達12天之久。

總之，在1967年夏季的反軍、亂軍中，清華兩派特別是團派的足跡遍及全國約22個省、市和自治區。從這些反軍、亂軍和插手外地文革的行徑中不難看出，清華兩派對群眾大武鬥並不陌生，並且已在清華園外涉足群眾大武鬥了。清華兩派在1967年夏季中國大地上的所作所為映襯了他們在1968年百日大武鬥的血戰廝殺是多麼地合乎文革的「邏輯」。

六、火燒英國代辦處

1967年1月至8月間，由於文革的特殊形勢，中國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一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取代了原有的部長、副部長職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同已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直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¹¹到了8月，與英國關係的不斷惡化則首當其衝。因為，在此之前，香港受到了內地文革許多方面的直接影響，發生了一些香港英方當局與中國愛國人員衝突的事端。8月初，港英當局拘押中國駐港記者及有關人員數十人，責令三家報紙停刊。對此，中國外交部於8月20日向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出抗議，發出照會，限令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上述三家報紙的停刊令，無罪釋放中國記者及有關人員。

1967年8月21日下午，清華四派的幾位人員參加了北京中國醫科大學（現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舉行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

11 金戈：〈在外交部「奪權」前後〉，載《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225。

反修聯絡站」的會議。這個聯絡站是由北京外語學院、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北京第一機床廠、清華大學等十多個單位中的有關群眾派別所組成。此次會議主要商討於8月22日晚在英國駐華臨時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此次會議商定，若是英國政府接受中國外交部8月20日的照會要求，立即就地舉行慶祝遊行；如不接受，即刻由該聯絡站的核心組成員帶領一部分人進入英國代辦處辦公區及住宅區，把英國代辦處揪出來聲討，查抄反華材料，切斷通訊聯繫，降下英國國旗。此次會議分配給清華四派的任務是：組織120人的衝擊隊伍，其中有專業人員負責切斷英國代辦處的電源與外界通訊聯繫，另有400人參加「聲討大會」。參加會議的四派人員回校後向四派少數頭目彙報了會議情況，這幾位頭目遂同意了派人部署。

8月22日晚，在英國代辦處前舉行的「聲討大會」異常混亂，原定3000人參加的大會，此時連圍觀群眾在內，已逾萬人。當晚22時30分左右，衝擊開始，差不多就在同時，北京衛戍區的宣傳車喇叭裏已播出周恩來總理關於不許衝擊英國代辦處的講話，而一些單位的狂熱群眾竟置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於不顧，在一片「反英帝」的殺聲中衝進英國代辦處院內，在辦公樓裏進行打英國人、砸辦公設施、搶某些物品的「打、砸、搶」活動，最後火燒了辦公樓和汽車等。清華四派個別人甚至還在英國代辦處辦公樓上揮舞四派的大旗。

在英國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不到三小時，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了外事口各造反派的組織頭頭，他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佈：「……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為，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國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

理。」¹²的確，火燒英國代辦處，「給我國的國際聲譽帶來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成為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一個『冰點』。」¹³「毛澤東、周恩來後來才多次將『火燒』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和極左思潮聯繫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¹⁴

並不是「極左派」的四派無疑在衝擊英國代辦處一事上身體力行的是「極左」思潮，而這恰恰是與它的「四一四思潮」並不完全相吻合的。由此可見文革群眾問題的複雜和曲折。四派一些人之所以參加了衝擊英國代辦處，主要原因是他們想從左右北京文革形勢中搶「功」來抬高自己的聲望，從而超過或壓倒團派的聲望。這使他們的愚蠢性舉動帶有極大的投機賭注成分。參與火燒英國代辦處，不僅是清華文革群眾運動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四派自身歷史的最大恥辱。「火燒英國代辦處」這種把中國文革群眾特有的「打、砸、搶、燒」之類的蠢舉，搬用到中國的外交活動及中國的國際事務中，除了證明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極端狂妄而又愚昧無禮，又能證明甚麼呢？

三 「文革」：清華大學災難的淵藪

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造成了 18 人死亡，1100 多人負傷，30 多人終身殘疾，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

12 金戈：〈在外交部「奪權」前後〉，載《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頁 239。

13 同上，頁 234。

14 同上，頁 235。

已逾 1000 萬元。在文革時期，幾乎沒有哪一個單位像清華大學這樣在短短的 100 天裏（實際上不足 100 天）遭受如此慘重的犧牲。換言之，幾乎沒有哪一個文革群眾武鬥的單位像清華大學這樣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損失。然而，百日大武鬥的結束還不是清華文革的結束。在長達十年的文革煉獄中，清華大學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磨難。

據不完全統計，清華大學在文革十年中經歷的大大小小的運動約有 20 次之多，可謂「年年有運動，運動必整人」。在百日大武鬥之前，紅衛兵造反、工作組進駐、原校黨委停止工作、所有幹部靠邊站、鬥爭「蒯氏人物」、工作組撤出、紅色恐怖之夜、大串聯、「井岡山紅衛兵」崛起、反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批鬥王光美、清華兩派形成、反軍亂軍狂潮及火燒英國代辦處、幹部問題大論戰直至大武鬥等，清華文革初期震動校內外的事件不下 10 起。百日大武鬥之後，清華大學經歷了工宣隊接管、清理階級隊伍、整黨建黨、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所謂「六廠二校經驗」和關於知識份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廣大教師職工下放江西農場、關於教育界及知識份子的「兩個估計」、以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為主的「教育革命」、「三個月運動」、批林批孔、開門辦學、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劉冰等人寫信給毛澤東、教育大辯論、「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清查運動」等等，清華文革中後期震動校內外的事件更是不下 10 起。一次次文革政治運動給清華帶來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據統計，在文革 10 年歷史中，清華大學教職員工中，受到文革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不同程度地衝擊、打擊或迫害的人數佔一半以上；被立案審查的教職工則達 1228 人，佔全校教職員工總人數的

20%以上，其中17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絕大多數實屬冤假錯案。¹⁵

在我看來，文革時期，清華大學至少有四個事件可稱之為文革重大事件，它們甚至影響到全國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進程：

一、1966年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組織以及隨後而來的紅衛兵運動，不僅僅意味著從清華大學附中那裏樹立起了一個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文革群眾造反的旗幟，而且給文革特別是給文革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所謂「大鬧天宮」和「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¹⁶的突擊隊。通過紅衛兵運動，文革得以橫掃天下，推向全國。紅衛兵運動也是文革初期群眾運動的一個縮影。「紅衛兵」的緣起使清華大學文革一開始就處於文革洪流的漩渦中。

二、1968年4月下旬至7月底的百日大武鬥，既是紅衛兵運動全面衰敗的象徵，也是以群眾造反運動為代表的文革第一階段趨於結束的標誌。百日大武鬥使清華大學又一次處在文革進程的轉捩點上。

三、從1970年才真正開始而於1976年年底瀕於結束的「教育革命」是文革時期清華大學進行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事件。「教育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文革理論和實踐中最富有想像力、也最具有「烏托邦」的反動性和破壞性的部分。「教育革命」打破了傳統的教育思想、教育體制和教學原則，拋棄了過去的教學方法、招生方式和考試制度等，具有非常偏激而又非常荒

唐的主張和做法。清華大學是文革時期「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教育革命」給清華大學乃至現代中國教育事業的損害是難以估計的。

四、1975年8月、10月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人兩次寫信¹⁷給毛澤東而引發的所謂「教育大辯論」和隨之而來的1976年年初開始的全國性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更加表明了文革已走進了歷史的死胡同。對寫信當事人每人多達上百次的批鬥（在10個多月裏，對劉冰本人在不同場合進行的批鬥多達214次！¹⁸）最主要的是，把這兩封信轉交給毛澤東的鄧小平本人在1976年4月又一次被「打倒」，意味著從1975年緣起的這場鬥爭，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實質上都是一場關係到否定還是肯定、拋棄還是堅持、結束還是繼續文革的鬥爭。在此意義上，清華大學劉冰等人的寫信事件實際上敲響了文革的喪鐘，而1976年3月底至4月初偉大的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則促使文革的覆滅不可逆轉。

然而，從1968年春夏百日大武鬥敲響了文革群眾運動的喪鐘到1975年秋寫信事件敲響了整個文革的喪鐘，不管人們意識到與否，也無論多麼艱難困苦，清華大學還得要跋涉近八年的漫長路程。

15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編輯部（主辦單位名稱下略）：《清華大學》報，1978年5月30日，第233期。

16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載《紅旗》，1966年第11期，頁27。

17 人們評述此事時，多用「上書」一詞。我個人認為，「上書」一詞帶有封建色彩，不妥。

18 《清華大學》報，1978年10月23日，第240期。

第三章 眾擎易舉

「文革」為甚麼是群眾性的

在對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記述和研究中，每當人們問起我，在紛繁複雜的諸多文革問題中，甚麼是最有意義的、最重要的問題？甚麼是令你最感興趣的問題？——非群眾問題莫能概屬。我的回答總是如此。在文革的故鄉，關於文革群眾問題的研究，則關係到如何反思和如何批判文革。因為，文革作為 20 世紀歷史上一場獨一無二的「革命」，它之所以具有這樣源遠流長的影響並成為了「中國政治中永恆的話題」，¹它之所以當年具有橫掃中國大陸天下的規模和衝擊了那時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氣勢，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文革的群眾性，即文革確實是一場調動起了億萬群眾投入和進行的所謂「大革命」。換言之，億萬群眾的回應和參與，使得文革在中國歷史上所產生的影響堪稱空前絕後。億萬群眾以如此巨大的熱情和精力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和如此之廣的空間來置身於這場文革之中並進行這場文革，這在人類發展到今天的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¹ 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5年10月號，第31期，頁2。

一 從清華大學的「文革」看「文革」的群眾基礎

著名文革研究學者金春明先生指出，在文革諸多起因中，自1957年之後，在我國，「左」傾思潮惡性發展逐漸佔主導地位，並表現為「三個惡性循環」，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集權體制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這三個惡性循環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互為促進，交互發展」。²使這三種惡性循環得以進行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不斷進行愈益激進和狂熱的全社會



1966年8月22日晚，清華群眾冒雨參加「文革」大會。

²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前言，頁4。

性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好像成了政治運動乃至革命運動的同義語。

許多從事文革研究的學者大都把文革看成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動亂，這一點確切地表明了文革不是由群眾所自主和自覺地進行的所謂革命。然而問題卻在於：為甚麼文革擁有了億萬群眾呢？為甚麼文革曾得到了億萬群眾的參加和支持呢？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至少應有四個方面必須切實加以關注：

其一，毛澤東在文革前夕不斷加劇的個人崇拜成為文革具有群眾性的必要條件之一。「毛澤東本人是有意識地利用個人崇拜，用它去幫助領袖個人凌駕於黨中央集體領導之上，更便於個人集權和運用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時，又可以蠱惑群眾不加思索地接受領袖的這種無上權威。也可以說是製造了一種社會承載力，使廣大群眾甘心成為『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馴服工具。」³在文革前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已達到了迷信的地步，這可從當時清華的報刊文章中略見一斑。即使是廣大幹部也把毛澤東的權威當成最高的權威，對毛澤東指示的貫徹雷厲風行。例如，毛澤東在1964年春節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關於「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發出不到三天，清華大學黨委立即學習、討論和貫徹部署，並於當年暑假召開全校所有幹部會議，進一步學習和落實毛澤東關於教育的一系列指示。在文革中，毛澤東本人的決策和權威給清華文革帶來了一次次決定性的轉折，從批判工作組到派出工宣隊，從制止大武鬥到批評劉冰等人的來信，毛澤東的意志和指示對清華廣大群眾來講不僅是不容抗拒的，而且是必須

³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133-34。

貫徹執行的，因為，只有毛澤東本人的力量才能把文革的群眾基礎確定下來，並把最廣泛而又最深入的群眾運動統一起來。而廣大群眾在文革之中，只有在毛澤東本人的權威及個人崇拜的庇護下，他們多種不同的利益才能在他們相似的文革行為的前提下相對地加以整合。所以，對毛澤東的崇拜和服從是文革群眾性的一個直接動因。

其二，文革群眾基礎的逐步形成還在於：文革之前的若干年中，社會生活中不斷出現和進行的高度整合性乃至高度規範性的政治運動、經濟運動和思想運動，把社會各界大眾從行為到心理、從個人本職工作到日常生活瑣事逐漸凝聚到以某種高度統一和高度強制的模式來進行。對清華而言，長期不斷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逐漸加劇的教育領域的意識形態批判和整肅，等等，對廣大師生員工來講，不可能有置身於局外的條件和機會。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之後至文革前，在我國，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達50餘次。⁴

「多年來頻繁的政治運動、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運作方式，為廣大群眾投身於『文革』提供了心理準備和參與方式。」⁵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所形成的鬥爭手段和積累的矛盾方式，在文革中，被廣大群眾大大加以引申和發揮；至少文革的形式和規模，對廣大群眾來說並不是陌生的或意外的，對一部分激進群眾而言，是水到渠成、習以為常的。文革前廣大群眾中的諸多矛盾，往往只是通過社會政治運動的形式曲折

4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3。

5 同上，頁182-83。

而又間接地表現出來，這使後來的文革群眾基礎初看上去顯得單調或專一。

例如，由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來的「四清」運動實際上使文革群眾運動的序幕於1964年下半年拉開，這比文革運動的理論序幕即姚文元發表的〈評《海瑞罷官》〉一文還早一年多的時間。「四清」運動的宗旨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把在全國農村、工廠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奪回來。中共中央宣傳部1964年在北京大學開始了高等院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北大原有的幹部統統靠邊站，接受審查，北大教學秩序被完全打亂。儘管這在後來得到了鄧小平等人的糾正，但是這一情況在清華大學等高校引起極大的震動，因為，北大與清華兩校是唇亡齒寒。「四清」運動的目的在於「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在「四清」運動中第一次提出「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點，已為社會政治鬥爭的重心轉移到黨內作了鋪墊。最主要的是，群眾鬥爭的形式、聲勢和規模都在「四清」運動中有所上升或「創新」，直接為將要到來的文革準備好了巨大規模的群眾鬥爭的「藝術」。同當時許多城市單位一樣，清華大學也派出了「四清工作隊」前往農村搞「四清」，先後有四、五、六年級的4400多名學生以及教職員工奔赴北京一些郊區縣，一些師生直至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才返校。大規模的「四清」群眾運動是文革群眾運動的某種「演習」。

其三，文革群眾基礎最根本的方面在於群眾的利益，具體地說，在於群眾為了自身的利益驅動和利益分化。這也是文革群眾所有問題的根本所在。我個人認為，上述毛澤東的權威與個人崇拜成為文革群眾基礎的直接動因，上述通過許多次政治運動中折射出的群眾基礎的模式及其強化，最終都受制於群眾

利益。把群眾利益確定為文革群眾問題的根源，而不是把所謂領袖權力之爭、黨內路線鬥爭等等作為根源，都會使我們對於任何繁蕪複雜、曲折多變的群眾問題的考察立足於一個客觀的出發點。

文革中的群眾利益，既涉及到文革前的群眾利益格局，也涉及到文革中的群眾利益轉換；既包括有形的群眾物質利益，也包括無形的群眾精神利益；既有不同階層群眾交織在一起的不同利益，也有相同階層群眾分化開來的相同利益。當然，這種種利益在文革群眾之中表現得非常廣泛、複雜、曲折甚至隱晦，但其表現途徑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與非群眾性的上層利益的互動；二是與文革前作為群眾頂頭上司的幹部利益的互動；三是與文革中上述暫時無職無權的幹部利益的互動；四是與對立的群眾利益的互動。

群眾生活的多種多樣使得群眾利益相對分散和極為廣泛，也使得文革的群眾基礎自始就不是確定如一的。在文革之前，群眾基礎經歷了不斷分化和組合的過程，群眾利益過多地、過於集中地由政治運動的途徑來加以「過濾」，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加以「凝聚」。在文革期間，群眾利益乃至群眾基礎直接等同於政治利益或被誇大為政治問題。文革群眾利益不可能是完全有機統一的，它總是處於一部分群眾利益與另一部分群眾利益相對立、相衝突的狀態中。這也使得文革群眾基礎從整體上即從全社會講不具備各自組織的性質，而從局部上即從眾多單位或地區各自來講又有一定的有序特性。

然而，即使是高度政治化了的文革群眾利益形式也不能掩蓋群眾實際利益的千差萬別。在文革前夕，部分群眾所受到的政治運動的衝擊或迫害，例如，1957年清華大學「反右派」運動中共有577名師生被打成「右派」（學生佔400多

名），⁶部分群眾的工作待遇和物質福利，部分群眾與部分幹部所結成的種種利害關係，部分群眾由於受家庭出身等政治牽連在提資、住房、子女入學、晉升等方面所形成的不滿甚至怨憤，已積累到了一個相當可觀的程度。部分群眾在追求一定的社會政治地位而在就業、入黨、入團、提幹等方面遇到的挫折，在更多情況下，會以更加激進的形式反彈於社會生活及政治運動。與此不同的是，那些上述方面獲得較大利益並成為既得利益者的部分群眾，他們理所當然地要不斷維護和繼續擴大已有的利益。

總之，在文革前的較長時間裏，無論是社會還是眾多單位和地區，都沒有妥善地解決廣大群眾之間利益的交匯、衝突、疏通、引導等方面的工作，並且使廣大群眾正常的不同利益壅塞於過於狹窄而偏激的政治「渠道」，致使在文革開始不久，這些利益以一種突發式的、畸形化的政治體現，披燦著臃腫的、紅色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橫溢在中國文革的大地上。文革不同群眾的利益表面上看似是觀點與觀點的衝突、思潮與思潮的交鋒、理論與理論的對峙，而背後無不深藏著廣大群眾的利益淵源、利益要求和利益關係。在清華，文革群眾利益問題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職工與教師之間生活待遇上的差距。當時清華一些文革報刊連篇累牘地控訴所謂教育戰線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職工的「全面專政」，只不過是列舉一些職工與教師之間在住房、收入、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在教師當中，業務能力與政治表現之間的關係，即所謂「紅與專」同「白與專」的對

⁶ 清華大學《新清華》報編輯部：《新清華》，1979年3月26日，第192期。

比，涉及到教師利益的方方面面。文革開始後不久，廣大群眾的諸多利益面臨著某種重新評價、重新劃分和重新確立的境地。這些都使文革群眾運動無比複雜和無比曲折。這種群眾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的分層、分化、裂變以及它與文革本身的互動，常常把個人利益直接以異化的形式表現為文革利益，同時，使群眾利益大都採取某種虛幻的文革共同體利益。

其四，從60年代初開始不斷強調和升溫的「階級鬥爭論」，不僅有可能成為日後的文革指導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礎，更有可能逐漸趨於成為廣大群眾看待社會生活、調節人際關係的某種心理定勢。60年代中期的中國大眾社會，如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一樣，「已經被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理論弄成了一個階級鬥爭的火藥桶。」⁷毫無疑問，教育界是灌輸和強化「階級鬥爭論」的重點，例如，清華大學與全國其他大學一樣在此時的學生招生和分配、教職工的使用和待遇等問題上，非常注重「階級出身」及「階級成分」。「階級鬥爭論」彷彿成為處理諸多社會矛盾、調整生活關係、解決人際糾紛的一根無形的而又有力的「大棒」。這種「階級鬥爭論」在文革前夕很快成為在全社會通行的「極端化的階級鬥爭論」。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高等院校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的談話錄要〉。毛澤東指出，「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自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及政治教育活動，實質上都貫穿著一條「階級鬥爭論」的主線。

7 點點：〈點點記憶〉，載《當代》，北京，1998年第5期，頁29。

按照林彪所說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所有現象的總的根源，離開了這個總根源去觀察社會現象，就觀察不出來，」⁸因而，強調和推行「階級鬥爭論」，既可把過去一些年的社會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大決策失誤歸之於敵對階級的影響及破壞，又可把人們的各種關係，包括人們認識的差異和思想的分歧，歸之於階級鬥爭的作用。「階級鬥爭論」發展到「極端化的階級鬥爭論」則無形而又有效地在全社會群眾的內心中編織出一張恐懼的「網」，製造出一個制約所有行為規範的「綱」。正如著名電影導演陳凱歌所概述的：「作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被告之，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仇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毫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是，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數，所以，昨愛今仇的事常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麼恨就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愛是毒藥，愛情是墮落，人性是虛偽。仇恨卻代表正義、崇高和安全感。在一個人口眾多而格外擁擠的國度裏，以仇恨作為火炬而加以傳遞，其結果就不難設想。」⁹在文革前夕，蒯大富作為大學生中「根正苗紅」的一個代表人物而寫的〈出身好也要自覺革命〉¹⁰這篇曾受到重視的文章，就反映出了這種階級教育的片面性和階級鬥爭心理的變態性。

8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64-65。

9 陳凱歌：〈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原載《中國作家》，北京，1993年第5期；後載柳萌主編《在劫難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40。

10 蒯大富：〈出身好也要自覺革命〉，載《新清華（共青團專刊）》（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部和共青團委主辦），1964年12月17日，第8期。

二 從清華大學的歷史看「文革」的歷史源流

文革的歷史源流何在？國內外文革研究學者大多從文革前的十年歷史，具體說，是從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開和1957年夏季全國性的「反右」運動以來的歷史，來探討文革的歷史起因、歷史條件或歷史源流的。這方面比較著名的就是金春明先生的概述。金春明先生在其《「文化大革命」史稿》一書中用了約四分之一的篇幅來分析文革前十年歷史形成文革的諸多因素。金春明先生認為，在形成文革的多種歷史原因中，「中國共產黨內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錯誤認識為主要特徵的『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並在黨內佔統治地位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¹¹金春明先生把文革的歷史原因過多地置於主觀認識的層面，這是值得商榷的。剖析導致文革爆發的並在黨內長期佔主導地位的「左」傾思潮及其勢力，對於確切地把握文革的歷史原因固然重要，但是，我個人認為，對於文革的歷史原因，還應該從更高更廣的視角，把中國近代歷史特別是中國為走入現代化的歷史，同文革的歷史原因聯繫起來加以探討和考察，進而揭示出文革自身的客觀必然性，揭示出文革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插曲」而顯現出上述歷史的曲折和艱辛。換言之，文革之前的十年歷史可謂文革的直歷史源流，而文革前的半個多世紀歷史則是文革更為久遠的又深厚的歷史源流。闡釋和把握文革十年歷史與20世紀中國六十多年歷史之間的關係，可使我們對於文革的考察和研究不僅僅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之中，而是置入近百年來中

11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4。

走向自立、自主、自新、自強的歷史過程中，還可使我們進一步理解文革與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特定關係。所以，文革的歷史源流問題不是一、二十年的問題，而是半個多世紀乃至近百年的問題。

以1840年為開端的中國近代史，是在英國罪惡的鴉片戰爭的重炮之下，打開中國國門而「逼迫」古老的中國走向世界、在20世紀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對於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來說，除了它所具有的諸多中國社會矛盾之外，它與以往封建王朝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那苟延殘喘的最後幾十年裏，一直處在如何與世界「接軌」的危機之中。是要「大清」，還是要中國？是使中國真正走向世界，還是使中國落伍於世界？這是清王朝自身無法解決而又促使它走向滅亡的一個歷史悖論。對於具有古老歷史的中國來說，近代中國歷史短短幾十年的變化之巨之深，用李鴻章的話來概括：「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¹²

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使中國在現代世界自立並自強起來，即如何實現或建設中國現代化。中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種種演化變革已使中國遠不是「千年一變」的中國了，中國的文化思想、道德規範、價值觀念、知識學說乃至話語體系都滲透了以西方世界為主的外來影響和異域因素。從20世紀一開始，中國就不得不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再次當成中國能否立國乃至如何建國的重心所在。唐德剛先生對於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巨變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評

12 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載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頁45。

說。中國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使中國從秦王朝前後完成的第一次社會轉型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封建時代開始了第二個轉型，即向「現代化」的轉型。「十年一變」是中國進行第二次轉型的階梯。這一轉型是痛苦的、長期的，不是自發的、漸進的，「它是西方帝國主義欺逼之下，突發的劇烈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¹³對於唐德剛先生勾勒出的「十年一變」，我稍加改動，著重表明中國 20 世紀的若干重大歷程：1900 年的義和團扶清滅洋和「八國聯軍」入侵；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 1919 年的五四運動；1929 年的國民黨統一和內戰；1937 年的全民抗日戰爭；1947 年的國共兩黨決戰和 1949 年的新中國成立；1957 年的反右鬥爭和 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1966 年的文革爆發和 1969 年的文革第一階段結束；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起步；1989 年的學生運動及「天安門事件」……20 世紀的中國和中華民族只是到了 90 年代才有了相對平靜與和平建設的年代。毫無疑問，20 世紀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已經走向了世界而逐漸自新的世紀。

從 20 世紀一開始，中華民族就處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而亡國亡種的危險之中。清王朝腐敗無能，它在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而使它的滅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的時，它的一系列所作所為更加從反面凸顯出建設一個獨立統一、富強和民主的中國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不可逆轉的題。不同於 1898 年多少沐浴著維新變法的雨露而誕生的北師大（當時稱「京師大學堂」），清華大學從孕育到出生都一

13 唐德剛：〈論「轉型期」與「啟蒙後」〉，為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代序，頁 7。

處在民族的危亡和祖國的衰敗的陰影之下。眾所周知，清華大學的產生是美國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政策的一個結果，¹⁴是美國用清廷「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而建立了「清華學堂」。儘管清華在其最初帶有濃厚的中西文化衝突和交匯的特色，但它卻恰恰產生於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前夕，這彷彿給日後清華的發展帶來了一線生機。辛亥革命後一年，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繼續從事留美預備生的培養。1925 年清華學校設立大學部，1928 年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並於次年結束了留美預備生的工作，發展成為一所正規的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迅速崛起為全國一流的大學。¹⁵清華從留美預備生學堂到清華學校再到清華大學的這三大步發展，

14 1906 年，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校長詹姆士 (Edmund J. James) 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備忘錄」中說：「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哪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那一個國家就能由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穫。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個國家來，並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他對當時中國大批留學生留學日本和歐洲之後回國，不效法美國而效法歐洲、日本，這些留學生將推薦歐、日教師到中國任職，而不請美國人，將買歐、日商品而不買美國商品等，表示十分著急。他的結論是：「為了擴展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獲得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轉引自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3。

15 參見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北京，1981 年）第一編；還可參見江崇廓、劉文淵、孫敦恒編著：《清華大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也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¹⁶

1931年，梅貽琦先生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步入了一個空前大發展的輝煌時期。在這前後，清華大學雲集了一大批知名學者、教授，薈萃了來自各地的莘莘學子，擁有先進的教學設備設施和雄厚的財力，培養出了一大批祖國和民族的棟樑人才。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清華大學歷盡艱險，於1938年5月遷至昆明後，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日戰爭艱苦卓絕的條件下，三校師生員工同舟共濟，共赴國難，艱苦辦學，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績，教學質量較戰前有所提高。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觀。¹⁷

清華大學正值她26年校齡時，開始經歷了八年之久的「外禍」；在她55年校齡時，又經歷了十年之久的「內亂」。在清華大學20世紀89年的歷史中，竟有五分之一多的時間處在「外禍」「內亂」之中，而實際上清華大學相對穩定、和平的發展時期共加起來不過50餘年。這不能不說是清華大學的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軍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代表正式宣佈接管清華大學，清華大學迎來了一個新紀元，清華大學步入了20世紀後半葉的征程。事實證明，不管這一征

16 馮友蘭：〈清華發展的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載莊君主編：《世紀清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頁28。

17 參見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1937年1946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多麼艱巨，清華大學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比其前38年來更加顯赫和卓著。

50年代初，經歷了思想教育和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之後，為了加快我國工業化建設的需要，1952年6月，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經過這次調整，使清華大學由延續了27年（1925—1952年）並已形成自己特點的多院制、多學科的綜合大學，轉變為一所工科大学。清華大學在1953年之後的40多年的時間裏成為中國一所最高的工科學府，這給清華大學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帶來了數十年的不良影響。儘管人們對這次院校調整的後果爭論不休，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清華大學多學科元氣大傷而步入工科大学的同時，反映出了我國50年代初經濟建設和教育建設的急切心態，這也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不同時期屢屢出現的問題。

從1953年春季開始，清華大學進行了以學習蘇聯經驗為主要內容的教學改革運動，實施的教學計畫以學習蘇聯為中心環節，加速改造舊清華和建設新清華。在教學思想、教學環節、教學方法、教學體制及教材體系等許多方面直接採用蘇聯的經驗或模式，學校還駐有蘇聯顧問、學者和專家。儘管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先生於1957年初不滿於只學蘇聯，提出了關於高等工業學校培養目標應走西德（聯邦德國）和美國的道路的談話，¹⁸引起了清華校內三個多月的討論，又稱百日論戰，但是蘇聯經驗的影響一直持續到60年代。在1964年暑期的清華幹部會議上，批判、清理了過去學習蘇聯的教條主義以及蘇聯模式

18 〈錢偉長談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載《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1月7日。

的不良因素。然而，這個時候，在中國與蘇聯兩黨兩國分裂的大背景下，中國教育改革已走上了一條更為激進而偏執的道路。

自 1957 年之後至文革前夕，清華大學同祖國一起經歷了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運動，這些愈來愈激進、狂熱的（名為「左」的）政治運動實質上都表現出在如何建設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人民所具有的急切、浮躁和所經歷的挫折、失敗。在清華大學裏，連年不斷的「教育革命」及「教育改革」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愈益強化的政治活動，使清華大學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走過了較長的彎路。這一點並不是由於清華大學本身造成的。60 年代中期，由那些不可避免的極「左」禍害逐漸積累起來的災難和危機，已在 1964 年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事件之後，就被清華大學的有識之士預感到了它們的來臨和爆發。

從對清華大學歷史的回顧和考察中，我個人認為：文革的歷史源流在於中國 20 世紀現代化建設歷史的曲折性和複雜性之中。這裏，暫且不提在 20 世紀不同時期、不同社會力量 and 不同政黨及學說為進行這一建設所做出的探討、嘗試和努力，而是再次強調建設一個獨立、統一、富強和民主的現代化中國是一個貫穿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它本身就是 20 世紀中國的歷史之重心乃至歷史之源。即使是文革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的一次「中斷」（間斷），但它也從反面進一步推動了並且是更加不可逆轉地堅定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具體地說，文革的歷史根源主要在於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諸多矛盾、張力、危機和衝突，例如，過去與現今的矛盾，傳統與變革的張力，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對撞，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中國在 20 世紀的若干年裏似乎要走完西方世界數百年的進步歷程而引起的一系列危機，等等；而文革作為這一現代化建設長河中的一股「逆流」恰恰就匯入於這一現代化建設長河的滾滾洪流之中。因而，

文革是 20 世紀中國最後 20 年產生真正地、徹底地實施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實踐所必然經歷的一次巨大而長久的「陣痛」。

我要強調的是，從「現代化」的角度考察文革的歷史源流，這並不排斥從其他角度諸如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影響的角度、中國共產黨內長期盛行的「左」傾勢力和「左」傾影響的角度、蘇聯模式影響的角度以及領袖個人因素的角度等來考察文革的歷史源流，相反，只有把這些不同角度的考察有機地互補，我們對文革的歷史性考察和邏輯上把握才有可能愈益切近完整、豐滿和具體。

「現代化」有多項要求，¹⁹並相應地有若干具體的經濟、科學、技術、教育、人口素質乃至政治等等的指標。²⁰對 20 世紀中國而言，「現代化」的最大指標應首推獨立、統一、富強和民主：「獨立」在 20 世紀上半葉成為「救亡」的同義詞；「統一」是中國至今還未完成的一項歷史重任；「富強」是中國現代化立國、建國之本；「民主」是中國告別封建時代而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沒有這四項指標，中國的現代化將是殘缺不全的。

從 1949 年起，新中國不斷打破外國的封鎖和欺壓，頂住了外國的干涉和強權，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並且成功地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諸多努力都與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仁人志士的「強

19 參見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0 參見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現代化進程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

國夢」有著割捨不斷的聯繫。自 50 年代末之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征程充滿了空想的成分以及畢其功於一役的緊迫感，加上人為地製造和擴大階級鬥爭而造成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過度誇大了國外「修正主義」勢力的威脅和國內異己勢力的復辟的危險，不得不使現代化進程屢遭緩滯，終於在文革時期幾乎使現代化建設的所有努力陷於文革群眾運動的內戰以及政治的內訌之中。儘管在 1975 年初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但整個文革是一場反現代化的運動，是一次使現代化中斷了十年之久的社會「反動」及群眾「反動」。

三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民「革命」

在這一節，我主要探討文革與「革命」的關係，具體言之，文革是否是一場「革命」？即文革是否是一場社會「革命」或具體形式的（如政治）「革命」？這關係到對文革的準確評價和全面認識。現今學術界中大都對文革作為一場「革命」持否定態度。我的一位朋友見到我的這一題目後指出，應改為「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民『反革命』」。而我則認為，考察文革不能回避「革命」，亦即文革與「革命」之關係。所以，我暫且繼續用我的標題來表示我的這一任務。

毋庸置疑，在 20 世紀的中國，使用頻率最高、涉及範圍最廣、意指蘊涵最大的一個詞，莫過於「革命」二字。長期以來，「革命」彷彿成為社會生活與個人行為的最高準則和最高規範。的確，中國的 20 世紀可稱之為革命的世紀，20 世紀的中國與革命形影相隨。當人們今天不無理由地說 20 世紀中國的主題之一

就是「革命」時，他們確實道出了中國在這樣一個世紀，以革命的集聚、革命的頻繁、革命的刻骨銘心乃至革命的「萬能」表現出了中國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矛盾、困境、危機和前所未有的轉折、生機、希望。回眸 20 世紀中國或中國 20 世紀的革命歷程，我們若以年代把每一時期的革命特性標點出來就可以看出，從 20 世紀頭十年晚清保守派「執行」改良派的政治「遺囑」而進行的「新政」到一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二十年代的「北伐革命」、三十年代的「民族革命」、四十年代的「政治革命」、五十年代的「經濟革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的「革命」破產，再到八十年代的革命全面轉型為改革，再到九十年代的革命反思或反思革命，「革命」已成為人們考察和研究 20 世紀中國每一重大社會歷史事件所無法回避或者不可忽視的參照點和切入點。因為，從辛亥革命開始，經過「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及「白話文革命」到文革時期的「道德革命」甚至「皮肉革命」，幾乎 20 世紀中國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與「革命」相關聯，或者就是「革命」的一部分。20 世紀的中國發生了並且容納了如此之眾多、如此之密集和如此之不同類型的「革命」，這也恰恰展現出了這一世紀中國的非凡和獨特。

文革時期，清華兩派以至全國許多地區和單位的群眾兩派進行論戰的主要內容是依據「階級鬥爭論」來如何發揮和應用「革命論」，而不僅僅是如何理解「革命論」。這種「革命論」是「階級鬥爭論」的派生物，即革命不但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也是階級鬥爭的必然途徑。既然革命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主題，彷彿中國社會只有「革命」或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存在和發展下去，那麼「革命」也就是實現社會轉變、觀念更替、人民需求、理想目標等等無所不能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盛大的節日」。在文革前夕，廣大群眾實際上在心理上已有了對革命的

廣泛認同和承受能力，革命意味著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為動力的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而文革把「革命」推向了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甚至無所不至其極的關於人的一切問題或方面的價值尺度。在文革群眾運動中，「革命論」同時還意味著「暴力論」。

隨之而來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文革是不是一場「革命」？即一場傳統意義上或者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呢？亦即如何從「革命」本身的涵義和實質來界定文革、劃分文革？二是包括基於文革的巨大歷史背景或沉重的文革陰影，李澤厚、劉再復先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了「告別革命論」，²¹此論涉及到自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國一系列革命有無必要和如何評價的大問題。此論一出，在海峽兩岸學術界引起較強烈的反響，並在大陸理論界中受到了批判。這裏，我並不直接回答或評析由「告別革命論」所帶來的關於革命的疑問，而是根據本書的任務，著重探討文革作為所謂一場「革命」的諸多方面。

從中國文化來看，「革命」在古代以王者受命於天，故稱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為「革命」。《易·革》中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變革；命，天命。在現代漢語中，「革命」一詞泛指人們在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會中所進行的重大變化，在很多情況下，特指制度的變更或社會的質變。必須注意的是，在中國歷史上，「長期的動亂使人民習慣了反抗與不服從，結果造成了『一種從定義上講就是一種造反、鬧事的文化』的『革命文化』。」²²

21 參見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

22 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3。

從近代與中國革命文化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關係的法國文化來看，在法國大革命前，「革命」(revolution)類似於天文學意義上的「公轉」、「繞轉」或「迴圈」的意思，反映的是一種古老的人類事務的「輪迴」觀，指出各事物均按環形運動，完成一圈便回到出發點。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以「革命」意指命運的變化、人類事務的偶然變動、人類的時間流程中突發的革新和混亂(無序狀態)。「革命」還意指人類生活的各種多變性和不穩定性，在馬基雅維里看來，這是人們感情用事的結果，而遏制、平息「革命」是政治等級的職能所在。²³因此，「革命」一詞在很長時間裏是一個貶義詞，在18世紀上半葉之前，歐洲一些國家的史學家，總是把「革命」當成「動亂」的同義語，而否定「革命」的積極意義。從18世紀中葉起，啟蒙思想家們考察社會歷史時代時，把「革命」看作「過程」或「時代」的觀點，不僅使時間進入了「革命」，而且有力地促進了「革命」的積極意義的普遍化，使「革命」在一般的意義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類前進過程」的同義語。²⁴「革命」改變了過去被視為「可咒的動亂」而成為「理性的進步」，成為社會的危機、矛盾的綜合。儘管那時人們予以其不同的規定，但是「革命」作為令人捉摸不定的危機狀態，有可能出現各種動盪、危險和艱難困苦，對於社會成員每個人來講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意味著一個民族或人民整體為擺脫奴役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價或犧牲，或者說，為取得「革命」勝利必須做出堅忍不拔甚至艱苦卓絕的努力。

23 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頁137。

24 同上，頁148。

我個人認為，文革決不是一場甚麼社會革命及政治革命。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文革是一場近似革命化了的造反運動。從文革自身來講，它是一場「革『革命』的命」的「革命」。在學理上，不妨稱它為一種「異化的革命」或「革命的異化」。文革之所以與「革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至少從形式上講，文革自上至下，自下至上，自裏到外，自表到內，都滲透著革命的氣息，都煥發著革命的色彩。但是，文革並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之理由，在今天，已沒有多大的爭議：

一、文革並不是也不可能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性質和國家制度發生根本變化的所謂「革命」。正如四派在批判和駁斥團派的觀點時所反復強調的那樣，文革不是使中國社會航船「大翻個兒」的「革命」。今天看來，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前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延續，是這些運動留下來的矛盾和危機的總爆發。

二、文革也不可能是一場具體的政治革命或一場經濟革命。文革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即使是這種黨的領導在文革頭兩、三年除中央和軍閥之外各級組織陷於癱瘓，但是黨的權威和影響依然還在，清華幹部隊伍作用的存在就是一例。文革沒有把經濟問題看作文革的主要方面，遑論「經濟革命」。

三、即使是從文革本義上的「文化革命」而言，文革並沒有推進文化發展，更不用說由文革本身帶來精神解放了。文革在精神或思想方面如同一場瘟疫，它使從社會意識形態到民間思想和民間文化發生的一切病變，最終使文革自己的「肌體」陷於不治之症而死亡的地步。從精神或從思想方面來講，否定文革是一場「革命」的只能是文革本身！

四、就中國文化本義所講的「造反」而言，文革這場近似革命化的造反，並不是甚麼「改朝換代」的造反，而它的近似「

命化」是指在形式上如同過去的農民起義完成之後，以「革命」的面目掩飾或重演陳舊的、沒落的東西。文革作為如上所說的近似革命化的造反只不過是一場在前現代化社會中進行反現代化建設的運動。這種近似革命化的造反是由上而下的、人民大眾參加的社會動亂。

五、由億萬群眾參加並為主體的文革，作為一場群眾運動，也並不是一場「革命」，而是群眾自我異化的運動。文革沒有也不可能實現億萬群眾的自我解放，沒有也不可能帶來億萬群眾在各個主要方面的真正進步。這一點也可從文革結束之際和之後，億萬群眾對文革的否定和唾棄得以證實。

類似某些具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在歷史上獨辟新徑地提出問題和發現問題，但他們本人卻極為笨拙地回答而實質上無力解決他們所提出或發現的問題，文革儘管不是甚麼「革命」，可是它卻引起了我們對革命本身的反思和回顧，對革命本身的重新探討和總結。在文革的沉重映襯下，我們應適時地建立一門關於中國自己的「革命學」了。中國在一場不是革命的文革之後卻能夠直接進行一場革命性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說的，文革的破產是改革的源頭，文革的結束是開放的起點。從歷史發展而言，對文革最有力的否定正是今天的現代化建設。從「革命」本身來講，批判和審視文革又有甚麼意義呢？

首先，文革是中國 20 世紀革命史上的一次「斷裂」或反動。在文革前半個多世紀裏所聚集的、幾乎每一年代的上述各個不同革命的發展或演變，一直持續不斷地把中國 20 世紀經歷的改良與革命、保守與激進、啟蒙與救亡、復古主義與自由主義、「問題與主義」、中體與西用、本土傳統與全盤西化、東方與西方、進化論與唯物史觀、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從「以日為師」、

「以西方為師」、「以俄為師」的模式到中國人走自己的道路等一系列社會、歷史、文化、政治遺留下的危機和深層次的矛盾，在文革之中得到一次總體性的爆發。文革既大大沿襲了傳統文化，又大大破壞了傳統文化。這一點也主要表現在文革把它之前的諸多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矛盾、危機，凝縮地、積壓性地、爆發式地爆發出來，彷彿使過去的諸多革命總是處在一種後一革命比前一革命更加急迫、更加緊張和更加激進的狀態之中，而到了文革，戛然而止，文革成為對幾乎過去所有革命進行革命的「革命」，亦即革命本身在文革那裏異化為反對革命的「革命」。在此意義上，文革把它自己置於了與過去的革命相反或相對立的境地。

其次，文革是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 20 世紀 40 年代末以建立新中國為標誌的成功的「政治革命」和 50 年代以「大躍進」為代表的失敗的「經濟革命」之間交匯的一次轉型，也是一次試圖從思想上和生活中建立烏托邦社會主義乃至烏托邦共產主義「天國」的徹底失敗。

文革前夕，中國 20 世紀的歷次革命好似一個比一個進行得更快，一個比一個更具重負，一個比一個更為壯觀。這不僅使革命幾十年來如一日，巋然不變地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題，而且使這一歷史發展本身賦有了革命的動力乃至革命的慣性和趨勢。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中國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的背景鼓舞下，毛澤東等人在 50 年代堅信，中國在十五年裏「超英（國）趕美（國）」而從經濟上翻身的目標一定會實現。大躍進年代裏，毛澤東曾對周圍的人表示過，他不相信經濟建設比戰爭年代打仗還要艱難。毛澤東在 50 年代領導的力圖使中國從經濟上富強起來的、以大躍進為代表的「經濟革命」遭到了沉重的失敗後，他從 60 年代初開始，力圖從文化領域及思想領域尋找癥結，急於

把過去未成功的「經濟革命」轉換成一場新的「文化革命」及「思想革命」。從 40 年代到 50 年代再到 60 年代的「革命」進程圖式應為：「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思想革命」。後兩個不成功的「革命」的直接歷史聯繫正是我個人所要探尋文革歷史起因的著眼點之一。因而，50 年代以大躍進為代表的「經濟革命」的失敗也多多少少地導致了文革的破產，因為文革不具備甚麼可觀的更不用說雄厚的經濟保障基礎。

最後，對億萬群眾而言，文革由最初的所謂「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革命」演變為最後的群眾自己批判自己、自己更新自己的大變革。

「一位經歷過晚清、北洋、國民黨政府和新中國漫長歷史跨度，並有極為豐富的政治閱歷、幾經沉浮的老人，在那個『紅八月』之後對我說，在近代歷史上，『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前所未有的。舊社會的大規模戰亂，也曾波及到全國的各個角落和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但是，那是人們被迫的，出於無奈的選擇。至於『文化大革命』，幾億人都心甘情願、主動地投身其中，無論是打人鬥人的，還是被打被鬥的，以及旁觀的，很少有不被觸及靈魂的，運動的思想深度更是無與倫比。」²⁵ 億萬群眾表面上的廣泛參與並不能保證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文革在所有使人民群眾置身於其中的社會運動中，它的規模和深度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文革作為一場所謂的全民「革命」，是文革時代每個成年人乃至未成年的十四、五歲的青少年所無法逃避的，即使是以「逍遙」的態度甚至以自殺的行為來對待文革，那也是以特定的方式參與了文革。文革被稱為一場全民「革

²⁵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頁182-83。

命」，還在於文革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作為孤立的、單一的人是無法拒絕或無法抗拒的，因為每個人都必須像他（她）的同類其他人那樣，必須以某種行為方式和某種態度來置身於文革之中，即每個人都潛在地既可能是文革的參與者也可能是文革的對象，無一例外。文革被看作一場全民「革命」，對於個人和對於群體來說都意味著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置或者如何運作的問題。文革被歸結為一場全民「革命」，還表現在文革存在於人們的各個方面和滲透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用文革話語來講，文革是融化在人們的血液裏、爆發於人們的靈魂中和落實到人們的行動上的「大革命」，或曰「生存革命」、「日常革命」、「話語革命」、「風俗革命」、「心理革命」、「道德革命」直至「靈魂革命」……總之，可稱之為一切的「革命」。文革的全民性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

第四章 畸重畸輕

「文革」初期群眾與非群眾的互動

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中，不難看出，文革初期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群眾派別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映現出了群眾與非群眾的關係，並且群眾問題自始至終都受制於非群眾因素。廣而言之，清華文革在整個文革中的獨特影響，清華文革初期各種群眾和非群眾的不同關係，使得清華文革乃至整個文革的群眾問題不可能是純粹群眾性的，不可能是完全以群眾的意志、願望和利益為轉移的，當然，也不可能完全是以非群眾的意圖和目的為轉移的。在我看來，正是文革初期群眾與非群眾的互動，文革中的群眾問題才顯得十分複雜，文革中的非群眾問題才看來異常沉重，而群眾與非群眾的關係才跌宕起伏，這些都時時制約著文革的進程、走向、格局和變數。這裏所說的「非群眾」主要指三個方面：一是作為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領袖本人；二是文革中崛起並執掌權力的當權派，這一當權派大體上來說指躋身中央文革小組的新權貴，下指進入各單位（或部門）、各地區文革權力機構（即使是臨時權力機構）的當權者；三是在文革之始一度紛紛失職失權的各單位（或部門）、各地區的原中、基層幹部。在嚴格意義上講，這一層的「非群眾」不包括所謂「走資派」。

根據清華文革初期的歷史來看，第一種「非群眾」是群眾與非群眾之互動以及二者相互關係的一個必要前提，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成為始源性的前提條件；第二種「非群眾」作為文革初

期群眾的頂頭上司，他們構成了群眾與非群眾互動的一個中介或轉化點；第三種「非群眾」在很多情況下，既是群眾與非群眾互動的直接的或現實的基礎之一，也是引發上述互動多種態勢的「酵素」。毫無疑問，文革初期群眾與非群眾的互動，應該成為文革群眾問題研究的一個重點。

一 領袖與群眾的互動

文革是毛澤東晚年自認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也是毛澤東晚年活動及有關錯誤的主要所在。可以肯定，與毛澤東同時期的國家領袖和政黨領袖，沒有任何其他人能夠像毛澤東這樣發動起文革運動，也沒有任何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中國領導人能夠像毛澤東這樣領導文革運動的進行。作為文革唯一可能發動者歷史地位的形成，作為文革唯一現實領導者歷史角色的確立，毛澤東對於文革的作用和他在文革中的力量，簡言之，毛澤東與文革的關係，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毛澤東與中國各階層、各職業的億萬群眾的關係所決定的，從總體上來看則是由毛澤東本人對億萬群眾的影響所充實的。

固然億萬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和熱愛，對毛澤東的信仰和回應，成為毛澤東有可能發動和進行文革的力量源泉，然而，億萬群眾對毛澤東文革事業的能動作用，對毛澤東文革策略的運用和發揮，致使毛澤東領導下的文革具有如此巨大而不可彌補的差異，具有如此偶然而難以預測的「變數」，具有如此眾多而無法化解的矛盾。毋庸置疑，毛澤東與億萬群眾的關係及其演化是導致文革走向其歸宿的一個必然因素。



1967年10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與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等北京紅衛兵代表人物一一握手。

在清華大學，廣大群眾對文革的理解和作用，同他們與文革中的毛澤東的互動是緊密相關的。

文革伊始，毛澤東就直接扭轉了清華文革的方向。當劉少奇在北京派出工作組進駐有關高等院校而造成工作組與部分激進群眾的對立之後，是毛澤東在1966年7月中旬回京後不久即對派工作組的做法大加斥責，並於7月底指示周恩來親自過問並關注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¹明確顯示出毛澤東本人對劉少奇

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頁44。

及王光美在清華文革運動問題上的不滿。毛澤東把自己與劉少奇等人在文革開始之際一些做法上的不同，特別是把在清華等校工作組與激進群眾關係上的分歧，上升到黨內路線鬥爭的高度，上升到文革在全國範圍按照毛澤東的旨意能否進行下去的大問題。毛澤東通過一系列的做法和指示把他與劉少奇等人的分歧明確無疑地昭示給廣大群眾。難怪乎，清華井岡山紅衛兵頭目在1966年9月就表示過，他們從8月就已切身地感覺到了，毛澤東讓「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來）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劉少奇）來過問清華文革那令人尋思的意味和奧秘，因而，他們不難得出結論：劉少奇在文革問題上的做法有悖於毛澤東的主張或打算。這也就不免在清華的基層激進群眾中產生出對劉少奇的不滿。例如，清華校內，8月下旬就有人貼出了批評劉少奇的大字報，而到了10月，更有人借批判「資反路線」而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

毛澤東否定了工作組的所作所為，也就意味著肯定了與工作組對立的激進群眾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曾受到工作組打擊和迫害的激進群眾擁有了從毛澤東那裏直接獲得的「解放感」，使他們煥發出了毛澤東所期望的文革群眾運動的能量。在文革如何對待幹部問題上，毛澤東比工作組走得更遠，他使全國除中央和軍隊以外各個單位的幹部「靠邊站」，讓文革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來進行，取消了過去政治運動一直奉行的黨的領導以及黨的幹部的具體領導，致使黨的機構、組織以及國家行政管理機構，除中央一級和軍隊外，幾乎全部陷於癱瘓。毛澤東以他自己的文革旨意、主張和目的，大大利用了文革前夕所積累的廣大群眾與一些幹部的矛盾，大大引發了億萬群眾在文革開始之際對各自單位（或部門）、地區領導幹部的不滿或批判。一時間，毛澤東本人彷彿逾越了他所領導

的黨和國家的各級權力機構，逾越了他所領導的各級幹部之間所有的中間環節，直接與億萬群眾（尤其是所謂造反派群眾）相溝通了。自然而然，造反派群眾由衷地吟頌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覺主席親。」

毛澤東的這一做法頗類似於17世紀初葉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發起和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文革』是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胡喬木斯言極是。²從文化史現象可以作一點比較。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直接架起了上帝與信徒之間心靈溝通的橋樑，削弱了教會神職勢力的權威，自那時起，「上帝就在我心中」成為所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千古絕唱。不過，在文革之始，毛澤東不同於馬丁·路德的一點在於：毛澤東本人既是文革的「上帝」，又是文革的「改革家」，即毛澤東彷彿既是他所自立和億萬群眾所擁戴的文革「上帝」，又是一位如同馬丁·路德那樣具有傳統的、集種種矛盾於一身的文革活動家兼思想家，這也使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具有了神與世俗領袖、改革家集於一身的耀眼光彩。

無論從哪一方面講，毛澤東都是群眾運動的大師，都是群眾鬥爭藝術的大師。毛澤東充分估計到他所發動的文革會在群眾中得到相應的乃至意料之中的反應或回應，例如，他決定撤出工作組，由群眾或學生自己起來進行文革，就是此例。毛澤東對清華文革初期的形勢和主流幾乎瞭若指掌，他不僅熟悉清華群眾派別的思潮和動向，而且在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領袖時，他還能夠數出鮑長康、劉才堂等團派總部委員的名字來，毛澤東關切地問蒯大富：「你們幾個

² 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5。

人還在一塊戰鬥嗎？」蒯大富答是。毛澤東又問到了團派小報《井岡山》：「你們的小報過去我都要看，現在怎麼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小報還出，份數減少了，印刷不如以前方便了」。

另一方面，億萬群眾對毛澤東的鼓動和號召也不是被動的、消極的。他們會以自己超乎尋常的想像和行動來創造出毛澤東本人未曾預料到的但又完全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文革初衷和其政治鬥爭邏輯的「新生事物」。例如，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產生的紅衛兵就是此例。毛澤東由衷地欣慰這樣一支紅衛兵隊伍是他進行並推動文革的突擊力量，他不但在1966年8月1日親筆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給以支持和鼓勵，此信成為決定正式全面開展文革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文件之一，而且毛澤東還親自臂戴紅衛兵袖章，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1100多萬紅衛兵，把文革的烈火燒向了中國大陸的各個社會角落。總之，在清華附中產生的「紅衛兵」是文革初期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中，來自群眾的一個首創。

然而，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廣大群眾同毛澤東的互動或關係愈益明顯地展現出二者之間的偏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背離。因為，十分明顯，置身於文革洪流之中的廣大群眾來自廣為不同的階層，具有廣為不同的利益，而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和文革實踐根本不可能實現廣大群眾的不同利益，根本不可能滿足廣大群眾的不同願望和不同要求。所以，這就決定了文革中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自始就不可能是完全整合的，不可能是完全有機地融合的。這不用說，一部分群眾在文革前受到毛澤東的某些主張和其所領導的政治鬥爭的衝擊和挫折，他們在文革之中大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是那些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際，所謂既得利益的群眾也會以毛澤東的此種主張來削

弱或抵消毛澤東的彼種主張，這一點在清華兩派的論戰中尤為清楚而又深刻地表現出來。

文革中，廣大群眾心中的毛澤東形象以及對毛澤東一系列指示和策略的理解和運用，廣大群眾對毛澤東權威的認可和遵從，儘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披上了神聖的甚至迷信的色彩，但決不是始終如一的或者沒有差異的。正如經歷了當年風雨的尤西林先生深刻指出的那樣：「仔細反省當時似乎無可懷疑的個人迷信狂熱，其實卻從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為前提基礎，眾口一辭的『毛主席』實質有著不同甚至對立的含義」。「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血統論壓制的『造反派』把毛澤東作為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作為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而「有一種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擁戴崇拜實質也以自身既得利益為立場。……不應高估抽象的個人崇拜，起支配作用的是實際的利益。」「在那個政治化的時代，圍繞個人崇拜所發明創造的諸種表演形式，都是表演者表白炫耀自己，並藉以佔據社會生活重要位置(引人注目)的手段。」³在文革群眾兩派鬥爭的高潮時期，不同群眾以及不同群眾派別都會根據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把毛澤東的文革策略和文革權威，或加以誇大，或加以淡化。

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大會主席台上，謝富治把他在22日見到毛澤東的有關情況繪聲繪色地向蒯大富傳達。謝富治講，他向毛澤東彙報了他12日和21日來清華主持兩派達成四項協定的情況以及清華的形勢，毛澤東表示贊成。謝富治又向毛澤東講了解決清

³ 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斷〉，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頁8-9。

華問題的三條途徑：第一條讓蔣南翔回來，第二條蒯大富和其總部下台，四一四上台。毛澤東說，這兩條都不行。謝富治又說，第三條還是兩派聯合起來。毛澤東笑著說：「你又和稀泥」。蒯大富回校後多次在不同會議上逐字逐句傳達，後經傳播，團派一些群眾把「四一四上台不行」當成「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歡天喜地地四處張貼、宣傳。四派有關代表前去找蒯大富對證，蒯大富答應糾正，但實際上對此聽之任之。團派上下備受鼓舞，開動宣傳機器，發出了儘快建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總動員。⁴團派總部要儘快儘早建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這一清華文革權力機構的迫切心情溢於言表：「動員起來！……克服一切阻力，踢開一切絆腳石，拿出十二分幹勁，下定二十四分決心，運用四大武器，晝夜奮戰，分秒必爭，全力以赴，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以前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⁵

在某種意義上，團派急於在1967年5月30日成立革委會，四派與團派在5月29日決裂，同訛傳的毛澤東這一指示有一定的關係。

文革中，群眾兩派對毛澤東的有關最新指示往往表現出不同的態度。當毛澤東某一指示對一派非常有利而被當成「毛主席的最大支持和最大關懷」時，而另一派則往往低調對待甚至加以「冷」處理。兩派常常指責對方反對或違背毛主席的某一指示背後，恰恰隱藏的是兩派不同的動機和利益。還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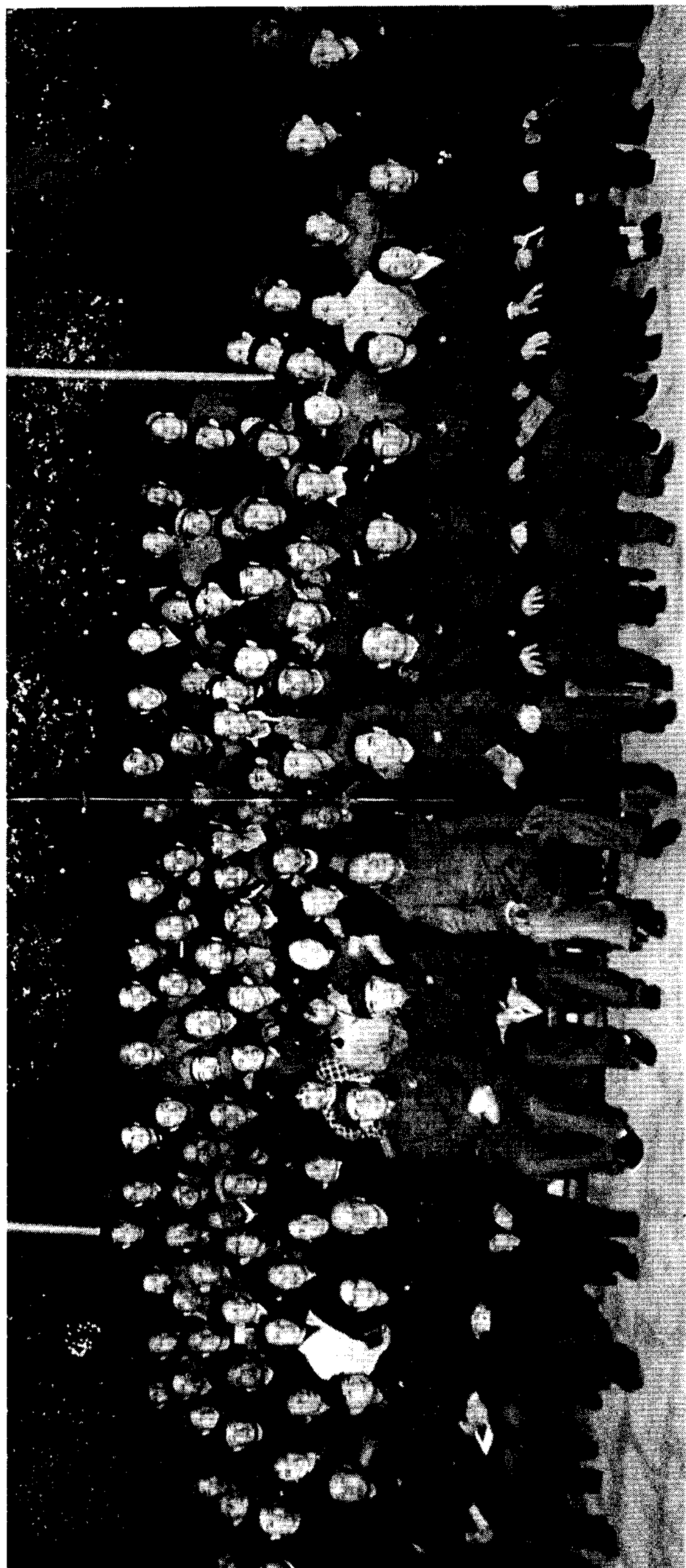
4 《井岡山》，1967年5月25日，第50期。

5 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化大革命簡報》，1967年5月24日，第18期。

是，當毛澤東的某種決策有利於一派群眾打擊或壓制另一派群眾時，後者往往認為毛澤東本人被矇騙或受干擾而拒絕對立派群眾從毛澤東指示中所獲得的權威。當毛澤東1967年春夏之季多次發出群眾派別大聯合的號召時，清華兩派群眾以一系列變本加厲的衝突、糾紛並且最終以1968年的百日大武鬥對此號召做出了歷史性的實際回答，致使毛澤東的文革進程遭到延緩和轉折。

更有甚者，1968年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校內，向團派有關人員宣講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制止武鬥的指示，有關武鬥人員拒絕停止武鬥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說：「我們不知道有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我們只聽蒯司令的！」這些人懷疑毛澤東這一指示的可靠性，在他們內心看來，即使有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他們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這種有悖於毛澤東個人崇高權威的所謂「多中心論」自然要受到否定和批判。《人民日報》在1968年8月5日發表的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兩周年的社論，同樣道出了毛澤東本人的心聲：

以毛主席為首的、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全黨、全軍、全國和廣大革命群眾的唯一領導的核心。……所謂「多中心論」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倘若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要「以我為中心」，全國有許多個「中心」，仍舊是無中心。這種思想如果聽任下去，而不加以糾正，就會走到脫離以至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的道路上去。



1967年5月1日晚，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成員合影。毛澤東正後二排帶帽者為韓愛晶，韓愛晶身後左側帶眼鏡者為蒯大富。

對毛主席的每一個最新指示，都要堅決照辦，徹底執行。理解的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加深理解。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群眾，要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下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

十分清楚，在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看來，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必須始終以毛澤東為中心。8月13日，《人民日報》在轉載《解放日報》〈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社論的編者按中也強調：批判「多中心論」關係到「要不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

《人民日報》的上述社論，不僅是對以團派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激進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的一個總結，還體現了毛澤東本人把這種互動加以轉化，而這種轉化恰恰是來自上述群眾愈發不可收拾而難以駕馭的大武鬥，這種轉化促使上述互動發生了不同於以往的、幾乎是質的改變，即毛澤東本人已不相信他昔日所發動起來並且所依靠的上述群眾，結束了那種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無序的運作模式。毛澤東不但給幾乎所有學校的文革廣大群眾派出了直接領導者，而且至少還把教育界的造反派激進群眾當成了文革對象。這一點最主要地表現在毛澤東派出工宣隊進駐並接管清華大學等學校文革運動領導權的做法上。

初看起來，毛澤東派工宣隊與劉少奇等派工作組有著驚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從上層、從外部來領導某一單位（或部門）的文革，都是力圖對文革的群眾運動加以有序而又有效的管理或制約。但是，二者卻有內容上或本質上的差別。劉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黨的上級垂直領導的傳統，旨在把文革群眾運動納入黨所指定的軌道運行。毛澤東派出工

宣隊，既是他對他難以駕馭並且很有可能勢大失控的群眾運動的無奈，又是他對他曾借此發動、依此成勢的文革群眾運動政策的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隊恰恰是在文革進入了一個危機性的關頭，毛澤東本人所做出的一個轉折性的決策或決策性的轉折，但也表現出毛澤東本人被動地應付群眾運動所造成的群眾武鬥局勢，表現出毛澤東本人在他與群眾的互動中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做法直接動搖以至逐漸消蝕了作為文革初期主力或支柱的群眾運動及造反派的基礎，使得文革的中、後期游離了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主題或主線。相比於工作組在清華等學校只是呆了五十餘天，而工宣隊在大學一呆就是七、八年，工宣隊的問題直至文革結束才告結束，但卻使得清華大學乃至整個教育領域大傷元氣。

百日大武鬥表明，像清華兩派之間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對立和衝突，像清華這樣一所著名大學的文革時局和趨向，在1968年7月底，已到非得由毛澤東本人直接過問和直接干預不可的地步了。在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領袖的談話中，毛澤東多次言不由衷地說道：「十萬工人進清華，四一四高興，井岡山不高興，我也不高興」。他還說：「井岡山小將一個不能抓，一個不能打」。「抓了七個總部委員，一律放掉」。毛澤東關切地問蒯大富：「你們井岡山的人現在怎麼樣？」蒯大富說：「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裏散了」。毛澤東對韓愛晶說：「你們不是親密戰友嗎？要好好招待他們」。儘管毛澤東不願意看到清華文革出現了百日大武鬥這樣的情況，但是他決定派遣數萬名工人組成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時，他是否想到進駐時的結局呢？他是否意料到清華團派會以武力對抗工宣隊而造成如此之大的犧牲和損失呢？或者，他是否已充分預想和充分估計到了以扭轉清華文革形勢為契機而要使他領導的文革所發生的轉折呢？

當毛澤東聽到清華「七·二七事件」後，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脫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⁶換言之，暫且撇開歷史已發生的不可逆轉或者不可更改的事實，我個人試圖做出猜測：如果清華團派不是以武力對抗工宣隊進駐而是和平地順從工宣隊的進駐乃至領導，那麼不僅僅是清華的文革，而且整個文革又會出現甚麼情景呢？是否會使文革發生較大的轉折呢？毛澤東本人在派出工宣隊時，他所期待的又是一種甚麼樣的情況呢？儘管人們永遠不會給出確定無疑的答案，儘管人們可能會說歷史本身不是假設，但是，這種猜測和由此而來的諸多推斷會有助於開闊我們對文革的歷史種種可能性和或然性的視野。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這次召見可以說是他對他與大學裏的文革造反派群眾之關係的一次重整。儘管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此次談話的全部內容，但根據正式公佈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⁷可以看出：

一、以清華百日大武鬥特別是「七·二七」大武鬥為契機，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的嚴厲批評表明：毛澤東對群眾運動及造反派失去信心，對造反派領袖及紅衛兵領袖已不抱多大希望。

6 轉引自《共和國歷程》編輯委員會編：《共和國歷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年），中卷，頁1133。

7 此材料是由謝富治在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之後，留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整理出來的。可能還有另一份關於此次召見談話的書面整理稿。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頁249。若是有的話，這份整理稿至今沒有公佈。另：參見趙聰著：《文革運動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9年），第四卷，頁681-707。

他似乎開始告別他過去屢試屢爽、屢用屢勝的群眾運動模式。毛澤東在1968年之後實際上已不再「啟用」群眾運動了，他再也不想使群眾運動從自己手中「失控」，例如，他在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批鄧中，多次強調不搞群眾運動。1968年之後出現的一些文革群眾運動的東西，不過是文革頭兩、三年群眾運動的回聲或遺跡。

二、毛澤東決心在北京地區和全國結束群眾武鬥，為達到此目的，他必然醞釀淘汰文革初期曾為文革效過犬馬之勞的紅衛兵領袖，甚至威脅說，不惜動用正規軍武力來結束群眾武鬥。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可以看作是對文革群眾武鬥的最後通牒。毛澤東不但被全國性的群眾武鬥所困擾、煩惱，而且還被這種武鬥弄得窮於應付。

三、毛澤東似乎對北京高等院校的群眾派別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希望兩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眾之所以分成兩派恰恰是沿著毛澤東的文革策略演化而來的。毛澤東在這裏已「超脫」了兩派對立的實際問題，他已逐步開始把群眾問題從他的文革全局戰略加以淡出。

四、毛澤東對群眾武鬥所帶來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問題也是力不從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個辦法，表明他開始置換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已開始考慮把學校現有的青年學生從整體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對象。這一點在他8月後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了體現。

五、毛澤東明確告知紅衛兵領袖們，派遣工宣隊是他的決定，不容懷疑、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見之後，蒯大富在很小的範圍內傳達，毛澤東講：「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他也不來抓。」這對團派以武力對抗工宣隊進駐清華來說不啻是致命的評判。毛澤東決定派遣工宣隊進

駐高等院校，在他看來，根本沒有事先「通知」造反派的必要，也根本沒有對此加以「討論」的餘地。正是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下令，為了防止紅衛兵領袖及其相關的群眾像以前那樣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而特地把這次召見的談話進行錄音備案。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及其麾下的群眾不信任感，由此可見一斑。

六、一貫最善於揣摩毛澤東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做出了一針見血地斷定：「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⁸紅衛兵領袖們的「落伍」意味著造反派群眾的「落伍」，意味著紅衛兵運動的衰落。文革即將轉入一個新的階段已不可避免。

關於文革中群眾與領袖的互動問題，這裏還應該談談文革初期清華群眾與周恩來的關係，這不僅是因為周恩來在文革初期「無產階級司令部」中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也不僅是由於自1966年7月底8月初起他所過問、關心的清華文革在某些方面注入了他的干預或影響，而且主要是就文革領導人與群眾的關係而言，周恩來與毛澤東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1966年8月22日，周恩來冒雨參加清華大學群眾大會再次申明，派工作組的責任在北京市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責任推到工作組。⁹10月中旬，周恩來兩次約見清華大學幾個紅衛兵組織代表，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拒絕清華紅

⁸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54。

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頁51。



1966年8月22日晚，周恩來冒雨參加清華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號召大家學習、掌握、運用「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衛兵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大學進行「檢查」、批鬥，他對清華八個組織代表說：「『黑五類子弟』，我們不同意這個名稱，他們不能成一個階級，不要造成人為的階級對立。」¹⁰

到了同年12月，周恩來數次表示過不同意把王光美問題與劉少奇聯繫起來，不同意揪鬥劉少奇、鄧小平，不同意說劉少奇問題是屬於敵我矛盾。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再次拒絕了清華井岡山紅衛兵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批鬥，並且不同意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頁76-77。

清華井岡山兵團12月25日舉行的反劉少奇、鄧小平大遊行，批評把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標語公佈於眾以及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上，¹¹認為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¹²

1967年1月6日下午，清華井岡山兵團下面的「捉鬼隊」把王光美騙出，並押回清華，連夜批鬥。周恩來聞訊後派人去攔，未有趕上，後又連夜派出秘書前往清華，傳達他對王光美的保護性指示。1月7日晚，周恩來接見第七機械工業部「九一五」、「九一六」兩派群眾代表時又提及此事，對清華紅衛兵的這一行動進行了指責，周恩來的這一講話當時很快在一些紅衛兵小報及有關群眾組織的宣傳材料中登載出來。周恩來說：「如果真有這個事情，根據毛澤東思想，最好反對這個動作。這個動作確實不光明磊落。……因為鬥王光美不僅是她一個問題。十一中全會以後，要看一段時間，不要擴大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跟清華左派同志談了，他們贊成。政治局都支持毛主席的意見，但清華八個同學說不過癮。……這是一場甚麼戲呀，惡作劇呵，不正常。騙去鬥還是鬥了，現在鬥不是揪鬥，而騙鬥了。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以後聽說是清華左派搶的，因為清華左派我熟悉，我放心了。……我是不贊成這種作風的，這種作風不能提倡。這種作風……就是指背後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現在要肅清這個壞作風」。¹³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頁103-105。

12 黃崢：《劉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450。

13 可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下卷，頁947。

1967年1月6日，周恩來得知清華等院校紅衛兵與在京軍隊院校造反派準備聯合揪鬥賀龍並召開批判賀龍大會時，加以制止。7月29日，得知團派一夥人抄了徐向前的家並搶走有關資料後，周恩來又派人來清華追回這些資料。

1967年五一節的一次活動中，周恩來答應過蒯大富的邀請，同意參加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5月29日深夜，蒯大富前去人民大會堂邀請周恩來出席次日舉行的清華革委會成立大會，蒯大富未見到周恩來，但轉交了邀請信。周恩來以清華群眾兩派沒有實現大聯合為由，托人轉告，婉辭了蒯大富的要求。這時正值「四一四串聯會」從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一個半月，並恰恰當日凌晨該串聯會宣佈正式成立四一四總部。周恩來的拒絕是給團派的革委會成立準備活動的一個致命的打擊。蒯大富對此不滿地說，「總理給我們當頭一棒，又澆了一盆冷水。」團派一些人也對此頗有微詞。團派沒有達到讓周恩來給其革委會成立大會壯聲色從而壓倒四派的目的，於5月30日凌晨3時廣播了周恩來不能來清華的消息，並決定「延期」革委會的成立活動。次年同月同日，團派把向四派進行大武鬥而圍攻東區浴室的時間同樣定在凌晨3時，有一種說法說這是團派把不滿的矛頭再次指向周恩來。

1967年1月至2月，清華校內出現了個別造反學生寫的含蓄地批評周恩來所謂折衷主義、調和主義等等的大字報。但是，在經歷了同年夏天的文革狂潮之後，幾個團派頭目私下議論時曾深刻地指出：周總理所要保護的幹部都是代表毛主席要保的，是一定能保住的；如果哪一個幹部是周總理所不保的，那麼這位幹部是一定保不住了。

1967年8月23日凌晨，在得知22日晚北京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活動中，有清華大學四派數百人參

加，周恩來感到有些意外。周恩來在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時，對火燒英國代辦處及奪外交部大權提出嚴厲批評。周恩來對造反派們說，你們沒有權力直接行使國家「外交大權」。對紅衛兵代表和造反派頭頭一再不聽勸告，周恩來悲憤地說：「我在你們心裏沒有威信」。¹⁴儘管如此，周恩來以他自己的力所能及大大緩解了文革的惡劣形勢。儘管造反派對周恩來有著這樣那樣的不滿，但是周恩來的存在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勢力難以逾越的長城。

1968年7月30日，周恩來和陳伯達、康生、江青聯名致信毛澤東、林彪，認為毛澤東7月28日凌晨接見北京紅衛兵代表五人的談話「極為重要，提議將這次談話的書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傳達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發到全國」。¹⁵周恩來適時地促使包括清華在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發展完成了又一次重大的轉折。

當然，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與文革群眾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毛澤東及其主導下的文革。著名作家邵燕祥先生對此作了引人深思的概述：「原先在人民中享有比林彪大得多的威望，影響直追毛澤東的周恩來，已經被放在陪襯以至靠邊的位置上。在所謂兩派群眾組織之間，周恩來以他國際知名的外交手腕和辯才折衝樽俎。失利的一方竟在會外口頭上甚至非正式的書面上呼為『周老三』。毛澤東就這樣以第一和唯一的權威的姿態君臨中國，掌握著昔日的戰友、部下的命運，遑論千百萬芸芸眾生哉！」¹⁶

¹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頁181。

¹⁵ 同上，頁181。

¹⁶ 邵燕祥：〈評「紅」長簡〉，載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頁72。

如前所述，文革是毛澤東的「宗教」。毛澤東不斷向文革「彌撒」並幻想的同時，他也不斷地變革著文革，即他既導演著文革，又修改著文革。對於毛澤東與文革廣大群眾的互動的探討，不能只是從毛澤東自身的性格（如他在文革開始時所說的他身上的「虎氣」和「猴氣」）、心理、素質等方面去尋找答案，更多地是應看到億萬群眾的生活土壤以及文化傳統「賦予」了毛澤東的文革「上帝」兼「改革家」的身份，「賦予」了毛澤東在文革這一他的「宗教」實踐化過程中不斷二重化，即不斷打碎他自己的文革「神話」和他關於文革彼岸的空想，一次次使他從文革意識形態的「天國」中迫不得已地回到群眾世俗的此岸生活，最終使得他的文革支離破碎，殘缺不堪。

關於文革的群眾問題，在國外研究文革的學者中流行「兩個文革說」。僅從學理上講，這種把文革劃分成「領袖文革」與「群眾文革」的說法有可能大大啟動對文革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可能把關注文革的視角更多地投向人民群眾之中，因而「兩個文革說」彷彿成了1996年文革爆發30周年、結束20周年之際國際上文革研究的「顯學」。然而，我個人同意徐友漁先生和金春明先生對「兩個文革說」所作的具體分析和深刻闡述。¹⁷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邏輯上都不存在一個脫離毛澤東、形成全國規模的和群眾獨立自主、自覺、自為的所謂群眾文革。在文革這場歷史之劇中，作為發動者和領導者的「導演」與作為人民群眾的「演員」或「觀眾」之間不可能是彼此平等或者一同並列的關係，不

17 徐友漁：〈關於「兩個文革」說〉，載《中國研究》，日本，1996年8月，第17期。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載《中共黨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2期。

可能是彼此獨立或者相互反對的關係，更不可能是捨棄了該劇的時、空條件而由後來的評論家們所界定的關係。

在清華文革中，所謂群眾文革從來就不是統一的，從來就沒有甚麼確定範式，從來就不是群眾自主或自為的，而是矛盾多樣並帶有濃厚的宿命色彩的。如前所述，清華文革的一個群眾組織就是由幹部影響的特殊組織。的確，包括清華在內的群眾鬥爭使文革伊始相對短暫的鬥黑幫、揪走資派很快被毛澤東等從未曾預料到的持久的群眾對立和衝突所超越，對此，能說存在著一個所謂領袖文革面對著無數個相互矛盾甚至敵對的所謂群眾文革嗎？也正是由於毛澤東一聲令下，在不到20個小時裏，三萬名工宣隊進駐清華園，一下子扭轉了清華文革的進程，而那些所謂群眾文革對此又當何論？可以說，所謂群眾文革內部的張力、反差、混亂甚至「個性」遠遠大於或高於所謂領袖文革。「兩個文革說」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在於我們應該不斷去解答：為甚麼在文革的全部問題中，群眾問題是最深刻、最具有持久影響或生命力的問題？

二 「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互動

考察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互動問題是研究文革群眾問題的重要內容之一，因為從這個問題上，既可探尋出文革初期不同於以往黨的領導的文革當權派的某些特性，也可折射出文革初期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某些特色。文革當權派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主要是指文革初期具有一定的政治權力並具有一定的政治權威的機構領導人或負責人，相應地，文革當權派主要涉及：1、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下的一些重要的黨政軍領

導人，如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2、某一地區、單位（或部門）的權力機構領導人；3、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迅速崛起和分化的群眾組織對自己的勢力總感到底氣不足，對自己的未來命運總感到不安，這主要表現在它們對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和權威的正統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或維護；表現在它們各自與其對立的群眾組織所進行的生死鬥爭，都毫無例外地力圖把自己凌駕於對立的派別之上，而把對立的派別置於死地。這一點，決定並促使它們從自身之外去尋求、去獲得更強有力的支持或庇護。這也使文革群眾組織的政治權威性和社會合法性如同「海市蜃樓」，是隨時可以消失或化解的。

群眾組織的這種脆弱使它們除了仰賴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之外，更多的、更直接的是借助於文革當權派的青睞和提攜。在文革初期，絕大多數的群眾組織高度重視、大量翻印自己所喜好的所謂中央首長講話資料，就是例證之一。它們常常是唯我所需地、唯我所用地對待文革當權派的指示和部署，常常是根據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目的來確定與文革當權派這些人或者那些人的親疏關係或遠近程度。事實上，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關係從上到下或從下到上都是由各自的文革利益和文革動因所確定的，但還是有大多數群眾組織不斷地攀附、應和和順從於它們所信賴甚至寄於幻想的文革當權派。例如，在清華四派某些領導人中形成再進而流傳到團派領導人那裏的一種說法，即中央一、三、五號領導人（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支持四派，二、四、六號領導人（即林彪、陳伯達、江青）支持團派，這實際上是一種宗教心理的依賴情結，也是一廂情願的猜測。

毋庸置疑，「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和後來的井岡山兵團，決不是深深植根於清華廣大群眾之中的群眾組織，而是從

一開始就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扶持、利用，雙方的互動進一步表明文革是一場所謂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革命」，是何等的虛假。相反，這種互動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文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大動亂，也恰如有關學者所言，對廣大群眾來說，文革是一場「奉命造反」乃至「奉旨造反」的群眾運動。文革中，許多的群眾激進行為以及極端事件，很容易使人去思索、去反問：誰在指使？誰是後台？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文革群眾中的極端活動及狂熱心理，大都帶有輕信、盲從甚至愚昧的歷史局限性。

清華大學既然在文革之始成為所謂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交鋒的前沿，中央文革小組則必定會高度關注清華文革的進展。1966年7月底至8月初，該小組有關人員數次來清華找人談話，收集情況及反映。9月，該小組支持蒯大富在清華拉起「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隊伍，而在此之前，蒯大富已上任「首都大專院校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首都紅衛兵三司」）召集人。「三司」在一些中共中央領導人及中央文革小組看來是真正的造反派組織。「三司」及「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羽翼下的「鐵拳頭」隊伍。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在京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工作會議，隨後，在全國掀起批判「資反路線」的浪潮。為了把文革繼續推進，為了把全國興起的掀鬥「資反路線」的代表人物與其所謂在中央上層的總代表聯繫起來，進而言之，為了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從政治上打倒，中央文革小組預謀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為主導的群眾大遊行，來把鬥爭劉少奇、鄧小平的活動從黨內推向黨外，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把這一鬥爭社會化。

1966年12月18日下午約14時，在中南海西門接待室，張春橋約見蒯大富，對如何以群眾運動的形式鬥爭劉少奇、鄧小平，向蒯大富作了交待。名列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位副組長的張春橋決不會以個人身份來交待此事，他身後肯定有更大的指使者。例如，正是在同一天，王光美專案組成立。張春橋對蒯大富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揮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當晚，蒯大富回到清華召開傳達會議，並作了具體部署。

12月1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紅衛兵」等聯合，成立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這一兵團的成立完全是奉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精神而對劉少奇、鄧小平鬥爭的一個具體步驟。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井岡山兵團或團派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產物，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政治襁褓」中出生的。當日晚，井岡山兵團召開「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誓師大會」，提出「徹底砸爛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20日，兵團總部開會，蒯大富提出23日進城進行「打倒劉鄧」的示威活動計劃。原「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一些人提出了異議，認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反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實在不妥。蒯大富等原「井岡山紅衛兵」則力爭，認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首長把如此重大的任務交給我們，不應辜負此信任，應該勇往直前。兵團總部會議經過爭論，通過決議，把行動日期改為12月25日。在鬥爭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上，井岡山兵團心領神會地充分發揮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圖，以自己的群眾形式的

「戰役」完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戰勝「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一個回合，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反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資反路線」的群眾突擊隊。兵團一時身價倍增，在後來的日子裏，團派都念念不忘：「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清華井岡山要做中央文革的鐵拳頭，我們的命運和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緊緊地聯在一起，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聯在一起。」¹⁸

然而，井岡山兵團以及後來的團派和四派並不是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一視同仁」的。他們與該小組成員的不同關係或特殊「情感」，恰恰說明了文革群眾組織自身兼有的依附性和反權威性。這裏僅舉幾例。

早在1967年1月初，兵團一些人參加了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內的一些幹部和群眾組成的「紅戰團」反康生的有關活動，並在清華校內張貼批判康生的大字報。對於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的這種「非禮」，惹得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於1967年1月22日親自打電話給蒯大富，指示其手下的人不許從事炮打康生的活動，否則就等於和中央文革小組決裂。關鋒既打又拉地在電話中指示蒯大富，不許清華人參與中央黨校的奪權活動。一時間，從井岡山兵團內部刊物到全國其他一些高校的紅衛兵小報和油印刊物，紛紛刊登出陳伯達、關鋒的這一電話指示紀錄。中央文革小組暫時壓住了這股反康生的「逆流」。實際上，對於清華井岡山兵團來說，一些人是帶著政治投機心理去從事反康生活動的。從他們事後的回憶中可知，他們反康生主要是由於1967年1月中央上層倒陶鑄的活動，「風光」幾乎由外地外校的造反派搶去了，對剛剛獲得了1966年12月25日反劉少奇、鄧

18 《井岡山》，1968年6月28日，第149期。

小平大遊行「殊榮」的清華井岡山兵團不啻是一種失落，他們不想再讓反康生的「頭功」肥水流入別人之田了。對於兵團總部一些人來說，當時如果反康生成功了，「功」在兵團總部；如果反砸了，「咎」歸兵團麾下的個別戰鬥組或個別人。兵團一些人的這種政治賭棍心態已表明，文革初期造反派群眾即使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抱有兩面派的作風。

即使對於江青這位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在清華，文革初期就有一些幹部敏銳地看出毛澤東啟用江青來搞文革的特殊做法，議論毛澤東重用其夫人打文革頭陣，這是毛澤東對其身邊的戰友、同事的不信任。這種看法後來延續到四派一些人那裏，他們深刻地認識到，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是文革極「左」路線的總根子。他們也在私下紛紛批評江青的一些做法，認為正是由於江青等人，文革才「搞糟了」，「搞壞了」。

至於陳伯達這位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1967年夏季全國性的激進的、極端的群眾運動狂潮之後，尤其是在王力、關鋒等人垮台不久，就成為四派某些人懷疑、批判的對象。顯而易見，從1967年7月初的中南海西門「揪劉火線」事件到7月下旬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文革極「左」狂潮彷彿達到了頂點。四派的所謂理論家周泉纓（動力與農業機械學系605班）及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把陳伯達作為極「左」狂潮的總後台，當作極「左」思想的總代表。這位理論家兩次貼出了炮打陳伯達的大字報，把陳伯達比作「竊國大盜袁世凱式的人物」，進一步闡發了日前提出的「四一四思潮」，並且借助炮打陳伯達來打擊團派勢力。1967年9月四派理論家的這次反陳伯達活動至少表明，在四派一些群眾眼裏已不把陳伯達在「無產階級司令部」擁有的權力和權威放在眼裏，要對陳伯達算歷史的「總賬」了。在這種背景下，「四一四思潮」也可以說是炮打陳伯達的先聲或序曲，而炮打陳伯達

則是宣揚和傳播「四一四思潮」的必然結果之一。在對陳伯達的態度上，團派和四派的區別昭然若揭。這次炮打陳伯達不僅遭到團派借題大力發揮的反擊，而且受到當時北京市有關部門的壓制。

清華兩派所具有的反權威性不僅僅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且在外地也波及到剛剛確立領導地位不久的文革當權派。這種反權威性是文革群眾組織之所以立足或顯現的重要標誌，它不僅與群眾組織的依附性和脆弱性密切相聯，更主要的是基於：為了獲得或實現自己的利益，群眾組織只有不斷地反當權派的權威才會取得自己的某種權力。造反派與保守派、激進造反派與溫和造反派在這一點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如果說區別的話，只是在更多的情況下，前者表現出比後者進行更加重大和極端的反權威活動。1967年春夏，團派派出許多聯絡站、記者站，在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干預當地文革，衝擊軍隊，反對當地的文革權力機構領導人和軍隊高級幹部，正如四派在1968年4月責問團派的：「為甚麼清華團總部在全國各地無一例外地到處反軍區、反革委會，而且是在各地揪軍內一小撮的急先鋒？打倒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李再含、劉格平等第一炮幾乎都是清華團派打響的，¹⁹這是為甚麼？」²⁰原因之一：一旦文革

19 在此文「編者按」中，四派還指出團派「在廣東要打倒黃永勝，在山東要打倒楊得志」。1967年，許世友任南京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任福州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再含任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黃永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任濟南軍區司令員。

20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井岡山報》編輯部（主辦單位名稱下略）：《井岡山報》，1968年4月5日，新25號。

初期中央和地方的以及軍隊的當權派權威有礙於以團派為代表的造反派，並且造反派不滿足所得權力而要進行爭權、搶權、奪權時，以及當這種權威有礙於群眾組織之間重新瓜分權力時，這種權威就在於打倒或衝擊之列，即使這種權威曾是造反派打倒走資派而使自己崛起所借用的力量也在所不惜。在井岡山兵團興盛之際，其成員就有 20 多人因嚴重觸犯了這種權威先後被捕入獄。這種得到群眾組織（至少是造反派）的領導和群眾默認甚至慫恿的觸犯現有權威，可以說是文革群眾組織的「天性」。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互動由於群眾組織的這種程度不同、範圍不一的反權威性，致使群眾問題格外複雜，也非常沉重，致使群眾組織比起許多文革當權派來成為文革中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過客」。

又如，進入 1967 年春季，北京一些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圍繞著下一步如何進行文革，最直接的是在初步完成奪權後如何在文革大局中佔有更大的地位，擁有更大的權力，發生了爭執和分化，形成了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為主的、聯合其他一些高等院校造反派群眾組織形成的「地派」與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為主的、聯合其他高等院校另一些造反派群眾組織形成的「天派」。「天派」、「地派」對北京各院校的群眾組織來說並不是甚麼正式的、上級領導的權力機構，甚至也不是甚麼協調性的機構（如此時北京各院校各群眾組織參加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只是由於觀點分歧和利益之爭而來的某種鬆散的「聯盟」。「天派」、「地派」主要是當時北京紅衛兵五大派別（即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清華「井岡山兵團」、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和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在文革新形勢下所形成的新一輪利益格局的體現。「天派」、「地派」無論是對清華團派還

是對四派來說，都遠不如像對「新北大公社」和「東方紅公社」那樣至關重要。由於團派傾向和贊成「新北大公社」，它自然就站到了「天派」一邊，而且為了「天派」的利益，還曾與北航「紅旗戰鬥隊」一起，衝散了作為「地派」的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一派所主辦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受到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陳伯達、江青等人的斥責。然而，團派與「地派」的分歧並不影響團派領導人與「地派」某些領導人之間良好的私人關係。正是由於面對團派的立場，四派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地派」一邊。總之，團派、四派都把「天派」與「地派」的鬥爭完全用來服務於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並力圖借助「天派」或者「地派」來打擊、壓制對方。

1967 年 4 月至百日大武鬥，清華兩派在形式上的直接領導機構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兩派群眾圍繞著各自的利益而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態度和立場是大不相同的，這一點最集中地體現在對謝富治的態度上。

作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偏袒團派，就他本人來講，他希望清華問題早日解決，這樣有利於他所管轄的北京地區文革的發展或相對穩定。他曾採用多種方式來促使以團派為主導的清華文革格局的形成和鞏固，所有這一切當然引起了四派的不滿和抵觸。謝富治兩次親臨清華，主持兩派的調解，並達成了兩派聯合的協定。但是，四派群眾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推翻了該協議，置謝富治對清華問題的多次指示於不顧，變本加厲地與團派進行鬥爭。後來，針對團派大加利用謝富治的指示，四派不遺餘力地把抨擊謝富治的大字報、大標語貼在北京市許多公共場所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

1968 年 3 月，四派總部還致信謝富治，責問他與戚本禹的關係，斥責謝富治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過」。四派把它同謝富

治的鬥爭當成同團派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使謝富治以及北京市革委會對於解決清華問題處在無能為力的境地。

難怪乎百日大武鬥進入白熱化階段時，團派曾著文強調：「清華問題是北京高校中一個老大難問題。清華大學是北京主要高校中唯一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大學，而目前仍在武鬥。『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皆治蜀未治』。北京未亂，清華先亂，北京已治，清華未治。」²¹清華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都已充分認識到，清華問題不可能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及其領導人所能解決的，尤其是團派多次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北京衛戍區關於制止清華武鬥的指示置若罔聞，把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人關於將派宣傳隊進校宣傳停止武鬥的招呼當成耳旁風。清華兩派都把更多更大的求助目光投向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之上的中共中央領導層。

上述情況表明，文革初期，許多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群眾兩派糾紛和鬥爭往往越過所在的單位（或部門）和地區而直達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直接處理或「裁決」。群眾組織與文革當權派在文革初期的滋生共長，使後者難於駕馭前者，而前者常常左右著後者。面對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自中央以下的文革當權派的權力是十分有限的，而其權威又是相對低弱的。文革群眾與文革當權派的互動在很多情況下是以群眾一方為主動的，至少是表面上顯現的主動，而文革當權派的主動過多地是潛行的。這種互動大都是由群眾組織的利益和要求來調節的。即使是昔日正面的、肯定的某一群眾組織與文革當權派的互動，

21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1968年6月18日，第149期。

也會由於前者利益受損、要求未果，在與當權派反目為仇後，而成為負面的、否定的互動。例如，在百日大武鬥的最後時刻，數萬名工人組成的工宣隊正是打著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旗號，部分地借著該革命委員會的權威進入清華，卻遭到團派的武力抵制，其頭頭還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機關裏與有關負責人「惡語相交」。

在百日大武鬥結束後，團派自上至下都說，他們事先根本不知道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若是知道毛主席派來的，他們根本不會抵抗工宣隊。在他們看來，毛澤東的權威是無法抗拒的，而對於除了毛澤東之外的任何其他人以及文革當權派，則另當別論。實際上，文革群眾組織先於文革當權派而退出歷史舞台，甚至到了1968年年底之前，曾經憑藉眾多群眾組織造反之勢而誕生的文革地方權力機構及當權派，已不可能同群眾組織共存或相容了，群眾組織對文革當權派來說也已變得「多餘」和過時了。

在研究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互動問題時，還應注意到群眾組織領導人，尤其是那些名噪一時、權傾一方的造反派領導人，與廣大群眾的關係。這種領導人，儘管在權力、權威等方面遠趕不上在群眾組織之上的文革當權派，或者他本人暫時地進入文革臨時權力機構而佔居一席職位而成為當權派，但是，在他身上，更加集中和直接地體現出了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關係。長期以來，對於這種領導人的文革作用或文革角色的研究，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作為文革某一群眾組織的領導人，特別是造反派領導人的歷史性定位，應注意以下幾點：1、該領導人與文革初始的運動之關係，以及他對文革初始的反應、理解和作用程度；2、該領導人與文革前和文革初本單位和本地區的幹部隊伍的關係；3、該領導人與文革初期的權力當局的關係；4、該領導人與其所影

響的群眾之關係，以及他與反對他的群眾組織之關係；5、該領導人在文革前的經歷和所處的地位；6、該領導人在文革之際所取得暫時的權力或權威。比較一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二人都是文革初期全國聞名的風雲人物，也都進入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班子。然而，二人對於整個文革來說，對於文革領導人和領導機構來說，對於文革群眾來說，又有很多方面的差異。如果說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燃了文革烈火，那麼，聶元梓的典型意義在於給文革的發動和進行提供了一個在單位（或部門）和地區「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樣板，因而從某種角度來講，聶元梓或聶元梓們對於文革初期具有原創性的影響。我在這裏以蒯大富為例，簡要談談文革初期的群眾組織及造反派領導人的有關問題。

蒯大富，江蘇省濱海縣人，1945年9月13日生，1963年夏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902班，其父母務農，皆為共產黨員。蒯大富作為「貧下中農子弟」考上大學，成為大學生的階級成分有所改變的一個事例，他的照片刊登在廣泛發行的《人民畫報》1963年第11期上。入學不久，蒯大富寫信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關部門，反映家鄉一些幹部多吃、多喝、多佔的作風問題。文革前，蒯大富被視為共青團積極活動分子。1966年6月3日文革開始後，蒯大富寫過一篇批評清華校黨委的大字報，7日，他開始認為校領導人是「黑幫」，並與本班13位同學組成了一個「戰鬥小組」。自工作組進入清華接管清華的全部領導權力後，從6月14日起，就有力學系的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指責「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隨後，有不少大字報貼出來批評工作組。同日下午，一個自發的「轟走工作組大會」因出席人數不夠，沒有開成。當時，對工作組權威的最大挑戰不可能是來自已經「靠邊站」的原清華幹部，而是比工作組更

為激進的眾多學生。這些學生與工作組的分歧主要在於：如何進行文革？是放任群眾自己去進行，還是由工作組來領導？說到底，在文革這場運動中，是群眾自己說了算，還是由工作組指手畫腳，說一不二？對於年輕的、激進的大學生們來說，有一種不言自明的心態：過去校黨委的權威都會在一夜之間被打倒，那麼為甚麼工作組的權威就不能被懷疑？他們貼出大字報，指責工作組不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脫離群眾，站在群眾頭



1966年4月10日，蒯大富在一次群眾批鬥大會上。

上瞎指揮，束縛了群眾的手腳。很快，在清華校內，形成了一股很大的不滿甚至反對工作組的勢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蒯大富。

6月14日，蒯大富明確地指責工作組「不像毛主席派來的」，「工作組是保皇派，還是革命派，我們有懷疑」，「我們有事實像懷疑校黨委那樣懷疑工作組。工作組的大方向錯了。這不是一個認識問題」。15日，蒯大富等12名學生開會決定與工作組抗衡，給工作組提了35條「意見」。蒯大富說：「你懷疑不懷疑工作組，就能判斷你是革命派還是保皇派。」會議決定上訪中共中央或國務院，告工作組的「狀」。蒯大富等人與工作組的對立很快上升為清華文革運動伊始的主要矛盾。蒯大富在本系同學劉才堂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上加了一段話：「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問題。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權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

從6月16日至25日，工作組不斷加大打擊反工作組的「蒯氏人物」及其勢力的力度。如前所述，工作組的這些作法造成了全校5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別名「蒯氏人物」），700餘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鬥爭，還發生了兩起自殺事件（其中一起未遂）。蒯大富本人在被開除共青團團籍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後，又於7月初開始被「隔離」了18天。實際上，蒯大富的上述經歷體現出了文革運動初期的某種「悖論」，即一方面他確實代表了受到工作組打擊的那些群眾反「迫害」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依然是用文革之「道」還治工作組其「身」。然而，正是因為前一方面原因，蒯大富終於為在清華之上的中央上層某些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所關注直至所倚重。

顯然，文革開始之一、兩個月之後，對於「無產階級司令部」來說，如何把文革廣泛而又深入地進行下去，即把文革不僅限

於單位（或部門）和地區，而是從中央開刀即找出文革的最大對象，從而把文革推向全國，蒯大富問題，具體說來是蒯大富與工作組的對立和鬥爭，提供了一個突破口。「成名」晚於聶元梓的蒯大富，其典型意義已遠遠不限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文革以及黨組織的具體領導，而是直接指向中央和全國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蒯大富或蒯大富們對於文革初期來說具有總體性的影響。

當蒯大富被「解放」後，他自然就被視為反對「資反路線」的群眾造反運動的頭號人物，他所代表的那部分激進群眾同樣獲得了直接來自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解放感」和「優越感」。因而蒯大富與中央最高層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緊密關係是文革群眾運動其他代表人物（尤其是造反派學生代表人物）望塵莫及的。一時間，蒯大富與中央上層的互動關係，蒯大富與基層群眾運動的互動關係，彷彿成為文革初期群眾運動的一個「寒暑表」。蒯大富不僅先後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非常信任的北京紅衛兵「三司」的召集人、多次在十多萬人參加的種種文革群眾大會的主要發言人或領頭宣誓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等，而且頻頻出席當時許多重大的社交活動或者參與一些著名的社會事務等，充分顯露出了群眾造反派代表的「風光」；同時，最為重要的是，蒯大富及其手下的群眾完成了由「無產階級司令部」所預想的有關任務。

在我看來，像蒯大富這樣的文革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以及文革群眾組織的領導人物歸根到底還是屬於群眾的，是群眾中的「特殊分子」。這種人物之所以得勢，不僅僅在於其得益於文革的進行和發展，也不僅僅得益於受到某一文革權力機構的青睞和恩寵，最主要的一點，是他代表了若干群眾與文革的特定關係，代表了某些群眾在文革中所處的地位，體現了特定群眾

所得的利益，反映了特定群眾具有的諸多要求。例如，蒯大富在文革一舉成名後，全國有難以計數的人們來清華找他，要蒯大富幫助反映意見，彙報情況，上訴要求，解答問題，甚至逼蒯大富對一些問題表態，把蒯大富的一些話當成「令箭」。儘管蒯大富力圖回避，但在清華內外，有不少群眾把他儼然當成「上達天庭」的群眾代言人。因而，這種領導人確實是由群眾所認可並在群眾運動中所「產生」、「塑造」出來的。不同群眾組織的領導人對於各自群眾來說，已具有政治文化的符號功能，甚至成為群眾心理體現在政治鬥爭中的象徵，形成某種凝聚的作用。例如，在清華兩派出現嚴重對峙時，兩派群眾難於同寢一室，同餐一廳，更不能當著對方群眾的面指責和抨擊對方組織的領導人，否則衝突和武鬥在所難免，彷彿攻擊了人家組織的領導人就是攻擊了群眾本身。就像當年復旦大學紅衛兵領袖、現今成為作家的安文江先生所說的：「那時候，當頭頭也簡單，關鍵在於你本身的感召力、凝聚力。這一點也不難。封建宗法觀念體現在紅衛兵組織裏是對頭頭的絕對服從，這是愚盲、迷信的擴展、下移，是喪失獨立人格的紅衛兵對強權的不自覺依附。」²²

當然，文革之際，由於諸多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不同，不同群眾組織的領導人身上的群眾性因素（主要來自群眾自發產生或自願擁戴的因素）與非群眾性因素（主要來自於上級權力機構的承認和支持）也有所區別，特別是在文革的形勢、環境等有所不同時，這種區別更加顯著。然而，無論怎樣，與自己組織內群眾的相對整合的關係是上述領導人獲得其力量、發揮其作

22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五冊，頁308。

用的重要依據。那種過多地從某一群眾組織領導人的品德、個性、才能、機遇和非凡經歷等方面看待該領導人的作用，我認為是不妥的，即使是這些方面在文革初期也有群眾認可與否或者接受與否的問題，對於這種領導人的作用應該著重於從群眾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有甚麼樣的民眾產生甚麼樣的領袖。」總之，蒯大富或形形色色的「蒯氏人物」在文革初期的清華還是有相當的群眾基礎的。

另一方面，文革群眾組織的領導人處在其下屬的群眾與其上級的權力機構及當權派的交叉點上，他必須立足於下面的群眾，反映他們的呼聲，並且要適時地修正、改換或調節下面群眾的行為方式及心理機制，同時，他必須承受上面的壓力，接受上面的指示，不斷竭盡全力地把自己的組織與上級權力機構乃至整個文革大局加以溝通，相互為用。所以，這種領導人具有的功能轉換、角色轉換、手段轉換甚至人格轉換要遠遠複雜於文革中的任何其他人士。僅就人格轉換而言，這種群眾性的領導人，對於自己的群眾而言，他是「主人」；對於他之上的當權派而言，他又非主人。一旦上述所有上通下達的方面出現牴牾，這種領導人對上級機構和下級群眾之關係的梳理與否或梳理成功與否，成為該領導人及其群眾組織成敗的關鍵。群眾組織領導人的角色的多重性實際上是群眾本身及群眾運動的多重性。當這些多重性的角色相互衝突、互相異化而無法統一時，這種領導人的文革政治生命則壽終正寢，這一點從蒯大富在百日大武鬥之後的經歷中就可體現出來。在經過工宣隊主持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裏短期「學習」之後，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偏僻、遙遠的寧夏回族自治州青銅峽一個礦廠工作。1970年12月，由於當時「批陳（伯達）整風」的「需要」，蒯大富被召回清華接受隔離審查，直至1973年底告一段落，隨即到北

京郊區一個煉油廠被「監督勞動」。1978年4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萬人批鬥大會上，押至會場的蒯大富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誣告陷害罪」判處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蒯大富在青海省一個勞改農場服刑，刑滿釋放後，現居深圳，經營一家裝飾建築工程公司。

三 中、基層幹部與群眾的互動。幹部問題是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的焦點

林彪在1966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講話中說：「這次大革命是個大批判運動，對全黨、全國是個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幹部大批判，是批判幹部的運動。」又如，林彪在1966年12月上旬中央工交文革會議上講話中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全黨的大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大量的幹部都要在群眾中受批判，如此才能扭轉幹部與群眾的對立情緒，要到群眾中去受批判。」的確，文革開始不久，在清華大學乃至全國高校的諸多人物中，有一類地位最為窘迫、心態最為複雜的人們，他們自工作組進校後，就被工作組置於檢查、過關的境地。在工作組撤離之前，一些群眾紛紛起來批判、鬥爭其中的一些人，這些人被遊街示眾，勞動改造，遭受屈辱，工作組對此也是聽之任之。即使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這些人依然處於政治身份難以「定性」的狀態，文革開始時所戴上的「黑幫」、「走資派」之類的帽子是否要摘掉，仍然是眾說紛紜。這些人就是北京各類學校的廣大中、基層幹部。

「中、基層幹部」這一概念是相應於某一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體制級別和幹部配置而言的。廣義上，除了本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領導班子主要成員之外，中、下層的負責人員或骨幹人員皆可稱之為「中、基層幹部」。狹義上，這類幹部在不同單位（或部門）和地區又有不同的區別標準。在中央機構的中層幹部到了下屬單位或地方機構任職，可能就屬於非中層幹部，換言之，某一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領導幹部到了上級單位（或部門）和更大地區任職則可能屬於中層幹部。因而，文革中幹部們所受的待遇和遭到的衝擊則因其所在的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職位而大有不同。就清華而言，文革初期的中、基層幹部大體上是指從學校黨政機關部、處和系一級的領導人到有關科室及教研組、黨支部負責人之間的幹部。

教育界的幹部，特別是大學的各級幹部，在文革中從時間上說是全國所有各類各級幹部中最早遭到衝擊的。工作組最愚蠢的做法，就是按照文革的最初圖式，一進校就把清華大學500多名各級幹部（上至校長下至每個學生班級的班主任和政治輔導員）打入「冷宮」。工作組讓清華廣大幹部「靠邊站」的做法，實際上等於架空了它自己。工作組一不熟悉清華情況，二無清華根基，三無清華勢力，到頭來，他們在清華四處碰壁，灰溜溜地撤離，但卻給清華文革初期埋下了一顆最大的政治「定時炸彈」，即幹部問題。

工作組撤離清華之後，「清華大學紅衛兵」等幾個紅衛兵組織都不可能改變幹部問題上的形勢，甚至繼續對廣大幹部進行不同形式的迫害。下面就是1966年8月下旬前後在北京掀起的紅衛兵橫掃「四舊」的風暴中，清華校內幹部和教師的處境的幾組鏡頭：

6月中旬，一些幹部和教授遭到激進群眾的批鬥，他們被隨意戴上紙糊的高帽子，被押著遊行示眾，並遭到個別群眾的拳

打腳踢，身上糊滿了大字報或沾滿唾液；一些幹部和教授的家被抄查，財物等被抄走……

8月24日傍晚，連日來在北京城內形成的紅衛兵「破四舊」的恐怖活動已蔓延到清華。深夜，約50名清華中層幹部被「清華大學紅衛兵」等拳打腳踢地從家中帶至清華禮堂前和西階教室，紅衛兵們讓他們自報身份或自報所謂「罪行」後，對他們又是一頓毒打，幹部們滿臉滿身是血。「清華大學紅衛兵」還讓他們排成兩隊，相互對打。之後，把幹部們關押在生物館，短則幾天，長則至10月底才釋放。在此期間，紅衛兵們監督幹部勞動改造，寫檢查等；讓幹部們背誦毛澤東語錄，背誦錯了就痛打；讓幹部吃窩頭，甚至把窩頭放在地下，讓幹部們不許用手掰著吃而要學狗那樣用嘴去咬。在此



1966年8月24日下午，始建於1909年的清華二校門被「清華大學紅衛兵」當作「四舊」拆毀。

期間，還發生一位原炊事員因對幹部問題講了幾句公道話，而被關押上吊自殺的事件，紅衛兵們讓校一級幹部將其屍體抬出……

8月24日之夜可謂是清華文革的「紅色恐怖之夜」。「清華大學紅衛兵」糾集了清華附中紅衛兵以及北京其他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把禮堂一帶戒嚴，撕毀了批評劉少奇等人的大字報，用拖拉機拉倒了清華大學二校門。²³推倒或破壞了包括王國維先生紀念碑在內的一大批清華文物，揪出200多名清華幹部連夜搬運被拉倒的二校門石塊，幹部們一邊搬運一邊遭到紅衛兵們的辱罵和夾道毆打，一些幹部身上淌著鮮血……

在8月24日之後，「清華大學紅衛兵」把幹部們「組織」起來進行「勞改」，大多數幹部每日到東大操場除草、修整場地。幹部們集合、排隊，舉著毛澤東語錄牌上、下工。紅衛兵們還根據幹部們的級別、職務和所謂「罪行」，予以不同強度的勞動懲罰，重者不許在炎炎夏日下戴草帽，甚至雙膝跪地拔草，勞動前後要「請罪」，隨時會遭到打罵；輕者幹活時不許穿襪子、不許穿涼鞋、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喝水……

²³ 清華大學二校門始建於1909年，原為清華正門，門額上刻有晚清軍機大臣那桐1911年題寫的「清華園」三個大字。1967年春，在原二校門舊址處立起了毛澤東的巨型全身塑雕像。同年5月1日，林彪為此塑雕像基座親筆題詞，書寫了文革中廣泛流行的名言：「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舵手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1988年4月，毛澤東塑雕像被改換成清華大學主樓內大廳正上方懸掛毛澤東浮雕頭像。1991年在清華校慶80周年之際，在清華大學校友捐助下，重新修建了二校門。

自8月初至9月中旬，清華大學許多幹部、教師的家庭多次被抄查，一些財物被沒收，大量書籍被焚或上交；一些系的紅衛兵還舉辦有關幹部、教授所謂「罪行展覽」和批判壁報等活動；個別系的紅衛兵還勒令幹部和教師把價值人民幣20元以上的物品和存摺等交「公」（後歸還）；有些系的紅衛兵還命令幹部和教師充當「勤雜勞動力」，不是讓他們抄寫、張貼大字報，就是讓他們燒水、掃街、打掃廁所等，受管治的幹部和教師稍有不順和不滿，就會遭到懲罰……

根據四派後來的統計，1966年6月至10月，清華大學大多數幹部遭到遊街、體罰、批鬥、勞改等迫害。「清華大學紅衛兵」把清華幹部分為三類：「黑幫分子」（校級幹部、系、處級幹部、黨總支書記和副書記）、「黑線人物」（黨總支委員、黨支部書記）、「黑幫爪牙」（黨支部委員、積極分子），並組成了「勞改隊」。「第一勞改隊」（8月2日至11月初）由校級幹部、黨總支書記、系主任、處長等組成，「第二勞改隊」（8月2日至11月初）由黨總支副書記、分團委書記等組成，「第三勞改隊」（8月初至10月底）由黨支部書記、委員等組成。有些政治課教師、政治輔導員也被強迫勞改。據統計，在清華大學的13個單位中，總支委員以上「勞改」的，有9個單位是100%，其餘的佔80%以上。黨委各部、學校各處被「勞改」的，在14個單位中有9個是100%。全校500多名幹部，被「勞改」的約佔70%，沒有「勞改」的大多是年老體弱或有病者。有些系的群眾抵制讓幹部「勞改」的做法。「清華大學紅衛兵」還在幹部、教師就餐的食堂門口貼了一幅對聯：氬氬氬氬氬惰性十足，吃喝玩聊睡不問國事；橫批：一群混蛋。在被迫「勞改」的431名幹部中，約213名幹部進行「一類勞改」，即打著黑幫旗號掛黑幫牌子全天勞動，一天或兩天寫一次「勞改日記」，約122名幹部進行「二類勞動」，即無人監督勞動半

日，不打旗號不掛牌，兩天或一周寫一次「勞改心得」；約有96名幹部進行「其他勞動」。²⁴

1966年8月底至11月初，清華幹部問題沒有因為清華臨時掌權的紅衛兵人馬的變動及所爭論的問題而有甚麼改變。雖然「井岡山紅衛兵」和後來的井岡山兵團因其初期的幾個月裏，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指向清華校外的社會問題，過多地關注中央上層的文革鬥爭，但是從1967年初春開始，幹部問題由於文革的發展逐漸迫使井岡山兵團的重心一次次由校外的文革轉向校內的文化，由對上層權力鬥爭的熱衷轉向對校內幹部問題的正視。

1967年3月，《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了署名為「本刊編輯部調查員」的報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情況的調查）〉，以及「《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文革戰略來看，在此時發表這兩篇東西是為了加緊在政治上全面圍剿所謂「劉少奇資反路線」，力圖掀起全國性的批判劉少奇的高潮，相對緩解文革開始十個月以來的全國性的基層幹部問題。然而，這兩篇東西在清華園裏引起軒然大波，並給清華文革的形勢帶來了轉折性的影響。顯而易見，「無產階級司令部」早在工作組撤離之際就給「蒯氏人物」平了反，卻沒有給廣大清華幹部做出結論，也沒有立即就對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的做法表示甚麼態度，這決不是甚麼「疏

²⁴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聯合總部原四一四幹部辦公室編（主辦單位下略）：《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北京，1967年10月，頁4-5。

忽」，而是文革發展策略的需要。到了1967年春，全國性的奪權鬥爭開始不久，「無產階級司令部」才著手解決幹部問題，而此時的清華幹部問題已演化成另一番景象了。《紅旗》雜誌的兩篇關於清華幹部問題的文章儘管依然把清華校一級領導幹部看成「走資派」，但是它們歷數工作組在清華幹部問題上的四大「罪狀」（一是對幹部不作階級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擊；二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三是在基層幹部中大搞人人檢查「下樓」，四是使幹部整革命群眾），就有可能為清華幹部問題的發展提供某種契機。

「無產階級司令部」在文革進行了十個月才對全國性的基層幹部問題作了具體的表態，這相比於在文革進行了50多天就對工作組壓制所謂革命學生的問題所作的表態，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甚至已不可能有同樣的或相似的效應了。因為，清華廣大中、基層幹部在1967年初春面臨的已不是甚麼工作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問題，而是如何解決或如何洗刷過去十個月裏文革以及激進群眾對他們的過激行為和迫害的問題，即給他們自己「平反」、「平黑」的問題。《紅旗》雜誌對工作組的老眼重提，並沒有從根本上緩解廣大幹部所受的壓力。此時，廣大幹部的心情或者思緒是比較複雜的，他們沒有當初「蒯氏人物」被中央直接解救的那種「解放感」，因為《紅旗》雜誌上的那兩篇文章只是說「許多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並沒有說廣大幹部可以像文革以前那樣領導或左右群眾運動；而且還強調了幹部改造的重要性，沒有直接回答1967年春以後的文革運動中群眾與幹部是何種關係。另一方面，廣大中、基層幹部不但怨恨《紅旗》雜誌那兩篇文章的姍姍來遲，而且更加憎恨由工作組、「清華大學紅衛兵」對他們的做法所體現出的文革給幹部造成的打擊和迫害。在這個意義上，工作組「埋下」的幹部問題這顆「政治

定時炸彈」，終於在大半年後由《紅旗》雜誌的報告和文章「引爆」了。

事實上，即使是沒有《紅旗》雜誌的報告和文章，清華廣大幹部也開始以各種不同方式來做出他們自己對已進行了數月之久的文革的反應。最典型的的就是原清華校黨委三位副書記、一位副校長，先後於1966年10月給毛澤東和於1967年2月給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聯名寫信，反映清華文革的有關情況，熱切要求解決幹部問題上的是非，澄清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廣大幹部身上的「罪名」，表示願意為黨和人民繼續工作。²⁵一些中、基層幹部還自發地組織起來，進行政治學習和時事討論，主動向群眾徵求意見並參加群眾的多種活動，從事一些社區性的服務活動和接待全國來清華學習、參觀的人們（從8月下旬到11月底，清華每天都有上萬名來京串連的外地群眾吃住），等等。這顯示出清華廣大中、基層幹部不願意或者不甘心被置於文革「另冊」的「判定」。《紅旗》雜誌的報告和文章，無疑使在清華文革地表下運行了十個月之久的幹部問題迸發出來，公開化了，這就是廣大幹部的「定性」問題，即廣大幹部是所謂「黑幫」人物還是革命的好幹部？是必須排斥、打擊、否定的對象還是可以肯定、團結和使用的力量？等等。

在井岡山兵團中，以「井岡山紅衛兵」為代表的群眾，不願讓幹部問題替代自己的大方向問題，更不願讓幹部問題超越了其他文革問題而佔居主導地位。上自兵團頭目，下至基本群眾，表示讓中、基層幹部自己出來「亮相」，即由幹部自己向廣大群

²⁵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98、108。

眾交待自己的問題，做出自己的檢查，然後，根據群眾及群眾組織的評議，決定中、基層幹部是否過關，是否可以參加文革運動及群眾組織，是否可列入人民隊伍一員。以非井岡山紅衛兵代表的另一些群眾則認為，應由群眾組織主動、積極、熱情地幫助中、基層幹部，指出他們的問題，促進他們的檢查，以使他們儘早地投身於文革群眾隊伍中來。

對於廣大幹部而言，他們自然傾向於那種使他們可以及早地解脫的幹部政策。這些幹部作為50年代、60年代初成長起來並先後任職的新一代大學生的佼佼者，他們不僅能力超眾，工作突出，而且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質。此時，他們主要根據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文革前的幹部政策來影響廣大群眾，作用於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他們的一些做法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廣大幹部會根據群眾對自己的取捨態度而使自己與特定群眾結成特定關係。根據毛澤東在歷來的政治運動中主張團結95%以上的幹部或者肯定95%的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廣大幹部都力爭列入這個95%以內。問題在於文革初期劃分另外所謂「5%」的幹部的標準或尺度，由於不同群眾的利益和目的大有差異，最直接的是不同群眾在文革前與幹部的利害關係有所差異，以及文革中的幹部狀況對不同群眾已有的和可能有的切身利益格局來說影響不同，所以在團結哪些幹部或者確定哪些幹部所謂好或壞，不同群眾的態度自然出入很大。非常明顯的是，一些群眾肯定的幹部為另一些群眾所否定，反之亦然。

其二，廣大幹部對文革群眾特別是造反派群眾的取捨態度關係到文革權力的合法性與否以及造反派群眾權威的持久性與否的問題。

在上述的同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確認自1967年初開始的全國各地奪權鬥爭建立的革命委員會為文革時期各地各單位（或部門）的權力機構。由毛澤東所概括的「三結合」的方針成為文革每一權力機構必須實行的原則。「三結合」原則意指任何文革權力機構都要由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解放軍代表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鼎足之勢，缺一不可。該社論強調，對於「三結合」切不可改成「合二而一」，革命幹部在權力機構中可起「核心作用和骨幹作用」，即使那些犯了錯誤而改正過來的幹部也可進入文革權力機構。「三結合」原則一時成為文革權力機構的合法性依據之一。然而問題亦隨即產生：哪些幹部可被認為或被定為「革命幹部」呢？確切地說，哪些幹部會被「革命群眾」所認可、所接受呢？哪些幹部和哪些群眾又能分別為群眾和幹部所支持而來共掌權事呢？

隨著建立清華文革權力機構的任務日益迫切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時，井岡山兵團同樣面臨著上述問題。對造反派群眾來說，所謂革命群眾代表容易確定，軍代表是由外來的或上級派來的更容易確定，頗為棘手的就是確定所謂革命幹部。這種幹部不僅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還必須在廣大幹部中具有代表性。文革把確定幹部的權力交給了革命群眾以及軍代表，而不可能是由幹部確定自己。在這裏，幹部問題已轉化為群眾問題，而不是純粹的幹部問題了。哪些幹部可以作為不同的文革組織所共同認可和選定的候選人而進入將要建立的革命委員會呢？無論是毛澤東本人還是中共中央的文件、社論、指示等，都沒有給廣大革命群眾一個可具體操作、可切實應用的準則或尺度。尤其是對那些中、基層幹部來說，他們日後是否要依然進入他們昔日所任職過的中、基層權力機構，這更令一些群眾不清楚甚至不安心。就清華而言，從井岡山兵團頭頭到群眾在準備成

立革命委員會之前，對確定幹部代表，最主要的是「解放」廣大幹部，並沒有做出甚麼像樣的、切實的步驟。更有甚者，許多幹部在造反派群眾對自己做出取捨之前已制訂出了自己對抗性的對策。

井岡山兵團分裂後，兩派所重用的幹部在各自看來大相逕庭。團派所推舉準備進入革命委員會的幹部沒有甚麼代表性，這樣的幹部本身也為團派所操縱。四派所推舉的幹部不但為四派所制約，還因為他們與文革前的清華幹部勢力有著根深蒂固的關係，也不可能為團派所接受。更令團派擔憂的是，這種幹部一旦進入革命委員會就很有可能造成與團派爭奪權力之虞。兩派各自拒絕了對方所重用和所推舉的幹部，這就註定了清華革命委員會的難產乃至流產實屬必然，同時也預示兩派的矛盾和對立主要由於幹部問題而不可調和。

在中、基層幹部與群眾的互動上，「紅教聯」的觀點最為極端，也最有代表性。「紅教聯」曾一度附屬團派，該組織成員大多不滿於自己文革前與幹部的關係，他們由於自己的坎坷經歷或挫折而在幹部問題上大造聲勢，大造其反，甚至比團派大多數群眾和頭目更為激進，喊出了團派在幹部問題的先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政治地位決定政治態度論」。此論認為：「解放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經濟地位，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更主要的是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提高了，經濟地位隨之提高了，到成了『特權階層』後，政治態度自然就要逐步改變。」因而，每月 56 元工資的助教黨員（或黨員幹部）之所以比每月

26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四一四革命串連會編：《大字報選編（三）》，頁 3。

200 元工資的教授要保守，就是因為前者的政治地位比後者高，而後者雖然出身不同，但由於在文革前所處的政治地位及經濟地位，致使他們的「革命性最強」。²⁷因而，「紅教聯」提出對清華大大小小的「走資派」要「除惡務盡」。「紅教聯」的此論是對包括團派在內的造反派把文革當成所謂「批幹運動」的觀點的具體註解。四派指出，「紅教聯」的觀點是非常錯誤、非常反動的，它們在團派中有相當市場，並且成為清華極「左」思潮的根源。

在團派那裏，其幹部政策是與團派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歷史密切相關的。否定「十七年」，必然要否定在「十七年」中任職或成長起來的各級幹部；反過來說，否定「十七年」的任職或成長起來的各級幹部，必然要否定「十七年」。因此，文革又可以說是文革崛起的造反派與文革前的幹部隊伍的一場較量。

在四派那裏，其幹部政策是與團派對立並抗衡的一個切實的支點。正是在四派那裏，才充分顯示出文革初期幹部與群眾的互動中，幹部的局部的主動性和有限的主導性。如果說團派必然具有的一大「失策」在於把廣大中、基層幹部推向了四派或者使他們傾向於四派，那麼四派的主要力量恰恰來自他們一開始就奉行並由此而崛起的幹部政策。

文革初期，對於一時間處在所謂走資派與廣大群眾之間「夾縫」地帶的中、基層幹部來說，他們既無法主宰文革的現實，又不可能退回到文革前的過去。他們急於擺脫被打擊、被歧視或被冷落的境況，熱切要求重新工作，衷心希望置身於文革運動之中而不是被廣大群眾視為「另類」，冷眼相待，他們十分敏感

27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四一四革命串連會編：《大字報選編（三）》，頁 3。

於群眾運動的不同勢力和群眾組織的不同代表對於他們的親疏態度和相應舉措。如前所述，由於文革的宗旨和涉及文革權力的劃分與利益的格局，團派也即激進的或極端的造反派實際上把廣大中、基層幹部當成自己的文革對象和潛在「勁敵」，這也就使這些幹部不可避免地同把文革當成一場「批幹運動」的團派（實為激進造反派）及其代表人物進行政治上的殊死鬥爭。這些幹部就會通過各種方式、施展各種才能和利用各種機會，不遺餘力地抑制或阻滯這類造反派的勢力。廣大中、基層幹部不但自覺、主動地甚至義無反顧地站到了與團派對立的四派亦即保守的、溫和的造反派一邊，而且還逐漸制約甚至支配了這類造反派。雖然這些幹部的作用不可能再現或者重複文革前的幹部職能，但它至少使得文革初期許多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局勢不可能由激進的或極端的造反派隨心所欲地去加以主宰。

這裏僅舉清華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的事例為證。1967年春夏之後，羅征啟逐漸成為團派和四派之間爭論的一位焦點人物。羅征啟在文革之初，為了反思許多問題，閱讀和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有關著作，被團派指責為對毛主席的著作「根本不讀」。羅征啟對於文革打擊、迫害幹部的一些作法深為不滿。他站到了四派一邊，很快成為四派幹部隊伍及幹部參謀小組的一個關鍵人物。羅征啟在與一些原清華幹部寫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信中，要求為原清華黨委副書記劉冰「平反平黑」，而該小組有關人員回答說，劉冰的問題中央沒有定性，可以辯論。四派幹部辦公室也為劉冰「鳴不平」。然而，正如團派領導人所認為的，為原清華黨委第二號人物劉冰翻案是清華兩個階級鬥爭的一件大事。羅征啟為四派所保護和利用包括清華原校級領導幹部在內的許多幹部，積極出謀劃策，並對四派總部的若干工作制度提出過很多有效的建議。尤為顯

著的是，1967年4月23日，羅征啟貼出了〈我對目前形勢的認識〉的大字報，講出了許多原清華幹部的心裏話。針對團派的幹部政策以及相關行徑，羅征啟指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應首先強調投入戰鬥，而不是強調檢查。目前對多數幹部首先強調是革命的力量而不是鬥爭的對象」，「現在多數幹部已經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來了」。羅征啟告誡團派總部：「當前主要是肅清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和影響」，不要忘記「十個月來對革命幹部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羅征啟的大字報無疑是原清華幹部隊伍對團派的一次「挑戰」。

與此同時，羅征啟對四派的最大「貢獻」是他比較深刻、系統地總結和歸納了四派的觀點，並且在討論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時，給該文提供了許多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著作觀點的論據。羅征啟所整理出的四派觀點以及「四一四思潮」對於整個四派乃至清華文革初期的影響至深至大。這些觀點主要內容如下：一、「清華大學文革前十七年紅線主導論」；二、「清華幹部黑一點紅一大片論」；三、「文化大革命翻船論」；四、「幹部層層檢查、人人過關就是犯罪論」；五、「文革對象為兩小撮論」；六、「全國造反派分化為兩大派論」；七、「兩派鬥爭帶來不同的思潮論」。

由上所述，就不難理解，四派為甚麼堅持把選擇羅征啟作為「解放」原清華幹部的一個典型了。四派認為，羅征啟是原清華中層幹部的「一個線」，正如劉冰是原清華高層幹部的「一個線」。在四派看來，「解放」了羅征啟，就可以他為標準，作比較，就可使「清華牌」（即在清華畢業留校並參加工作）的許多幹部得到「解放」。四派領導人明確指出：「羅征啟是關鍵，也是與蒯大富鬥爭的關鍵，因為蒯大富說他是走資派，我們就越要解放他！」顯而易見，團派把在四派眼裏視為「大紅人」的羅征

啟當作眼中釘、肉中刺，以至後來不遺餘力地打擊、迫害羅征啟及其同事，把羅征啟與其同事之間的時政議論上「綱」上「線」，歪曲、誇大後，當作殘酷整治他們的依據，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羅文李饒」案。

另外，這裏要補充的是羅征啟本人的特殊經歷和命運。50年代，羅征啟是作為優秀學生而留在清華工作的，長期從事政治宣傳工作，擔任了較為重要的黨委宣傳部領導職務。文革開始，羅征啟受到衝擊而被「就地免職」。羅征啟在1968年後的清華文革運動中還遭到過遲群等人的打擊。文革結束後，羅征啟擔任過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黨委副書記等職。80年代中期，羅征啟出任新建伊始的深圳大學副校長、校長。1989年6月，因公開反對中央處理學潮問題的作法，羅征啟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羅征啟現居深圳，在一家建築設計所從事他大學時所學的建築設計專業。

毫無疑問，由於文革的特殊條件，廣大中、基層幹部起到了原高層幹部起不到的作用。在清華，原校級幹部十多人，他們大都被打成「走資派」、「黑幫」，而中、基層幹部500多人，他們人多勢眾，儘管自身也在分化，但他們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消蝕和對文革群眾組織的分解使整個初期文革受到強有力的牽制。從下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幹部問題在清華兩派鬥爭的大平上的份量。據團派1967年4月28日召開原黨支部書記、科以上的幹部會議上統計：四派中幹部、黨員的比例為66.6%，團派為27.3%，其餘不詳。四派中支持或傾向於反蔣南翔的比例為32%，團派為60.3%，其餘不詳。四派中傾向或支持反作組的比例為29.3%，團派為65.6%，其餘不詳。四派中的老衛兵（「八九派」）比例佔65.7%，團派為19.8%，其餘不詳。使到了百日大武鬥前夕，也只有原清華31名中、基層幹部正

站出來支持團派而反對四派，據不完全統計，團派失去了原清華80%左右的幹部力量。

清華的中、基層幹部隊伍是一支特殊的幹部隊伍。自1949年至文革前，經過清華黨組織特別是以蔣南翔校長為首的黨委十多年的選拔和培養，這支幹部隊伍不斷壯大，其重要特色如前所述在於他們絕大多數人是從清華歷屆畢業生或者在讀的學生幹部和骨幹中挑選出來的，可謂幾乎清一色的清華人。這種特色及成分給清華校領導的指示上傳下達和貫徹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給清華學校各項管理工作提供了高效率的人員條件，也使清華中、基層幹部隊伍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又如，在文革前，清華大學已實施多年的學生班級的班主任與政治輔導員制，學生幹部和學校有關幹部的政治思想工作與業務工作「雙肩挑」制，都是全國高校中十分罕見的，非常有效地推動了清華各項工作的開展和進行。從1953年到1966年，清華大學先後共選拔培養了628名政治輔導員。²⁸清華中、基層幹部隊伍的上述特色不可能不會轉換到文革中兩派群眾的組織機構和政治運轉之中。即使只有少數幹部支持的團派，忝列其中的幹部們都把自己的豐富鬥爭經驗和管理才能奉獻出來，更不用說幹部雲集的四派了。例如，四派總部下設一個20多名幹部組成的幹部參謀組。他們給群眾鬥爭出謀劃策，起到了智囊庫的作用。又如，兩派一直不斷地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有關部門遞送「情況簡報」，這直接來自於幹部們的建議，為的是加強各自在中央心目中的形象和聲勢。

²⁸ 劉克先、方東明主編：《北大與清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下冊，頁537。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文革初期，清華幹部隊伍沒有發生整體上的分裂或內訌，沒有像一些單位或地區的幹部隊伍出現了本單位幹部與外來幹部、本土幹部與「南下幹部」之間的分裂或對立。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文革前清華幹部隊伍的結構和成分，保證了文革初期清華沒有發生由兩支分裂的幹部勢力所左右的群眾派別的對立。

清華文革初期的歷史表明，在1967年—1968年，由於廣大中、基層幹部加入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相對保守的或溫和的造反派，直接促使激進的或極端的造反派直至整個造反派走向衰落。文革群眾兩派鬥爭的背後無不滲透或交叉著幹部主要是中、基層幹部的因素或影響。幹部問題成為包括清華在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問題及群眾鬥爭的不可逾越、不可化解的難題，幹部問題彷彿已顯示出它是文革的「剋星」。

毛澤東在文革開始不到兩個月時致信江青，他寫道：文革作為「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和「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²⁹此言差矣。「頃刻瓦解」只是由於來自黨內上層的高壓才使北大、清華等校的黨政幹部系統陷於癱瘓。例如，清華文革群眾論戰時，有人就責問：原高等教育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於1966年6月被罷免，究竟是由上級領導「拋」出來的，還是由下層群眾「揪」出來的呢？那麼，我個人也會反問：整個清華幹部問題究竟是由上級領導「拋」出來的，還是由下層群眾「揪」出來的呢？

2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6。

毋庸置疑，文革初期，對於幹部隊伍的重大打擊肇始於毛澤東發動並進行文革的意圖和策略，沿襲於文革前相當長時期慣用的「左」的政治鬥爭模式，而廣大群眾不可能是使幹部隊伍陷於暫時「瓦解」的發端者，他們只不過是盡其所能甚至盡其所需地把毛澤東的上述意圖和策略加以轉換、擴大而變成活生生的現實。

毛澤東所說的「瓦解」難以成立，至少就清華而言，文革剛進行了十個月，由廣大中、基層幹部為骨幹的群眾組織——四派的誕生，說明了清華幹部隊伍並沒有真正「瓦解」。這些幹部經過文革的初步「洗禮」後「死而復生」並加以重新整合，他們所發揮的政治功能以及所釋放出的政治能量，致使文革戰車在清華園裏不可能完全循著毛澤東及有關文革當局所指出的軌道暢通無阻地行駛下去，不得不屢遭緩滯，甚至給清華文革注入了難以逆轉的因素。

第五章 眾志成城

略論「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和取向

百日大武鬥的發生和進行，直接有賴於清華文革兩派的組織結構及其功能。清華文革兩派，尤其是團派，在文革初期蜚聲長城內外，揚名大江南北，還在於它們在文革初期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裏，不論是在其組織的建制和運行，還是在其組織的結構和取向，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解剖」清華文革兩派的結構和取向，可由此窺見文革初期多如牛毛、匯成狂瀾的群眾組織之一斑。

一 清華大學「文革」兩派——井岡山兵團和「四一四」及其建制與報刊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建制是在 1966 年年底至 1967 年年初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兵團的正式領導機構是總部委員會，蒯大富、韓銀山、鮑長康、劉才堂、馬小莊、陳育延，陳繼芳、任傳仲、王良生等任常委，後來是四派領導人之一的孫怒濤曾任過常委。這一班常委組成人員變化不大。總部委員會表面上實行集體負責制，而且沒有設立過主任委員一類的職位，但實際上，蒯大富作為兵團及其總部委員會第一號人物是沒有疑義的。除韓銀山為原校行政處幹部，其他常委都是年齡二十歲出頭的在校學生。在

1967年6月之前，至少在團派與四派形成對峙格局之前，這一總部委員會實際上臨時全權負責清華大學的日常領導工作，即成為當時清華大學的領導機構。

兵團總部（後來也就是團派總部）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又稱一部）、政治部、後勤部等常設部門，每一部門都由其核心組負責領導工作。

總部辦公室設有秘書組、電話組、常務組、資料組。

作戰部設對內作戰部和對外作戰部。對內作戰部轄有辦公室、部隊¹發放組、保衛組、第三辦公室（簡稱「三辦」，負責專案）、鬥蔣（南翔）兵團、大行動組、大批判組；對外作戰部轄有辦公室、社會調查組（又稱「動態組」）、全國聯絡站。社會調查組分為「一動」（兵團動態）、「二動」（校內及四一四動態）、「三動」（中央首長講話及北京動態）、「四動」（中學動態）、「五動」（軍事動態）、「六動」（國際動態）六個小組。全國聯絡站分為辦公室、資料組、東北組、華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等。

政治部設有辦公室、宣傳部、學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即幹部辦公室）、組織部等。每一部門還有下屬分支機構。

後勤部設有辦公室、科技組、財務組、生活組。

兵團（或團派）的組織建制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上述機構及其下轄部門的成立時間、沿革變化等也是有所不同的。必須提及的是，在兵團建制史上，還出現了團派保衛組管轄的一個生存較短的組織——「一科」，這一組織是仿照30年代中共中央

1 系、處等單位的代號。

「特科」而設立的，專門負責文革初期抓所謂「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等。

根據某些特殊情況，兵團（或團派）還設置一些應急機構，諸如文攻武衛指揮部、「羅文李饒」專案組、呂應中專案組、鬥私批修聯絡站、遵義學習班（學生學習班分部）、平型關學習班（幹部學習班分部）、六二四戰團以及在武鬥期間為武器生產而設置的「國防工業辦公室」、「校防科委」、軍需辦公室等。

兵團的組織建制還把各系、處等單位按軍事編制劃為01至15部隊（一度擴為20部隊），各部隊由數目不等的戰鬥組（隊）構成。這些以革命術語或紅色詞句（如「契卡」、「刺刀見紅」、「雲水怒」、「戰地黃花」、「風雷」、「不怕鬼」、「二萬五千里」、「指點江山」、「第一紅岩」、「照妖鏡」、「浩浩蕩蕩」、「巋然不動」、「衝霄漢」、「打落水狗」、「第一號炮」、「老實話」、「黨同伐異」、「千鈞棒」、「井岡志」等）命名的戰鬥組（隊），由數目不等、關係相對鬆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員組成。一些戰鬥組實際上只有一個人，即一個人拉起一個戰鬥組，冠以頗有特色或意味的名稱。戰鬥組的存在時間長則半年數月，短則只為了某一次行動或者某一次大字報簽名之用。戰鬥組的數目由於此消彼長，不斷分化和組合，恐怕永遠無法確定。然而，眾多戰鬥組那些紅色的、革命的或準軍事化的甚至暴力性的名稱，生動地反映了文革話語體系的特徵和屬性。

兵團群眾性組織主要有以學生為主的28團（該團的名稱是紀念中共井岡山鬥爭時期林彪任團長的紅四軍28團）和以職工為主的「清華大學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清華工總司」）等。

兵團的宣傳機構有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廣播台、井岡山通訊社、井岡山雜誌社、前哨廣播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它們主要是由兵團宣傳部來負責的。

兵團在不同時間出版並在不同範圍發行的刊物有：《井岡山》報、《井岡山》雜誌、《井岡山通訊》、《文化大革命簡報》、《學習資料》、《理論批判》、《整風簡訊》、《大字報選》、《內部資料》以及各動態組的有關動態簡報等。這些刊物是由兵團總部不同部門主辦的，其中有的刊物不僅信息量大，選題廣，而且在當時的北京及外地都頗有影響。

作為兵團報刊的《井岡山》，鉛印八開版，共出版了 157 期以及 10 多期「專刊」、「特刊」、「合刊」，約每週出兩期，每期最多時發行約 50 萬份，從 1966 年 12 月 1 日至 1968 年 8 月 9 日共持續了 20 個月左右，成為通過郵政系統在全國發行的一份著名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的小報。文革初期，包括《井岡山》報在內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的小報是當時中國報刊發行領域裏的一個「奇觀」。因為，文革開始後不久，大多數城市晚報性的、文藝娛樂性的或專業性的報紙被封閉，所剩下公開發行的各省、市、自治區一級的黨報大多是轉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這些所謂文革特定的「兩報一刊」的內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報」者，大多指以小八開版面出版的，在編輯、發行上沒有正式的「大報」那樣多限制的群眾組織的報紙。當時的文革運動還沒有對這種「小報」的編輯、發行做出甚麼明文的限定，這種由群眾組織主辦的「小報」自行決定其內容，敢於「炮打」除了「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外的任何人，對本地區、本單位（或部門）的所謂當權派以及與己對立的群眾組織更是不在話下。

斯大林說過，黨報要成為「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組織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革群眾「小報」的確起到了把文革群眾運動加以宣傳和組織的作用，因為這種「小報」是比文革大字報等流傳更廣、保存更久、影響更大的傳播媒介。在「小報」的背景或背後經常顯出的是文革政要的鼓動和利用，經常會出

現一些在文革大潮中推波助瀾的文章，也經常給廣大讀者透露出前所未聞的消息或者顯露出蛛絲馬跡般的新動向。總之，文革「小報」比起當時的有關正式文件、社論等來具有它自己不可磨滅的、獨特的文獻價值。具有上述特點的《井岡山》報不僅是當時上至毛澤東下至平民百姓所關注的一份「熱門」報紙，而且對文革在全國各地的不同發展，特別是對一些地區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心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例如，正是經過《井岡山》報作為「反面材料」的登載，「四一四思潮」才在全國一些地方傳播開來，也才會成為由毛澤東本人所關注的一個著名的群眾性思潮。

又如，刻板油印的《井岡山通訊》在其發行的一年半左右裏，出版了近千期，常常是一日數期，還有各動態組分門別類出的數百期動態簡報。這些刊物的內容包括校內兼校外、中央到地方、工農商學兵幾乎各界的文革動態和東西南北中幾乎各地的文革情況。這些刊物表明，兵團非常重視文革資訊或情報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別重視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及有關負責人的講話、指示，力圖通過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輿論聲勢來加強自己的形象和擴大自己的影響；進而還表明，兵團（或團派）在建有較全的政治、宣傳機構的同時，也擁有較發達的、輻射全國的資訊機構。這在文革初期群眾組織中是極為罕見的。無疑，這些刊物是文革初期運動的某種見證，它們對於研究清華大學乃至全國文革初期的歷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四派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建制是在「四一四革命串聯會」核心組的基礎上，於 1967 年 5 月底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四派由其總部領導，沈如槐、孫怒濤、汲鵬、陳楚三、劉萬璋、宿長忠、張雪梅、蔣南峰、周泉纓、李秀芙、任彥申、傅正泰、譚浩強等 54 人任總部委員，四派總部委員中儘管是學生佔主導地位，

但還是有相當一部份委員是原清華中、基層幹部。這是與團派總部成員構成的一個顯著不同。

四派總部稱為「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轄有總部辦公室、作戰部、幹部辦公室、宣傳部、組織部、保衛組、幹部參謀組、鬥蔣（南翔）作戰部、政治部、行政管理總勤務站、鬥批改辦公室、群眾接待站以及後來的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等。

作戰部設有第一作戰部（負責北京地區及校內）、第二作戰部（負責大批判）、第三作戰部（負責全國），轄有辦公室、資料組、軍事組、東北組、華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等。

宣傳部設有動態組、簡報組、廣播台、報紙編輯部、發放組。

四一四總部儘管在規模上小於團派總部，但是它十分重視基層建設，在基層單位共有 12 個部隊（稱 01 至 12 支隊）和較完整的分部機構。四派的群眾組織主要是以學生為主的東方紅戰團等和以教工為主的三七戰團，還有一個以幹部為主的幹部辯論團。四派的最盛時期自稱有 7000 人。

四派在不同時間出版並在不同範圍發行的刊物有《井岡山報》、《四一四戰報》、《情況簡報》、《井岡山參考資料》、《大字報選》、《清華四一四通訊》、《教革》、《聯合風暴》、《滿天紅》、《重要文件》等。

四派的刊物在創辦時間上遲於團派刊物，在發行數量上也遜團派刊物一籌，在選題範圍、資訊含量等方面難與團派刊物平分秋色。在報導有關校外文革情況時，兩派刊物常常雷同。只是在涉及到清華文革形勢與兩派各自的利益和見解時，兩派刊物才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兩派刊物常常是「互補的」，即在

一方的偏頗之處可發現另一方的特色。這種互補性是「解讀」整體意義上的井岡山兵團史和清華文革初期歷史時應重視的方面。

的確，類似團派即激進的或極端的造反派的報刊更多地是指向文革全局，四派即保守的或溫和的造反派的刊物更集中地是指向團派即激進的或極端的造反派們所代表的極「左」勢力。四派刊物的主要特點是以團派為代表的激進的或極端的造反派思潮和觀點為目標，予以相當深刻而又淋漓盡致的批判和分析。四派刊物對團派一系列主張和行徑從理論上的批判，具體而又真切地體現出文革中兩大類的不同群眾及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和分歧。特別是在涉及清華文革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四派刊物堅持與團派刊物「對著幹」的方針，給團派的種種思想和傾向做出了有力的、反面的評註。清華文革兩派的刊物，不僅從它們的諸多數量品種上，而且從它們的思想內容和理論風格上，都給人們研究文革群眾鬥爭及群眾分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標本」。

這裏，用「建制」一詞代表清華文革兩派組織的結構，主要是說明兩派組織結構已不是一般社會群體或系統組織的結構，而是帶有準軍事性的或準軍事化的結構，即按照軍隊的編制或建制來組成自己的體系及隊伍。兩派都以「作戰部」來指稱自己在文革運動中的日常「業務」領導和協調的機構，都以軍隊體制的概稱來命名自己的下屬群體和有關機構，這些都活生生地印證了，文革群眾組織具有相當強的組織能力和相當高的運行與反應的效率，同時，還具有與這種準軍事化形影不離的、根深蒂固的專制性和暴力性，後面將涉及這一點。總之，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或建制在數千年中國所有社會群體或組織中是極為罕見的，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二 「文革」群眾組織的界定和功能

關於文革群眾組織的界定，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一界定涉及到文革群眾組織的性質，也關係到由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而來的功能，還牽扯到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這裏，基於對清華文革兩派的個案考察和分析，做出一些探索性的論述。

首先，群眾組織的界定是以對群眾的界定為前提的。從社會心理學來看，「群眾」是指「人們彼此由共同的情緒狀態或注意對象而維持聯繫的無組織的、偶然的、暫時性的聚合。群眾是由某種客觀產生的社會情勢而形成的」。² 社會心理學強調的是因情緒感染的相互增強而導致的循環反應成為形成群眾的主要機制。從文革中不難看出，情緒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群眾形成和群眾活動的重要方面。由群眾而形成的「群眾現象」也是一種「無組織的人群由於對某一情景的共同體驗而產生的比較一致的社會心理現象，如暗示、模仿、從眾、定勢、輿論、憤慨、感染、氣氛、謊言、競爭等」。³

「群眾現象」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在於：當個人集合為群眾時，隨之帶來的是自覺個性的退化或消失，無意識個性佔據優勢，情感衝動上升為主導地位。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群眾心理的有關學者指出，人群中各個個人的情緒和觀點取得了相同的趨向，代替個人人格的是集合心靈，人們的觀念傾注於一個相同的方向，並且可能立即轉化為行動的趨勢。當個人成為群

2 朱智賢主編：《心理學大辭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519。

3 同上。

眾的一員時，其文化程度會隨著認同群眾心理而有所降低，並且難以控制自己的地位或行為。⁴ 這也使得在群眾中，群眾總是大於或高於個人。

在文革初期，群眾以及群眾組織大都按照單位（或部門）和地區來劃分，不存在跨地區、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文革群眾組織無一例外地都是「小社會群眾」。由於文革群眾組織所進行的活動主要是依賴於文革群眾生活和工作的具體單位或特定地區，這使文革群眾組織一般帶有如下特徵：

- 1、群眾之間有聯繫的紐帶；
- 2、有共同的目標和活動；
- 3、有群眾性的特殊規範；
- 4、有組織意識。

然而，文革群眾組織卻不是某種「集體」。⁵ 「集體」本身的目的性、整體性和自覺性以及形成「集體」本身的內聚力遠遠大於一般群眾組織。相對於「集體」，文革群眾組織更多的是集體成型前的某種鬆散群體。

其次，文革群眾組織不是由群眾自主產生的，而是在文革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由於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鼓勵和支持而產生的，並且是在昔日的黨政機構權威自上而下地弱化的形勢下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文革群眾組織對文革本身的認可和依存是其存在和運行的首要條件（文革時期幾乎沒有出現過從總體上反對或者否定文革的群眾組織），這使任何一個文革群眾組織

4 朱智賢主編：《心理學大辭典》，頁520。

5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集體」辭條，頁99。

都必須在文革運動的軌道上運行。所有文革群眾組織面對的問題是：不是要不要或者有沒有文革的問題，而是如何進行文革、如何闡釋文革的問題，甚至是如何排斥其他群眾組織而「佔有」或「獨霸」本單位（或部門）和本地區文革的問題。正是由此，文革群眾組織的不同直至對立都是基於文革自身所產生的矛盾和危機。

當然，文革群眾組織與任何其他群體相比有一個顯著特徵：無個人性，即組織成員的個人及個性、人格等匯合於或消失於群眾組織之中，代之以組織的心理和行為，代之於組織總是有大於或者高於個人的主導趨勢和狀況。其實不難發現，文革群眾組織的名稱幾乎都是無人稱的，都是冠之無個人性的政治名詞或紅色概念以及某些事件的日期等。文革群眾組織的群眾無意識心理和行為遮蔽了成員個人的自覺，同化了成員個人的品質。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眾多的個人只有結合成為群眾（不一定是群眾組織），只有把個人的感情和觀念投注於某種群眾所共同認可並且使個人具有安全感和依賴感的行為的共同方向，哪怕是暫時的、模糊的，才能使個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或擺脫那種恐懼、孤獨、被歧視甚至被迫害的心理。即使是所謂文革「逍遙派」也不是否定或脫離文革，而是同兩派群眾組織保持一定的距離即不介入的態度。一定的群眾組織有可能給個人暫時建立起的保護屏，決定了個人與群眾組織的特定關係，而個人與群眾組織所共有的榮辱、安危會使個人不加遲疑地把自己的內心轉換成組織的觀念，以求得保護和發展，甚至連每一成員個人的行為、思考、時尚、話語等也被自己的組織加以規範化。

然而，文革群眾組織成員個人的「組織性」又是非常鬆懈的。在清華兩派那裏，真正強硬即「鐵桿」的成員，兩派各自也只有數百人，這些人在清華當時被分別稱為「桿團」、「桿四」。

因為，當某一群眾組織過分的激進或其偏激行為有害或有悖於個人的生存和生活時，個人往往會採取一種消極無為的、逍遙觀望的態度。顯然，個人傾向或者加入某一群眾組織是某種心理上的認同和價值上的重合。個人對於群眾組織來說進退相對自願、取捨相對自便，這主要取決於個人的利益和現實生活是否由群眾組織所實現、所保證。群眾組織只不過是把群眾個人的心理情緒加以大眾行為化，沒有也不可能實現群眾個人的根本需求和根本利益。因而不難理解，為甚麼愈是到了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後期，處於逍遙派或觀望者的群眾愈益增多。例如，在百日大武鬥前夕，脫離了兩派的「逍遙派」群眾已達清華師生員工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在百日大武鬥期間，全校14700多名師生員工，在校置身於武鬥的不足千人，而近14000人紛紛離校，躲避武鬥。在此意義上，兩派在大武鬥期間漸漸失去了廣大群眾，文革群眾組織到頭來成為非群眾性的派別組織，這真是莫大的歷史諷刺。

探討文革群眾組織的功能（function，又可稱之為「作用」）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系統（或組織）具有結構，結構產生功能。文革群眾組織寓於文革大系統之中，這使我本人考察文革群眾組織的功能立足於它與文革的互動所造成的客觀後果。這裏，先簡要談一下文革群眾組織的內功能和外功能、顯功能和潛功能、正功能和負功能。

外功能和內功能：也可稱外在功能和內在功能，或者稱為對外功能和對內功能。作為文革特殊的政治—文化組織，文革群眾組織的產生、生存和發展，至少從表現形態上過多地依賴於這種組織所寄生的文革政治—文化環境。這一點決定了每一文革群眾組織與整個文革的互動、與其直接對立的其他群眾組織的關係，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重於或高於該群眾組織自身

內的所有方面。這一點也常常使得每一個群眾組織把能否使自己與整個文革協調起來、把能否從根本上加以制約與已直接對立的其他群眾組織，當成自身組織能否安身立命的功能即外功能。這種外功能的一個根本方面還在於：文革群眾組織把自己對與其之上的文革權力機構及權威勢力的依附或對峙的關係，當成其組織的價值與直接目標的重要內容。

從清華兩派的組織結構及有關活動中可以看出，文革群眾組織的對外職能部門遠遠多於或大於其對內職能部門，文革群眾組織的內功能屈從和服務於其外功能。例如，團派在大武鬥之前和大武鬥期間的數次「整風」活動，簡言之，就是力圖鞏固自己的文革地位和壓倒四派。不同於其他歷史條件下群眾組織的內功能決定其外功能，文革的群眾組織的外功能決定其內功能，這不能不是文革群眾組織的畸形之一。

潛功能和顯功能：如果說文革群眾組織的外功能大於其內功能，那麼其潛功能又高於顯功能。顯功能是指文革群眾組織那些有意造成並可以認識到的後果，而潛功能是該組織自身活動並非有意造成的、難以認識和無法預料到的後果。對文革群眾組織所處的文革大系統而言的性質和局部，顯、潛功能的劃分又相對不確定和相互轉化。一個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同是在1967年8月，四派在上旬提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這一點是四派的顯功能之體現，但在下旬，卻有四派部分群眾參加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活動，事後連四派許多頭目及廣大群眾都認為此次活動是一大蠢舉。表面上看來，這是四派某些人為了投機而「撈一把」，但在功能上體現的正是四派的潛功能。顯、潛功能往往在表現上圍繞著文革大系統不同時期的事項及其轉換而定，甚至還會根據群眾組織之上的權力機構的任務來裁定。然而，文革群眾組織的顯功能是相對弱小的，而其潛功

能常常格外巨大。在一些情況下，文革初期的某些勢力倚重的就是文革群眾組織的潛功能。而對群眾組織來說，潛功能在許多場合又是他們親手造成而無法控制的、具有異化特性的功能。例如，清華兩派都未有意識到他們進行百日大武鬥會有如此驚心動魄、殘酷不堪的後果，特別是團派絕對沒有意識到它所發動的百日大武鬥給自己帶來的竟是滅頂之災。

正功能和負功能：對系統或群體的整合或內聚有貢獻的是正功能，而推助系統失效或群體破裂的則是負功能。文革群眾組織的正、負功能是相對於文革系統和相對於它自身分別而言的。從總體上來看，四派對文革的負功能遠多於團派，當然這不排除在局部上團派的負功能也會多於四派。就各自組織而言，兩派的正、負功能都有其特殊的情況，但都直接受制於對方組織的影響和干預。兩派的正、負功能儘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在性質上頗為近似。例如，它們各自都力圖以某種準軍事化組織和準政權組織來整合自身。

文革群眾組織的功能所顯示出的特殊之處就是外功能高於內功能，潛功能大於顯功能，負功能多於正功能。無論是文革群眾組織功能的總和，還是內外功能、潛顯功能、正負功能的差值，都是文革本身所固有的或所需要的。即使在文革群眾組織諸多功能的選擇、置換、替代一一發生甚至一一消失之後，文革既可在初期無序進行，又可在後期相對有序地發展。因而，文革群眾組織的功能對於文革來說不是安身立命之類的東西，而是使文革在其初期興起和成型的「杠桿」一類的東西。因為，文革本身確定了文革群眾組織追求的目標和擁有達到上述目標的手段，一旦文革不斷改換的目標與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和功能（作為手段）發生脫節，文革處於「失範」(anomie)、文革群眾組織陷於危機就難以避免，文革的轉折就勢在必然。

清華兩派的組織系統相對來說是機構齊全和體制完備的，這在所有的文革群眾組織中是非常少見的，因而代表了文革群眾組織的典型。清華兩派的組織系統在性質上是沒有甚麼根本差別的，即都是文革群眾組織。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對於與己對立的群眾組織的絕對排斥的程度和途徑，這一點既是文革群眾組織的獨斷特性和專制機制的延伸，也使兩派的組織系統在各自的中、後期始終圍繞著如何戰勝直至消滅對方這一中心任務為轉移的。這種組織系統集中體現出了文革群眾組織具有的準政黨體制兼準軍事體制的蘊涵，並且愈是到了後期，準軍事體制的成分和色彩愈大、愈突出。

進而，清華兩派的組織系統在各自中、後期都發生了很大的功能反差和功能異化。從兩派擁有的機構和設施來看，它們絕大多數都是使文革群眾組織「超負荷」運行並具有「超負荷」功能的關鍵因素。因為，兩派（尤其是團派）的組織系統對社會形勢及政治局勢的作用和影響不僅超過了文革前原清華黨政系統，而且它們各自所顧及的從中央到地方、由校內到校外甚至自國內到國外的任務，所囊括的政治、軍事、宣傳、調查、專案、通訊、聯絡、管理等等的功能，已使清華大學在文革初期完全超出了一所大學所應有的地位和應盡的職責，每每使清華文革也使上述兩派不堪「重負」，畸形發展。顯而易見，在清華兩派的全部功能中幾乎沒有具備關係到清華大學「身家性命」的功能——高等教育功能，儘管在少數場合和少數時間兩派各自還進行過走走樣子的教育革命的討論等活動，但是兩派都把自己定位於群眾政治組織而不得不全力從事文革政治，兩派的全部功能至少對清華大學乃至對整個教育界都是「負面」的。確切地說，文革群眾組織面對著或者置身於文革大局和本單位的「行業」，它難於使自己對文革的功能與對本單位的功能有機地

正面地協調起來，無法使這些功能融洽地、和諧地統一起來，甚至還會發生上述兩種功能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狀況，即對文革有利的功能很有可能無益於本單位的生存和發展，而有利於本單位的功能則更有可能無益於文革的進行或深入。

清華兩派所表現出的功能經歷了一個從注重本單位之外的文革局勢到轉向注重本單位內的文化鬥爭的過程，這一過程實際上由兩派分裂、對立和愈益僵化的關係所促成。這一過程與其說顯現了兩派組織的功能的鈍化，不如說是「寄生」於文革大局的群眾組織功能的宿命。無論團派的組織系統在時間上長於四派，還是在組織運轉上顯著於四派，但就兩派本身的種種功能而言，兩派都具有十分相似的角色分裂和角色衝突。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它們曾派駐外地、外單位（或部門）的記者站、調查組和聯絡站的作法上。

這些記者站、調查組和聯絡站名義上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主席團」派出的，執行的卻是中央文革小組派赴各地收集、調查各地文革形勢和文革動向的使命，但自身又受到清華大學文革的局限。它們所面對的是不同於北京、不同於中央、不同於大學的文革形勢，所要試圖解決的是更大範圍和更加複雜的文革矛盾。它們從總體上力圖使北京方面的文革資訊和相關精神在外地、外單位（或部門）得到落實，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會竭力把自己的觀點和策略、傾向和作法貫徹到所在的外地、外單位（或部門）。在它們「生存」的1967年春夏，一方面，它們所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對待當地造反派組織與軍隊的關係，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置身於反軍、亂軍的旋渦中，並且直接參與了有關的反軍、亂軍活動；另一方面，它們在當地必然是支持一派群眾而反對另一派群眾。在這一點上，團派與四派相比明顯有所不同，前者無疑比後者具有更為顯著的作用和更為持

久的影響，捲入當地文革事務的程度要廣泛、深切得多。然而，兩派的這些記者站、調查組和聯絡站在外地、外單位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大都是它們所無法預料、無法把握和無法承擔的。它們一再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負責人的批評、斥責，最後損兵折將，被迫打道回府。這種貌似中央派遣的「欽差大臣」與實為清華普通學生之間角色的分裂和衝突在團派那裏曾一度達到了難以化解的地步。例如，團派記者站、調查組和聯絡站的一些成員由於在外地、外單位（或部門）的「過激」行為而受到審查或逮捕的人數是相當可觀的，而四派的則幾乎為零。

清華兩派的組織功能在百日大武鬥時期實質上已轉化為武鬥的功能即暴力的功能，此時，兩派的各個組織機構和設施已具有了武鬥的附屬或協作的功能，它們愈益緊迫地以武鬥為自己職責的首要方面，並且基於武鬥的進展必然使自身的相關功能富有暴力的或軍事的因素。

在百日大武鬥期間，兩派的「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功能遠遠超過了兩派其他所有的組織機構或部門，居於整個組織功能之首。兩派的這種武鬥指揮班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都是由兩派各自總部的「鷹派」人士所組成、所把持。這些全力以赴地從事武鬥的「鷹派」人士賦予了文革群眾組織的領導機構某種綜合性的功能，也使各自一派的整個武鬥指揮班子具有超常的、高效率的和強制性的功能，直接擁有許多軍事性的職責，諸如作戰、訓練、情報、通訊、動員、後勤等等，甚至還負責武器的製造、試驗、運送和裝備等等事務。實際上，兩派的「文攻武衛指揮部」最終只能把兩派的諸多功能「鎖定」為一個唯一的功能——武鬥！

如何劃分群眾組織，即如何界定文革群眾組織的所謂造反派與保守派，這是文革研究中一個頗為複雜而又棘手的問題。

國外學者對於文革造反派與保守派的界定過多地是從文革之前群眾階層的社會區分以及不同群眾階層的結構來考察，根據社會衝突的理論來概述兩派的對立與分歧。⁶徐友漁先生進一步提出從造反派內部的分化和分裂來考察兩派的劃分和對立，這大大開闊了對文革群眾兩派歷史內涵的視野。⁷的確，類似文革中沒有甚麼一成不變的東西，如文革「階級鬥爭論」有多種「版本」和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有多種「形式」，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是隨著文革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在清華，從最初受工作組壓制的學生群眾與以幹部子女為主的紅衛兵造反派（「老紅衛兵」）的位置彷彿在1966年10月左右調換了個，昔日所謂「右派」學生變成了最激進的造反派，而昔日打著「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⁸旗號的老紅衛兵們都變成了「老保」及「保爹保媽派」。同源於1966年年底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的團派和四派，到了1967年5月底已勢不兩立，到了1967年年底之後，這兩派更成為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的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與保守的、溫和的造反派。

那麼，甚麼是「造反」？甚麼是「保守」？文革時期的「造反」決不是指中國歷史上以傳統的農民起義和反抗來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的社會變革，而是在文革特殊形勢下特定的反社會

6 華林山：〈文革期間群眾性對立派系成因〉，〈政治迫害與造反運動〉，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事與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91-208，頁219-30。

7 徐友漁：〈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事與研究》，頁209-18。

8 《紅旗》雜誌，北京，1966年第11期，頁28。

體制和反政治權威的群眾激進行動。這種造反可能既是政治動亂又是社會動亂，但決不是甚麼社會革命以及所謂「改朝換代」的社會質變。文革時期的「保守」只是相對於「造反」而言的，「保守」並不是從根本上否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只是對文革的策略、主張和做法有所保留、有所懷疑，而不採取極端或激進的態度和做法。文革時期的「造反」與「保守」近似於由法國大革命而來的政治學意義上的左派與右派、激進派與保守派之分。但是，「左」與「右」之分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際已發生了重大的轉換，昔日的「右派」往往「驟變」成今日的「左派」，而昔日的「左派」一時「淪落」為今日的「右派」。「左派」與「右派」的沉浮，「造反派」與「保守派」的興衰，常常令人眼花繚亂，一領「風騷」三、五個月的情況，比比皆是。如前所述，文革群眾兩派的問題實質上是在文革大目標下如何操作和由誰掌權的問題。實際上兩派既相互反對、否定、排斥、分離、對立和鬥爭，又相互依賴、聯結、吸引、轉化、共存和統一。具體到清華兩派而言，「造反派」與「保守派」之分，以及造反派自身內部之分，既有置於政治實用主義之上的混同，也有慣於玩弄政治功利手法的溝通。例如，兩派各自為了自身的權力和利益，都出現過一些出爾反爾、丟卒保車、拋出個別人而保全派系等功利主義的東西；並且為了自己的大局和名聲，都幹過共同批鬥一些所謂走資派人物、共同上街遊行示威等機會主義的行徑。例如，兩派都參加了1967年7月下旬至8月初在中南海西門由北京上千個單位組成的所謂「揪劉（少奇）火線」。兩派在參加這一共同活動時，並不「妨礙」他們在中南海西門外還不時惡語相交，拳腳相加。在不觸及和不違反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兩派都經常顯示出搖擺、無所適從之類的特徵，更有一些人如魚得水般地「穿梭」於兩派而進行「鑽營」。

到了1967年年初，文革群眾組織，既有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也有兩派各自內部的分化，十分明顯的是，造反派內既有激進者與溫和者之分，更有兩派的交叉、滲透和部分重合。所以，純粹的造反派與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因為大量出現的情況是儘管兩派對文革的一些理論、策略和行徑等有所認同，但一旦涉及到兩派各自的根本利益時，由此所產生對文革的態度、理解和運作等就黑白相分，一清二楚。然而，為從整體上研究並從本質上把握文革群眾組織，將其劃分為「造反派」與「保守派」，特別是劃分為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與保守的、溫和的造反派，還是可行的。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從1967年年初開始，造反派內部的分化已超越了過去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對立，並上升到文革群眾運動的主位。造反派內部的分裂使新一輪的所謂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從文革自身中演變出來。在此意義上，四派與團派都是造反派，但四派卻又不是極端的或激進的造反派。從1967年春由造反派中分化出來，四派無論在觀點上還是在行動上迅速與昔日的保守派重合，並使整個保守派上升到一個嶄新的形態。毫無疑問，造反派的分化和裂變遠遠大於甚至「淹沒」了保守派的分化和裂變，而且前者對於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走向和命運起著至關全局的作用。

清華文革兩派的對立表明：以團派為代表的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堅力量。造反派的產生既直接得益於文革發動者兼領導者的意圖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質和要求。這類造反派唸的是文革理論的「真經」，行的是文革實踐的「真髓」，可謂文革理論和實踐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代表。沒有造反派，也就難以有文革。若是沒有造反派，文革很難成為全國規模的、關係到億萬人民生活的群眾性運動，很

難成為觸及到社會制度、國家政權及全民心靈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過來說，沒有文革，也就沒有造反派。正是由於文革，造反派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行社會體制內的「反體制派」，成為被文革最高領袖一時許可甚至所鼓動的反現行社會權威的所謂「群眾反對派」。文革「造反派」大致可定義為：拒斥過去本單位(或部門)和本地區的政治領導體制，否定已有的幹部權威，傾向於推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的激進群眾。造反派在文革中的異常偏激和極端反權威性，致使它自身走向消亡。造反派問題是文革的一個縮影。

以四派為代表的相對保守的、溫和的造反派和它所逐漸趨向的保守派是文革的「修正主義」(從「修正主義」一詞的原意來講)力量。不管是在文革大局還是在其某一局部，四派乃至保守派都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文革理論，都不可能完全被文革實踐所整合。保守派在行動和心理上總是與文革保持某種距離，至少保守派對文革的理解與運作不是與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以及與文革有關領導權力機構相吻合，而總是有所「偏差」甚至「摩擦」。更主要的是，保守派與造反派愈益激化的矛盾以及二者在後期所進行的殊死衝突，每每使文革初期的發展不但不同於造反派的期望和努力，而且從總體上或局部上有悖於文革的方針和目標。保守派問題緊緊地附著造反派問題。保守派如同魔影，不僅與造反派同生，而且與造反派共亡。通過與造反派的直接對立和生死較量，保守派所表現出的對文革的疑慮、困惑、批評和失望，不斷從思想上消蝕了文革理論，從實踐中動搖了文革的正統權威，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文革在頭兩年所形成的群眾運動的高潮發生了歷史性的波折。

三 「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

清華文革兩派的結構和功能，以及二者的各自歷史和共同命運，都強烈地表現出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orientation)。這種取向可以成為人們研究文革群眾組織的著眼點之一，因為這種取向是文革群眾組織自身發展趨勢的關鍵點。「取向」是指正常人或群體對於自己所在的客觀環境、自身狀況、自己與當時環境狀況的關係等能夠做出時間、事件、空間、人物等等的識別和判斷。瞭解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可以加深理解文革群眾組織的內涵和特徵，還可準確地把握文革群眾組織在文革複雜多變的形勢中所特有的反應和行為。在文革相對短的一個時期裏，大致說來是在1967年年初至1968年秋，全國不同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群眾組織都表現出或多或少、或此或彼的文革取向。這些取向大體上可歸結為下面幾點：

一、文革群眾組織的準政黨取向

清華文革初期的歷史表明，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難以駕馭的群眾運動，因為文革開始後不久，除中央和軍隊之外，黨的各級機構和組織幾乎陷於癱瘓。紛紛崛起的群眾組織(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黨的群眾組織，但是文革群眾組織無不是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和歷史傳統為自己的思想背景和活動「座標」，這一點從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大都設立了與文革前黨政系統相似的組織設施中可見一斑。文革群眾組織「發祥」於黨的政治傳統和政治謀略，也超越於黨的約束和黨在文革時所處的窘境。黨的鬥爭由非黨的群眾組織來充當其在文革一定範圍內的主體和動力，並變為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群眾運動，也是整個文革歷史的、

必然的「二律背反」，即成為整個文革初期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不可化解的矛盾癥結。

正是由此，文革群眾組織的準政黨取向既是自發的，更是自覺的；既是狂熱的，更是理智的。這些群眾組織把自己視為所在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最高的（至少是暫行的）文革政治代表或文革政治集團。儘管所有文革群眾組織都不可能不正視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都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扮成此時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化身即作為毛澤東手下的某個組織，但它們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表現甚至強化自己的準政黨取向。例如，清華兩派都按照黨組織的形式來吸收成員，頒佈義務，履行有關手續，建立基層組織，制定相關紀律。

對於團派即造反派來說，他們力圖把黨過去行之有效的具體領導轉換成自己的權力和權威，他們竭力想把過去的廣大黨員、幹部控制在自己的麾下。1968年初春，當時文革已發展到了「整黨建黨」階段，團派某一戰鬥小組貼出了「清華一切黨權歸團派」的大標語。團派還下令清華黨員到團派總部登記，但是行不通。實際上，造反派對黨的衝擊與保守派不可同日而語。對於四派即相對意義上的保守派來說，他們把自己隊伍裏的黨員多、幹部多看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他們在文革特殊的環境裏力圖暫行代表黨來工作，依然以黨過去的經驗、方法和傳統作用於。儘管文革此時黨的路線已大不同於以往，但是包括四派在內的保守派堅信黨的權威依然存在，黨的戰鬥力不會在文革中遭到瓦解。實際上，保守派也不可能墨守黨的過去政治運動的成規和慣性了。

文革群眾兩派的準政黨取向使他們千方百計地追求或獲得本單位（或部門）和本地區過去黨組織的地位，使他們格外重視以黨組織的模式來統一自己隊伍的認識、意志和步伐，不遺餘

力地尋求獲取所在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文革領導權。由於文革群眾兩派準政黨取向的排他性，兩派的政治生死較量在所難免。

二、文革群眾組織的準政權取向

為了在本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確立起自己的權力和權威，文革群眾兩派都使自己的活動以奪權或奪取更大的權力為宗旨。林彪在文革伊始所說的「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⁹對文革群眾兩派來說，真是至理名言。在文革初期一個相對短的時間裏，造反派處在奪權後自身變為所在單位（或部門）和地區「準政權」的狀態，而保守派處在一種與造反派問鼎大權的「影子政權」的狀態。或者，在保守派一時處在「準政權」的狀態，造反派則處於「影子政權」的狀態。不管兩派居於何種狀態，也不論是哪種政權，兩派都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準政權取向驅使文革群眾組織力圖在所在的單位（或部門）和地區進行奪權前後的「組閣」。能否實現「組閣」，這不僅受制於「在野」的對立群眾組織的舉措，更主要地是由在群眾之上的更高一級的文革權力機構所裁決。即使群眾兩派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同處文革臨時權力機構之外或者在這一權力機構成立之前，它們都會把對方當成自己奪權的最大而又最「危險」的「勁敵」；當兩派的代表同處按照毛澤東「三結合」原則所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之中時，兩派的鬥爭圍繞著爭權奪利、打擊對方、

⁹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7。

擠垮對方來進行。兩派的權力爭奪和權利鬥爭不可能是建立在現代政治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原則的基礎上。

準政權取向更多地表現為是一種與其對手「你死我活，別無他擇」的取向，即某一群眾組織若是暫時執掌「大權」，便會向對立的群眾組織大加整肅，而暫時「在野」的群眾組織則會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破壞對方的「大權」，隨時準備取而代之，還是如同林彪所言：「政權是鎮壓之權」。¹⁰

三、文革群眾組織的唯權力取向

從政治學上講，「權力」意味著支配、控制或作用於他人的能力，意味著某種帶有強制性力量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而合法化、制度化和規範化地強制進行並使人們自願服從的權力就是「權威」。

文革洪流衝擊著昔日的權力體系，泛起的是造反派的問鼎權力。對昔日沒有權力而如今初涉權力的造反派來說，權力是他們的命根子。上自文革領導人，下自廣大群眾，無不把文革看成一場奪權鬥爭。「權」彷彿成為貫穿文革肌體的「神經」。有無權力，權力大小等等成為文革政治生活，也是文革群眾組織的永恆的主題。

1967年年初，初獲反劉少奇、鄧小平大遊行活動「勝利」而在北京「風光」一時的蒯大富著文大談「奪權經」：「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傾；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不奪權，就是對人民極大犯罪。奪權，就是捍衛黨的領導，就是捍

¹⁰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7。

衛無產階級。奪權，就是無產階級派的當務之急。此時不奪，更待何時！」「真正的革命派，應該滿腦子裏想的是奪權，眼裏看的是奪權，雙手幹的是奪權。」「有人笑我們滿腦子是權權權，是一個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在政權問題上，我們就是毫不含糊，當仁不讓！我們寧可做『野心家』，也不願當糊塗蟲、馬大哈。」¹¹這道出了唯權力取向的「真諦」。

唯權力取向不但使造反派也使保守派在自己的全部活動中和在自己組織的全部運行中，唯權是圖，奪權、搶權、爭權、分權、弄權、玩權……，不一而足。一部文革群眾組織的歷史，一部文革群眾運動的歷史，彷彿就是唯權而爭、為權而奪的歷史。為了權力，可以毫無顧忌，可以不計道德，可以不擇手段，可以「在政治上只有頭腦而沒有良心」……¹²

由於獲得的權力的易變和不確定，由於執掌權力是在文革特殊形勢下外部勢力所給予的或所造成的，文革群眾組織對權力的重視和追求，進而對自己權力的維護和擴大，幾乎是投入了全部心血。他們在文革那個「有權就有一切，沒權就沒有一切」的年代，切實感受到了「有權的幸福」，真正體驗到了「無權的痛苦」，他們也往往經歷了權力的峰谷之間的變化，甚至是既玩弄了權力，也被權力所玩弄……

唯權力取向致使文革群眾組織過多而又過分注重政治權力、權威的外在形式，而忽略了內在價值，這兩方面的脫節乃至相互異化，決定了唯權力取向走向其反面。

¹¹ 《井岡山》，1967年1月17日，第11期。

¹² 〈蒯大富三十六條權術〉，載《天涯》，海口，1998年第1期，頁58。

四、文革群眾組織的孤立取向

儘管在 1967 年年初，井岡山兵團個別人向該兵團頭頭提出建立全國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同年夏天，團派還召開各地許多造反派代表參加的「全國形勢討論會」，甚至還企圖把全國造反派統一起來。但是，任何一個文革群眾組織，不管其形式是甚麼，也無論其屬性多麼非凡，都必須是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大原則上認可的、群眾參與文革的組織。因而，文革群眾組織「它的重要特點是分散的。中央允許並鼓勵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存在，但反復強調不准成立全國性的組織，曾取締了 1966 年年底、1967 年年初成立的幾個全國性的組織。中央設法使群眾組織保持本單位組織的本色，對跨行業、跨地區的組織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只支持保持分散特點的『大聯合』、紅代會，從未鼓勵群眾組織的統一。這一方針顯然是為便於領導和控制，防止出現全國性的政黨性質的團體，防止借用群眾組織的力量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同時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毛澤東一向主張一元化領導，反對多元化的政治傾向。」¹³

由此造成的文革群眾組織的孤立取向，致使差不多所有的文革群眾組織愈是到了其存在和發展的中、後期，愈是把自己的重心或中心立於本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文革，而對整個文革形勢或大局無能為力。文革群眾組織的孤立取向表面上看來是有著如此之類同的組織自生自滅的特徵和現象，實際上這種取向也證明了沒有哪個單一的文革群眾組織可以從整體上、從全局上影響並制約文革的歷史發展及歷史走向。文革時期，全

13 印紅標：〈紅衛兵狂飆：全景大素描〉，載于輝編：《紅衛兵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頁306。

國數以幾十萬計乃至幾百萬計的大大小小的文革群眾組織的孤立、分散、自發的特性，不正證明了文革的重要社會基礎是勢如汪洋大海的、置於舊傳統生活之中的那些相互隔離的「文革村落」即「群眾組織」嗎？

五、文革群眾組織準意識形態的虛假取向

「準意識形態」是指特定組織內的而非全社會的、由社會意識形態所派生的某種思想體系或理論學說的總和。文革群眾組織的準意識形態從根本上講與文革意識形態並無二致，差異只在於前者是對後者的不同註解和應用，前者只是在特定的文革群眾組織中佔有思想主導地位。「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¹⁴這一意識形態問題的關鍵，對於文革群眾組織而言，只具有局部性的意義，甚至還具有給文革意識形態帶來「部分質變」的意義。

這裏所說的「虛假」不是指與實在相反的空虛、虛無之意，而是指文革群眾組織對自己的主張、觀點、要求和目的所要採取的誇大、虛飾的態度和行為。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也無論是團派還是四派，顯然他們對文革意識形態的根本認同是一致的，但是他們卻把各自對文革意識形態的理解和發揮當成了代表文革時期全社會的普遍利益和普遍要求，力圖把自己一派對文革意識形態的詮釋和轉換當成文革唯一的「正統」，更可笑的是，總是把自己一派看成文革芸芸眾生的最高代表。因而，文革群眾兩派都會在宣傳文革的理論而推行自己的準意識形態之類的東西

14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卷，頁98。

時，自覺不自覺地把「正宗」的文革意識形態加以分割、剝離、切換和嬗變，而注重、誇大或虛飾文革意識形態的哪些方面，淡出、泛化或消解哪些方面，則完全基於文革群眾兩派各自的利益和需要。例如，同是文革「階級鬥爭論」，在團派那裏得出的是「大翻個兒論」及「徹底砸爛舊清華」的準意識形態「文本」，在四派那裏衍生出的是「階級關係不變論」的準意識形態「文本」。

文革群眾組織準意識形態的虛假取向，往往給後人接觸或研究不同的文革群眾派別所擁有的理論、觀點、口號、主張、傾向、思潮等東西時，很難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找出它們之間的差別甚至根本對立，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東西在話語體系上超常的相似，在思想模式上驚人的一致，不用說給後人，就是在當時都造成了某種假像或幻像，即人們很難分清它們何者打的是文革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的旗號，何者唱的是文革意識形態「修正主義」（從該詞原意上講）的腔調，何者又是玩弄的文革意識形態「異端邪說」的潛台詞。只有超越它們那枯燥、淺薄和貧乏的表現形式而深入到它們背後的文化群眾兩派的利益源淵，才可透析出這些東西的特質，才可聚合出文革群眾組織準意識形態本身虛假的實質。而文革群眾兩派的準意識形態偏頗的論戰維繫於飄搖不定、動盪不安的文革群眾的生活。

總之，上述虛假取向使文革意識形態發生「部分質變」的同時，也給文革群眾組織所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準意識形態帶來了相似的或相同的裂變。團派領導人在70年代初的概括可謂入木三分，他們認為：與林彪所說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截然相反，「群眾運動會天然地產生各種各樣不合理的東西：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多中心論』等等。」今天看來，還應加上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直至蒙昧主義。

六、文革群眾組織的投機取向

文革風雲的突起和變幻莫測，文革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激烈，文革風雲人物走馬燈似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文革策略的混亂不堪等等，這些都使文革群眾組織必須以鮮明的或強烈的投機取向來苟且生存，或來經營一方。

投機取向的一個內容是創奇性，即某個文革群眾組織在本單位（或部門）和本地區，更多的是在外單位和外地區大肆進行超出文革規矩許可或文革常規許可的反權威等之類的行徑。行前所未行搶權之事，打前所未打群眾之「仗」，把過去的革命遊擊戰爭策略「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改換成文革政治賭徒的「打一把，撈一把；打得上，撞大運；打不上，倒楣運」，以聞名遐邇的轟動效應，力求增強自己的勢力和地位，擴大自己的名聲和身價。前面所述的團派在北京和外地的一系列反文革當權派的活動無不如此。正如團派領導人當年檢討自己組織成員們頭腦中的政策觀點「太差」時所說：「在社會上，每當中央揪出一個或一小批『大人物』以後，我們總要順著這個大方向大衝大殺一陣，沒有一次不過頭的」。可謂投機方能「取巧」，投機必在「取巧」。

投機取向的另一內容是欺詐性。文革群眾組織大都有兩副面孔和兩套手法，尤其是在對付與己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時更是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同樣「革命的兩手」。在當年清華園裏，中央文革小組個別「大員」及其手下幾位幹將所散佈的「文革就是個人爭權奪利論」和「互相利用論」、「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政治鬥爭就是引導對方犯錯誤」、「政治鬥爭就是要結成死黨」、「攻守同盟牢固論」、「政治陰謀活動不可知論」等之類的東西，頗有市場。這些散發著中國市儈政治氣息和黑社會政治幽靈的東西，在團派中曾達到一個「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

用先學、立竿見影」的高潮。在解決與處理與己對立的文革群眾組織之關係成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時，某一文革群眾組織的投機取向則一發不可收拾。真真實實，虛虛假假；打打談談，談談打打；對上一套，對下一套；對內一套，對外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盛時一套，衰時一套；總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最大限度地打擊自己一時的主要敵人。例如，清華兩派在百日大武鬥期間都曾向外單位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取經」，可笑的是，這種做法決不限於團派只向造反派、四派只向保守派「取經」。

在1970年年底與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講到文革的兩大「缺點」時，毛澤東曾生動地談到了這種投機取向：「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甚麼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好嘛，你這樣搞，我贊成。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¹⁵

七、文革群眾組織「大民主」形式下的專制取向

文革「分散的群眾組織參與政治運動很容易出現意見分歧，形成派別之爭。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鬥爭哲學』的傳統觀點，使小團體之間不可能形成共存、競爭的民主秩序。階級鬥

15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499。

爭的觀念和『以我為核心』的一元化政治思想，使紅衛兵認定不擊垮對手就不能自立。這種中央的高度集權、個人專制，基層的山頭林立，派鬥不止，無政府狀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極至，完全與現代民主制度南轅北轍。」¹⁶

在我遇到的一些當年造反派學生及紅衛兵，不同程度地回憶到文革特有的「大民主」形式(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聯)，有的頗為首肯，有的動之以情。無獨有偶，我讀到了在海外的中國個別學者發表的讚揚文革「大民主」形式的文章。由上可見，那種「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文革「大民主」形式的貽害並沒有絕跡。在我看來，衡量和評價任何形式的民主或任何民主的形式都應立足於它們是否有益於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自由。當民主作為手段服務於人的健康發展之目的時，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文革群眾運動所鼓動、所推行的「大民主」形式，諸如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呼風喚雨的各類傳單，無中生有或誇大其辭的各類大批判材料，招之即來、動輒上街的遊行示威，如火如荼而風格如一的批鬥大會，等等，其直接的結果在帶來了文革初期迅猛的群眾奪權和和群眾分裂的同時，還助長了文革專制時尚，蔓延了蠻橫風氣和愚昧心理，擴大了社會裂變及政治動盪，其最終歸宿是慘無人道的大武鬥。由文革群眾的「大民主」帶來文革群眾的大武鬥，決不是甚麼歷史的偶然或巧合。

儘管在個別情況下或特殊形勢下，某一群眾組織(如團派)有屢見不鮮的「內部整風」，有普通群眾成員對自己組織領導人的直面批評，有對自己組織的決策擁有影響甚至修正的權利，等

16 印紅標：《紅衛兵秘錄》，頁306。

等，但是所有這些都是服務於使自己組織在本單位(或部門)和本地區奪得文革牌局頭把交椅的目的，而對於對立的群眾組織無不是竭力地從組織上打垮，爾後對其加以政治上專政、思想上獨斷甚至言論上鉗制，「大民主」的形式只是對己不對外人。即使是某個特定的群眾組織，一旦奪權到手，大權在握，其內部不可避免地立即發生分裂，產生「大民主」形式下新一輪的專制取向。實質上，在文革初期出現的「大民主」，只不過是在一定的單位(或部門)和地區的暴政的群眾民主，或曰「群眾民主的暴政」，不管它們在形式上多麼繁蕪複雜，但其內容上都有一點相同，即無視公民個人尤其是與己對立的群眾一派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無不犯有殘踏人權、殘害人性甚至致死人命的罪過。

八、文革群眾組織的依附取向

從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產生到清華兩派在百日大武鬥「同歸於盡」，表明了文革群眾組織及群眾運動，無不受到群眾之上的文革權力機構的控制和支配，表明了文革群眾不可能是甚麼獨立自主的、「自覺自為」的群眾組織。

文革群眾組織的依附取向來自於文革是一場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社會動亂。1967年初至1968年秋，群眾組織彷彿成為文革鼎足之勢或三角格局舉足輕重的一方，因為按照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在由群眾代表、軍隊代表和原幹部代表三方組成(「三結合」)的文革時期除中央和軍隊之外的各級權力機構中，群眾代表中的多數人是由造反派群眾推舉的，這些代表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調整與曾被他們打倒或衝擊的幹部代表的關係，也不過多關注與軍隊代表的關係，而是把精力和力量更多地投入上級文革領導機構，直至中央。顯而易見，哪一個群眾組織在文革大局下頗成「氣候」，幾乎完全依賴於文革有關權力機構

的點播和鼓動。即便在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或部門)和地區，文革群眾組織也是千方百計地尋求上級文革領導機構的重用和庇護，尋求政治靠山或同情者。由於沒有可觀的長久政治權力的基礎，由於不存在現代政治民主的合法保障，包括團派和四派在內的所有文革群眾組織都必須盡力使自己的言行舉止依附於文革權威的默認或許可，它們挖空心思地從上級的文件、指示、決策等中來唯我所需地尋找對自己有用的東西，給自己的行動提供依據。當然，它們各自更會極盡能事地把有利於自己一方的文革「最高指示」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

十分清楚，文革群眾組織的依附取向所依附的根本不是群眾，而是非群眾勢力，它不斷地體現出文革群眾組織的虛弱甚至虛偽，同時，從反面更加有力地證明了：文革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講都不是群眾自身進步乃至自身解放的運動。文革作為一場「史無前例」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給群眾帶來了無數由群眾自己親手造成的貽害無窮的痛苦和災難。

九、文革群眾組織的暴力取向

文革群眾組織的暴力取向從深層上說來自文革的性質和文革的社會基礎，從直接層面上來說來自文革群眾組織對自己的鬥爭對象和與自己相對立的群眾組織的關係。

這種取向的第一點是驅使文革群眾組織對文革對象——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這九類人物大肆採用暴力行徑，諸如抄家、遊街、批鬥、拷打、關押、勞改甚至殘殺。然而，面對這些暴力行徑，被迫害者卻沒有甚麼反抗，這反而愈加強化了文革群眾組織的暴力取向，並在一時間暴力取向掀起了橫掃全社會的紅色恐怖風暴。這種由對文革對象到文革社會所通行慣用的暴力取向，的確在

文革的本義上，把對人們的「靈魂革命」與「肉體革命」統一起來了，而且「靈魂革命」的激烈與「肉體革命」的殘酷是成正比的。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兩派群眾往往為了配合文革形勢以及自己任務的需要，在不同地點和場合而共同採用暴力行徑來對付同樣的一些文革對象人物等。

這種取向的第二點是文革群眾組織之間的爭論和糾紛不但導致兵戎相見，大動干戈，而且文革群眾兩派都曾將擁有暴力的手段來使暴力取向升級為群眾性的武鬥。群眾武鬥的尖銳、激烈、殘酷和兇狠，可從前述清華百日大武鬥略見一斑。愈是到了文革群眾組織的晚期，其暴力取向愈發不可收拾，以致暴力取向在群眾武鬥中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這種暴力取向儘管具有單位的或地區的特徵，但它對包括文革群眾在內的無數受害者乃至施害者的內心創傷幾乎是無法治癒的。在北京大學校慶百年之際，年已耄耋的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出版的《牛棚雜記》一書，以作者的親身經歷控訴了這種暴力取向，給我們後人永遠防止這種暴力取向的死灰復燃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警鐘！

在文革研究中，人們往往會把暴力與武鬥混同，儘管二者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這裏要指出的是，暴力及其取向是單向性的、非交互性的，而武鬥則是雙向性的、交互性的，因為前者更多是指文革群眾組織對文革對象個人的迫害和對社會的禍害而言，而後者主要是指兩個截然對峙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暴力之戰。總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暴力取向以及武鬥導致了文革群眾組織的不同衰敗和共同消解。

十、文革群眾組織的思潮取向

每一文革群眾組織大都有自己的觀點和見解。這些反映並體現某一群眾組織利益與要求的觀點和見解的總和，在社會心

理及社會輿論的層面上，形成某種群眾性的思潮。文革群眾組織的思潮取向使不同階層的文革群眾對於複雜多變的文革形勢做出自己所特有的判斷和反應，成為一條顯現文革群眾運動演變的、來自群眾之中的重要線索。思潮取向比起其他取向顯得格外醒目和重要，因為它是指導和制約文革群眾組織生存和行為的一個「視窗」。文革當中的群眾思潮就其數量難以統計，就其類型約有十種左右，僅就群眾組織的思潮而言可分為四種：造反派思潮和保守派思潮，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思潮和保守的、溫和的造反派思潮。這些思潮萌發於毛澤東的文革思想，生長於文革的實踐之中，但是任何一個群眾性文革思潮都不等同於毛澤東的文革思想，都與文革理論和文革實踐之間有一定的差異、偏離甚至「修正」。實際上，文革群眾思潮的廣泛而又深刻的不同恰恰表明了文革群眾運動的演變及分化。

印紅標先生把文革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群眾思潮概括為「老紅衛兵思潮和造反派紅衛兵思潮」。在我看來，這兩個思潮大致上分別代表了流行於文革最早的四、五個月和1967年前七個月這兩個不同階段的造反派思潮。下面我將大段引用印紅標先生的概述。

「老紅衛兵思潮直接承襲『文革』前的『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在社會分析方面，它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來自『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為數不多的走資派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構想是回到1949年之前的舊中國，是原來的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捲土重來。因而，文革打擊的重點在『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一小撮走資派。這種思潮指導下的行動是『破四舊』、批判文化教育路線、知識界人士、文教界及北京市委『包庇資產階級分子』的領導幹部。老紅衛兵的鬥爭偏重黨外，偏重『階級敵人』、『反

動文人』。在階級路線問題上，老紅衛兵思潮強調『紅五類』，特別是黨政軍領導幹部子女相互的階級感情和革命家庭的薰陶，認為只有這些人是真正可以依靠的接班人，同時強調剝削階級家庭的反動影響，排斥出身這些家庭的青年，其極端表現形式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幅對聯。老紅衛兵思潮的主要倡導者和基本骨幹是幹部子女，其追隨者多為工農子女。當『文革』深入、衝擊到幾乎整個領導幹部層時，老紅衛兵從『革命』轉為『保守』，要求保護老幹部；當『反特權』的口號提出以後，大部分工農子女放棄了老紅衛兵思潮。老紅衛兵思潮，尤其是血統論的獨特之處在於革命自豪感背後隱藏著的對政治、社會特權的追求，這是蘇聯模式國家普遍存在的權力和財產集體世襲傾向的具體表現。」¹⁷這一概述同樣在清華大學文革最初四個月的「老紅衛兵」（最主要是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以高級幹部子女為主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那裏的經歷和思潮中得到了具體而切實的證明。

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由老紅衛兵始作俑者而掀起的文革第一次造反狂潮不僅很快吞沒了這些老紅衛兵，而且由1966年年底崛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在把這些老紅衛兵推向所謂「保皇派」或「保守派」的地位的同時，大大發揮了老紅衛兵思潮，並且很快成為文革群眾運動的主要思潮。「造反派思潮認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來自黨內走資派，即黨和國家的一批領導人背叛馬列主義，搞修正主義，背叛人民，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由公僕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特權階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受走資派的庇護，是走資派的幫兇。蘇聯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

17 印紅標：《紅衛兵秘錄》，頁314-15。

因此，文革主要目標應是打倒走資派，造反派極端分子還提出建立『沒有官僚的中華人民公社』。造反派指責老紅衛兵有血統論、特權思想，說正是那些以『自來紅』自居的幹部子女最容易『和平演變』為新興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¹⁸

儘管印紅標先生沒有對保守派思潮進行分析或論述，但他給整個造反派思潮作了準確而深刻的歷史性評判：「老紅衛兵和造反派思潮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結構矛盾的間接的反映：毛澤東的號令在處境不同的人群引起不盡相同的反響。人們從兩種思潮的存在不難看到蘇聯模式國家社會結構上的矛盾及其不斷提出的問題：特權和反特權。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似乎給了受官僚特權壓抑的人們新的希望。然而事實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剷除特權的『革命』，造反派的思想武器不外中國農民傳統的『均貧富、等貴賤』。『革命』、『造反』的結果是摧毀了中國文明與進步的因素，導致封建的大倒退。老紅衛兵和造反派思潮雖然不是全無道理，但就其主體而言都沒有走出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的樊籬。」¹⁹

1967年春夏，文革群眾思潮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從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思潮中萌發和成型並最終分裂而獨立出來的保守的、溫和的造反派思潮，它簡直就是另一類保守派思潮，開始登上了文革群眾運動的舞台。「1967年夏季及其以後一段時間是『文革』思潮走向理論化的時期。上上下下的造反文人都力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理論解釋和論證。」²⁰在清華

18 印紅標：《紅衛兵秘錄》，頁315。

19 同上，頁316。

20 同上，頁307。

大學產生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它成為新型的保守派思潮的代表。同樣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四一四思潮」與老紅衛兵思潮具有某種天然的歷史聯繫，昔日的造反派思潮如今已演化成為文革群眾中典型的保守派思潮；而「四一四思潮」從造反派思潮分裂出來，與老紅衛兵思潮一起匯成了同團派為代表的造反派思潮決一死戰的潮流。

第六章 見微知著

「文革」群眾思潮的分歧及評析

清華文革兩派不僅在 1968 年春夏之際進行了鐵與血的大武鬥，而且十分顯著的是，兩派從 1967 年夏季起，經歷了約一年的論戰。這一論戰既是稍後的百日大武鬥的思潮交鋒「前奏」，又給歷史、給後人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可謂用刀與火鑄成的論戰資料。顯然，兩派在認識上的分歧，最主要的是各自所代表或所體現出的不同類型的文革群眾思潮，不但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強烈的政治背景，而且還有突出的理論意義和廣泛的思想影響。誠如〈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所言：「清華大學四一四與團派的原則分歧和組織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的。」¹的確，兩派有不少人認為甚至誇大說，全國性的「四派」諸如河南「河造總」、長沙「高司」、哈爾濱「山上派」、成都「紅成」、重慶「八一五」及四川「產業軍」，甚至還有武漢「百萬雄師」；全國性的「團派」諸如河南「二七公社」、長沙「湘江風雷」、哈爾濱「炮轟派」、成都「八二六」、重慶「反到底」、武漢「工造總」及「三鋼」等等，都可在清華兩派的理論分歧和組織對立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發現其相應的影子或痕跡。²即使在

1 《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專刊。

2 同上。

四派認為，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文革，目的是部分改善這一專政和加強這一專政。包括團派在內的那些要「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要否定過去的一切，要打倒過去的一切等言行都是十分錯誤的。⁴四派對文革的理解並由此而對團派的批判主要體現在1967年8月發表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此文是動力與農業機械學系60級學生周泉纓(25歲)8月9日寄給其在河南省鄭州市「河造總」一派戰友的長信，此信似是對文革形勢及諸多問題的綜合性評論。在1967年6、7月間，周泉纓在河南等地一個多月，與當地的群眾組織「河造總」舉行大量座談會，印發傳單〈和河造總座談紀要〉，該紀要就是〈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的雛型。在寫作之際，得到了原清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等的修改。此文先是作為四派東方紅戰團內部印發的參考資料而於1967年8月3日開始在四派內部流傳，後到了8月下旬，此文通過團派報刊《井岡山》作為被批判的「反面」文章而發表，在全國尤其是在群眾派別鬥爭的熱點地區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成為全國性的四派思潮的代表作。

該文一開始就大膽地提出：迫於文革形勢，「我們要更加獨立自主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當仁不讓地要去充當文革的主力軍。該文並不否定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但是恰恰在文革與其他革命的區別這一點上，該文指出文革的獨特性，進而否定了包括團派在內的造反派對於文革的理解。在四派看來，文革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革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革命，成為文革對象的走資派以及修正主義者「只是一小撮」。走資派在中國的地位和蘇聯完全不一樣。他們在黨內、在政權機器內未

4 《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專刊。

佔統治地位，並未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也正因为這樣，「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共產主義化的。」無論文革中階級關係如何變化，「也決不可能來個『大翻個兒』，也決不可能劃分甚麼『老保階級』、『造反階級』。十七年來掌權的工農兵還是工農兵，十七年來受壓迫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還是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文革中階級關係是基本不變的，因而，「政權也是局部地改變的，而不是徹底的改變」。⁵一句話，文革不是改朝換代。

四派認為，與否認階級鬥爭的右傾思想不同，文革的極「左」思想由否認文革與其他革命的區別而誇大階級關係的變化，把人民內部對少數人教育的過程當成階級關係的大變動、大翻個的過程，斷言在文革後財產和權力必須再分配，從而從左的方面復辟資本主義。正是由此問題，所謂作為革命派的四派與他的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團派分道揚鑣。這個問題也是文革中幾乎95%地區的造反派分裂成了所謂兩支造反派(即四派和團派)分歧的焦點。⁶

四派指出，上述分歧是合乎規律的、非常原則的，並且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因為全國各地群眾兩派的政治主張及政治思想都能在四派與團派的分歧中得到反映或體現。儘管兩派在解決同黨內走資派這一文革主要矛盾時是統一的並在鬥爭中結為戰友，「但是在奪權問題上，即由誰來掌權，依靠誰，團結誰，鎮壓誰這個階級陣線問題上，兩派的分歧就急劇地爆發、激化、發展到組織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致發生激烈的武鬥，幾乎在每個地

5 《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專刊。

6 同上。

區，當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時，四一四派和團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會迅速地上升。」⁷這就造成了兩派對文革的任務、策略、目的等問題上的對立。文革在解決了走資派問題之後，兩派及其思潮誰戰勝誰的問題就會迅速地提到日程上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兩派的分歧和鬥爭使文革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一方面，走資派問題被群眾派別之間的矛盾激化所超越，文革由最初的清洗走資派轉向群眾派別之間的內戰；另一方面，一些地富反壞右分子等混入團派，他們表現得極「左」，對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要求得最為迫切，他們把自己一派當成造反派，把對立面打成保守階級，「他們彷彿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槳，但是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把航船攔在暗礁上，以便來個階級關係『大翻個兒』，復辟資本主義」。⁸他們往往操縱或利用團派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及其狂熱性，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四派強調，團派的錯誤在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奪軍權的鬥爭中就已充分表現出來。團派錯誤地認為，槍桿子已經完全被敵人所掌握，全國性的內戰、全國性的武鬥奪權已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已演變為「武化大革命」。殊不知軍權牢牢掌握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手裏，絕不能像以往衝擊省、市委而奪權那樣去衝擊軍區而奪軍權。文革的進程絕不是像團派所想像的那樣，「全面內戰是打不起來的」。⁹

與四派不同，團派認為，「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從根本上來說即從本質上來說相同的」。¹⁰以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論述為

7 《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專刊。

8 同上。

9 同上。

10 《井岡山》，1968年7月5日，第151期。

依據，團派著文闡明：文革和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在「革命的首要問題，革命的根本問題，革命的實質問題上」是相同的。四派提出文革與民主革命的「根本不同論」，「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權革命、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就是否認對走資派篡奪了的部分國家機器（也就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必須實行徹底打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一句話，『根本不同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論』！」¹¹在此之前，團派《井岡山》報就刊登〈論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選登了毛澤東、江青、張春橋、馬克思、列寧以及《紅旗》雜誌社論的有關論述，號召人們徹底砸爛舊清華。¹²

團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最主要的敵人，混雜在我們隊伍中」。¹³四派看不到這一點，否定作為文革理論基礎之一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相應地提出關於「十七年」以及文革之際「階級關係不變論」作為自己的根本主張，力圖把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的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來並列於甚至來掩蓋住同走資派的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因此，團派與四派的鬥爭，「歸根到底，也就是承認不承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的問題，承認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部殘存著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問題，承認不承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的問題，總之承認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要繼續

11 《井岡山》，1968年7月5日，第151期。

12 《井岡山》，1967年12月21日，增刊。

13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5。

並且最重要的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¹⁴四派的「階級關係不變論」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按照四派「不變論」的邏輯，「中國就根本沒有走資派，就根本不存在修正主義路線，就根本沒有資產階級篡奪了政權的爛掉了的單位，就根本沒有必要進行文化大革命。」¹⁵

四派中的個別人在當時就已敏銳地看到，文革之所以發生，一是領袖「個人需要」，二是「排除異己」；還有個別人深刻地指出：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是「極左路線的總根子」，文革的鬥爭是出於「個人集權的需要」。文革黨內上層的狀況表明：「任何一個國家，領袖只能樹一個，如果有兩三個領袖，就得把其他的領導幹下去。」因而，團派斥責四派把文革看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看成「幹部大換班」，看成「打倒『劉家軍』，換上『林家鋪子』」。¹⁶四派有人認為，文革的上層鬥爭也不過是集團利益的鬥爭，即所謂「第×號人物與第×號人物之爭」，「軍方與文方之爭」，「舊政府與新文革之爭」等等。¹⁷四派有人看到文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並且「收集了大量文革所謂『黑暗面』」。針對這些，團派怒不可遏，反問道：「這豈不是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的大革命，而是幾個野心家互相排擠，互相傾軋，爭權奪利，排除異己，如同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的一場鬧劇？」¹⁸

14 《井岡山》，1968年7月5日，第151期。

15 同上。

16 同上。

17 《井岡山》，1968年5月31日，第143、144期合刊。

18 《井岡山》，1968年7月5日，第151期。

團派概括四派的文化大革命理論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三部曲；抽掉文革的主要敵人；把文化大革命變成沒有對象的無頭案；進而攻擊文化大革命是『集團鬥爭』，是『排除異己』，『改朝換代』；以此推論這種無緣無故的『宗派鬥爭』是『人為的悲劇』，『帶來了災難』。最後得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應該否定——這，就是四一四的哲學。」¹⁹團派把四派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估計過分了，四派不是否定文革理論，而只是少數人異議或批評文革。但是，四派的主張或者觀點確實從諸多方面懷疑、批評甚至動搖了正統的（更不用說團派的）文革理論。

二、如何評價清華大學文革前十七年的歷史？

團派聲稱，清華大學是中國赫魯曉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典型，是用來復辟資本主義的戰略據點之一。清華十七年來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爛掉的單位，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資產階級的王國。²⁰團派歷數舊清華的「六大罪狀」：1、清華黨委組成了清華資產階級司令部，而一些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則形成了清華的特權階層，成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清華的骨幹力量；2、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黨內走資派的支持下，成了資產階級統治清華的「參謀部」，為資本主義復辟出謀劃策。全校108名教授是調節學校工作的「寒暑表」和「穩定力量」，成為蔣南翔手下的一百單八將；3、舊清華包庇、重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他們翻案、摘帽，而對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4、舊清華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反對學習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大搞「和平演

19 《井岡山》，1968年7月5日，第151期。

20 《井岡山》，1967年8月24日，第77期；8月26日，專刊。

變」；5、舊清華反對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和科研路線，執行分數掛帥，脫離生產和國家需要，爭名譽，爭利潤，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6、舊清華維護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特權享受，對廣大職工實行殘酷剝削和迫害。對於舊清華不僅要在組織上「大翻個兒」，而且要在頭腦中徹底砸爛！²¹ 堅決反對舊清華「十七年紅線主導論」！堅決反對舊清華「上黑下紅論」！

四派聲稱，雖然「清華大學是蔣南翔長期統治的獨立王國」，「前校黨委在舊中宣傳部、舊北京市委、舊高教部黑線的操縱下，逐步推行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把清華大學當成修正主義的實驗場，」²² 但是，「十七年來，毛澤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任何人要想封鎖，不讓毛澤東思想和廣大幹部、群眾見面是辦不到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清華園。」²³

四派認為，清華大學長期以來就存在著紅線與黑線的鬥爭。不能把廣大幹部與前校黨委看成是鐵板一塊，不能把他們說得一無是處。不能對清華的十七年一概否定。堅決反對舊清華「黑線上下連續論」！清華大學與修正主義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有著本質的區別，不能徹底砸爛。四派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文革，這和解放前在蔣介石、日本鬼子統治下鬧革命不一樣。誰要把十七年說的漆黑一團，誰就是否定十七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誰就是往我們黨的臉上抹黑！²⁴

21 《井岡山》，1967年10月12日，第90期。

22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17。

23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11。

24 《井岡山報》，1967年12月1日，新20號。

三、如何評價清華大學的黨組織？

1967年年底到1968年年初，隨著兩派分歧的加劇，特別是整黨建黨的來臨，團派提出必須否定清華黨組織、重建清華黨組織的主張，團派歷數原清華黨委的種種「罪狀」，把原清華黨委看成站在所謂劉鄧司令部一邊，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在清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團派斷言，原清華黨委「根本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新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理人」，整個清華成了繼原清華黨委「『封、資、修』的教授治校的翻版」。²⁵ 更有甚者，以原清華黨委一些負責人為成員的第一套班子在文革伊始被揪出來之後，以原清華中、基層幹部為主體的第二套班子又用不同方式繼續發揮著作用，影響著清華文革，即「把我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拉向右轉」。²⁶ 「車馬比將帥更危險」。所以，團派強調，同這些班子的鬥爭，不僅要砸爛被其領導人稱之為「永不漏氣的發動機」的原清華黨委，而且必須重建清華黨組織。「清華的黨組織必須在批判十七年修正主義建黨路線中，必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重建！非如此，就不能真正鞏固我們的紅色政權；非如此，就不能鞏固和強化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非如此，就不能將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²⁷

在團派看來，文革前的清華黨組織被改造成「黨員教授化」、「教授黨員化」，教師、黨員「兩路會師」，使清華的黨組織成為「教授黨」、「科學黨」、「教學黨」、「業務黨」。²⁸ 原清

25 《井岡山》，1967年12月28日，第106期。

26 同上。

27 《井岡山》，1967年10月12日，第90期。

28 《井岡山》，1968年2月8日，第115期。

華黨委注重在教師中發展黨員，黨員佔教師的比例 50.5%，而忽略在工人中發展黨員，黨員佔工人比例 15%，「可見清華黨組織中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何其多也」，「清華黨組織爛掉了」，因而必須搬掉，必須重建！²⁹ 那種「聽起來似乎十分文雅的『教授黨』，原來就是法西斯黨、修正主義黨的代名詞」。³⁰

由於文革的特殊形勢，四派並不直接推翻強加原清華黨委的各種罪名，而是對團派的一系列論調進行反駁。他們否定那種把廣大黨員看成黨委的奴隸主義工具、修正主義基礎和保皇勢力等說法，強調清華黨組織在本質上、在主流上是好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黨員、大多數幹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成員，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清華的黨員、幹部也是如此，他們的先進面目必須迅速恢復。³¹ 現在從上到下大多數幹部犯了嚴重的錯誤的說法，純粹是那種「幹部不如群眾、黨員不如團員、團員不如群眾」³² 謬論的翻版，對此，必須徹底批判。

四派強調，「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我們黨內是佔統治地位的，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佔統治地位，近幾年來也是這樣。」³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

29 《井岡山》，1968年1月4日，第104期。

30 《井岡山》，1968年2月8日，第115期。

31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3。

32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24。

33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2。

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這正是為了要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那種……『在文化大革命以後要從零開始建黨』等等論調，都是十分錯誤的論調」，³⁴ 都是別有用心的，都是幫助了敵人。「階級敵人把共產黨描繪得一團漆黑，要把幹部搞成一個單純的批判對象，我們就要造這個反。」³⁵

四、如何評價清華大學的校、系、部(處)一級的當權派？

兩派的對立出現在文革進行了10個月之際，他們對於清華大學校、系、部(處)一級的領導幹部所採取的不同態度，是直接與經歷了文革頭10個月磨難的幹部的境況有關。由於蔣南翔校長是被清華大學之上的領導權威所罷免的，兩派在蔣南翔的問題上沒有正面交鋒。兩派分歧的焦點在於如何對待原清華有一定代表性的30多名中層幹部，團派主張全部打倒，四派主張保護絕大部分。兩派圍繞著數位頗具影響的中層幹部，不但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而且進行了殊死的武鬥。

團派斷言，清華各級當權派是蔣南翔的全套人馬，分佈在黨團組織、宣傳、科研、教學、行政管理各個部門領導職位，讓這些人上台，就是資本主義復辟。因為，舊清華本來就是高等教育戰線的一塊黑樣板，而這些當權派則集中反映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剝削階級教育制度的靈魂。所以，要不要批判並

34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12。

35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29。

打倒這些當權派，這是「革」與「保」的問題，是原則問題，是立場問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讓他們上台就等於蔣南翔上台，保護他們就是保護蔣南翔。

四派斷言，清華各級當權派的大節是好的。從他們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堅定的。他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雖然過去程度不同地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但他們對這條路線是抵制的，他們對於幹部問題上的「資反路線」覺悟較早，並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在文革初期運動中有不同程度的立功表現。他們對紅衛兵小將支持、愛護。因而，應該發揮他們的作用，並使他們再次走上負責崗位。

五、如何評價清華大學的幹部隊伍？

《紅旗》雜誌 1967 年第 5 期發表了關於批判工作組在清華幹部問題上執行「資反路線」的評論員的文章和調查員的調查報告。以此為契機，清華園裏掀起了關於幹部問題的大辯論，這不僅使四派從團派中正式獨立或分裂出來，而且給清華文革帶來了至關全局的影響。

團派認為，清華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是要革命的，但他們在過去都不同程度地犯過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清華幹部有如下特殊性：1、清華幹部大都是三門（家門——校門——機關門）幹部，沒有經過槍林彈雨的鍛煉，而且是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的學校裏培養出來的；2、清華幹部對十七年來兩條路線鬥爭沒有認識，不能區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他們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3、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尖銳鬥爭中，清華幹部長期站在反動路線一邊。4、清華大多數幹部絕不是左派，絕不是無產階級當權

派，而是資產階級當權派，說他們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那純粹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論調。³⁶

團派強調，清華大學多數幹部是中間派，他們同以蔣南翔為首的修正主義黨委沒有原則的分歧和鬥爭。他們在政治上崇拜蔣南翔，在這一點上估計不足，就是政治上的糊塗蟲。毛主席在談到知識份子問題時曾說過：「就大多數來說可以為舊中國服務，也可以為新中國服務，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其中除了左翼和右翼之外，中間派是極大多數。而清華的大多數幹部是屬於這一類的，他們中的一部分由於世界觀的改造程度不同，社會影響不同，因此可能對資產階級專政有不同程度的抵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推翻之，而往往以得到統治者的局部微小讓步而滿足，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思想影響下，以及他們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是愛國，是熱愛社會主義，擁護黨和毛主席的。但是他們受資產階級思想及《黑修養》的毒比較深，他們雖然口頭上每天也在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自己不知道怎樣才能真正地為人民服務，他們也在無時不在表示堅決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但是，可就是不知道甚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所以往往不自覺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替法西斯賣力，自己也不知道。這種人，老是被動，在關鍵時刻，往往要人給他們後背擊一猛

36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 13-14。

37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 38。

掌，推向前進一步。」³⁷在團派看來，清華幹部沒有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也是由於「蔣南翔在清華貫徹了一條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七年來在清華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是法西斯專政，而廣大的幹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不管他們主觀願望如何，他們客觀實際上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替法西斯賣力」。³⁸「清華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是復辟舊清華的社會基礎」。³⁹

四派指出，「對幹部問題上的分歧，追其根源，最根本的是對十七年國家政權性質的估計不同，對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認識不同。」⁴⁰毛主席關於團結95%的幹部和95%的群眾的指示仍然適用於清華，清華不能例外。清華廣大幹部無論是在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中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還是在本職上工作中，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執行的基本上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⁴¹他們是革命的好幹部，對於他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他們有缺點和錯誤，但應允許他們改正，允許他們投入革命，不能把他們作為打擊對象。「那種把幹部一概打倒，把幹部估計得一團漆黑的『黑線上下連續論』、『幹部過去的工作是為法西斯賣力論』、文化革命後『幹部大換班論』就是『權力財產再分配』

38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28。

39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5。

40 同上，頁2。

41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18。

的思想，就是否認十七年來的偉大成就，就是妄圖『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觀點！」⁴²

六、如何對待或使用文革中的幹部？

這一問題既是兩派認識分歧和思想對立的前沿，更是決定兩派各自命運和實際鬥爭的制高點。

(1) 如何對待所謂犯錯誤的幹部

團派認為，犯錯誤的幹部，要進行徹底「亮相」，⁴³要徹底檢查、交代，要揭發檢舉，要使他們和走資派、「資反路線」、自己的錯誤劃清界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即「三劃一站」），要到群眾中去，要在階級鬥爭的蓋子徹底揭開之後才能解放。

四派認為，「對犯錯誤的幹部採取統統打倒的政策是錯誤的」。「在批判他們過去的錯誤時，往往把他們生活作風上的、一般世界觀的、性質不嚴重的錯誤、缺點誇大成系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簡單地扣以『大帽子』，並且不給犯錯誤幹部以說明或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更甚時，乃至加以體罰、武鬥，簡單地予以打擊、懲辦，而且似乎越狠越好，謂之曰『加強專政』。」⁴⁴「對廣大革命幹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只會為資

42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7。

43 「亮相」原是中國戲劇表演藝術的一個辭彙，這裏專指在文革初期，領導幹部或一般幹部以某種方式公開聲明自己對某造反派組織或某些重大問題以及對自己的「錯誤」所持有的態度。

44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12-13。

井岡山報

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井岡山報編輯部

新3號

1977年7月5日



社論 勇敢的保, 热情的帮, 大胆的用

干部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问题。严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方面煽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竭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斗、私、修、反的范围内，把运动引上歧途，打击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怎样才能真正的解放一大批？四一四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清华园的干部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校部二十八名干部在四一四总路线会议上的联名发言，尖锐地提出了这个严重问题。革命干部要平“黑”，要解放，要革命！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对待一大批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

对待一大批，我们要勇敢地保。广大革命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丰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对他们，我们要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保，只有保住他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胜利，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才有希望！

对待一大批，我们要热情地帮。帮，就是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严肃地指出犯错误的干部的思想和缺点，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走向第一线。帮的过程，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变错误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对待一大批，我们要大胆地用。我们不但要

敢于解放和使用广大革命的中下干部，还必须团结广大中上干部，包括那些犯过严重错误，但确实愿意改过的主要负责干部，真正来向第一线，还要敢于用他们，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领导核心和骨干。用错了也没什么，再改嘛！即使对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的要打倒，有的也可以半打倒，只要他们不是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就可以把他们从床底下拖出来，给他们工作，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有些人受到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宁“左”勿右地对待一大批。他们口头上也承认“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一落实到清华园，就什么“清华干部特殊论”、“黑线连续论”、“赫法西斯暴力”等等谬论百出，他们形而上学地以为，霸始所谓“干部堆”就是“彻底砸烂清华”，这实际上仍然是压制和打击一大批；他们不是对干部队伍作正确的阶级分析，而是错误地按照工作职务来分类，主要负责干部一定是当然的四类，这样用干部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观点！有宁“左”勿右思想的人，他们不能正确地对待一大批，他们不敢保，不敢帮，更不敢用，还自以为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其实是怕字当头的保守派！

有些人，满脑子私字在作怪，他们坦白地说：“我天天想权、权、权，生怕被别人夺去。”因此被罢了的“私”字和“权”字蒙了

双眼，迷了心窍，狠了心打击一大批。他们在里胡思乱想，自以为当个什么书记已经绰绰有余了，其实，没有一大批干部的彻底解放，没有一大批革命干部作为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和骨干，而由你们来独揽大权，这是肯定不行的！这么大的事，大家怎么能放心！你们今天独揽大权，明天就会被打倒。弄得不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有些人为了小集团的私利，为了压垮对方，为了把对方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一个人，一封信，一夜间便实用主义地硬把一些因为支持了对方，虽然犯过错误但决不是四类的要革命的干部打成地地道道。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极端错误的，根本违背毛主席思想的。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干部政策的，这是犯罪行为！

对于这种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决不在“不折腾”的幌子下，心安理得，不敢吭一声。我们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抛尽私心杂念，不怕怕“顶”边，敢于边大边，不怕走“极端”，敢于在被人门眼作现迷的问题上作新的探索。我们四一四战士要站在解放全人类的高度上，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上深刻批判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提出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把干部队伍中真正的关键人物，代表人物找出来，我们要大胆解放所谓被打倒而决不是真

(下转第4版)

四派《井岡山報》1967年7月5日新3號頭版發表的關於幹部問題的重要社論。

產階級敞開後門，最後自己也會被否定，被打倒。極『左』的口號會導致極右的結果」。⁴⁵

四派強調，對犯錯誤的幹部要「一看二幫」，「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先找出幹部隊伍中的關鍵人物，大膽解放那些被認為是「三類」而不是「四類」⁴⁶的幹部，給他們以適當的工作，在運動中使他們認識和改造錯誤，接受考驗和鍛煉。要使他們真正「亮相」而不假「亮相」，要自覺「亮相」而不逼迫「亮相」。總之，對於他們要「勇敢的保，熱情的幫，大膽的用」，「只有保住他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勝利」。⁴⁷

(2) 在文革運動中，誰為核心，誰來掌權？

團派斷言，清華大多數幹部不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都應降職使用或當老百姓，更不能讓走資派混進三結合機構，否則資本主義復辟隨時都是有可能的。⁴⁸「如果不正確對待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看不到解決清華幹部問題上的複雜性，艱巨性，……就有使文化大革命走過場的危險。」⁴⁹對此，就要敢於提拔年輕有為的小將到領導崗位上，需要破除各種迷信或框框的束縛，要大膽地提拔地位低的左派幹部到領導崗位，使他們掌實權，成為核心。⁵⁰「我們依靠的是徹底砸爛舊清

- 45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0。
- 46 中共中央1966年8月8日關於文革的決定即「十六條」中對幹部的劃分。「三類」為「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四類」為「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
- 47 《井岡山報》，1967年7月5日，新3號。
- 48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4。
- 49 《井岡山》，1967年4月18日，第36期。
- 50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1。

華、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幹部、革命工人和革命學生。」

四派斷言，解放和大膽使用幹部，關係到建立一個甚麼樣的政權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沒有大批革命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紅衛兵小將奪得的權就有可能喪失，因為革命小將自身有很多缺陷。革命小將要勇於讓賢，單純的紅衛兵掌權是不可能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大膽使用幹部就必須使革命小將讓權、放權，這樣一大批黨的好幹部必須讓他們在各級領導中發揮核心作用或骨幹作用，讓他們擔負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掌好權、用好權的重任。敢不敢讓權，這是對紅衛兵小將的一個考驗。你若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就必然把革命政權當成私有財產，把解放、使用幹部看作是復辟資本主義。因而，解放、使用幹部就應該使他們有職有權，不能老是對他們不放心、不相信、不稱心，把他們當作陪襯。其實，沒有一大片幹部的徹底解放，沒有一大批革命幹部作為權力機構的領導核心和骨幹，而由團派來獨攬大權，這肯定是行不通的。⁵¹

(3) 如何對待「幹部堆」？

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一些中、基層幹部為了擺脫被冷落或遭打擊的困境，為了回應、參與文革，自己起來，組成以幹部為清一色成份的一些「戰鬥組」，這些被稱為「幹部堆」。隨著文革的進行，這類「幹部堆」產生著較大的政治能量和思想影響，並在日後成為四派的骨幹力量。

51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9。

團派呼籲，「幹部堆」必須解散！解散「幹部堆」就是改變幹群關係，使幹部深入到群眾中去，「就是徹底砸爛舊清華修正主義罪惡統治，就是剷除劉鄧黑司令部在全國的反動社會基礎，就是剷除蘇修在全世界的流毒與黑根！」解散「幹部堆」，意味著在文革的烈火中把「等級制度、幹部特權、奴隸主義、官老爺作風、人浮於事的官僚機構等等」舊東西燒得乾乾淨淨。「根本杜絕幹群關係的對立，閃耀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幹部新制度必將誕生，這就是解散幹部堆的巨大意義！」⁵²

四派指出，「砸爛舊制度必須通過解散幹部堆才能實現」的提法是非常錯誤的，不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而只用幹群關係去對待「幹部堆」問題也是不值一駁的。正如不同階級的人是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不同立場、不同政治下的幹部與群眾不可能走到一起。「革命幹部必須政治掛帥地到群眾中去」。若使幹部脫離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即使解散了「幹部堆」，也不可能真正使幹部到群眾中來，更不可能砸爛舊制度。⁵³

(4) 是搞「批幹運動」，還是為幹部「平黑」、「平反」？

團派著文闡述，「毛主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僅對幹部，而且也是對黨員團員的大審查大考驗。』毛主席還說：『全國勝利後，我們是幹部在群眾中受冷落……有些脫離群眾了』。『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變過來』。毛主席

52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35。

53 同上，頁14。

又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群眾發動起來，甚麼壞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這次大革命是個大批判運動，對全國、全黨是個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於幹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不僅「革命的群眾批幹運動天然合理」，而且只有大規模的「批幹運動」，才能揪出壞人，才能衝擊廣大幹部，使之出一身大汗，犯錯誤的得到教育，走到危險邊緣的得到改造，才能達到文革的目的。⁵⁴而「否定批幹運動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⁵⁵「今後的文化大革命，大約都會伴隨一場群眾批幹運動」。⁵⁶

四派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奮鬥目標絕不是自身的解放，而是全人類的解放。革命小將應該理解革命幹部被打成黑幫時要求解放的心情，去解放被「資反路線」打擊、迫害的幹部，為他們「平黑」、「平反」。四派提出建議：1、取消對幹部所實行的專政措施，給他們以人身自由；2、給幹部參加運動的權利，允許他們用「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3、吸收幹部參加合適的工作及一般的群眾會

54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5-16。

55 同上，頁18。

56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18。

議；4、對幹部的錯誤進行說理批判，允許他們發表不同意見，自行辯論；5、給幹部以選舉權、被選舉權。⁵⁷

(5) 「上揪下掃，除惡務盡」，還是大膽解放、大膽使用？

「紅教聯」提出，「上揪」就是揪到「資反路線」的根子，「不僅要揪出清華園的政治扒手，還要揪出他們的後台老闆！」「下掃」就是「掃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會基礎，掃掉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在上面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得以存在，是離不開他們的基礎的，這個基礎除了老的資產階級分子，地富反壞右，還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特別是其中大大小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他們最重要的支柱。我們不能為他們以『群眾』、『學生』的面目出現而看不清本質，這一小撮人已不屬於群眾的範疇，他們是群眾的敵人，我們就是要掃，而且要掃除乾淨！」⁵⁸

四派指出，我們要集中力量，揪出要害，把矛頭對準「資反路線」，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走資派、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不是廣大的黨員、幹部。「我們提議解放我校的所有原當權派，因為目前除蔣南翔等極少數幾個人大家認為已是定性黑幫外，其餘的絕大多數原當權派是否黑幫並沒有定性，暫時的大解放有利於我們在鬥爭中打得更準、打得更狠，打活老虎，更好地鍛煉人」。⁵⁹同時他們還認為，絕大多數的基層幹部都是好的，都可通過檢查而過關。

57 同上，頁13。

58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27。

59 同上，頁7。

七、如何評價「五十天」(1966年6月底到8月初)與「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5月)之關係？

這一問題關係到對文革的對象和任務的不同理解，也關係到對文革與文革前的「十七年歷史」之關係的不同評價。

團派引用江青1967年11月12日的一次講話「不能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斥責四派用修正主義手法篡改江青的講話，把它改換成「不要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團派強調，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十七年」的反革命路線，而四派害怕否定這些東西，所以他們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來代替「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實質上就是肯定「十七年」。〈五·一六通知〉已說得很清楚，文革的目標主要是整一小撮走資派，而四派卻來了個「兩小撮論」。實際上，地富反壞右跟走資派的利益是一致的。地富反壞右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就是一小撮走資派，而四派叫嚷要抓兩小撮，結果在學校打擊了一大片，攪亂了階級陣線，模糊了文革的主要敵人。

四派指出，「五十天」的反動路線以及路線鬥爭是「十七年」的反動路線以及路線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決不能割斷歷史。「五十天」與「十七年」的關係是辯證的，對於「十七年」也要一分为二。既有人利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即包庇「十七年」的反動路線，更有人利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即否定「十七年」的成績，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然，有包庇必然有否定。包庇「十七年」的反動路線就必然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線，二者是一致的。四派堅信，資產階級分子絕不會因為他「五十天」內的造反而變成「左派」，而革命幹部也絕不會因為他「五十天」內犯錯誤而變成「右派」。總之，階級陣線及政治關係是基本不變的。⁶⁰

60 《井岡山報》，1967年12月7日，新21號。

八、有無「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這個問題是由傾向團派的個別原清華中層幹部提出的。此論提出的最初意圖是為了切中四派幹部政策的「要害」乃至整個清華幹部問題的「要害」。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清華文革前十七年的評價、對清華教師隊伍和幹部隊伍的評價等問題。

團派認為，這個問題還涉及到對毛主席所講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含義的理解。「在我國確實存在著產生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可能性和現實性」。⁶¹因為，既有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作用，又有家庭及社會習慣勢力的影響，更主要的是走資派的拉攏，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出現就不可避免。新、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不同界定在於前者是新社會即1949年後產生的，後者是舊社會中即1949年以前產生的。團派指出，教育界及舊清華是新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聯合專政，在舊清華是以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主。不管是新的還是老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在教育界及舊清華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中主要起「參謀」與「執行」的雙重作用。其中，儘管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作用不可低估或不可輕視，但他們人數少，威信低，在政治上販賣修正主義的本領不高，還不能借著黨的名義來招搖撞騙。相比之下，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就沒有這些弱點。他們有政治資本，有權威，已遍佈全校各單位，形成一支龐大的隊伍即特權階層，許多事情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辦理。他們善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具有「紅皮白心蘿蔔」的特點。不同於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實力派，是走資派的主要依靠力量。團派強調，

61 《井岡山》，1967年10月19日，第91期。

儘管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般地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但誰若要包庇他們，誰就是包庇「十七年」，就是反對砸爛舊清華，就是間接地包庇走資派。⁶²

四派批駁道，團派提出「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論」，提出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比老教授更壞、更危險，提出老教授有職無權、有鬼無害，是紙老虎，就是全盤否定「十七年」來工作中的成績，就是露骨地包庇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露骨地包庇「十七年」的反動路線。此論模糊了走資派與革命幹部之間的清晰界限，把矛頭不是指向走資派和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而是指向廣大幹部、黨員，致使一些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格外活躍甚至非常猖狂。「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論」不過是極左思潮的新貨色。⁶³四派不僅提出此論在邏輯上不成立，而且也不承認有「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存在，痛加斥責團派此論所包含的「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更加危險的論調。

九、如何評價文革群眾運動？

文革的一條重要原則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唯有進行群眾運動，文革才能成其為文革。然而，兩派對群眾運動的評價則大相逕庭。

四派指出，對於群眾運動，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在於「階級分析」還是「極左的歌頌」、「全民式的歌頌」，是「引導」還是「放任自流」。「在任何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到來之

62 《井岡山》，1967年10月19日，第91期。

63 《井岡山報》，1967年12月1日，新20號。

前，一切馬列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區別在哪兒呢？區分在於是否用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去作調查研究，去作階級分析，從而對群眾的階級、階級力量，作一個嚴格的客觀估計，以便準確地、最勇敢地站在未來的群眾運動面前去領導群眾。」⁶⁴事實證明，紅衛兵群眾運動在全國各地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紅衛兵小將衝擊各省市，不是依靠、團結當地廣大群眾，而且對犯錯誤的幹部也不問青紅皂白，炮轟一切領導幹部。⁶⁵群眾運動「沒有黨的領導」，「打倒一切」，「執行了一條左的關門主義路線」。群眾運動的這種「左傾思潮是目前革命隊伍內部的主要危險」，照此下去，「最後必然導致和蘇聯肅反擴大化的類似錯誤。」⁶⁶另一方面，文革群眾運動的出現和發展勢必會使一些有嚴重歷史問題或「政治劣跡」的人以「痞子」自居，以自己過去受壓迫受打擊為名起來造反，叫喊「痞子要掌權」，竭力把群眾運動扭轉成「痞子運動」來泄私憤，這類人傾向團派思潮，揮舞「流氓痞子掌權論」旗幟，妄圖顛倒乾坤，改寫歷史。⁶⁷

團派依據文革初期流行的「革命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為文革群眾運動大唱讚歌，他們強調：勢如天崩地裂的群眾運動，其成就是輝煌的，其「主流是適合社會發展的，天然合理的體現了人民群眾巨大的歷史主動性」。正是由於群眾運動，文革才會如此廣泛、深刻和重大。文革群眾運動自始就不免出現許多過

64 《井岡山》，1968年7月5日，第151期。

65 《井岡山》，1968年4月12日，第132、133期合刊。

66 《井岡山》，1968年4月19日，第134期。

67 《井岡山》，1968年4月12日，第132、133期合刊。

67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1-3。

激和偏差，像文革「這樣破天荒第一次、沒有任何經驗可借鑒的幾億群眾投入的最偉大最深刻的革命運動，出現了一些『左』的偏差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如果依了那類散發著庸人和市儈氣息的「群眾運動設計師」的設計，「『左』的偏差固然避免了，整個文化大革命也根本沒有了。」⁶⁸

十、對於對方的看法

團派聲稱：四派廣大群眾是好的，是受蒙蔽的，但其領導核心和骨幹力量是文革中的一股右傾勢力、改良主義者和分裂主義者。在政治上，四派在文革「五大戰役」（反彭真，反劉少奇、鄧小平，反「二月逆流」，反王力、關鋒、戚本禹，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中「都毫無例外地站錯了隊」。⁶⁹四派包庇走資派，炮打陳伯達、謝富治，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組織上，儘管四派黨團員多，幹部多，貧下中農出身的多，畢業生多，但卻「嚴重不純」，既有過去校一級的當權派，又有一些叛徒，甚至「有黑手和黑後台操縱。」⁷⁰四派在幹部問題上保的多，革的少，甚至公開保「清華第二號走資派」劉冰，主張盡快解放、結合和使用他。四派不肯徹底砸爛舊清華。在思想上，四派代表了文革中的修正主義。在理論上，四派堅持為「劉鄧招魂的理論」。⁷¹在歷史上，四派從文革一開始「就堅持了一條右

68 《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16-17。

69 《井岡山》，1968年5月21日，第138期。

70 同上

71 《井岡山》，1968年5月31日，第143、144期合刊。

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四派既是文革的右派，又是形「左」實右派。如果說在文革初期四派是「保皇派」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四派就成了文革的反對派⁷²以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托洛茨基匪幫」。⁷³總結四派的經歷，團派十分誇張地把四派稱為「蔣南翔鎮壓學生運動的黑打手、劉鄧工作組的僱傭軍、偽三臨⁷⁴的同盟軍、二月逆流派的急先鋒、武力屠殺革命人民的劊子手、雙手沾滿全國革命造反派鮮血的劉鄧消防隊」。⁷⁵「清華四一四成了全國最反動的、不可救藥的老保。」⁷⁶

四派聲稱：團派廣大群眾是好的，是受蒙蔽的，但其領導核心和骨幹力量代表了文革的一股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勢力。在歷史上，四派比團派先進、英勇和堅定。在組織上，團派隊伍比較複雜，有相當多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及其知識份子，痞子多，如在教師隊伍中，有許多歷史問題的人（國民黨員、三青團員、舊知識份子、老教授、民主人士等）倒向團派。在政治上，團派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黨的方針、政策，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戰友和群眾，對下採取「愚民政策」。團派炮打周恩來、康生，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團派打擊、迫害革命幹部，在外地做盡了壞事。團派自身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使他

72 《井岡山》，1968年5月21日，第138期。

73 《井岡山》，1968年5月31日，第143、144期合刊。

74 「三臨」指1966年8月之後到11月間，在清華大學出現的三個以高級幹部子女為主體的紅衛兵臨時權力領導機構。

75 《井岡山》，1968年6月10日，第146期。

76 《井岡山》，1968年6月28日，第149期。

全部的生活內容與形式都歸結為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看作社會主義發展的唯一動力同時也是唯一目的；其次，把社會的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的富裕、多樣等同於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寧可不要生產力的發展，寧可生活繼續貧窮，也要進行階級鬥爭；其三，以不擇手段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只要所謂鬥爭需要，便可使用從精神折磨到酷刑、從人身迫害到株連等一切非法的、非人道的手段」。⁷⁸在文革之前，階級鬥爭的觀念和運動已成為廣大群眾的心理和行為的一條主線。在一定意義上，文革的一切理論、觀點和主張，包括文革群眾的思潮，都是階級鬥爭理論的產物、變種或翻版。明確這一點，對於把握文革群眾思潮的形態和實質非常關鍵。

在我看來，儘管文革理論從根本上來說是「極端化的階級鬥爭理論」，但文革理論本身卻是一個非系統的、不嚴密的體系，它更多地是一個較鬆散、具有很大的內在矛盾的體系。文革理論主要由三個內容及相衍生的方面所構成：一是「階級鬥爭論」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二是「群眾運動論」及「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面專政論」；三是對領袖個人崇拜的心理及對領袖極權權威的應用。不過，這三個內容及衍生方面從未形成始終如一、完全契合的理論體系，而是更多地散見於黨的文件、報刊社論、首長講話、時事政策甚至鼓動口號中，特別是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和決策中。文革初期，群眾兩派對中央報刊和社論、首長講話，特別是對毛澤東每一指示和決策的極大關注和重視，恰好說明了文革理論對廣大群眾來說自始就不是完備的、確定的，而是隨著文革的實踐不斷建構、不斷修補，甚至是不

78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頁 16-17。

斷自我否定和自我異化，套用毛澤東愛用的一句話：「草鞋無樣，邊打邊像」。同樣，群眾兩派都熱衷於刻板油印或鉛印傳播中共中央有關負責人及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的諸多講話，特別是把毛澤東關於文革的具體指示或談話當成「最新指示」連夜宣傳。這些既表明了廣大群眾對文革理論的盲從和輕信，也表明了文革理論在廣大群眾中造成的短期效應和功利特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軍對峙、「敵我」分明的兩派群眾都能從文革理論固有的矛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一派的「批判的武器」，進而從事旨在打擊對方一派的「武器的批判」。文革實踐的一個極至就是群眾兩派之間既無真正的勝利者，也無徹底的失敗者，二者彼此消解，同歸於盡。清華文革兩派對文革理論的不同闡釋，更重要的是不同應用，充分地顯示出文革群眾運動以及群眾組織特有的認識背景、理論底蘊和思潮氛圍。

從「階級鬥爭論」來看，在文革前夕已廣泛流行和強化灌輸的「極端化的階級鬥爭理論」，實際上是把人們的不同思想、黨內的不同意見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歸結為階級關係及階級鬥爭的關係。這些做法既可以把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挫折和失敗歸因於敵對的階級鬥爭，也是在「反右鬥爭」、「四清」一類的政治運動中整合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依據之一，更可為即將到來的政治運動如文革提供某些從觀念到輿論的正統性所作的準備。而文革時期的「階級鬥爭論」，與歷史上氾濫過的並且造成種種災難的「種族迫害論」、「種姓歧視論」乃至「封建血統論」並沒有甚麼實質性的差別，都是把人的某種出身、地位或身份及特徵當成劃分人們高低、貴賤的標準，更有甚者，文革時期的「階級鬥爭論」甚至還把人們的言論、觀點、主張和思想以及文章、學歷、學問等等當成劃分人們身份及特徵的標準。

文革時期的「階級鬥爭論」在群眾兩派中演變成兩種「階級鬥爭心態」：一是「整人論」，二是「奪權論」。

「整人論」是把一切與自己不同的政治派別及政治個人當成敵對者，甚至當成「階級敵人」的心態及行徑；更為荒謬的是，即使沒有「敵人」，也要不斷地、人為地「製造」出「敵人」和「擴大」敵情，從而顯示出自己造反的權威性以及自己行為的正統性。實際上，這種「整人論」是對與自己不同見解的群眾或個人進行一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極端做法，它表現為迫害手段的極其殘酷，整治手段的極其惡毒，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群眾武鬥的血腥屠殺和慘無人道。與其說由文革「階級鬥爭論」而來的「整人論」是一種非人道的「害人論」，不如說它是一種獸性的法西斯論。例如，在百日大武鬥之前和之際，團派為了給其大武鬥尋找藉口，為了給其武鬥隊伍壯威打氣，效法當年毛澤東撰寫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幾批材料按語的口吻和風格，拋出了幾批所謂關於原清華中層幹部羅征啟、文學宓、李康、饒慰慈反革命案的材料，對這些幹部以及與之相關的人實行了令人髮指、難以言狀的暴行，此案造了3人死亡，20多人被打傷或被致殘。四派對多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團派群眾和少數幹部的關押，也是嚴酷迫害，大加摧殘。

「奪權論」也可稱之為「唯權力論」，它是文革兩派群眾把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和直接動因當成為政權而戰的心態及行徑。既然階級鬥爭在文革之始就是政權之爭，就是奪權鬥爭，那麼兩派群眾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為了佔有更大的權力，都會不遺餘力地把階級鬥爭實用為戰勝與己對立的群眾派別的鬥爭，都會庸俗地以「階級鬥爭」來固守自己的急功近利。因而，這就不難理解在清華文革初期「階級鬥爭論」最廣大的運用者們——兩派群眾那裏，為甚麼會有「階級鬥爭論」的兩個不同「文本」：一是

以四派為代表的「階級關係不變論」，二是以團派為代表的「階級關係大翻個兒論」。前者基本上沿襲了文革前十七年「階級鬥爭論」的傳統，後者卻賦予了文革「階級鬥爭論」嶄新的內容。這兩種「階級鬥爭論」在理論上的貧乏、淺薄並不掩飾它們各自所體現的文革不同群眾利益的深切，也並不遮蔽「階級鬥爭論」對於文革時期的不同群眾來說所具有的歧義、變異和多元的取向。清華兩派的兩種「階級鬥爭論」在理論上的較量和在思潮上的交鋒，不可避免地導向行動中的武鬥衝突，其結果只能是宣告了「階級鬥爭論」在清華園的又一次劣跡，同時，也凸顯出在同一種意識形態觀念內的廝殺是何等的激烈、何等的慘重。

從「階級鬥爭論」衍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只不過是把文革之類的「繼續革命」具體地限定為「革命的革命」，或曰「對革命進行革命」。確切地說，文革作為一場新的、獨特的階級鬥爭或「革命」，已根本不是甚麼社會革命或政治革命，而是不斷地突出為其本義的「文化革命」，即在文學、藝術、教育、哲學、歷史學等思想界和學術界以及現行意識形態領域所進行的「革命」，用毛澤東於1967年初姚文元在發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時所加的一段話來說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⁷⁹「所以當社會革命的思想越來越不為社會所允許時，最後剩下的就只有世界觀的改造了，於是文化大革命也就從一場本來意義上的社會革命還原為更為本來的文化革命的意義，即思想革命、靈魂革命、世界觀革命」。⁸⁰

79 《紅旗》雜誌，北京，1967年第1期，頁36。

80 陳家琪：〈執著與迷惘〉，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318。

因而，「繼續革命論」實質上已使文革轉換成觸及人們皮肉或觸及人們靈魂的「精神革命論」。這也是使文革的「階級鬥爭論」帶有相當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虛幻性，或是在群眾心理方面造成高度緊張、壓抑甚至變態的普遍恐懼；或是給社會生活帶來幾乎人人自畏、自危或異化的重重困境；或是形成以筆為刀，以言為繩，重治嚴懲「思想罪」的高壓局面；或是導致整人者被整、惡性循環、仇難求和的荒唐結局。

從「群眾運動論」來看，文革的奧秘在於：只有發動全民置身於其中，文革才成其為文革，文革才會形成全國、全民和全社會的氣勢、威力和效應。文革與以往過去的群眾政治運動的最大不同就是文革的觸角和鋒芒已涉及到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職業的各種群眾的生活。不同以往群眾政治運動只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而已，文革幾乎是全民無一遺漏的「大革命」。只有全民動員起來，行動起來，「革命」起來，文革方可進行。

從「群眾運動論」衍生出的「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面專政論」，既可視為「繼續革命論」必然的邏輯結論，也可看作在文革實踐中轉換成的「群眾專政論」。這種「全面專政論」不僅僅是對「階級敵人」的政治專政及人身「專政」，而且就其「全面」而言，它也是對全體群眾生活的專政，表現為由「破四舊、立四新」的紅色恐怖狂潮為代表的從文學、藝術、教育、道德等等到傳統、風俗、習慣、心理、思想乃至話語、衣著、風尚、舉止等等的「全面專政」。就其「徹底」而言，這種「全面專政論」使廣大群眾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由「老紅衛兵」變為「保皇派」，由告密者、監視者變為受害者、同情者，由參與者變為逍遙派，由狂熱分子變為反叛人士，由「紅五類」變為「狗崽子」，由「革命派」變為「走資派」，一句話，由專政者變為被專政者。反過來說也一樣，由「黑五類」變為造反派，由「右派」變

為「左派」，由被迫受害者變為迫害者……不一而足。因此，「文革中的各派學生像瘋狗追逐的人群，跑慢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險。於是你追我趕，你用紙帽，我用鐵帽；你用火燒，我喊打倒；你說一個，我說一堆……甚麼是非、原則、政策，統統失去了約束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⁸¹

文革彷彿成為一場全民進行「比賽革命的革命」。到頭來，「全面專政論」演變為「群眾專政論」，群眾既是「群眾專政」的主體，更是「群眾專政」的對象。「群眾專政」異化為群眾被專政，正如革命往往吞噬革命者一樣，「全面專政論」最終吞噬的只能是群眾本身。

從對領袖個人崇拜的心理意識來看，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演變為對毛澤東個人的迷信，實際上是廣大群眾在文革時期的一種依賴心理。按照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觀點，宗教信仰的基礎在於人們內心的依賴感。由於廣大群眾各自內心的相對分散和懦弱，他們必須借助毛澤東的權威而外化出他們自身的要求和利益，來延伸和擴展他們自己的情感或心理。文革特定時期的個人迷信的根據之一在於：廣大群眾可以從毛澤東那裏找到或獲得千差萬別而難於統一的「依賴感」，而毛澤東的文革時期無疑是毛澤東一生最為矛盾甚至自我分裂的時期。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系列激進而又極端的主張和決策，與他在此時所採取的一系列相對溫和而又漸進的調整、修正措施相比，形成鮮明的、自相矛盾的對照，而這一點輻射到文革不同的群眾之中又會形成無比巨大的反差。

81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五冊，頁305。

例如，正是毛澤東本人在1967年1月通過上海一月奪權發出全國性的奪權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⁸²這一號召不但極大地鼓動了廣大群眾的造反活動及造反精神，而且使群眾中的那些激進分子或極端造反派分子把文革理解成一場「改朝換代」似的大革命。自1967年1月後的20個月裏的全國性奪權鬥爭事實，不但證明了這種理解的現實合理性，而且從清華兩派爭論文革是否是一場「大翻個兒」中也證明了這種理解的廣泛而又深厚的群眾性。以這種理解為基礎而萌發和形成的群眾思潮，很自然地把文革區別於不同於文革前十七年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把文革看成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獨樹一幟的「革命」，即這場「革命」就是「『革』那些革過命的人的命」，換言之，是「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和新中國自我奪權的革命」。

經過毛澤東審閱總結奪權鬥爭經驗的一篇社論中聲稱：「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⁸³這就赤裸裸地把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⁸⁴而必須徹底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論斷，與文革初期除中央和軍隊之外的全國各地各級奪權鬥爭，混為一談。不僅如此，這也給日

82 《紅旗》雜誌評論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載《紅旗》雜誌，北京，1967年第2期，頁24。

83 《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載《紅旗》雜誌，北京，1967年第3期，頁16。

8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卷，頁372。

後的文革留下一個潛在的危機，即空缺下來的各地各級黨政機構權力職位可由哪些群眾去「充填」？從群眾方面來講，恰恰是群眾派別之間的爭鬥使這種所謂打碎舊的國家原則成為不值一提的謬論。

又是毛澤東本人在1967年2月12日召見張春橋、姚文元時指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⁸⁵並且提出了包括一些原有幹部在內的文革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組成的「三結合」原則。這是毛澤東對毛澤東本人的文革奪權戰略的一個重大修正。毛澤東不僅明確地意識到，他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及國家政權不能從根本上「大翻個兒」，而且他所領導的並且跟隨他多年的幹部隊伍不能被拋棄或被否定。為了給文革提出一個可行的根據，「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在理論上又造成極為寬泛的解釋餘地，在實踐中又帶來極大的混亂狀況。問題在於：就「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部分」而言，由誰來確定？是哪些「部分」？標準何在？對廣大群眾來講，具體地對具有不同利益、背景和主張的群眾派別來講，這種「部分」的性質和範圍，這種「部分」的意義和內容，更是見仁見智，各取所需了。毛澤東只是籠統地講「部分」改善，這不能不使文革理論的取向和文革實踐的趨勢帶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不能不使廣大群眾的文革心理、文革意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某些文革思潮帶有隨意的或隨機的特點。具體到文革每一單位（或部門）和地區而言，這一「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

85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21。

停留在字面上或口頭上的理解和領會，而是對於幾乎所有置身於文革洪流之中的群眾和幹部以及造反派和保守派等等來說，有著廣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活生生的現實內容。

到了1968年3月，面對著由於1967年夏季達到頂點的全國性極端的、激進的群眾運動狂潮所作的糾正以及對極「左」勢力的抑制而帶來的所謂「右傾翻案風」，毛澤東又一次給文革做出了戰略性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⁸⁶這一指示在1968年春天似乎又一次啟動了造反派激進群眾的狂熱勢頭，使全國許多單位或地區的造反派激進勢力在1968年春、夏、秋季孤注一擲地進行大武鬥，因為既然文革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在20世紀60年代的繼續，那麼文革群眾兩派的對立和衝突自然而然地被誇大成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生死決戰。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無疑又一次助燃了群眾兩派之間的內戰烈火。然而，必須再次提起的是，以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結束為契機，毛澤東對文革群眾大武鬥的「宣判」最終把群眾兩派的鬥爭送進了文革「歷史博物館」。這完全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他前幾個月發出的上述指示的自我否定。

綜上所述，從對領袖個人崇拜的心理所衍生出對領袖極權威的應用，也就理在其然，勢在必行。顯而易見，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系列主張、決策和部署等方面所出現的重大而深刻

86 《人民日報》1968年4月10日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熱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的矛盾，明顯而多樣的危機，不可能使毛澤東的權威呈現為始終如一的態勢，也不可能使這種權威在其效應性上或在其持續性上展示出完整，而是自文革一開始，廣大不同階層的群眾就不斷依據自身的生活來分解著這種權威，基於自己的利益不斷演變這種權威，從而使這種在中國歷史上幾乎空前絕後的權威在浩如大海、勢如狂瀾的文革群眾之中從未統一或整合過，還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即以毛澤東的此種權威來化解甚至來「抵消」毛澤東的其他權威。

不管怎樣，文革初期，至少是在現實上，文革廣大群眾依附和應用毛澤東的權威，是他們力爭使自身的心理和行為達到合理性並具有權威性的唯一的、終極的理由。正如親身經歷了文革當年風雨而大徹大悟的陳家琪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正是毛澤東，也只有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才給從日常生活到升學、成家、提幹、入黨，乃至生老病死等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感受到社會之不公正的下層小人物提供了一個至少從理論上說，具有某種『正當性』的『鬥垮當權派』的可能。」「……最早領會到毛澤東的意思是要『鬥垮走資派』的，多為那些最明顯地感受到社會不公正（廣義地理解為懷才不遇，狹義地理解為出身不好）的學生。要是抽象地講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比看誰與毛主席的階級感情深，『黑五類』及其子女斷然不敢出頭露面；要是具體到這場文化大革命，看誰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體會深，比看誰更切身地感受到毛主席的拯救與恩情，『黑五類』及其子女卻萬死不辭」。⁸⁷

87 陳家琪：〈執著與迷惘〉，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314-15。

從清華兩派所表現出的文革群眾思潮可以看出，團派思潮是文革造反派的思潮或者說是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思潮，它體現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群眾的正統思潮，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被毛澤東認同的思潮。團派思潮在全國許多地區或許多單位的造反派群眾思潮中是常見不鮮的，幾乎沒有甚麼新的「獨創」或「個性」，遠沒有幾個頗為著名的造反派極端思潮（如「湖南『省無聯』思潮」）那樣有代表性和影響力。

團派思潮即造反派的一般思潮，最符合原本意義上的文革理論和文革思想，相比較於其他諸多的造反派極端思潮而言，特別是相比較於與其針鋒相對而勢不兩立的「四一四思潮」而言，團派思潮更多地是一種文革「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意義上的群眾性思潮。這種思潮儘管在文革諸多思潮中具有的典型性不夠，但它擁有較為廣大而又眾多的群眾，最主要的是，它與文革歷史源淵的聯繫遠遠密切於其他文革思潮，因而，它與文革的融合和內聚也遠遠高於其他文革思潮。所以，團派思潮是文革初期的一種主流思潮。這裏要指出的是團派思潮所包含的兩種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根據文革的「階級鬥爭論」及「繼續革命論」，把文革的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派，把文革鬥爭的重心定在奪回所謂被各級走資派篡奪黨和國家的那一部分權力，把走資派看成是所謂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以及新、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的總代表，把走資派與階級敵人相提並論。這種傾向反映了許多造反派群眾迫切要求在文革中獲得某種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更大的政治權利，強烈不滿於文革前社會中存在的種種特權，例如，這些群眾反對幹部子女在就學、升遷、就業等方面的特權，反對幹部子女在「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方面的優越感和優先權。文革

開始不久，許多造反派群眾就針對文革前一些幹部脫離群眾、作風粗暴並利用一些政治運動打擊或傷害群眾的做法，大加報復。這些群眾還以遠比文革前幹部以及幹部所信賴的有關群眾更為激進甚至更為「革命」的做法，直接否定了文革前和文革開始時根據人們的出身、家庭和與幹部的遠近親疏來劃分所謂先進群眾與落後群眾的做法。這種傾向更多地代表了團派思潮的群眾性的特徵。

第二種傾向主要是根據文革理論中的社會衝突思想，把文革的實踐看成是近於變革整個社會制度的「大革命」，或如四派斥責的是「大翻個兒」。這種傾向更多的是從革命政治及社會衝突的角度來回應並作用於文革，來反對走資派。這種傾向提出了更多的平等要求和平等權利，以其平均主義的特徵反對特權，否定文革前多次政治運動的過激做法以及一些幹部的高壓行徑，尤其是反對文革前和文革開始時一些群眾所受到的種種無形的或有形的政治壓力和政治待遇。這種傾向的著眼點主要放在黨內領導層的鬥爭和清華校內 1949 年後的十七年變遷，注重於把黨內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轉移為社會階級鬥爭和階層鬥爭，同樣地熱衷於把社會階級鬥爭抑或階層鬥爭轉移為黨內路線鬥爭。這種傾向對於平等的要求和理解是多種多樣的。它既反對長期流行的不是從「業務能力」而是從「思想表現」或「思想狀況」來把師生員工加以「思想排隊」，而潛在地把人們的地位和身份劃成三六九等的工作做法，又反對文革前清華歷史上積澱下來的一些個人發展、工作待遇、生活狀況等不平等、不公正的現象，還反對清華教師隊伍中過於注重是否是清華學生出身、是否是黨員團員、是否是幹部或骨幹的習慣做法。這種傾向在「紅教聯」那裏得到集中的反映。這種傾向更多地代表了團派思潮的功利性的特徵。

適時的內心共鳴，並成為他們看待文革和運作文革的思想借鑒之一。另外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四一四思潮」的出現比百日大武鬥早了大半年多。由此可見，四派與團派各自對文革的獨特「貢獻」可謂平分秋色，難分仲伯。

因為無論從文革群眾鬥爭的歷史來講，還是後人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來看，「四一四思潮」都是清華文革對整個文革的一份獨特的思潮「貢獻」。相比較於在整個文革中全國性的或地區性的或階段性的具有代表意義的十餘種群眾思潮而言，「四一四思潮」獨樹一幟，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統觀念和正統秩序來批評、懷疑並進而大有可能否定文革的群眾思潮。因為，在發表〈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的前後，其作者周泉纓多次在有關會議上說：「思潮就是路線！」，「思潮鬥爭就是司令部的鬥爭。」⁸⁸

周泉纓本人出身於一個軍官家庭。周泉纓的父親原為傅作義將軍部隊的一名團長，跟隨傅作義將軍「起義」，後於50年代初被關押。周泉纓及弟妹隨母親到新疆。作為小學教師的母親和篤信佛教的外祖母，含辛茹苦，把周泉纓及弟妹養大成人。周泉纓考入清華後，依然保持愛思考、善論辯的習性。文革開始後不久，周泉纓多次到外地串聯、調查，特別是在考察了河南等地的文革形勢及群眾運動後，他逐漸形成了後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的有關見解。因為寫作和發表〈四一四思潮必勝〉等文章和大字報，周泉纓被團派群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受到十個多月的關押。「七·二七事件」的次日，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周泉纓很快被釋放，回清華不久畢業，參加工作。文革

88 清華大學井冈山聯合總部《井冈志》編（主辦單位名稱下略）：《把反革命分子周泉纓揪出來示眾——反革命分子周泉纓簡介》，頁4。

結束後，周泉纓因不滿於當時中國領導人華國鋒的某些政策，貼出大字報加以批評，被有關部門逮捕，入獄一年多。釋放後，周泉纓從事過多種工作，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在湖北等地曾作為一家著名的公司成員經商，但屢遭挫折。周泉纓現已退休，家居廣州，潛心從事佛教研究，時常有論著發表。

「四一四思潮」興起的背景主要在於：面對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帶來的震動和引起的局勢變化；8月，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等人垮台，戚本禹等人也相繼失勢；9月8日，「無產階級司令部」借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把「五·一六思潮」的「罪狀」正式公佈出來，並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這些都極大地激發了富有思考和疑慮的四派群眾去尋找文革運動之所以走入極「左」泥潭的線索和答案，去試圖挖出極「左」勢力的後台老闆。〈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的作者周泉纓，借團派報刊《井冈山》1967年6月22日第59、60期上重新刊印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於9月4日貼出題為〈重炮猛轟篡奪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凱式的人物——陶鑄……〉的大字報，而陶鑄早於九個月前已被打倒；9月17日，為了明白無誤，周泉纓又貼出大字報，題為〈炮打篡奪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袁世凱——評陶鑄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這裏已指明陳伯達是當今文革的「袁世凱」。這兩篇大字報進一步發揮了〈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的思想，抨擊陳伯達把文革群眾運動引向了歧途。

前一大字報列舉了文革中「袁世凱式的人物」的六大特徵：一是千方百計地「貶低毛主席、貶低林副主席，相應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他們的目的無非是企圖在人們的心中造成一種假像，他們領導文化大革命是具體的、真切的，而

毛主席、林副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是抽象的、空虛的」；二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期存在著一股炮打總理的妖風，這股妖風非常頑強，無論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壓不去，這就是袁世凱式的人物耍的由他們散佈『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是不懷疑自己、打倒自己，只打倒別人」；三是「大搞壟斷，積極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奪權」；四是「抹煞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裝出一副熱情歌頌群眾運動的樣子，放縱小資產階級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氾濫，從而把群眾運動引向歧途，……以此實現其『小資產階級當權，大資產階級上台』的陰謀」；五是「極高的反革命兩面手法——以極『左』的口號來實現其極右的目的」；六是「登峰造極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機智』」。這類人物的目的，不但企圖壟斷文革的大權以及一些主要報刊的權，「而且還企圖壟斷外交權，企圖壟斷行政權，甚至企圖控制總理的常委大權」。更有甚者，還要奪軍權，「搞垮無產階級的軍隊」，搞亂階級陣線，去「迎合地富反壞右的『權力再分配』的強烈欲望。」⁸⁹〈四一四思潮必勝〉的作者炮打陳伯達，同時也是對造反派思潮的有力抨擊。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一點上，四派大大借助了毛澤東、中共中央在1967年夏末秋初對文革極「左」狂瀾的遏制所帶來的契機，這也致使團派在論戰之中一時忙於招架。江青在周泉纓大字報貼出的次日就斥責周泉纓是「小丑」；陳伯達說：「周泉纓上綱那麼高，說明他不簡單」；謝富治明令：對周泉纓「要抓起來」，「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⁹⁰

89 上述引文出自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通訊社編：《大字報選》，1967年9月15日，第034期。

90 《把反革命分子周泉纓揪出來示眾——反革命分子周泉纓簡介》，頁8。

團派對〈四一四思潮必勝〉的批判，連篇累牘，不勝其數。其中，在團派前哨廣播台小報《專刊01》（1967年8月18日）上轉載該文時所加的「編者按」中的批判最有代表性：「……文章對中央文革充滿了滿腹的牢騷與強烈的不滿，揚言要打光媚眉和軟弱，實際上是反對中央文革，是號召聯動分子再度起來反對中央文革；揚言『困難的形勢迫使我們更加獨立自主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就是獨立於中央文革之外，獨立於毛澤東思想之外，而發明另一套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理論」。從這個言過其辭的批判中，多少反映出「四一四思潮」的異端性。

〈四一四思潮必勝〉以及該文作者的另外兩篇大字報，加上團派報刊從反面的批判「推動」，使「四一四思潮」給文革全國性的如火如荼的群眾派別鬥爭之勢增添了某種助燃劑，特別是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召見北京紅衛兵領袖時，他直接點名和批評「四一四思潮」為「右」的思潮，這大大增加了「四一四思潮」在全國範圍乃至整個文革的知名度。在1967年夏末至1968年夏末期間，隨著「四一四思潮」傳播的空間和時間的加大加長，也由於既來自保守派群眾的「消化」和應用，又來自造反派群眾的註解和批判，「四一四思潮」成為有四大內容的著名「右傾」思潮。下面將其主要內容逐一做出簡要評析。

一、「階級關係不變論」

文革正統理論把走資派、修正主義者等列入「階級敵人」，具體來說，列入文革的主要對象。對此，「四一四思潮」並不直接否定，而是提出了文革如文革前十七年一樣的「階級關係不變」、「階級陣線不變」的論點，換言之，文革前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依然是文革的對象之一。儘管四派沒有擺脫極端化了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窠臼，但是它大大沖淡了文革正統理論矛頭

所指的對象，就有可能把文革當成完全如同文革前的政治運動是大搞重點在黨外的階級鬥爭。「四一四思潮」此論多多少少有維護四派之類的群眾在文革前與其他不同群眾鬥爭形成的既得利益之嫌，更有把過去的政治運動及誇大化的階級鬥爭加以固定之嫌。所以，四派認為，那些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以及文革前在政治上受到打擊或遭遇挫折的人們，不能因為他們在文革的造反舉動或激進表現而改變自己的身份和改變自己的地位，這些人總是革命的對象。這一點，與文革時期的諸多極「左」思潮認定文革已造成了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大變動完全不同，表明文革群眾思潮的多元性。

二、「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論」

對於四派許多人來說，文革初期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始終有這樣一個現象為人們所不理解：為甚麼反蔣（指蔣南翔，——註）反工作組的時期，造反派裏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個人都認為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種解釋來說明這種現象的必然性。經過長時間的熱烈討論後，人們發現沒有一種站得住的、令人信服的解釋能說明這一點。而所謂哪裏壓迫最重，那裏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論顯然是缺乏階級分析的。於是人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疑問：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的標準？」⁹¹實際上，在井岡山兵團成立的最初數十天裏，其內部的、後來成為四派的有關群眾就提出：造反派不是革命派，造反派不能獨攬大權。「四一四思潮」列舉了包括團派在內的造反派的種種「過失」：團結不了廣大群眾，背

91 〈論造反派〉，載上海市上海中學編：《思潮集》，1968年。

棄了昔日的政治盟友；背離文革的初衷；混淆了階級關係和階級陣線，不分敵我，其內部人員成分複雜而嚴重不純；對文革的目的心懷不軌，投機取巧，妄圖另起爐灶，兜售私貨；大搞使社會制度及國家制度發生根本變化的「大翻個兒」行徑；大造「十七年」的反，為自己鳴冤叫屈；解決不了幹部問題；削弱「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衝擊解放軍；等等，所以，包括革命小將在內的造反派是不可能掌好權、用好權的。造反派中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造反派的旗號，混在革命隊伍中齊喊造反。他們不是把矛頭指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乘機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而那些人一般是出身於剝削階級」。⁹²

對此，在「四一四思潮」看來，只有像四派這樣的革命派才能夠坐江山。屆時，他們會對造反派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加以整肅，「用鐵的手腕打擊那些在革命中『露頭角』的壞分子和一切犯罪分子……」，以「無產階級的手腕捏碎」團派所代表的極「左」社會思潮。⁹³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四派提出的一個口號：「決不讓老保翻天，也不讓極『左』翻船。」四派有關幹部在印發〈四一四思潮必勝〉的編者按中作了結論：「團派極左思潮終將被衝垮，比較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四一四思潮』必將在全國取得勝利。」⁹⁴

三、「文化大革命必須修整、鞏固、妥協論」

「四一四思潮」認為，文革到了1967年7月之後，應進入「收」的階段，「修整、鞏固、妥協是必要的」，這是周泉纓於

92 〈論造反派〉，載上海市上海中學編：《思潮集》，1968年。

93 《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專刊。

94 同上

1967年10月中旬被團派一些群眾扭送北京市公安局之前，在與四派一些人長時間的座談中提出的。四派這些人為了反擊團派群眾扭送周泉纓的做法，發表長達近百張的大字報，題為〈和周泉纓談話紀要〉。周泉纓含蓄地批評了文革已到了「人跑長了要昏倒的，發動機工作長了要拉缸、斷裂，到這種局面被動時，再來修整補充，就已經違背規律了」的局面。周泉纓多次舉出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的代表人物及事例，反復說明，為避免「一個朝代要垮台」，封建王朝及其統治者在其大業上所做的「修整、鞏固、妥協」是必要的，從而達到其王朝「中朝復興或朝代延長」。反面的事例也說明了這點，「秦始皇在封建制度剛剛完善時期，他殘暴過急而不修正、妥協，十年就垮了」。⁹⁵周泉纓道出的「四一四思潮」此論，毫無疑問，含沙射影地批評毛澤東及其所發動、領導的文革之狀況。

四、「河歸舊道『十七年』論」

清華文革兩派鬥爭的焦點之一在於如何評價文革前的十七年歷史。文革的悖論之一在於部分地否定文革前十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至少是斷定教育界等領域存在著資產階級專政，因而文革才顯得有此必要。否定「十七年」還是肯定「十七年」，這是團派與四派之關係的一個死結，也是全國各地的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關係糾紛的一個頑症。「否定十七年」一直貫穿於整個清華文革的過程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文革也是文革與文革前十七年的一場較量。

95 〈和周泉纓談話紀要〉，轉引自宋永毅、孫大進編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73-89。

在四派看來，團派一些人對「十七年」的態度和行徑就是「砸！砸！砸！大翻個派真是砸紅了眼。他們真沒有辜負自己的諾言——我們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就是歸結為一句話：徹底砸爛」。⁹⁶

從文革中「階級關係不變論」出發，四派必然得出結論：「十七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及其歷史不容否定。大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極端思潮，實質上已成為階級敵人的思潮。儘管四派是文革造反派分化出的一支相對溫和或保守的派別，「四一四思潮」儘管是文革正統理論的一個異端性思潮，但是，四派廣大群眾以及「四一四思潮」的鼓吹者和代表者們，都與文革前的「十七年」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割捨不斷的利益關係，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十七年」的一定意義上的既得利益者，都深受「十七年」黨和國家的政治和教育等種種影響；最主要的是，文革所形成的天下大亂的局面，生活環境的混亂和工作條件的動盪，使他們對於文革的發展大為失望；而造反派在奪權之後所表現出來的爭權奪利的醜惡和腐化，更使他們對文革的不滿有增無減；而上層領導機構的權力之爭的殘酷和文革新權貴的走馬燈式的更換，大大強化了他們對文革目標的懷疑。相比之下，他們自然而然地回想起和留戀於文革前那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秩序，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力圖使文革的進程多少切近於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模式。「無疑，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一種舊秩序的復辟，而這一思潮的產生，卻是以反復辟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眾的直接後果。這真是莫大的歷史諷刺。」⁹⁷

96 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四一四戰報》編輯部：《四一四戰報》創刊號，1968年1月5日。

97 宋永毅、孫大進編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70。

「四一四思潮」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關注」。周泉纓在 1967 年 10 月中旬被團派群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後，他承認：「我拋出了〈必勝〉，其實是不想讓同學看的，而是想傳到毛主席那兒，希望毛主席瞭解全國的四一四思潮，做出決定，支持四一四思潮」。⁹⁸ 周泉纓的期望半是實現，半是落空。據悉，毛澤東讀了刊登在《井岡山》報上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在該文發表之前，如前所述，毛澤東不同意在清華大學出現由一派群眾掌權的局面，更不希望四派上台而把團派打下去的情形發生，而是希望兩派聯合起來。但是，毛澤東在 1967 年夏末至 1968 年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或肯定「四一四思潮」的。顯而易見，「四一四思潮」與當時毛澤東的文革目的和文革策略以及文革指導思想是大有抵觸的。毛澤東在由百日大武鬥所促成的召見北京紅衛兵領袖時，實際上以百日大武鬥的血的背景，給「四一四思潮」做出了令周泉纓們大失所望的「瞭解」。毛澤東對「四一四思潮」進行了評判：「〈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鑒於當時周泉纓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毛澤東下令放人：「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寫文章抓他幹甚麼？」

這裏，再次表現出文革中毛澤東本人矛盾心態和矛盾境況的是毛澤東本人與「四一四思潮」的關係。一方面，毛澤東指責「四一四思潮」，把它當成在全國範圍內的一股「右」的思潮；另

98 《把反革命分子周泉纓揪出來示眾——反革命分子周泉纓簡介》，頁 7。

一方面，正是由於百日大武鬥等全國著名的武鬥事件所帶來的文革形勢在 1968 年最後五個月的變化，使毛澤東及其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著手部署在全國範圍或者是在清華大學裏批判「四一四思潮」。這說明了，毛澤東在口頭上、在思想上反對的是「四一四思潮」批評甚至否定文革的傾向，反對的是「四一四思潮」斥責和批判作為文革初期正統主力軍的造反派，但是在行動中或實踐中，毛澤東開始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認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令人頗為驚異地實行的或應用的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觀點和主張。這是因為自百日大武鬥之後，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發生轉折。毛澤東已不想再讓由群眾鬥爭為主的文革初期的混亂和動盪持續下去了。毛澤東在 1968 年 7 月之後的一系列決策和措施本身就是對他的文革初期戰略的某種修正，並加速文革由其初期向其中期的轉化。所以，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對「四一四思潮」不了了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較於文革期間出現的「血統論」、「出身論」、「懷疑一切論」、「無政府主義思潮」、「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湖南『省無聯』思潮」、「武漢『北、決、揚』思潮」、「上海炮打張春橋思潮」、「李一哲民主思潮」等而言，尤其相比較於那些提出「階級關係大變論」、「特權階層論」、「大翻個兒論」（即徹底砸爛國家機器論）等極端的造反派思潮而言，「四一四思潮」提出「代表了從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統的理論體系」，的確，它集中體現了文革中「河歸舊道『十七年』」的傾向。⁹⁹ 不僅如此，在文革結束之後，迄今為止，唯

99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 年 8 月號第 36 期。

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顯著的、也是最重大的歷史性勝利，這無論在清華大學還是在全國都是如此。團派早在 1967 年 8、9 月間的一段評論今天讀來仍令人拍案叫絕：「團——四一四的論戰將進行十年（陳伯達語）是對這場鬥爭的長期性，對這場鬥爭的艱巨性的估計，是很深刻的。它將和以後三十年或四十年劉少奇翻案的鬥爭匯在一起，因為這種思潮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¹⁰⁰ 在此意義上，「四一四思潮」是我們研究和考察文革前十七年歷史、文革十年歷史和文革後至今的二十多年歷史之間的互動及相互關係的一個不可多得的群眾思潮的「活化石」。

100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簡報》，1967 年底翻印團派內部傳閱的〈幹部問題〉一文。

第七章 犖犖大者

略論「文革」的群眾運動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前因後果充分表明了文革群眾問題的敏感和棘手，文革群眾運動的深切和沉重，除了它們必然涉及到文革中億萬群眾與文革的最高領袖、與文革當權派、與廣大幹部的多樣而又複雜的關係外，還必然涉及到文革中億萬群眾自身的歷史和現實的方方面面。這裏，只是著重探討後一點。今天，不管人們對文革群眾問題有多麼不同而相互矛盾和尖銳的評價，也不管某些評論者對於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領導（實際上，文革初期，黨的領導只能轉換成毛澤東一個人的領導）而加以忽略或否定，我們都應切實看到，1967 年初至 1968 年底，文革的焦點在於群眾問題。

一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敲響了「文革」初期群眾運動的喪鐘。1968 年是「文革」群眾運動的頂點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結局，從當時的角度來看，由於工宣隊的介入，百日大武鬥使得四派不勝而「勝」，使得團派不敗而「敗」。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沒有勝負或不分勝負，因為百日大武鬥本身既是兩派自我異化的鐵證，又是兩派共同走向消亡的「墳墓」。然而，百日大武鬥最後一天的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猛烈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在百日大武鬥接近最後殘局、特別是7月27日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所遭受的慘重傷亡發生後的短短數小時，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就決定親自解決由百日大武鬥所帶來的嚴重問題。從7月27日至28日的一系列活動中可以看出，不僅清華大學處在血與火的武鬥動盪之中，而且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更是處在焦急不安的狀態之中。根據毛澤東身邊警衛人員的回憶：1968年7月28日凌晨兩點多，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當毛澤東聽取了幾個小時前的清華大學流血事件的彙報之後，脫口而出地說道：「造反派，真的反了?!」毛澤東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他在118廳先是仔細傾聽了中共中央負責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以及工宣隊的代表幾方彙報情況，後是決定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¹儘管我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以及北京市革委會特派數萬人的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的詳細內幕，只是從遲群本人事後的多次講話中知道，毛澤東本人在他的中南海住地，親自向遲群等人部署任務，並在地圖上指出工宣隊進駐清華的行動路綫。據遲群後來多次所言，實際上，從毛澤東親自決定派遣工宣隊到工宣隊開進清華大學，前後只用了十幾個小時或不到二十個小時。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制止清華大學曠日持久、驚心動魄乃至日益慘烈的大武鬥，表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決心在北京眾多高等院

1 在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際，毛澤東身邊的警衛人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對「五大領袖」一一進行搜查。根據毛澤東警衛人員的回憶，在蒯大富進來時，警衛人員讓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聽，兩名警衛人員上前下了他的武器。參見陳長江、李忠誠：〈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轉引自《共和國歷程》編輯委員會編：《共和國歷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年），中卷，頁1133-34。

校直至全國範圍內結束群眾武鬥，並通過清華大學來樹立一個從外部依靠工人群眾結束武鬥的典型。顯然，自5月30日大武鬥之後，團派和四派基本上處於相持狀態。隨著當時全國範圍的武鬥形勢的發展，清華的武鬥既不可能單純以清華人的意願來左右，也不可能由武鬥雙方所根本解決。

1968年7月28日清晨5時30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內電報大樓致電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

7·27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七三佈告，挑動11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兇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數百人遭毒打，數千人被捕未救。為避免跟工人再發生衝突，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著，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尋求中央馬上接見。

這一原文沒有標點符號的電稿顯然帶有誇張色彩。蒯大富此時認為工宣隊背後有「黑手」，此話給毛澤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一個多小時後，毛澤東在召見五大領袖時對蒯大富說，他本人就是這個「黑手」。蒯大富剛從市內返回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就來電話通知他參加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召見，此時還不知道毛澤東本人親自參加召見的蒯大富，對此感到懷疑，擔心遭「黑手」陷害，後由聶元梓親自通話，才前去人民大會堂。

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蒯大富到達時已7時左右，謝富治把渾身泥水的蒯大富帶進會場。蒯大富一見到毛澤東等人時，一頭撲進毛澤

東的懷裏，百感交集地大哭起來，毛澤東、江青等也流下了眼淚。這時，先前到達的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已彙報完畢。參加召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吳德、黃作珍等。召見後，謝富治留下了五大領袖，整理並署名〈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很快正式公佈。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的嚴厲指責也給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畫上了一個沉重的句號。

7月29日至31日，「逃難」於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地盤的團派，多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以及群眾骨幹大會。蒯大富數次有選擇地傳達了毛澤東的召見講話，力圖把毛澤東的講話置於有利於團派而不利於四派的程度，力圖給團派群眾一些穩定情緒的講話資訊。在這些會議上，許多團派人員表現出爭吵、痛哭、呼喊、叫罵、困惑、迷惘、惆悵、悲觀、哀怨、絕望……，反映出團派消亡前的複雜心態。在有的會議上，還貼出了「留得井岡豪氣在，三年歸報劉鄧仇」、「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的大標語。迫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等有關方面的壓力和督促，團派人員於8月2日開始返回清華。同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人通知團派頭目：工宣隊要在清華大學駐紮下去。自8月中旬起，包括團派在內的清華人員開始「接受」工宣隊的領導和「改造」。

以百日大武鬥結束為標誌，表明了1968年文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全國性的群眾武鬥不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毛澤東的意料，完全有可能出現從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險。

1968年新年伊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又一次發表了在文革中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聲音的「兩報一

刊」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提出「加強無產階級黨性，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能不能自覺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勢下願不願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標誌」。次日，中央文革小組專門向全國發出學習此社論的通知。《文匯報》1月12日還發表了〈論派性的反動性〉社論，歷數派性十大罪狀。〈人民日報〉1月16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指示為綱發動群眾圍剿派性〉的編者按語。看來，1968年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力圖結束群眾派性以及群眾運動大分裂的一年。

1970年12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指出了文革「全面內戰」，這一「內戰」從1967年7、8月間到1968年夏季進行了一年多。這一名為「內戰」實為群眾性的大武鬥在1968年夏末接近了尾聲。毛澤東看到了，在千差萬別的、錯綜複雜的文革形勢中，必須首先制止住武鬥。因為，1967年7、8、9三個月對毛澤東來說也是「失控的三個月」，²而不是像他在同年10月所說的「七、八、九三個月……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³

從1967年春夏開始，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群眾性的大武鬥綿延不斷，這些武鬥不僅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失，而且充分顯示出文革群眾運動的種種矛盾和危機，更有可能的是，這些群眾大武鬥使文革走到了其意料不到的、群眾性「內戰」的最高階段。到了1968年夏季，群眾性大武鬥已到了

²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258。

³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90。

迫使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從文革全局來加以遏制並結束這種群眾大武鬥的危機關頭。

這裏僅舉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例子來說明 1968 年群眾大武鬥所造成的嚴峻形勢。廣西壯族自治區對立的兩大群眾組織（「聯指」和「四二二」）的武鬥自 1968 年春末夏初進入白熱化階段，自 5 月初至 6 月底，「聯指」一派搶奪軍械，共有各類槍支 14855 枝，六〇炮 14 門，子彈 546 萬發，炮彈 60 發等大量的武器，而「四二二」一派截獲中國抗美援朝部分軍用物資，僅在柳州就搶得 1700 萬發子彈。雙方在廣西全區的大多數縣、市、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武鬥，造成了數萬人的傷亡。僅在 7 月 31 日至 8 月 8 日的南寧市武鬥，先後就有近 4000 人被打死。柳江縣某個「四二二」據點 7 月 24 日一天就打死 146 人。賓陽縣從 7 月 26 日至 8 月 6 日的十一天裏，全縣被打死 3618 人。整個廣西地區的武鬥持續了約兩年的時間。廣西成為全國文革群眾武鬥規模最大、犧牲最慘重的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廣西全區約有數萬人在武鬥中被打死。⁴

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決心在 1968 年夏季制止全國地區性的此起彼伏的群眾武鬥。從同年 7 月 3 日毛澤東簽署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制止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鬥的「七·三佈告」，到 7 月 24 日還是毛澤東簽署的由上述四大部門關於制止陝西省武鬥的「七·二四佈告」，再到 7 月 27 日毛澤東以派出數萬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武鬥的實際行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基

4 參見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本上扼制住了全國群眾武鬥迅猛發展的態勢，並由此給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注入了某種命定性的因素。

到了 1968 年夏秋，文革群眾運動在其充滿了千瘡百孔、元氣殆盡的狀況之時，彷彿已進入了歷史的盡頭。因為，文革群眾運動所必然經歷的武鬥從根本上消蝕了文革群眾運動的基礎，並使文革群眾運動走上了自我異化的黃泉之路。儘管 1968 年文革的焦點依然是群眾性問題，但是到了 1968 年年底，群眾性問題趨於從文革大局中漸漸淡出。進入 1969 年之後，在文革的最後八年裏，文革群眾運動已不能與文革的最初三年相提並論。文革群眾運動在 1968 年達到頂點之際，也就是走向全面衰敗之時。在此意義上，「1968 年」是文革的一個分水嶺。

總之，1968 年 7 月底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結束，可以說，它凝聚式地表明了全國性的群眾大武鬥進入全面低潮的過程，並且集中地體現出文革群眾運動走向全面衰敗的趨勢。

二 「文革」群眾運動的歸宿——武鬥

文革群眾運動由 1966 年所謂「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使用，經過 1967 年興起的大武鬥，最終走上了 1968 年大武鬥的窮途末路。文革群眾運動由文鬥的「四大武器」發展到我個人認為的「第五大武器」即大武鬥，也是文革群眾運動的必由之路。正是這「第五大武器」實質上不但把前「四大武器」，而且連同文革群眾運動送上西天。由文革文鬥「四大武器」到文革大武鬥，似乎又一次驗證了一位先哲的至理名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為物質力

量。」⁵結合文革的實際，我們可以模仿這位先哲的語調來說：「文鬥當然不能代替武鬥，群眾運動只能用群眾運動來摧毀，但是武鬥一經制約文革，也會變為群眾運動」。

何謂「武鬥」？「武鬥」是文革的特有現象及專有名詞（或動詞），至今學術界對「武鬥」的內容和意義所作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我個人認為，「武鬥」不是也不可能達到軍事意義上的戰爭、戰役和戰鬥，而是文革政治意義上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戰鬥或群眾運動中的內戰。英語世界常把「武鬥」譯成[war]，二者實際上大有出入。「武鬥」意指[resort to violence in a debate, dispute etc.]（意即「在爭論、辯論等中訴諸暴力」），應該用[armed struggle]（武力鬥爭）來表示。

「武鬥」儘管在形式上包括從拳打腳踢、石擲棍鬥到常規冷、熱兵器的簡單應用，但在內容上卻具有群眾組織鬥爭的特殊蘊涵，如在武鬥中的宣傳因素、心理因素等等大於或多於在武鬥中的暴力因素或軍事因素。確切地說，「武鬥」是指文革中，在同一社會制度、同一信仰體系和同一政治生活的形勢下，更多地是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或部門）中，某個群眾組織從政治上和精神上與敵對群眾組織進行的武力鬥爭。「武鬥」是文革暴力進行的特定內容和集中表現，也是文革殘酷性的一個「系數」。

文革之始，上自文革最高領袖，下至文革廣大群眾，都沒有預料到文革群眾運動最終會以群眾與群眾之間進行的武鬥而出現，他們最初把文革當成了對文革對象以及所謂階級敵人施加專政的暴力運動。然而，文革群眾運動導致武鬥，這不僅是文革群眾運動的歷史必然，也是文革群眾運動的邏輯必然。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卷，頁9。

首先，從文革最初的大半年裏，文革群眾運動，在迅速完成了文革的初步任務之後，其內部也迅速分化，文革群眾勢力也不斷裂變。如前所述，在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奪權後出現的除中央和軍隊之外的各地各單位（或部門）的權力「空缺」，儘管按照文革有關宗旨是由造反群眾及其代表來填補，但是究竟由哪些群眾及其代表能夠或者被認可忝居「權位」，這實際上涉及到不同群眾組織的不同利益。由此，群眾運動的內訌和分裂勢在必然。最主要的是，如何尋求群眾運動的統一，彌補內訌，消除分裂，這已成為文革進入其第二個年頭裏帶有全局意義的重大問題，也是關係到文革群眾運動如何持續下去的重大問題。

其次，根據文革的理論基礎「階級鬥爭論」或曰「極端化的階級鬥爭論」（它實際上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為廣大群眾所熟知甚至熟用了），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革命，而革命的必然途徑是通過暴力鬥爭獲取政權。以暴力奪取政權並以暴力鞏固政權已成為「極端化的階級鬥爭論」的一個十分片面而又偏激的組成部分。顯而易見，在其初期，文革就具有非常強烈的暴力性質和暴力形式，這一點在1966年8月下旬開始的「破四舊、立四新」活動中和1967年初全國性的奪權鬥爭中已得到最充分的體現。文革的暴力性質寓於文革群眾運動之中，而文革最廣泛、最巨大的暴力形式就是群眾武鬥。文革只有通過暴力性的群眾運動或群眾性的暴力運動，文革才能展開，文革才能得勢。因此，文革的暴力性質及武鬥是文革的「應有之義」。文革群眾運動的武鬥哲學信條就是武鬥群眾雙方總是引用毛澤東20年代的一段著名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

動。」⁶所以不難理解，文革群眾鬥爭的殘酷和兇狠，特別是群眾武鬥那慘無人道的血腥程度和令人髮指的殘害方式，都可以從文革的理論基礎推論而出，同時也是文革群眾運動以一貫之的。對於群眾大武鬥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中，人道主義、「人性論」、溫情態度及溫和作風、妥協精神、讓步策略等意味著作繭自縛，束手就擒，簡直等於自殺。

再則，當文革群眾運動中出現對立的兩個派別時，群眾兩派之間經過了分歧、分裂、論戰、小規模衝突以及其他形式的鬥爭之後，兩派矛盾和對立最終除了訴諸武鬥外，無法解決。因為，十分清楚，在武鬥成為必然趨勢和必然結果之前，文革群眾運動本身並不存在轉換武鬥、遏制武鬥或消除武鬥的有效機制，也不存在制衡武鬥雙方的運作體制。群眾兩派鬥爭除了升級為武鬥，別無他途。

還有，武鬥一旦成為現實，武鬥雙方都會不遺餘力地投入武鬥。儘管武鬥雙方有主動與被動之勢，有優勢與劣勢之分，但無論哪一方都會把武鬥看成關係到自己命運的決鬥，這也意味著武鬥是武鬥雙方在文革「輪盤賭」中所下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筆賭注。因而，武鬥的失控正如武鬥升級一樣，都是武鬥雙方不能把握的，也是無法預計的。在武鬥的手段和方法上，武鬥雙方可謂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例如，在百日大武鬥期間，清華兩派各自成立了「文攻武衛指揮部」，即專門從事武鬥指揮和協調的機構，並建立了專門從事武鬥的骨幹隊伍（在團派那裏稱之為「紅一連」）。團派還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校防科委」、「軍需辦公室」等旨在專門

6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頁17。

負責武鬥武器生產、試製、分配的機構。團派還徵招復員軍人，指導其武鬥隊伍練習刺殺、格鬥、攀登、捕俘等技術，並按照軍營生活和軍事訓練來安排其武鬥隊伍的日常作息。

在百日大武鬥之前，團派就開始從外省市、外單位運進用於武鬥的武器。大武鬥期間，兩派大力試製、生產各種土武器，如用鋼管一端加工為斜截面而成的長矛，用自行車輪胎製成的彈弓車（強弩），用拖拉機改裝的土坦克、用汽車改建的土裝甲車以及土槍、土炮、土迫擊炮、土炸藥包、土炸彈、土手榴彈、土地雷、燃燒瓶、匕首等等。說這些武器「土」，一是這些清華兩派自己試驗、自己製造的武器完全用於武鬥，二是這些武器儘管相當粗陋，但卻在清華兩派武鬥的攻防戰中，別具一格，大有「用武」之地。因為，清華大學當時作為一所工科大學，她擁有許多全國一流的教學、實驗設施設備以及附屬的工廠、車間。而作為工科學生的清華兩派群眾利用了清華的「方便」，也大大發揮了他們自己專業的「才幹」。這使清華大學在1968年百日大武鬥中，不但成為一處群眾武鬥廝殺的戰場，而且成了一所武鬥武器生產的「作坊」。這不能不說是清華大學歷史上的一個悲劇。

1968年8月底，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經過一個月的收繳武器，收繳的正規武器如下：56式半自動步槍11枝，56式衝鋒槍1枝，43式衝鋒槍1枝，79式步槍8枝，各類手槍12把，96式輕機槍1挺，軍用手榴彈9枚，雷管455枚，還有大量的子彈、炸藥以及其他用品等。收繳的土武器如下：土造手槍42把，土造步槍154枝，土炮約50門，土地雷317顆，土手榴彈1192枚，匕首519把，長矛、木槍、鐵棍共1404件，其他各類兇器59件，難以計數的土槍彈、土炸藥，還有難以統計的教學用車輛、電台、步話機、電話機和其他物品等。從這些數字和前面所述的百日大武鬥人員傷亡的統計數字中不難看出，清華兩派的大武鬥已使國

內外昔日聞名遐邇、美麗而寧謐的清華大學成了一座武鬥廝殺、槍戰、流血犧牲不止和烽火硝煙不斷的屠場。這一慘痛的經歷已成為清華大學發展史上一座刻骨銘心而永遠不會忘記的警鐘！

最後，在文革幾乎各種武鬥中，它們的結局大都是武鬥雙方難以直接決定的。武鬥的結局大致說來如下：一派群眾暫時戰勝另一派群眾的有之；武鬥雙方由於力量懸殊而使一方不戰而「勝」的有之；武鬥雙方由於外部原因還來不及決戰而使武鬥「草草收場」的有之；武鬥一方由於外來支持而戰勝另一方的有之；武鬥最後由上級文革權力機構來裁定的有之；武鬥雙方由於軍隊、工宣隊等的介入而解甲繳械達到休戰的有之；武鬥最終導致武鬥雙方「同歸於盡」的有之……。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之結局顯然屬於後三者。從百日大武鬥中不難看出，文革群眾組織可相對輕易地發動和從事武鬥，但是，能否結束武鬥和如何把武鬥進行下去就不是該群眾組織一廂情願的事情了。愈是到武鬥後期，武鬥愈是難以持續下去。武鬥雙方回顧武鬥時都會有這樣一種窘境：打吧，實在難以打下去；不打吧，會被對方瓦解或消耗掉。這就是：「打」（武鬥），找死；「不打」（不武鬥），等死。對文革群眾兩派而言，尤其是對造反派來說，武鬥與否只是自取滅亡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

這裏，我還要試圖回答下面兩個問題：一是為甚麼清華百日大武鬥出現在全國性的武鬥高潮之後，這一問題涉及到清華文革初期的進程與整個文革初期的進程之間的關係；二是清華百日大武鬥與北京大學當時的武鬥之間有甚麼樣的差異，這又涉及到清華文革初期的「個性」問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也是相互關聯的。

首先，清華兩派的分歧和對峙在 1967 年夏季儘管已經明朗，但是這種分歧和對峙還沒有到達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地

步。清華兩派此時主要忙於校外的文革鬥爭，致使此時的清華文革局勢具有相對僵持的特點。只是到了 1967 年年底，四派力圖從原清華幹部隊伍中選出自己的幹部代表，作為進入未來的清華革命委員會的候選人，這似乎從根本上「觸怒」了團派，兩派由決裂走向武鬥的趨勢已無法避免。同時，隨著全國性的武鬥趨向低潮以及極端激進、狂熱的群眾運動得到遏制，清華兩派只能把自己的「身心」重點轉移到校內，全力以赴地從事壓制、破壞、打擊、抵抗對方的種種活動，兩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最終只能通過大武鬥來決一死戰。然而，清華的大武鬥此時與廣西、陝西等地的武鬥不僅顯得與上一年的群眾武鬥「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已成為文革初期持續性的大規模群眾武鬥的「強弩之末」，更主要的是，地處北京、鄰近中央的清華大學所發生的武鬥的持久、激烈、殘酷和慘重，最終給「無產階級司令部」為制止和結束群眾性的武鬥提供了一個「契機」。在 1966 年下半年曾一領全國文革「風騷」的清華文革運動，到了 1967 年下半年和 1968 年上半年彷彿已失去了這種「風騷」而忙於內訌和武鬥，而百日大武鬥的結局既導致清華文革初期歷史的結束，又標誌包括群眾大武鬥在內的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轉折。在此意義上，百日大武鬥使清華文革再一次獨領全國文革的「風騷」，不過這一次「風騷」對清華文革群眾組織而言是負面的甚至是致命的。這就是我所認為的清華武鬥所帶來的清華文革進程與全國性武鬥所帶來的整個文革進程的關係。

其次，清華百日大武鬥與北京大學的武鬥不僅有著持續過程、進行規模和激烈程度的差異，而且還有時間、時機、影響和後果的區別。一方面，如前所述，北京大學 1968 年 3 月發生武鬥的結局是團派在清華發動大武鬥的一個因素。「新北大公社」通過武鬥一舉戰勝了自己的對立派別即北大「井岡山」，得到了

中央文革小組的首肯。這裏的一個重要背景還在於：由於糾正和遏制 1967 年夏季極端激進、狂熱的群眾運動，社會上懷疑和批評文革的各種思想、思潮悄然興起，這被「無產階級司令部」視為「右傾回潮」，所以毛澤東在 1968 年 4 月強調指出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這一點無疑對 1968 年春夏的文革群眾運動（包括武鬥）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北大之所以能夠進行武鬥和完成武鬥也就不難理解了。團派借機想把北大的武鬥「經驗」和「結果」搬到清華來，這必然是打錯了算盤。因為到了 1968 年夏天，形勢已變，問題已不是像幾個月前的「新北大公社」那樣從武鬥中求生存，而是清華的武鬥進入 6 月，既使團派焦頭爛額，力不從心，也使四派疲於奔命，難以為繼。此時，從整個文革進程的角度來看，「武鬥」好似陳舊過時的東西了。另一方面，不同於對待北大兩派，「無產階級司令部」最終肯定一派而否定另一派，並且認可了北大的武鬥結局；在對待清華兩派問題上，「無產階級司令部」始終沒有肯定一派而否定另一派。這在某種意義上給清華兩派最大限度地進行打擊、壓倒對方的武鬥，從而竭力「迫使」「無產階級司令部」認可自己而否定對方，提供了很大的餘地，百日大武鬥後期愈益嚴重、惡劣的武鬥行徑證明了這一點。清華兩派的大武鬥比北大的武鬥發生得晚，但退出文革「歷史舞台」的時間卻比「新北大公社」一派要早得多。如前所述，從結局上來講，由於工宣隊的介入，清華兩派之間沒有勝負，但共同走向了消解。

另外，從 1966 年夏至 1968 年 8 月前，清華文革與北大文革的主要差異還在於下面兩點：一是清華文革的主體力量幾乎完全是青年造反派學生。儘管有部分幹部和教師的某種作用，但他們並不居於「前台」。北大文革的主體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部分起來造反的幹部和教師，如聶元梓等人，當時就有清華等學校的造反派領袖不滿於聶元梓所代表的「新北大公社」在批判「資反路線」問題上的「曖昧」態度。這一點後來在對待北京中學生紅衛兵「四三」派與「四四」派的問題上充分顯露出來，即在北京高等院校著名的五大紅衛兵組織及其領袖（只有聶元梓一人是幹部身份，並且在北京各造反派領導人中職位最高，如 1968 年 4 月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一年後還成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只有聶元梓及「新北大公社」支持「四三」派。清華此時文革以學生為主的事實多少體現出了那種學生參與文革、進行文革的諸多特色。相比較之下，北大的文革，至少是在此時北大文革的「前台」，具有一定的上述幹部和教師的特色。二是清華作為一所工科大學，使她的學生具有充滿了「工具理性」的意識和行為。清華學生的辦事認真、講究效率、注重實用、矢志不移等特點也在文革運動中表現出來，並且往往使這些學生千方百計地從文革運動中發現和得到實實在在的答案或者結果。北大作為一所文理綜合大學，比起清華相對來說具有較多的「價值理性」，即使是在文革這樣的非常時期，這種理性也不會滅絕。多多少少還具有這種理性因素或者受這種理性因素作用的北大文革的當事者們，也會多多少少從總體上使北大文革具有自己的獨特內容和獨特形式。儘管北大和清華二者各自在文革初期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差異，但是二者的文革在實質上不可能有甚麼區別。

總之，「武鬥」作為文革群眾運動的歸宿還意味著：1968 年年底，全國性的群眾武鬥漸於消失之後，文革群眾運動的各種鬥爭和衝突逐漸由顯勢轉入潛勢，並在 1969 年之後被淡出文革大局。文革本身意義上的群眾運動隨著群眾武鬥的結束，落下了沉重不堪的歷史帷幕。

三 從「群眾運動」到「運動群眾」 ——簡論「文革」群眾運動的模式

文革被稱之為「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即有億萬群眾參加並進行的大運動，到文革結束後，據統計，已有數以億計的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或迫害。到頭來，文革卻成為一場名副其實的「運動群眾」的群眾運動，或曰「群眾鬥群眾、群眾整群眾」的群眾運動。文革的十年歷史有一個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不僅是文革群眾運動的被整治者，就是那些文革群眾運動的整治者，也極少有人最終逃脫被整治的厄運（俗語稱為「窩裏鬥」）。文革曲終氣盡，人們回首一看，在整治者與被整治者之間，二者轉化，兩極相通，凡整人者無不被整，這恰是文革群眾運動的一手「絕活」乃至「絕症」。

例如，對於百日大武鬥諸多事件的責任追究和相關處理在百日大武鬥結束不到一年就開始進行。當時以工宣隊為主導的清華領導機構暫緩了一百多名與百日大武鬥有直接關係的學生的畢業和分配工作。1970年大規模的「清查五·一六」運動的來臨，進一步加緊加大了對百日大武鬥的有關當事人和責任人的審查、處理。這些人或是在專門設立的專案組或「學習班」裏被加以隔離，接受審查；或是被送到農場或車間進行「勞動改造」；或是從畢業後的工作單位被召回清華做出交代，進行檢查；或是在個人檔案裏被「鑒定記錄」；或是被定為具有某種「政治身份」；或是前面幾種情況兼而有之。文革結束後，在80年代的「徹底否定文革」的清查活動中，百日大武鬥的有關當事人和責任人再次受到審查和處理。在百日大武鬥開槍致人死命的幾個行兇者，先後被有關地區的人民法院判處八年到十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實際上，自百日大武

鬥之後的十多年裏，許多當年從事這一武鬥的積極、活躍分子，在就職、晉升、入黨、入學深造、出國甚至個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等等方面，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具有難以言狀的苦楚。簡言之，百日大武鬥持續不過百日，但它的「陰影」和「幽靈」對於這一武鬥的許多當事人、責任人以及相關群眾的影響和作用，不但是十年、二十年的，而且更有可能是終生的！

如前所述，「群眾」一詞具有很大的暫時性和隨機性。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群眾」被人們賦予了褒義，在很多情況下，把它與「人民」混同並用。文革伊始，為了文革的發動和深入，「群眾」被置於極高的地位，因為群眾及群眾運動要充當文革初期的主力。自1968年之後，「群眾」跌入了文革的低谷。實際上，從文革一開始，「群眾」就是附著魔力的用語、工具和集合體。誰若是被置於「群眾」之外，誰若是成為群眾聲討或打倒的對象，那他（她）既可能是「群眾」的「敵人」，還可能是文革的「敵人」。然而，「群眾」又是充滿著法術的符咒、圖騰或迷魂陣，它作為無形而又實在的、無象而又真切的群體，有可能使其之中的每一個分子被逐出「群眾」的陣營，由「群眾」的一分子演變為「非群眾」的一分子，這常常是翻雲覆雨、朝令夕改的事。「群眾」在政治上的巨大流動性和「群眾」分子在文革群眾運動中身份的不固定性，這是由文革不同時期的任務和策略所決定的，並貫穿於整個文革的過程之中，因為文革本身就潛在地具有把其中每一個參加者打入「叛逆」、「異端」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至少是每一個對文革持有異議、批評和不滿的人都會走入「群眾」的對立面。「群眾」，這在文革中的確是一個極為含混的名詞，但這並不妨礙「群眾」的力量形成文革排山倒海之勢，去席捲全社會，包括群眾本身。

文革中，幾乎沒有人自願脫離「群眾」，幾乎所有人都本能地感受到和切實地意識到：只有在「群眾」之中才有生存的相對「安全感」或某種「依賴感」。文革中慣用的把不堪忍受迫害而自尋致死的人士稱之為「自絕」於「群眾」。實際上，「自絕」於「群眾」的人士在更大程度上「自絕」於文革，換言之，「自絕」於文革也就等於「自絕」於「群眾」。文革中，一個人一旦置身於所有「群眾」之外，那他（她）就的確是身臨絕境。文革中，不可能是所有的個人都歸屬「群眾」，「群眾」也不可能是某種密不可分的整體，總要有一部分人或部分「群眾」是另一部分人或另一部分「群眾」所要打倒和整治的對象；至於是何人、哪些「群眾」，這不是由個人甚至也不是由「群眾」所決定的。唯有如此，文革方可進行，即總要有一部分「群眾」運動另一部分「群眾」，而「運動」的內容則十分廣泛，內可觸及靈魂，外可觸及皮肉，直至生命。我個人時常在想，為甚麼文革所謂群眾與群眾之間的「運動」比起群眾與非群眾之間的「運動」和非群眾之間的「運動」來得更為激烈、殘酷和複雜呢？

對此，陳凱歌先生在反思文革的暴行時曾作了非常深刻的論述。他認為，文革的暴行既不是戰爭，也不能把它僅僅歸結為多年的仇恨教育和政治教育。那麼，驅使一部分群眾對另一部分群眾進行殘暴的究竟是甚麼呢？「是恐懼」。「人所以為人，在於不能絕對地離開集體；文明的演進只是使個體在社會中的排列組合趨於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類原始的恐懼。這種恐懼在中國仍然原始，在於它的深刻：在一個個人的利益或權利都必須通過國家的形式體現的制度下，反過來說，個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視為國家的恩賜。在一個就業、住房、遷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國家決定的社會裏，放棄這種恩賜就等於放棄生存本身。唯一的抉擇是：不管發生甚麼都留在這個社會

中。選擇成為唯一，已經不是選擇。……『文革』就是以恐懼為前提的群眾運動。不管口號多麼動聽，旗幟多麼壯麗，熱情多麼感人，都和真的主義、理想無關。無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樣出於害怕落於人後的心理。在一個過分擁擠的社會裏，只有打倒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人們彼此競爭，各不相讓，拼命證明自己對集體的忠誠，別人的不忠誠；所以才會出現雙方由同一個領袖統率卻彼此交戰的情況。在求存的意義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順從，並無心態上的大區別，只是所求稍不同罷了。」⁷實際上，出於生存的本能，為了生活下去的需要，「群眾」個人，在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專政之下，面臨的正是：要麼施害他人，即使是以群體無意識的形式施害；要麼受他人施害，那只能是獨自個人的生活困境。

討論文革群眾運動的基本模式問題，大致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群眾大批判」或曰「革命大批判」；2、「群眾專政」；3、群眾武鬥；4、群眾運動諸階段的連續性問題。由於前面已分析過了武鬥問題，下面只涉及其餘三個方面。

從文化學上講，「批判」(critique)一詞是指對於構成知識或理論之對象的經驗前提和邏輯前提能否成立以及為何成立的考察。對於文革對象的「批判」或曰「大批判」(mass critique)已不是甚麼知識意義上的或理論意義上的批判，而是演化為文革群眾運動的一種具體操作的方式。大批判之所以「大」，首先在於它是群眾性的，用文革的語言來說，是群眾人人口誅筆伐，「拿起

7 陳凱歌：〈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原載《中國作家》，1993年第5期，後載柳萌主編：《在劫難逃》，頁156。

筆，作刀槍」，走上批判的戰場。大批判在文革中常常被當作群眾運動引路或開路的先聲，它主要包括大字報、批判會等方面。

大批判的主要功能還在於為正在進行的群眾運動和當前的某種鬥爭任務渲染一種群眾輿論的氣氛，力圖形成群眾心理的某種定勢，動員並且激發某種特別需要的群眾鬥爭的情緒，催化某類能夠使群眾付諸實踐的行為。大批判一旦開啟起來，被批判對象就已置於群眾輿論的審判席上，並從語言到人格上被剝奪了辯護權利，被批判對象似乎處在一種由批判群眾任意擺佈乃至任意「塑造」的狀態中。

大字報作為文革群眾運動的「大民主的形式」之一，它在大批判中差不多完全是進行人身攻擊、人格污辱、誇大其辭、無視人權和造謠惑眾等一類的東西。大字報是文革群眾運動中最有效、最直接、最常見的傳播媒體。文革中，那些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實際上引發的是無數顆文革的政治「炸彈」，蔓延的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火藥氣息和暴力強波，鼓動起的是文革群眾運動的超凡效應。大字報是中國文化傳播媒介史上的變態畸形的「景觀」。在那千篇一律、散發著軍事戰鬥文風文體的大字報中，人們感受到的更多是形式大於內容，強辭奪理摻雜著愚昧、無賴，詭辯伴隨著空洞、淺薄。

批鬥會也稱批判會或大批判會，也是文革群眾運動「四大武器」的應用場之一。這種會議類似於中國傳統戲劇表演藝術的群眾「亮相」，即與會群眾群情激憤，鬥志昂揚，摩拳擦掌，同仇敵愾。批鬥會既可在大庭廣眾面前把被批判者的面子、隱私直至人格批判得「體無完膚」，又可對被批判者施加拳打腳踢即變相的「肉體批判」和戴帽或掛牌的「身份驗證」的批判。文革批判會大都有一套相仿的模式，它的主要功能是把文革群眾運動的形式切換成那種群眾的面對面的直接鬥爭。

文革中，大批判的對象會像走馬燈似地不斷變換，而大批判的形式則依然如舊。儘管大批判與文革前夕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批判有著聯繫，但是它作為群眾性的活動與以往一切批判的最大不同，就是在批判者與被批判者之間不斷轉換的形勢下，「批判」本身不過是迫害的別名。從歷史上的發展來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大批判本身幾乎無不是被批判對象的顛倒了的再現或反面的證明，無不顯現出被批判對象本身比起大批判來更具有歷史價值或生命力。

「群眾專政」是文革群眾運動最重要的內容和最常見的形式，也是文革運動的基本方式之一。據王力稱，「群眾專政」一詞是毛澤東於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提出來的。毛澤東說，文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群眾專政，並且它已在北京基本存在了。由此可見，「群眾專政」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的。⁸

群眾專政實行的是文革的某些專政措施，並且體現了文革的某些專政職責。與以往一切專政所不同的是，群眾專政根本沒有也從來不需要甚麼起碼的法規律令作為自己的意志和制裁及懲治活動的依據，法律對於群眾專政而言一文不值。那麼甚麼是群眾專政呢？這是文革最簡單、最實在而又是最殘酷的一個問題，即一部分群眾對另一部分群眾的專政，或曰大多數群眾對少數群眾的專政。

文革群眾專政具有三個特徵：一是普遍性，二是日常性，三是單位性。「普遍性」是指在文革中，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大致上都有相應的群眾專政。或者說，在群眾進行文革的地方，無不存在某種程度的群眾專政。「日常性」是指群眾專政

⁸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記實》，頁53-55，90-91。

與以往一切專政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是「日常生活專政」，即文革中部分群眾對「專政對象」施加的日常生活行為、習俗、情感甚至話語的專政。「日常性」還意味著專政者與被專政者之間曾具有最相熟而又最相近的工作關係及同事關係。「日常性」賦予了群眾專政與以往一切專政不可比擬的獨特力量和獨特作用，它使「專政對象」面對的總是其生活周圍最熟悉不過的也最平凡不過的群眾所構成的人際關係之「網」和彼此防範之「牆」。「單位性」是指群眾專政是按照「單位」即社會職能部門或機構來劃分，並且來加以具體實施的。「單位性」使專政對象難以逃離單位的界限，並且由單位群眾來加以管治。在文革中，幾乎每一個單位的群眾專政在許多方面都曾擁有過這種過去只有「公（公安局）、檢（檢察院）、法（法院）」機構才擁有的權力和權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把這些機構的權力與職責集於一身。這就不難想像文革群眾專政的無法無天會達到何等混亂而又荒唐的地步。

群眾專政的暴力性質是不言而喻的。「封建社會的國粹、羅織罪名的構陷、慘絕人寰的酷刑、口含天憲的專政意志，盡被這種意義上的『群眾專政』所網集。『專案』和交『群眾監督改造』是其最常採用的方式」。⁹ 群眾專政的暴力性質還體現在基層單位設立的公堂和變相的監獄，辦案部門（「專案組」），以及刑罰的濫用等之中。文革期間，一些地方還成立了「群眾專政隊」，如一些城市的「民兵小分隊」。群眾專政的暴力活動以打、砸、搶、抄、抓、關、刑訊（「逼、供、信」）等形式盛行於文革的全

9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頁 125。

社會。總之，群眾專政成為文革「極左思潮下出現的暴民政治的發洩途徑之一」。¹⁰

群眾專政既然主要是由群眾來實施，那麼很有可能出現昔日的專政者變為今日的被專政者。這不僅是由於文革「群眾」本身就在不斷地裂變出專政對象，文革不同時期的不同任務和不同策略也會促成這一點，而且群眾中的個人不幸或苦難會由於種種有悖於文革的言行、圖謀甚至超出了文革大局的極端行為等原因所造成。群眾專政總是一面「雙刃劍」，它在揮向文革對象的同時，也總是在指向廣大群眾，包括那些玩弄這一專政的群眾本身。

無論怎樣，群眾專政都具有確定不移的模式，即「這種群眾專政在『鬥爭』中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經驗：內查外調，政治攻勢，檢舉揭發，政策攻心，定期批鬥，定期請罪，勞動改造，群眾監督。而每一步都是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來搞，做到人人參加戰鬥，人人受到鍛煉』。戰爭年代的土改階級鬥爭方式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用上了」。¹¹ 群眾專政的主要功能就是確保並實施文革的群眾暴力和群眾專制。

除群眾武鬥之外，群眾專政也是對億萬群眾不同程度的殘害最深切的一種文革暴力形式。然而，不同於群眾武鬥的是，群眾專政與文革的內在契合更加有機、更加持久而密不可分。如果說群眾武鬥把文革暴力推向頂點的話，那麼群眾專政則把人民大眾生活推向了文革暴力的深淵。縱觀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專政」，我們不能不說，文革群眾專政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專政「怪胎」。

10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頁 123。

11 同上，頁 125。

回顧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我們不難發現它是由許多個階段性的群眾運動所構成的。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大大小小的階段性的群眾運動約有 20 個之多。1976 年春季，在北京等地持續了幾天的四五群眾運動，已不屬於文革群眾運動，而是一場反文革的群眾運動。正如紅衛兵運動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紅衛兵組織的結束，文革本義上的群眾運動在 1968 年瀕於消解之後，文革群眾運動的許多形式和手法依然在沿襲並使用。

分析文革諸多階段性的群眾運動，我們會遇到許多非常深刻的、頗有研究價值的文革問題，諸如文革的矛盾發展、危機趨勢、決策特點、鬥爭走向、群眾心態、群眾的響應和作用、群眾與非群眾的互動以及文革自身的修補、調整等等。



1968 年 8 月，清華大學的一次群眾集會。

在文革諸多階段性的群眾運動中，有一種令人值得注意和探討的現象和事實，即兩個前後相接的群眾運動之間的聯繫和轉換。具體說來，某一階段性的群眾運動與在此之前的或者在此之後的群眾運動的有機聯繫，往往代表了文革發展的特定任務、具體步驟、階段目標和相應策略等。但是，這些階段性的群眾運動就其單個來說，並不都是與文革總體性目的完全契合的，而是不斷被文革總的發展過程所重新組合，甚至到了後期，後一階段的運動則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對前一階段的修補和「糾正」，即某一階段的運動所帶來的「後遺症」難於為下一階段的運動所「治療」。例如，造反派劃分為勢不兩立的群眾兩派所帶來的武鬥在 1968 年夏秋致使群眾運動壽終正寢，它不但大大延遲了預定的「整黨建黨」、「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而且造成了文革開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糾正極「左」運動——「清查五·一六」運動，而這一運動又是一個極端擴大化了的整治運動。林彪事件所帶來的「批林批孔」運動完全不是發自群眾下層的運動，日後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直至「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運動，更是來自文革領導的主觀決斷。

文革諸多階段性的群眾運動所遺留下來的「病症」和所潛伏的危機積聚到一定時刻，致使文革的氣數走到了盡頭。當這些階段性的群眾運動一個比一個矛盾更加難以解決、一個比一個弊端更加難以克服時，文革群眾運動的末日（儘管這一運動在文革初期大張旗鼓，橫行天下，而在中、後期則流於形式）也就為期不遠了。從這些階段性的群眾運動中還可以看出，總體上的文革群眾運動根本就沒有甚麼明確的規劃和目標，它彷彿實踐著當年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機會主義政治路線：「目的算不了甚麼，運動就是一切」；對文革群眾運動而言，可謂「群眾算不了甚麼，運動就是一切」，直至文革的徹底破產。

然而，我個人再次強調，文革只有在群眾運動中才能進行和持續，哪怕僅僅是形式上的群眾運動。具體言之，群眾運動是文革存在的方式，即只有在社會一部分群眾總是與另一部分即少數群眾之間不斷進行各種各樣的鬥爭之中，文革才能維繫其運轉。在此意義上，文革群眾運動乃至文革就是群眾鬥爭群眾的運動。

為甚麼如此呢？道理非常簡單。在文革那種時代，在根本沒有把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大力發展生產力、推進經濟建設作為首要任務及國家中心任務的條件下，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把人們內心具有的種種渴望、需要、追求和壓抑及其施放，或者把陳凱歌先生提到的、我認為是文革群眾運動的基本情結之一的「恐懼」，加以維繫和統一起來，並且達到在文革那種專制水平下高效地、超凡地運轉，只有通過群眾運動才能達到。當一部分群眾與另一部分群眾總是處在或有可能處在緊張、對立、防範和內耗的狀態之中，文革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就形成和具備了，因為一部分群眾總是肩負著文革的使命和義務去「改造」另一部分群眾而「造就」文革「新人」。正如進駐清華後的工宣隊很快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所得出的一條經驗：「有了群眾，就有了敵情；發動了群眾，就暴露了敵人；依靠了群眾，就無往而不勝」。

文革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個別局部上，它作為一場群眾運動最終都無法逃脫「運動群眾」的劫數，最主要的一點就在於文革最終損害了所有群眾的根本利益，包括那些曾積極主動地投入到文革的群眾，更不用說那些先後是殊途同歸地成為群眾運動「淪落人」的群眾了。「運動群眾」不僅僅包括前面所說的那些完全有可能並隨時用於群眾本身的專政手段、專制工具，特別是文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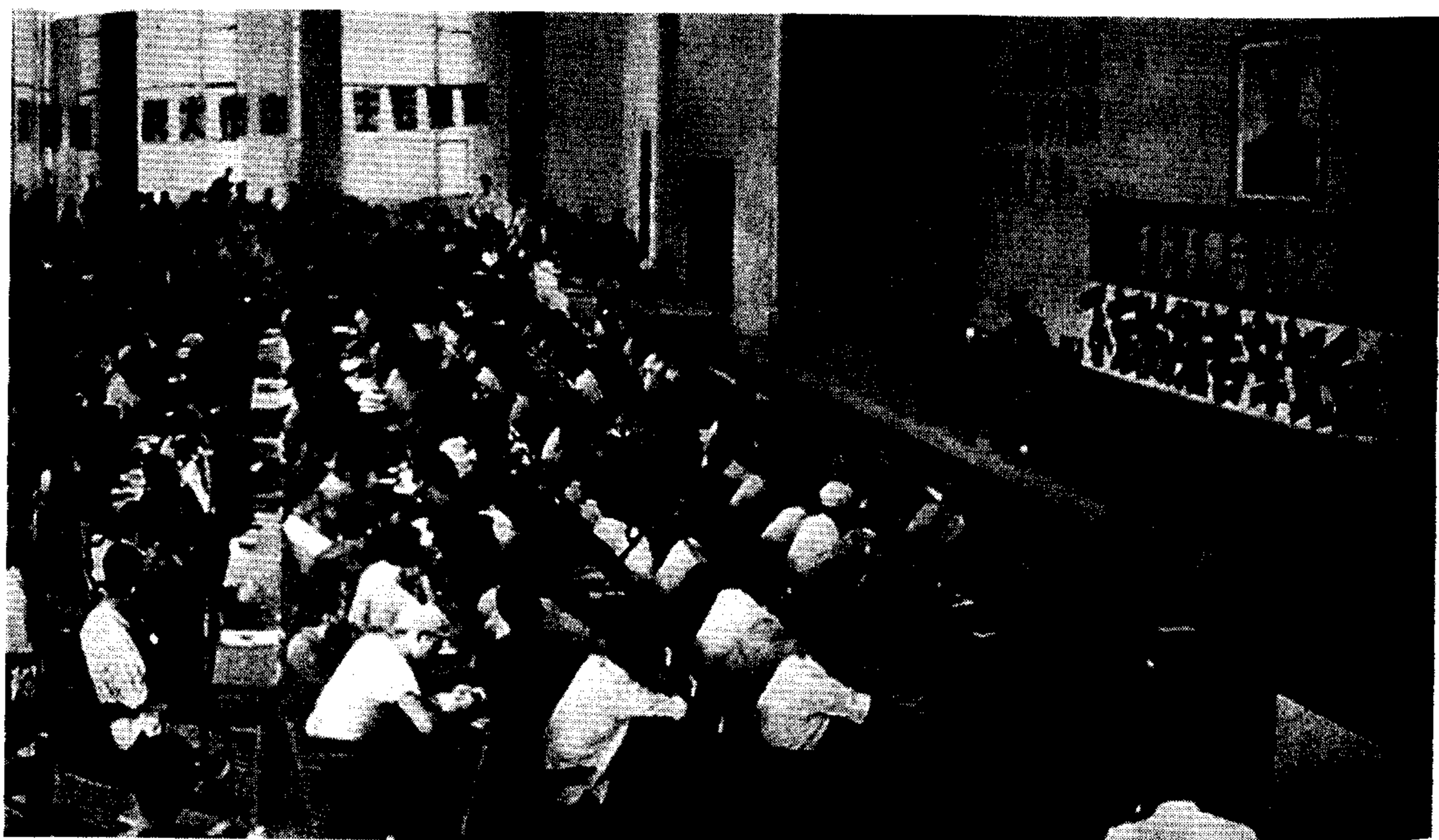
期特有的、恰恰是來自群眾的專政方法，而且「運動群眾」最終幾乎沒有給任何群眾帶來甚麼看得見、摸得著、切實不斷改善的生活利益。試問，在長達十年的文革中，億萬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多少改進和提高呢？具體言之，那些置身於群眾運動中的群眾，他們的工資收入、住房環境以及他們日常飯碗的食物質量、他們的衣著時尚有沒有過較大的改善呢？那些曾把文革當成真正的群眾運動而投身於其中的群眾，他們的日常閱讀、藝術欣賞等精神活動曾被限定到一種甚麼樣的匱乏、貧瘠、荒涼的地步呢？更有甚者，從群眾運動到運動群眾的普遍性的結果是：在文革廣大群眾中間，在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而又確實可感受到的從話語、情感、交流的「緊箍咒」到心理、意識、思想的「設防線」。人們內心的普遍的恐懼感造成的防範心理和防範行為，不能不使廣大群眾的生活在充滿了出賣、背棄、告密、監視等可恥而又必然的行徑的同時，充滿了高度的壓抑和高度的緊張，甚至達到了人同自己內心的影子在進行搏鬥的體驗和情景，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寫的小說《啊》主人公的經歷就是一例。這樣的群眾運動到運動群眾，再由運動群眾到群眾運動，必然是使廣大群眾生活中的言不由己、虛偽成風、隨波逐流甚至爾虞我詐、嫁禍他人等現象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廣大群眾之間，你爭我鬥，兩敗俱傷，到頭來，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爭鬥的群眾雙方元氣大傷，心灰意冷，悔悟已晚。因而，文革群眾運動無論是總的過程還是某一階段，無論是從起點還是到終點，其最大的受害者只能是群眾！

文革從群眾運動到運動群眾，最終使文革失去了民心。當年投身參加並推動文革的億萬群眾用了十年的歷史而變為否定和拋棄文革的億萬群眾，這不能不說是億萬群眾所做出的一個極為沉重但又值得加以深切反思和批判的歷史性進步。

四 「文革」群眾運動中知識份子的多舛命運

清華大學作為幾代不同的知識份子聚集而工作和生活的單位，使得清華文革的每一問題幾乎都離不開知識份子的因素。以清華廣大教師、學生所映現的知識份子問題，既是體現清華文革進程的底色，也是映襯清華文革現實的背景。清華文革的群眾運動及群眾問題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注入了知識份子因素的群眾運動及群眾問題。關於文革中知識份子問題的研究，既是知識份子的社會作用問題研究，也是文革研究中一個亟待深化的課題，它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自身的發展、轉型和未來走向。

文革時期，知識份子階層是在所有社會階層中遭到衝擊最大、自身群體分化最廣和個體分裂最深的階層，換言之，在社會諸多階層中，沒有哪一個階層像知識份子階層這樣處在所謂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後不久，給師生舉行「憶苦思甜」報告會。

「被改造」和接受「再教育」的地位。「我們發現，在人類以往的歷史上，還很少有過這樣的情形：幾乎每一個知識份子的命運都與其民族的命運有過如此緊密的聯繫，如此地浸淌著血與淚的聯繫。我們感到強烈的、命運的悲愴之情」。¹²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文革都是一場反知識份子的運動。文革作為一場「革知識份子『命』」的「革命」，它是廣大知識份子的靈與肉的煉獄，它對知識份子幾代人的影響決不是20世紀最後20年所能「消解」的，正如季羨林先生指出的：「對廣大的受迫害的知識份子來說，『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過去」。¹³

「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的含義在我國學術界有著廣為不同的界定，常見的說法是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腦力勞動者」。¹⁴然而，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知識份子是由古代科舉制下沿襲儒家文化傳統的「士」的形態和角色轉化過來的，它與近代以來「知識份子」的內涵有很大的不同。從現代歷史—政治的角度而言，「知識份子」是指從事知識創新和思想探索、具有個體自主的精神權威而不依附任何現實政治勢力的群體或個人；他們在真理的認同上具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並依據內心準則而自由行動；他們在社會實踐生活中，積極地參與政治，成為改造社會的獨立的、批判的力量。¹⁵儘管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深受西方知識份子的影響，並且更切近於俄國近代

12 沈展雲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頁1。

13 季羨林：《牛棚雜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頁216。

14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下冊，頁4537，「知識份子」辭條。

15 參見許紀霖：《智者的尊嚴——知識份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頁3-4。

以來的知識份子，¹⁶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更多地是指一種精神性的或依附性的，而非經濟性的和職業性的社會群體及個人。中國「知識份子」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指包括受過中學以上的中等教育在內的所謂「文化人」。這種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與清華大學學生一起習毛澤東著作。

「文化人」即知識份子從未形成獨立的社會階層，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知識份子的「毛」總是依附於一定的社會階級的「皮」上。

文革時期，清華大學乃至當時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從其形成年齡上大致可分為三代：一是 1949 年前學成的老一代知識份

子，他們的年齡大都在 50 歲以上；二是 1949 年後至 1966 年前已學成的並擁有較固定專業工作的中年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的年齡大都在 40 歲上下；三是 1966 年文革開始時依然在校學習的青年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的年齡大都在 20 歲左右。雖然每一代知識份子自身內的每個個人的社會經歷和社會地位有較大差異，但是三代知識份子從整體上（暫且不指個人）在文革之前和文革開始的命運和境況則大不相同。

毋庸置疑，文革中的知識份子問題是與毛澤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知識份子的錯誤判斷與錯誤政策緊密相關的。在 50 年代，儘管有主要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但是毛澤東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總的來說是表現出矛盾的特徵。例如，在「反右」運動結束後，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宣傳部 1958 年 12 月 19 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 165 期上刊載的〈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甯「左」勿右〉的材料，親筆致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建議將此件印發給全國一切大專學校、科學研究機構的黨委、總支、支委閱讀，並討論一次，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你看如何？文學藝術團體、報社、雜誌社和出版機關的黨委、黨支，也應該發去，也應討論一次。請酌定！」¹⁷看來，當年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甯「左」勿右的錯誤，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在他的推動下，他實際上讓全國所有的知識份子性的單位來關注這一問題。

16 「『知識份子』這個名詞最先用之於十九世紀俄國，當時它指的是特定的一群人，他們一般在大學裏受過教育，大都具有西方文化的思想背景和行為教養，自成一個有別於傳統階級結構的社群。他們互以思想相啟蒙、以奉獻相激勵，他們那時眼睛閃耀的是為人類自由、平等而奮鬥的火焰。」沈展雲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頁 3。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第七冊，頁 654。〈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甯「左」勿右〉一文概要附在同書頁 654-55。

然而，到了60年代，由於對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評價和政策就成為以一貫之的錯誤了。例如，在196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強調，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同年5月7日在致林彪的信中，毛澤東又重申「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有其複雜的原因，「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理論根據，是他主張根據世界觀劃分階級。在這種『左』的觀點的支配下，他把一切不同意自己的觀點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看成是異己階級的敵對力量，甚至連吳晗、翦伯贊這樣的進步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被排入敵人的行列，這實在是一種歷史性的悲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歷代農民都不把知識份子當成自己人的這種不信任感的遺跡」。¹⁸這種對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感，到了文革之際，促使毛澤東把知識份子當成文革的對象，毛澤東1970年年底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得再確定不過了：「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¹⁹

文革一開始，相對來說，老、中一代知識份子最先受到衝擊，他們不是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18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148。

1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496-97。

就是被當成「黑幫」、「黑線」人物而加以整治，他們是文革中社會上最早受到衝擊和迫害的人。相比之下，當時在校的大學生激進分子，曾被利用為文革的開路先鋒，他們在文革最初的一、兩年裏不同於在他們年齡之上、曾為他們師長的老、中一代知識份子。當然，這並不排除在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中群體中有少數個別人與其只是年齡相近似的群體的命運和狀況有所不同。

至1968年底，知識份子在文革中大致可分為兩類：「革命造反學生」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前者儘管在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成為文革的開路先鋒，但是其過於激進的主張和極端的行為，到了1967年夏季之後，就有可能造成高等院校的文革從「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失控。因而，革命造反學生進行的武鬥到了必須加以消除的地步。這青年一代造反學生此時對毛澤東的有關指示陽奉陰違，而且對毛澤東以下的文革地方權力機構權威不屑一顧並時有「冒犯」，他們就走到了必須從文革的牌局中被逐出場的時候了。所以，青年一代知識份子成為文革的對象是必然的，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駐清華大學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後來成為推廣文革六廠二校「鬥、批、改」經驗的典型之一，實際上，這支由毛澤東身邊警衛部隊人員領導的工宣隊是對清華大學這樣一個擁有眾多知識份子的單位進行文革的領導，直至1976年10月，工宣隊不斷地把清華大學搞成文革的一個「樣板」，或者按清華工宣隊領導人之一的遲群所言，是毛澤東的「一個點」。

在向清華大學派出工宣隊的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知：中央決定對教育部實行軍事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與清華大學學生談心。

管制，成立軍事管制小組。進入8月之後，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加速進行教育界等領域的文革轉折，並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的決策。例如，8月5日，毛澤東把巴基斯坦朋友贈給他的芒果轉送給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以表示慰問。8月15日，毛澤東還接見了該工宣隊的代表。這些舉動給整個工宣隊以極大的鼓勵。8月25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派出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該通知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²⁰決定向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派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領導全國教育界

的文革。到8月底，北京的59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宣隊。到1968年年底，不僅全國大中城市的學校或教育部門，而且中國科學院、文化藝術單位或部門、出版社，甚至還有一些軍事院校，都進駐了工宣隊。

1968年8月下旬，毛澤東發出「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指示，這意味著他把工人階級置身於知識份子之上的領導階級，並且表明他把整個知識份子列入文革的對象。這不僅直接是由於百日大武鬥給教育界的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而且通過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的文革武鬥，使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造反派來完成教育界的文革任務。根據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指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²¹到了1968年8月，毛澤東已使文革的對象不僅僅包括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知識份子以及所謂走資派，而且演變擴大到文革初始曾作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學生及青年知識份子了。

在清華大學「七·二七事件」之後，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寫出「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姚文元於1968年8月22日給毛澤東送去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一文，並附信說：「……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毛澤東對姚文元的文章做了三次認

20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61。

21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63。

真細緻的修改，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姚文元發表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作為文革的頭號筆桿子，姚文元對毛澤東的文革新戰略加以詳細發揮和闡釋。²²

姚文元先作了一番警告：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首先要保證「毛主席的每一個指示，工人階級的最高戰鬥指揮部的每一個號令，都能迅速地暢通地貫徹執行。必須反對『多中心即無中心論』、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種種破壞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反動傾向。……我們國家中，不允許存在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相對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獨立王國』」。對此，姚文元以前北京市委的所謂「獨立王國」為「教訓」。毛澤東在審閱到此處時加寫了下面這段話：「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裏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²³姚文元不點名地以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事例，總結道：「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上的鬥、批、改，及其它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²⁴言外之意，知識份子已不能適應文革或者已不能完成文革任務了。

22 當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作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8月25日《紅旗》雜誌第2期發表了姚文元的此文，《人民日報》次日轉載了此文。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十二冊，頁533。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29。

24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63。

進而，姚文元針對一些抵觸工宣隊進駐高校的論調加以駁斥，指出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證」。姚文元聲色俱厲而不點名地對文革新形勢下的新的「蒯大富式的人物」（或曰「蒯氏人物」）大加斥責：「那種把工人當成『自己』以外的異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塗，他自己就是工人階級的異己分子，工人階級就有理由專他的政。」緊接著，毛澤東加寫了下面了這段話：「有些自己宣佈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份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²⁵姚文元的此文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表態，是對此事件所帶來的文革戰略轉折舉措的總結。此文已表明，「無產階級司令部」已不信任「蒯氏人物」之類的「革命知識份子」了，這種人物曾在文革伊始因反對工作組而被提攜重用，而如今卻因反對工宣隊而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所惱怒，最終被遺棄。

姚文元的文章表達出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文革中知識份子策略的歷史性斷定：「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可能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31。

得到改造和解放」。這一段話也是毛澤東加寫進去的。²⁶姚文元轉達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定：工人階級不但要到學校，而且要「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中去」。²⁷因而到了1968年年底，幾乎中國各界所有的知識份子成為文革的對象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工宣隊的任務、宗旨和目的在清華工宣隊一份紀念毛澤東1968年「七·二一指示」一周年的材料中又一次得到說明，這份題為〈高舉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偉大紅旗，為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而鬥爭〉的文章強調：「實踐證明，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文化教育陣地領導權的鬥爭，始終是圍繞著爭奪知識份子群眾問題展開的一場尖銳、複雜、激烈的階級鬥爭。在一定意義上講，工人階級佔領文化教育陣地，就是佔領廣大知識份子群眾。」因而，工人階級就要「以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徹底砸爛舊的教育制度，徹底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由此可見，工宣隊在徹底砸爛所謂舊清華這一點上與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何其相似乃爾！「清華大學是美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九年²⁸用『庚子賠款』籌建起來的，歷來在這裏為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國民黨反動派培養了不少奴才、走卒和反動文人。解放後，……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英美和蘇修的一套大雜燴，學校裏有『這個系，那個系，就是和工農兵沒關係』。課堂上，『講這個定理，那個定理，就是不講革命的道理。』」因此，「無產階級教育大革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31。

27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64。

28 應為一九一一年。

命首先是一場政治思想大革命，是一場最深刻、最廣泛地觸及每個知識份子的方向、道路和世界觀的大革命」。工宣隊在很多場合反復強調，文革是不可能靠知識份子來進行到底的。在工宣隊看來，知識份子對於文革來說總是一個「負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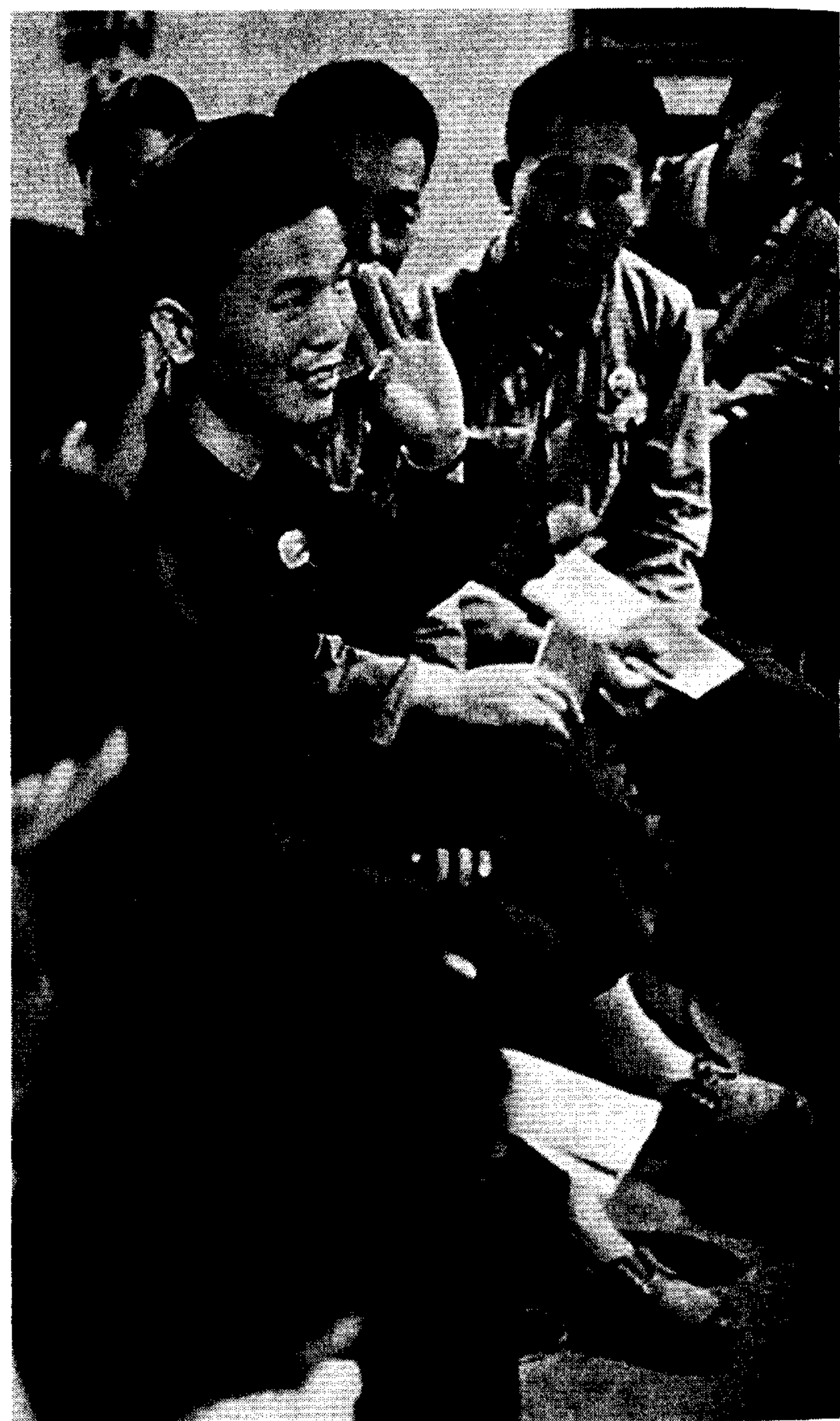
工宣隊進駐清華之後，一直到1976年年底，才失去了它在清華的霸主地位。在文革一些年裏，清華大學有關文件題頭或署名中，都是以清華大學黨委會、革委會、工宣隊三者並列的形式出現，工宣隊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回顧工宣隊在清華大學的八年多歷史，可以說，工宣隊的最大職能就是「管制」和整治廣大知識份子。這裏，僅舉幾個事例，可見三代知識份子的共同命運：

三代知識份子儘管走向文革對象的道路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毫無例外地已從整體意義上成為以「再教育」、「給出路」、「可改造」等等名義出現的文革對象，進而成為文革全社會中幾乎是唯一的作為文革對象的階層。這一點對那些曾叱咤文革風雲而如今「淪落」為文革「被改造」、「被領導」對象的清華造反派學生來說，刺激最為深刻和痛切。他們頗有體會地說，在文革中，「積極太冒險，消極太危險，不前不後最保險」。他們說，紅衛兵「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鬥」；對他們自己的狀況說，「我們這些人是舊教育制度的犧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試驗品，社會上的處理品」，是「犯不完的錯誤，站不完的隊，寫不完的檢討，認不完的罪」，活生生地體現出造反派學生們的失落心境。

1969年5月至10月，工宣隊組織先後5批共計約2821名清華教職員工開赴江西省南昌市郊外的鯉魚洲清華大學試驗農場。該地是血吸蟲病的重疫區。由於水下勞動和防洪，教職員工患上血吸蟲病者當年確診747人，懷疑待查者111人，次年患者已

突破千人。以後多年並直至 1997 年，清華大學醫療保健部門還要對昔日的血吸蟲病患者進行復查或有關治療。「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勞動被當成對知識份子的懲罰。只有對工宣隊表現得俯首貼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種奴化式的改造」。²⁹該農場 1971 年 10 月被撤回，改在北京市大興縣辦清華農場。

在 70 年代，清華廣大知識份子與全國知識份子一樣，被 1971 年 8 月批發全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所謂「兩個估計」，在政治上壓得翻不過身來。「兩個估計」是指：一、文革十七年前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後，給師生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29 賀黎、楊健：《無罪流放——66 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年），頁 6-7。

級的政」；二、教師隊伍包括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清華大學廣大教師與這「兩個估計」進行了多方面的、長期的鬥爭。有的教師把「兩個估計」稱為文革中壓在廣大知識份子身上的「兩座大山」。「兩個估計」是文革迫害、整治知識份子的一根大棒，它集中體現了對廣大知識份子的不信任甚至恐懼和仇視的心理。

從進駐清華大學起到 1976 年 10 月，工宣隊幾乎是每逢較大的政治運動及政治鬥爭，就必須提起和強化對知識份子的一系列改造。從這一時期取代了原來清華校刊《新清華》而改名為《清華戰報》上面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宣隊與廣大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是何等的深刻、尖銳和難以化解。甚至在工宣隊看來，知識份子是不應該有好日子過的。一位工宣隊頭目在一次講話中說：「甚麼時候知識份子的心情舒暢了，那麼甚麼時候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後來此話發表時改成了：「廣大知識份子……甚麼時候思想平靜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檢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頭路？」³⁰這赤裸裸地道出了文革以知識份子為「敵」的心態。

30 〈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載《清華戰報》（清華大學《清華戰報》編輯部），1973 年 11 月 8 日，第 77 期。

第八章 歧路亡羊

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失敗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還標誌著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失敗。紅衛兵運動是文革中最早出現的群眾運動。文革於 1966 年 5、6 月間開始，於 8 月才成為一場全社會性的群眾運動，這首先「仰仗」於紅衛兵運動的進行。以千百萬處在青春期的熱情衝動、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運動，充當了文草地地道道的開路先鋒。

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造反派運動、群眾運動往往難以有嚴格明確的界限，在名詞用法上，三者常有混同，人們有時使用紅衛兵造反運動、群眾造反運動、紅衛兵群眾運動等詞，表明了三者的密切關係。在實際的文革進程中，這三種運動，最主要的是前兩種，體現並代表的是文革初期兩個不同階段的運動重點。例如，從所謂老紅衛兵到造反派的轉換恰恰就是文革初期群眾運動中心的位移。

那麼，甚麼是「紅衛兵運動」？正如「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們用兩個字所簡練概括的：「造反」。確切地講，「紅衛兵運動」是中國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在全社會進行的反權威體制、反現存的文化、

道德、教育和傳統之主流的、為了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群眾政治文化運動。¹紅衛兵運動是文革群眾運動的一面凸鏡。

一 歷史的怪圈：從 1966 年 5 月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興起到 1968 年 7 月底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後運動紅衛兵主流的衰敗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是紅衛兵運動的搖籃。早在文革之前，清華附中就已滋生著紅衛兵運動的幼芽。紅衛兵運動最初起源於以幹部子女為主的、散發著「血統論」氣息的「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系列活動。從 60 年代初以來，清華附中的一批幹部子女，憑藉其敏銳的頭腦、非凡的抱負和強烈的優越感，他們與學校共同提倡「階級鬥爭論」，重視家庭出身，在當時和後來的文革中造成很大影響。例如，1964 年附中發生的一起小小的學生打架事件，實為一位幹部子弟與一位平民子弟的打架，後被反映到清華大學領導人那裏，迫於壓力，清華大學主要領導人和附中校方都把它當成具有政治色彩的階級鬥爭事件。²這種人為地抬高幹部子弟的地位，壓制平民子弟的作法，製造了同學間的隔閡，更加助長了幹部子弟的驕橫心態。清華附中校方

1 參見安文江所寫的〈我不懺悔〉：「紅衛兵運動是被極左壓抑的民主意識、自主意識的強勁反彈！是對階級鬥爭怖懼到極點而迸發的變態絕叫！是幾千年的積澱的封建意識的迴光返照和集成展覽！」，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五冊，頁 301。

2 清華大學附中八十周年校慶籌委會編：《清華大學附中八十周年校慶紀念文集》，北京，1995 年，頁 139-40。



1966 年夏，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學生批鬥該附中校長萬邦儒。

對這些幹部子弟備加關照，常給他們進行專門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傳達有關幹部才可享受的文件等。由此可見，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名義上是「造反」和「造就接班人」，實為文革「血統論」的濫觴。

1966 年 5 月初，清華附中「預科 65 級一班」（簡稱「預 651 班」）的一些學生因當時幾件事與校方發生分歧，雙方爭論不下，

對立情緒嚴重，矛盾激化，大有一觸即發之勢。5月29日晚，七、八位高年級學生在距清華附中不遠的圓明園遺址處，討論形勢和商量對策，大家決定今後使用張承志（後來成為著名作家）曾用過的筆名「紅衛兵」來署名所寫的大字報。「紅衛兵」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6月2日，他們貼出了有一百多人在「紅衛兵」後簽字的大字報，表示「堅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很快，北京許多所中學學生來清華附中觀看大字報，並以各自學校的「紅衛兵」署名來表示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這一名稱不脛而走，迅速成為文革伊始中學生們使用最早、最廣的組織名稱。

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清華所有部門中最早衝擊自己部門的領導人，他們在得到了剛進校不久的工作組的支持後，備受鼓舞，自6月24日至7月27日先後寫出了三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這三篇在文革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獻，一經同年8月《紅旗》雜誌第11期以及《人民日報》等全文刊出，就成為文革群眾運動全線出擊的進軍號。前兩篇大字報經過江青轉交毛澤東，毛澤東於8月1日親筆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紅衛兵運動表示堅決的支持。由於來自毛澤東的首肯，紅衛兵運動於8月份從校園衝向全社會。

然而，由清華附中紅衛兵所揚起的紅衛兵運動的大旗，很快被後來崛起的大學生紅衛兵接過來。自9月起，文革運動已衝擊到昔日幹部子弟紅衛兵的父輩們，他們開始對文革已有所保留了。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插手，紅衛兵運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其標誌就是出現了所謂新紅衛兵。新紅衛兵不僅更多更廣地來自非中學生，而且是文革本來意義上的造反派群眾。由「紅衛兵」到「造反派」，文革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在策略上，更多的是在群眾運動的群眾成分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1966年5月29日，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在北京清華大學附中成立。圖為該校「紅衛兵」的旗幟。

1966年9月6日，蒯大富出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紅衛兵三司」）召集人，這是紅衛兵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也是紅衛兵運動分化的開始。由於「三司」紅衛兵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他們比在此之前的「一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和「二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們更為偏激。被視為「新紅衛兵」的「三司」紅衛兵們，提出了文革本義上的造反派的最初觀點和主張：一是文革所要打倒的「走資派」就是涉及除毛澤東之外的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人；二是「踢開黨委鬧革命」，即文革由群眾自己來包辦。而「老紅衛兵」的觀點和主張對1966年9月之後的文革來說已明顯「陳舊過時」了：一是文革要在中央、省、市委一級黨組織的統一具體領導下進行，二是

文革應該主要限於反對文化藝術界、教育界等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路線。³1966年年底，以幹部子女為主導的「老紅衛兵」所代表的紅衛兵運動第一階段已是強弩之末了。

從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紅衛兵運動融進了更為廣大的群眾造反運動之中，這一紅衛兵運動的階段也可統稱為「奪權階段」。這一階段以大學生和社會其他各界成年人造反群眾為主要成分的紅衛兵運動，比起中學生為代表的紅衛兵運動第一階段來，把紅衛兵運動推入到了更大、更廣、更深、更新的範圍，直至推向了頂點。關於這第二階段的紅衛兵運動，我們可以從前面所述的清華文革初期萍蹤中略見一斑。到了1967年夏季，紅衛兵運動似乎達到了頂點。

「1967年夏季的紅衛兵運動具有空前的規模，幾乎捲進了整整一代青年學生，大批教職工參加紅衛兵組織，教職工群眾組織與學生組織在『大聯合』中合流。紅衛兵的宣傳手段不僅僅是散發油印傳單，而是主辦了數以千計的鉛印、油印小報、雜誌，建立了遍及全國的群眾組織和資訊交流網路。著名大學生的紅衛兵組織和紅衛兵聯合組織的聯絡站派駐全國主要城市和熱點地區。紅衛兵造反派的聯合活動動輒萬人，十萬人以至幾百萬人。一個城市發生問題，不通過官方宣傳媒介，不出24小時，就會在全國紅衛兵中引起反響。大、中學校紅衛兵在省、市有紅衛兵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其核心成員進入地方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參與地方重大事務的決策（儘管這種『決策』多為『貫徹』，實權不在紅衛兵領袖之手），各地大、中學校的革命委員會都有紅衛兵

3 參見關海庭：〈紅衛兵運動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56輯，頁124。

組織的代表參加。在擁護和服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紅衛兵一度得到了相當程度自主成立政治性團體、辦報、集會、遊行的權利。「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度『大民主』，調動了青年學生強烈的政治參與激情，驅使他們為『文化大革命』赴湯蹈火」。⁴

紅衛兵運動對於文革的主要作用有三點：

一、紅衛兵運動造就的「紅海洋」活動把億萬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為文革群眾運動提供了一個統一的信仰支柱。毛澤東需要千百萬青年學生狂熱的、無條件的服從和追隨，與紅衛兵學生需要依據毛澤東的權威而走出校園、衝向社會，這兩個上下交匯並且結合為一體的互動是文革得以全盤展開的必要條件。從毛澤東親筆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到他先後八次接見1100多萬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前後不到四個月，表明了毛澤東是紅衛兵運動的最高締造者和最大鼓動者，也表明了紅衛兵學生是毛澤東文革初期除人民解放軍之外唯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可信賴的追隨者。

二、紅衛兵運動進行的「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不僅為文革的全面展開創造了紅色恐怖的環境和民眾順從的氛圍，而且提供了最初的鬥爭方式。這一活動充分顯示出文革群眾運動自始就具有破壞力和暴力性，是一場紅衛兵學生所進行的全社會性的、泛道德化的政治文化專政，它在極大地毀壞祖國文化財富和民族遺產的同時，極有效地整肅了種種可能背離文革文化主流的民間思想傾向和民眾心理潛流。

4 印紅標：〈紅衛兵狂飆：全景大素描〉，載于輝編：《紅衛兵秘錄》，頁305。

三、紅衛兵運動的大串聯活動給文革觸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每一個角落提供了群眾活動的方式和途徑。數以千萬計人次的紅衛兵大串聯在中國大地上流淌湧動所形成的文革之勢，的確，是任何個人、任何力量也無法抗拒的。大串聯活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民眾政治大流動，為文革群眾運動提供了多種模式或套路，還存在著文革群眾運動在群眾的大流動中失控的可能。儘管中共中央1967年2月決定：停止全國大串聯，但是1967年春夏，許多紅衛兵組織派駐外地的記者站、聯絡站也是變相的串聯。

紅衛兵運動鼎盛之際也是其內部分化、分裂之時。幾乎每一個紅衛兵組織愈到其後期愈為不同派別的對立和衝突而大傷元氣。在眾多省、市，紅衛兵隊伍也出現了內訌和派戰。在北京，中學生紅衛兵勢力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大學生紅衛兵勢力分成了「天派」和「地派」。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和混戰到了1968年夏秋，毛澤東意識到這場運動從他手中失控有可能變為現實。早在1967年夏季，他就告誡說「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⁵到了1968年夏末，面對「不可救藥」的紅衛兵們的「錯誤」，又是毛澤東以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契機，親自結束了紅衛兵運動。

蒯大富在1968年8月16日團派總部擴大會議（差不多是團派總部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做總結發言：「希望大家要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全國造反派看著我們，全國紅衛兵看著我們。我們的老本吃光了，全國紅衛兵跟著我們吃老本，

5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91。

跟著我們倒楣。」「全國的紅衛兵，北京的紅衛兵代表性強，北京的紅衛兵也就是大學的這五家。比較起來，北大不行（一種記錄說法是『聶元梓沒有甚麼威信』，——注），師大不行，地質還好，就數北航紅旗和清華井岡山代表性強。」其中，「清華影響最大」，「我、韓愛晶垮台是小事，全國紅衛兵也跟著我們垮台」，「中央文革也跟著我們倒楣，會因此受到攻擊」。蒯大富這一番話實際上是給紅衛兵運動的死亡致了「悼詞」。的確，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敲響了紅衛兵運動的喪鐘！

紅衛兵運動結束於何時？關海庭先生認為，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關於紅衛兵問題的請示報告〉後，取消了紅衛兵組織，紅衛兵運動方正式宣告結束。⁶其實不然，「紅衛兵組織」與「紅衛兵運動」是兩回事。前者作為文革青少年的群眾組織形式之一持續了十多年，而後者於1968年夏末秋初則瀕於結束。理由如下：1、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談話，表明他對紅衛兵運動及其領袖失去了信心甚至信任；2、毛澤東派遣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等高校，實際上是「剝奪」了紅衛兵在高校紅衛兵運動中的領導權乃至文革運動中的主動權；3、昔日紅衛兵，不管新、老紅衛兵，已從整體上列入了文革的對象，從1968年底成為開赴農場、農村等「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一代青年；4、進入1969年之後，紅衛兵運動的核心——「造反」活動已經結束和消失；5、1969年之後的紅衛兵組織與以往不同的關鍵點在於，它已歸屬於工宣隊、革命委員會進而歸屬於重建後的

6 參見關海庭：〈紅衛兵運動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6輯，頁137。

黨組織的領導了；6、紅衛兵運動只存在了不到三年，而對紅衛兵運動進行最有力的歷史批判和反思的恰恰來自失落後的一代紅衛兵思想者和探索者。

毫無疑問，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是紅衛兵運動的「墳墓」。紅衛兵運動從其搖籃走向墳墓，儘管它成長的中間涵蓋於中國廣大的社會，但其起點和終點皆在清華大學，這是文革歷史的偶然巧合，還是文革歷史的必然匯合？

二 歷史的反思：談「紅衛兵情結」

在前面的「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中，我著重討論的是文革中群眾群體的某些問題，而這一節，我要通過「情結」問題來著重探討文革初期群眾運動及群眾個人問題的某些方面。

「情結」(complex) 是心理學的一個專有名詞，這一由「精神分析學派」提出的術語是指：「由一些被意識壓抑的意念(即無意識的思想、感情、知覺、記憶等)所組成的具有類似核心作用的複雜的心理現象。它能吸附許多經驗，使當事者的思想行為及情緒易受這種情結的影響而遵循一定的方式進行，形成固定的行為模式」。⁷ 換言之，情結也是指與許多因素相聯繫的複合情緒，表示一種伴隨著強烈情緒變化的觀念或思想。情結往往是由個人生活經驗中的一個重大傷害而產生的。這種傷害被埋進潛意識裏，會在人的意識裏固著於一個特殊的觀念形式上。

7 朱智賢主編：《心理學大辭典》，頁 502。

這些觀念變得充滿情緒色彩，並總是影響他的思想、感覺、行為和生活。

那麼，甚麼是「紅衛兵情結」呢？儘管這是一個見仁見智、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是，我根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於 1966 年 6 月至 7 月發表的著名三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把紅衛兵情結簡要地定義為造反情結。紅衛兵把毛澤東 1939 年為紀念斯大林誕辰所說的話當成自己造反的旗幟：「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造反情結隨著文革的發展又注入了新的內容，甚至演變成「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虛無主義情結。在 1968 年的世界舞台上，許多國家形形色色青年身上所具有的紅衛兵一類的情結實質上同樣表現為造反即反抗(rebel)情結。儘管包括中國紅衛兵在內的人類新一代青年在 1968 年之際和之後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聲勢浩大的反權威、反現今文化主流的運動或活動，但是，「反抗」並不總是意味著「反叛」，因為紅衛兵運動的起因和歸宿，一代激進青年從總體上被重新整合甚至被融進當代人類文化主流之中，多少說明了以紅衛兵情結所顯現的紅衛兵運動並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或從根本上變革人類現存的文化生活。

無疑，「紅衛兵情結」不是形成於文革之際，而是與文革的孕育和發動密切相關。在文革時期，「紅衛兵情結」得到了最廣泛而深切的表現，這種情結集中地表現於處在「青春期激情」的一代青年學生身上，這一點使紅衛兵情結不僅僅是作為個體性的心理因素和行為方式而存在，而且是作為上千萬青年學生的普遍性活動來嵌入文革初期的社會變遷以及文化動盪中。下面討論的紅衛兵情結僅就紅衛兵這一代人整體的情結而言，很難為某個紅

衛兵人物所全部具有，但是不同紅衛兵人物的情結在下述諸方面有重點和表現方式的差異，也有高低程度和潛顯層次的區別。

一、「造反有理」情結

文革時期的「造反」實質上是包括紅衛兵在內的激進群眾對自身壓抑的或社會壓抑的某些意念以及這些意念的總和所產生的反抗心理和反抗行為。這種造反是對以往社會慣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部分否定或拒絕，它表面上看來是對舊權力、舊權威的某種改換，而實際是力圖樹立起造反者自身的新權力、新權威。這種造反不同於過去歷史上農民打倒舊皇帝而自己當新皇帝的造反，根本不可能是超越現有的社會制度以及現有的政治體制而進行的社會革命。然而，這種使以往的政治範式失效、使有序生活混亂的造反，不僅成為文革初期的動力，「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⁸而且鑄就了激進群眾個人抗衡或拒絕一切自視為壓抑性的意念而直接訴諸非範式的、非制度性的心態或情緒。「造反有理」情結往往衍生成造反無序行為，更有可能的是，造反吞噬了造反者。

二、準救世主情結

這種情結大都是在高度緊張、強制甚至恐懼的意識壓抑下，為擺脫逆境而獲得某種霸主性的權力和權威所產生的。這種情結往往導致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之初的紅衛兵們，竭盡全力地去獲得自己或自己一派的某種「唯我獨尊」的地位、「唯我獨革」的

8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載《紅旗》雜誌，北京，1966年第11期，頁29。

權勢和「唯我所是」的信念，致使文革初期虛無主義潛行之際，也就是唯我論氾濫之時。

準救世主情結並不是宗教救世主（彌賽亞，Messiah）意義上的，因為它既不是旨在拯救眾生，擺脫邪惡，也不是使自己靈魂升天，獲得永生，而是以紅衛兵個人或其小派別自我為中心的霸權。這種霸權性的情結既把「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說誰？我們不幹，誰幹？」的信條化為從思想到話語的獨斷，又把「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訓言當成從內心到行為的專制。這種情結由「我」（個人，「小我」）出發，把「我之一派」（群體、「大我」）、文革的重任、祖國的發展、世界的命運、人類的前途等等繫於「我」之一身。1968年後開始流傳的佚名作者的〈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長詩充分體現了這一情結：「我們曾飲馬頓河畔，／跨過烏克蘭草原，／翻過烏拉爾的峰巔，／將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再次點燃。／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的街巷，／踏著國際歌的鼓點，／馳騁在歐羅巴的／每一個城鎮、鄉村、港灣。／瑞士的湖光，／比薩的塔尖，／葉門的晚霞，／金邊的佛殿，／富士山的櫻花，／哈瓦那的烤煙，／西班牙的紅酒，／黑非洲的清泉，／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們留念！／因為我們有／鋼槍在手／重任在肩。」⁹

準救世主情結無疑是紅衛兵們把自己的使命和義務急劇地、無限地放大：君臨天下、扭轉乾坤，擔當朝綱，救生育民，皆不在話下。問題在於：這種情結的當事者不是唯一的，當無數

9 轉引自郝海顏主編：《中國知青詩抄》（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293。

個如此之類的情結當事者產生相互關係甚至對立時，這些情結及當事者們又如何協調而不致相互廝殺、吞併呢？具體講，又有哪一個準救世主情結才是最高的主宰呢？這種在文革中甚至連自己都難以解救的情結永遠不能企及救世主情結。當紅衛兵踏著〈國際歌〉的鼓點而癡心妄想地去「征服」世界時，〈國際歌〉中的歌詞「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對他們來說又意味著甚麼呢？

三、革命實用情結

這裏所講的革命只是文革意義上的「革命」。革命幾乎已成為紅衛兵個人或群體為求得較順利的發展和爭得有益的境遇的唯一出路。在文革時，「革命」及其情結的最高形式和全部含義在於「權」，即奪權、掌權、用權，循環往復，以求更大更高的「權」。「革命」總是意味著一部份人鬥爭著另一部份人，或者是一部份人左右著另一部份人。但是，誰為革命？為誰革命？具體說來，誰來掌權？為誰掌權？無不使所有的革命情結植根於革命群眾的不同利益和需求之中。「革命」總是被當成來去匆匆、如同「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可以不斷改換或取捨的道具。「革命」不僅僅沒有目的，而且彷彿永遠不顧及目的，這使革命情結大多帶有投機鑽營特徵和功利實用屬性，把「革命」當成了唯己所需的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革命實用情結總是以「革命無罪」為革命者、為革命群眾的過失甚至罪責開脫。「革命」彷彿永遠不計代價、不怕交「學費」甚至不在乎自虐、自戕，因為「革命」本身就是不擇手段。老鬼（馬清波）先生對於這種革命情結作過淋漓盡致的描述。¹⁰

10 老鬼：《血與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四、泛敵意識情結

文革前和文革時所大力提倡和推行的「極端化的階級鬥爭論」，在社會生活中特意製造了普遍緊張的形勢和普遍壓抑的氣氛，這也在紅衛兵們內心中產生了把有關自己的不幸、失敗和挫折的意念歸之於形形色色敵對者的破壞的泛敵情結。這種情結帶來的是「假想敵」的泛化，而在實際生活中即使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甚至個人自身也會具有革命的行動與敵人的觀念這樣的二重分裂。

這種情結在極盡誇大敵情之能事的同時，也顯現出紅衛兵們內心的不安或虛弱。「敵人」的普遍存在和層出不窮，方顯得文革鬥爭的必要，而且這種鬥爭的持久和殘酷是由五花八門的「敵人」所「充實」和「規定」的。泛敵意識情結在很多情況下反映出的是紅衛兵們對其他群眾的權利剝奪，是為紅衛兵們自己無所不用其極的鬥爭手段尋找口實。泛敵意識情結還滲透在文革時廣泛流行的「對著幹」的「泛敵思維模式」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文革的「兩個凡是」最終把文革描繪成了最大限度地「打擊了敵人，鍛煉了人民」的歷史漫畫。

五、迷信領袖情結

無論是把文革最高領袖奉為「紅司令」還是「紅太陽」，紅衛兵們對於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以及對於確保實現它們的行為和心理來說，文革最高領袖的權威和意志是他們的最終依據。對於領袖的迷信和崇拜已演變為廣大紅衛兵把包括自己情結在內的方方面面合法化的資源。對領袖之一切加以神化的情結實際上是伸張個人性的東西，並力圖化解個人經

歷中的傷害性因素。這種情結在文革中彷彿是紅衛兵們求得安身立命的一種情結，但它並不能總是得到如願以償的滿足。

六、暴力崇尚情結

處於青春期激情和衝動的廣大紅衛兵最容易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走入極端。由於尋求制敵取勝的捷徑，也由於日益嚴峻的「階級鬥爭論」的教化和「革命論」的薰陶，把暴力作為戰勝對手從而實現自己諸多意念的最有效、最難以抗拒的方式，似乎成為廣大紅衛兵行為中無法洗刷掉的情結痕跡。通過訴諸暴力，紅衛兵「大鬧天宮」的心態才有籌碼，紅衛兵「殺出新世界」的舉動才有回應。紅衛兵在1966年8月間「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充分證實了紅衛兵的暴力情結是文革暴力的元兇之一。紅衛兵所帶來的紅色恐怖在歷史地顯現了紅衛兵的初始角色和功能之後，也為紅衛兵運動的壽終正寢埋下了伏筆。

暴力崇尚情結實際上使廣大紅衛兵的歷史活動過多地滯留於政治和文化的表層，過多地尋求權力形式，不可能深入到政治的核心即政治價值本身，不可能達到文化的核心即文化的重建，因為紅衛兵一味地橫掃，專門地破壞，除了使用暴力之外難於自立，並使自己的暴力崇尚情結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烙有準軍事性的印記。暴力崇尚情結一旦付諸實施，暴力的慘酷、殘忍、激烈和兇狠則一發難以收拾，甚至該情結本身具有的「雙刃性」也會指向暴力者本人。暴力崇尚情結的背後是一大堆不堪回首的往事「廢墟」和一大堆痛心疾首的記憶「殘片」。這一情結也最大限度地消蝕了暴力者本人的心靈。

七、血統出身情結

紅衛兵運動及其組織最初源於血統出身問題，具體地說，源於「革命接班人」問題。最早的紅衛兵的血統出身情結是中國封建宗法傳統的文革怪胎，毫無例外，它是一種歧視的情結和迫害的情結，它的宣洩就是文革初始特意地劃分人與人之間「等級」對立的仇恨和施虐。

血統出身情結不僅以「階級鬥爭論」為前提，而且是「階級鬥爭論」的蛻化。以個人的血統、家庭出身「純正」與否來劃分人們在社會地位、利益、職責、身份等等的標準，來衝破以個人的能力和業績而實現個人價值所帶來的壓抑，最終把血統出身情結當成了社會生活中歧視、壓迫和奴役的心理基礎，致使文革自始就帶有了濃厚深重的封建性質，也使文革的愚蠢和蒙昧處於封建時代的水平。

血統出身情結在20世紀有著較多的變種，例如，法西斯主義的「種族論」、民族沙文主義的「種性論」等等。不管這種情結披著甚麼偽裝，也無論它持有甚麼「道義」上的強辭詭辯，它都使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造反不得人心而走入文革最早的死胡同，並使整個紅衛兵運動不可能給社會上任何一個階級、任何一個階層甚至任何一個紅衛兵個人帶來解放，就連紅衛兵運動本身都在這種情結的支配下，喪盡民心，失去根基，命運不濟，早早夭折。

八、道德專政情結

文革作為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強制性的政治運動，借助於紅衛兵的造反派活動，在全社會範圍內，極大地推行道德強制措施。「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新思想、新

文化、新風俗、新習慣，致使個人生活全部而深刻地顯現出文革道德的專政性。為了突破那些調整和制約個人行為規範的非文革道德的約束，為了確立一種高度整合也是高度強制而有效的文革道德，為了消除抑制文革如火如荼地迅猛開展的各種阻力，為了把文革變成一場造就「新人」和「四新」世界的泛道德化運動，就必然讓包括紅衛兵們在內的億萬群眾使用一個腦袋思維，令文革的文體顯示出單一的軍事化文采，叫文革的話語呈現出單一的暴力性風格，把凡夫俗子的衣著、舉止、風貌、愛憎、興趣、習慣、心境等等染上單一的色調，使平民百姓在做出行為之前和表達觀念之前就已在潛意識中嵌入了固定不移的框架。

道德專政情結制約個人生活的一切規範不是基於個人的自覺、自律，甚至不是基於個人的自發、自願，而是來自於社會政治化的道德高壓專政。道德專政情結完全有可能使生活失去活力，使思想喪盡創新，使文化丟棄生機。

九、英雄主義情結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人，只要是處在溫飽線以上的，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甚麼？——是平凡」。¹¹處在青春期成長的紅衛兵們內心固有一種力爭在眾人中出人頭地、高人一籌而做出非凡舉動和事蹟的情結。這種可稱之為英雄主義的情結在文革初始捲入到造反的政治風暴，而不是按照青春期本性自由而健康地發洩，就會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具有很大的破壞力甚至摧毀力。

11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219。

英雄主義情結與那種淡泊名利、耐住平凡、與世無爭、甘守寂寞的心態和作風是格格不入的。它要呼喚激情，訴諸信仰，超度想像，浪漫自我，自視為人生舞台上頂天立地、主宰芸芸眾生的「大英雄」。同時，這種情結借用暴力，置他人的權利於不顧，踐踏民主，無視公平，以理想主義的情懷「重整」世界，以禁欲主義的風尚禁錮生活，以蒙昧主義的輕信、無知和盲目炫耀英雄世界的荒唐和無聊，以自大狂的心態把自己扮演成文革先知先覺的「天兵天將」，視眾人為群氓。英雄主義情結往往最終造就的不是文革的「英雄」，而是文革的小丑、瘋子或捐客。

十、理想至上情結

理想是人們所共有的，它是在現實之基礎上對於現實的超越以及對現實的未來發展所作的期望和努力。紅衛兵們把自己的理想「至上化」，即理想不但脫離了孕育並產生理想的現實，而且以「犧牲」現實，最終使理想自身走向異化。在文革中，紅衛兵們為理想而戰，從不計較為實現理想而使用的手段，從不審視所樹立的理想的內在價值，甚至在理想的大旗下，以理想殺人，以理想的名義來做出種種迫害、殘暴、虐待的勾當。紅衛兵們理想中所包含的非人道主義因素已不僅僅是紅衛兵們的偏執、狂熱和虛妄所能解釋的。理想至上情結進行宣洩的是要掃除一切「非理想」的東西，「唯理想而理想」，不在乎理想的能否實現和如何實現。而一旦把理想當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社會烏托邦，理想的恐怖和專制就接踵而至。

歷史已給文革時代的理想做出了定論：「那是一個理想被萬眾高歌的時代，是理想被體制化的強權推行天下武裝億萬群眾的時代。但那些光彩奪目的理想之果，無一不能被人們品嚐出

文化、新風俗、新習慣，致使個人生活全部而深刻地顯現出文革道德的專政性。為了突破那些調整和制約個人行為規範的非文革道德的約束，為了確立一種高度整合也是高度強制而有效的文革道德，為了消除抑制文革如火如荼地迅猛開展的各種阻力，為了把文革變成一場造就「新人」和「四新」世界的泛道德化運動，就必然讓包括紅衛兵們在內的億萬群眾使用一個腦袋思維，令文革的文體顯示出單一的軍事化文采，叫文革的話語呈現出單一的暴力性風格，把凡夫俗子的衣著、舉止、風貌、愛憎、興趣、習慣、心境等等染上單一的色調，使平民百姓在做出行為之前和表達觀念之前就已在潛意識中嵌入了固定不移的框架。

道德專政情結制約個人生活的一切規範不是基於個人的自覺、自律，甚至不是基於個人的自發、自願，而是來自於社會政治化的道德高壓專政。道德專政情結完全有可能使生活失去活力，使思想喪盡創新，使文化丟棄生機。

九、英雄主義情結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人，只要是處在溫飽線以上的，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甚麼？——是平凡」。¹¹處在青春期成長的紅衛兵們內心固有一種力爭在眾人中出人頭地、高人一籌而做出非凡舉動和事蹟的情結。這種可稱之為英雄主義的情結在文革初始捲入到造反的政治風暴，而不是按照青春期本性自由而健康地發洩，就會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具有很大的破壞力甚至摧毀力。

11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219。

英雄主義情結與那種淡泊名利、耐住平凡、與世無爭、甘守寂寞的心態和作風是格格不入的。它要呼喚激情，訴諸信仰，超度想像，浪漫自我，自視為人生舞台上頂天立地、主宰芸芸眾生的「大英雄」。同時，這種情結借用暴力，置他人的權利於不顧，踐踏民主，無視公平，以理想主義的情懷「重整」世界，以禁欲主義的風尚禁錮生活，以蒙昧主義的輕信、無知和盲目炫耀英雄世界的荒唐和無聊，以自大狂的心態把自己扮演成文革先知先覺的「天兵天將」，視眾人為群氓。英雄主義情結往往最終造就的不是文革的「英雄」，而是文革的小丑、瘋子或搨客。

十、理想至上情結

理想是人們所共有的，它是在現實之基礎上對於現實的超越以及對現實的未來發展所作的期望和努力。紅衛兵們把自己的理想「至上化」，即理想不但脫離了孕育並產生理想的現實，而且以「犧牲」現實，最終使理想自身走向異化。在文革中，紅衛兵們為理想而戰，從不計較為實現理想而使用的手段，從不審視所樹立的理想的內在價值，甚至在理想的大旗下，以理想殺人，以理想的名義來做出種種迫害、殘暴、虐待的勾當。紅衛兵們理想中所包含的非人道主義因素已不僅僅是紅衛兵們的偏執、狂熱和虛妄所能解釋的。理想至上情結進行宣洩的是要掃除一切「非理想」的東西，「唯理想而理想」，不在乎理想的能否實現和如何實現。而一旦把理想當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社會烏托邦，理想的恐怖和專制就接踵而至。

歷史已給文革時代的理想做出了定論：「那是一個理想被萬眾高歌的時代，是理想被體制化的強權推行天下武裝億萬群眾的時代。但那些光彩奪目的理想之果，無一不能被人們品嚐出

虛偽和專制的苦澀。」「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勝利，也是最大的毀滅和冷卻。」¹²

紅衛兵情結是否是紅衛兵性格(個性)呢？從心理學上來看，情結在個人心理發展史上比性格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具有更深厚的生活背景和經驗基礎。紅衛兵情結並不會隨著紅衛兵運動的結束乃至文革的破產而消失，它還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或轉型。這種曾給我們祖國和民族帶來巨大創傷的情結是否會改頭換面地進入 21 世紀呢？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我個人時常在想，「紅衛兵情結」集中代表了 20 世紀 60 年代和 60 年代前後的某種大眾社會心理。這種以千百萬青年學生的歷史經驗及歷史性格為主要內涵的情結，也集中展現了 60 年代和 60 年代前後國民性的獨特方面。我常常反問自己：從 20 世紀初國民的「阿 Q 性格」到 60 年代的「紅衛兵情結」，中華民族的國民性又有多大的進步和怎樣的轉換呢？

三 歷史的輪回：評價紅衛兵問題

隨著文革研究的不斷擴大和深入，人們一定會不斷地提起和討論紅衛兵問題。當然，人們對文革的不同理解乃至不同情懷，也一定會有不同的態度和觀點。紅衛兵運動是文革中獨一無二的運動，即它是一代激進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造反運動。但是，「紅衛兵現象」則不僅是文革時期中國的，而且是 1968 年之

12 韓少功：〈完善的假定〉，載萌萌主編：《1999 年獨白》(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年)，卷二，頁 85。

際世界許多地區和不同範圍內屢屢出現的現象。評價紅衛兵的問題涉及到對 20 世紀 60、70 年代青年及青年運動的認識，關係到對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的文化危機與文化轉型的理解。

在中國，對紅衛兵運動和紅衛兵現象等問題的研究和爭論至今都是一個關係到千百萬人過去的經歷、現在的生活和未來的走向的熱門話題。因為，「實際上，紅衛兵一代的涵義，包括了整個 60 年代正在讀書年齡的所有人，即形成了具有共同經歷、共同體驗、共同特性的一代人群體」。¹³「紅衛兵一代人」與「老三屆一代人」、「知識青年一代人」有部份重合，也有部份轉換或部份遞進。在很多情況下，可用「紅衛兵一代人」涵蓋「老三屆一代人」和「知識青年一代人」。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以來，關於紅衛兵問題的態度和評價大致上有兩類：

一是「青春無悔」的態度，即認為不管紅衛兵犯有多大的錯誤，而又如何被利用和曾失落過，但是，「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原因不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是愚昧、盲從、打架、兇暴，可是在他的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思的幽靈，是壯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¹⁴「今天，在我們身上如果還能找到一些沒有被歲月改變的東西的話，那就是追求。在某種意義上，紅衛兵運動是這代人在追求過程中不光彩的一頁。」¹⁵安文江先生在

13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頁 376。

14 轉引自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頁 23。

15 轉引自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頁 101。

上一世紀80年代末就對他們那代人當年的紅衛兵生活經歷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吶喊：「我不懺悔！」¹⁶這種態度和評價進入90年代後在眾多的「難忘歲月」紀念活動（如「知青紀念活動」）中又得到了某種強化，並在日後的人文精神的有關討論中，在某些高舉「理想主義」大旗的人士的言論中得到了反映。

另一類是真正批判和反思的態度。李輝先生以客觀、冷靜、歷史的眼光對「紅衛兵一代」做出了概述：「在20世紀中國，紅衛兵也許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有悲劇色彩、也最為尷尬的一代。轟轟烈烈與冷冷清清，叱咤風雲與平淡瑣碎，豪氣干雲與無可奈何，諸多形成強烈反差的形態，在短短幾年時間裏，都以未曾預想的方式在他們身上出現」。¹⁷李輝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和諸多文集把有關紅衛兵問題的討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著名作家張抗抗女士作為當年紅衛兵、「老三屆」、「知青」中的一員，以擲地有聲的反思做出了歷史性的評說：「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革的犧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記文革中抄家破壞文物的紅衛兵是這一代人；不要忘記文革中打死老師的革命小將是這一代人；不要忘記瘋狂地鼓吹並推行血統論的也是這代人。紅衛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實，已是昨天的噩夢，但有多少人真誠地懺悔過，用心靈去追問我們當年為甚麼受騙上當，為甚麼如此愚昧無知？」¹⁸

16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五冊，頁299-335。

17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頁22。

18 張抗抗：〈無法撫慰的歲月〉，載《文匯報》，上海，1998年4月13日。

我完全贊同李輝先生和張抗抗女士等對紅衛兵及「老三屆」一代人所作的批判和反思。今天，人們越來越多地對紅衛兵一代人所帶來的紅衛兵運動持否定性的態度，即使有個別高唱紅衛兵運動的「理想高尚」、「動機純正」、「為了追求」等一類的腔調也是懸浮在可以理解的、情感化的東西之上。對於紅衛兵問題的評價，我們已不能僅僅滿足於對紅衛兵問題所持的否定性態度，不應過多地停留在道德評說上，即在「好」與「壞」之間或「對」與「錯」之間做出抉擇，而是應該深入一步，從歷史的必然和邏輯的必然相統一的高度，並從歷史的真實和邏輯的可能相統一的方面，著重研究和把握紅衛兵問題為甚麼是可能的？它又如何是可能的？它為甚麼是必然的？它又如何是必然的？這有待有於廣大學者研究的共同努力。這裏，我僅僅談談我的幾點看法：

其一，紅衛兵的孕育和形成是與新中國的歷史密切相關。紅衛兵一代人的年齡與新中國的年齡十分相近，從紅衛兵一代人的年齡構成來看，他們的年齡上限與下限同1949年相距不到10年，甚至更短，人們在探索紅衛兵形成的起因時大多指出了文革前這一代成長著的青少年所經歷的諸多社會政治運動而受到的影響，指出了文革之前對於青少年學生教育方面存在的片面和缺陷等等。實際上，這也就是說，紅衛兵運動與新中國經歷了17年後而到了1966年所發生的轉折是完全同步的。17歲（或17歲左右），這對人生是充滿理想、詩意、激情和追求的年齡，同時也是潛在地具有奔放、狂熱、浮躁、盲動、好勝、偏執和破壞力的年齡；17歲，這對於一個新興的國家同樣是充滿了朝氣風發、發奮進取的年齡，同時也是潛在地充滿了荊棘叢生、步履艱難的年齡。紅衛兵這代人與新中國的歷史息息相關；翻開新中國17年的歷史，就不難理解紅衛兵的形成和發展。我本人並不否認紅

衛兵的某些理想中具有合理的因素，然而，由於紅衛兵目的的荒唐和手段的殘暴，他們的理想最終分崩離析。正如我們的祖國在文革十年的歷史中，不管喊出了多少震天動地的口號和樹起了多少耀眼顯赫的目標，我們的祖國並沒有富強起來一樣。

當那些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當年紅衛兵今天喊出了「青春無悔」、「理想萬歲」等口號時，當他們成群結隊前往昔日下鄉插隊的村落時，他們是否曾對紅衛兵運動及紅衛兵情結作過批判性的反思和否定呢？當他們一遍又一遍地為昔日種種壯烈的情操和高尚的事蹟而感動得淚雨滂沱、不能自己時，當他們一次又一次舉辦或開辦各種紀念「難忘歲月」活動以及有關店舖時，他們要把人們的心態引向何方？這是一個很令人值得警覺的問題。

正是 1968 年年底紅衛兵運動結束之際，一代紅衛兵才找到了他們自己的文革初步的歷史歸宿。他們上山下鄉到農村或學軍鍛煉到農場，接觸到了中國社會最下層也是最基本的實際，生活於作為中國千百年來「脊梁」的億萬農民之中，用他們自己艱苦卓絕的勞動和不斷批判的反思，一次次地使思想和感情向否定文革的方向趨近或升騰。正是在農村，一代紅衛兵才懂得了甚麼是中國的實際。一代紅衛兵從狂熱走向沉淪，從都市走向農村，從文革漩渦中心走向文革洪流邊緣，從求索走向自新，從困惑走向覺悟，從破壞走向創造，我們的民族幾乎沒有哪一代人像紅衛兵這代人擁有歷史的重負。如今，他們這代人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行各業的支柱性的一代，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過去、現今和未來。正如我這一節標題所用的是「歷史的輪回」，它旨在表明當年紅衛兵一代人所批判、所摧毀的許多東西恰恰是他們今天大力建設和發展的東西。儘管歲月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是歷史彷彿開了一大玩笑，它使一

代紅衛兵人一次又一次地處在歷史活動的起點上。從整體上講，紅衛兵一代人的命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同軌共向。

其二，紅衛兵情結給一代紅衛兵所帶來的沉重的歷史抱負與他們相對淺薄的歷史根基之間的差異幾乎是無法彌補的。紅衛兵情結過早地使紅衛兵一代人離別了青少年或青年的生活，過早地走入了成年或中年的生活。這類情結對於紅衛兵們的心理和行為來說過於沉重，格外壓抑，甚至苦不堪言，難以化解，宣洩或排解的唯一渠道只能是像文革這樣一類以青年學生造反為先鋒的政治造反運動。在我的採訪中，許多紅衛兵學生都談起當年學校生活中，那種非常畸形的政治堅定不移、思想合格過硬、家庭出身純正和作風艱苦樸素之類的競爭給那些年輕的心靈造成的巨大而又無形的壓抑。相比之下，學習優秀是從屬於政治標準的。

就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之始，至少沒有哪一所大學的學生敢於在聶元梓大字報公開發表前貼出自己的宣言。恰恰是一些尚不瞭解政治鬥爭的複雜和殘酷的中學生最早站出來。紅衛兵就是在階級鬥爭理論指引下，青年學生們那種狂熱的政治信念、盲目的個人崇拜、強烈的青春激情的產物，是那種『天降大任於斯人』式的歷史使命感把青年學生們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幕前。」¹⁹我個人可以做出肯定性的推測：當年一代熱血青年的「紅衛兵情結」所積蓄的政治能量以及將要爆發的政治熱量，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形態上都略早於文革的正式開場，即文革最早的那種群眾「演員」定型略早於文革「舞台」的搭建配置。這裏僅舉一個事例就可證明，毛澤東本人在文革之始也沒有充分預料到青年學生中「蘊藏」如此

19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頁 109。

一股文革火山爆發時迸出的強大的政治「熔岩」，他曾說：「我還沒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就鬧起這麼大的事。」²⁰

其三，紅衛兵一代人所掀起的紅衛兵運動乃至文革運動，如同 20 世紀中國以往諸多社會運動一樣，是以青年為先鋒、為主體的。這類青年運動具有的創造、大膽、獨特和新穎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朝氣，給歷史注入了某種生機，但它在歷史上大都不是相對短暫，就是很快分化瓦解。然而，青年運動很容易引起社會大多數階層群眾的同情、共鳴和支持。青年運動在體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某個方向的同時，它更有可能被青年運動之外的一些勢力所利用。以青年運動為旋渦的中心，社會生活洪流之中的各種龍目魚珠被捲入進來，都會對如此的青年運動帶來某種改換或轉型。這一點很有可能使青年運動變為非青年運動。毫無疑問，紅衛兵運動也是 20 世紀中國所有的青年運動中最大的一次破產和異化。

其四，即使在上述關於紅衛兵評價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場的背後，也有實實在在的利益在起作用。十分有意思的是，許多當年紅衛兵所懷舊的大都是他們在農村、在鄉下的艱苦生活及其「難忘歲月」，但很少有人站出來直陳坦言自己在文革初始的那一年半載裏的所作所為，更沒有當年紅衛兵成群結隊地向他們曾經施虐、施害過的老師以及其他人道歉悔過。因為文革最初的幾個月裏，畢竟是紅衛兵們也即未來的部份知青們最「風光」的日子呀！而過多地講述自己的艱難經歷，這是一種歷史責任的逃

20 〈毛主席在十月二十四日彙報會議上的講話〉，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無印發者署名，北京，1967年2月，頁16。

避，還是一種歷史態度的虛飾？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對於某些當年紅衛兵來說，既然過去的那段歲月如此「難忘」和「無悔」，那麼他們為甚麼不乾脆辭去今天已有的相對優越的條件而重返依然還相對艱苦的舊地，在那裏紮根安家呢？或者，把他們自己的子女（年齡與他們當年上山下鄉之年齡相近）送入當年曾是他們「接受再教育」的廣闊天地呢？實際上，「青春無悔」之類的呼喊掩蓋不住「青春有悔」、「青春無奈」的虛弱和惆悵。

面對紅衛兵當年的暴行和罪過，如今有幾個當事人公開加以反思和檢討呢？又有幾個當事人敢於捨棄自己那點面子和那些利益而向歷史、向受害人做出悔過呢？「無論甚麼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正是如此。……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都永遠沉淪了」。²¹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面對慘絕人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所殘害的亡靈，哲人們發出了吶喊：我們的生活已失去了詩性，我們必須不斷從內心拷問我們自己的生存價值和意義；那麼，面對文革這樣一場給包括一代青年在內的民族和祖國帶來浩劫的運動，面對文革中那些難以計數的無辜的冤魂，我要說：我們的生活再也承受不起那烏托邦的詩意之「輕」了，我們同樣必須不斷從內心拷問我們自己的生存價值和意義。

21 陳凱歌：〈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原載《中國作家》，北京，1993年第5期；後載柳萌主編：《在劫難逃》，頁144。

張抗抗女士那〈無法撫慰的歲月〉一文寫出了包括老紅衛兵在內的「老三屆」一代人那無法撫慰的心靈和無法撫慰的經歷。在把「老三屆」一詞改成「紅衛兵」一詞之後，我本人願借用張女士該文的一段話，奉獻給那些至今還沒有走出紅衛兵情結陰影的「紅衛兵」：「紅衛兵的紅衛兵化，這代人固執的『紅衛兵情結』，是近年來深深困擾著我的一種憂慮。我寫下這些也許觸痛紅衛兵傷痕的話語，正是因為許多人尚在違心地用『無怨無悔』的結語，逃避對自身的清理與整合。我願我們這代人能走出紅衛兵的陰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進步的大潮，從容地邁向二十一世紀」。

跋 念茲在茲

「1968年」的幾點啟示

1968年對於文革、對於20世紀中國來說是十分不平凡的一年，它是文革轉折性的一年，即在這一年裏，文革的矛盾和危機全面顯露出來，並且文革群眾運動走向衰落。對於經歷過1968年的人來說，那是刻骨銘心、夢牽魂繞的一年，也是失望與希望同生共長的一年。1968年是20世紀中國百年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與其他一些具有劃時代意義或標誌性意義的年份，如1911年、1919年、1937年、1949年、1957年、1978年和1989年等相比，1968年對於20世紀中國意味著甚麼呢？對於那些1968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人來說，意味著甚麼呢？21世紀出生和成長的人們又將如何看待1968年呢？

「1968年」如今已成為學術界一個非同凡響的新術語，具有了深切的思想意蘊和歷史內涵。¹

1 參見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原載《讀書》，北京，1995年第10期；後全文載萌萌主編：《1999年獨白》，卷一，頁375-89。另參見陳平原：〈無法回避的「一九六八」〉，載《萬象》，瀋陽，1998年，創刊號。還可參見Robert V. Danniels, *Year of the Heroic Guerrilla-World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196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ul Berman, *A Tale of Two Utopias — The Political Journey of the Generation of 1968*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一 從「文革」十年看「1968年」

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文革戰略部署來看，1968年是進入文革的「鬥、批、改」決定性階段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提出了五項戰略任務：1、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2、繼續大搞「鬥、批、改」。按照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文革決定的〈十六條〉：「鬥、批、改」即「鬥垮」各類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及修正主義，「改革」文藝、教育等事業和「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3、整黨建黨；4、擁軍愛民；5、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確，「無產階級司令部」認為，在1968年一年裏，文革已到了鞏固、修整的時候了。例如，中共中央於1967年底發出關於徵求中共「九大」的意見通知，打算在1968年召開中共「九大」，恢復黨組織的生活。1967年12月初，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就是證明。

然而，全國性的群眾派性的氾濫，各類群眾組織的分裂、論戰，特別是此起彼伏的大規模武鬥，使「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文革戰略一再受挫，致使該司令部1968年當年最大的任務實際上是遏制群眾運動，結束群眾武鬥，消除群眾派性，整肅群眾組織。為此，「無產階級司令部」遇到了他們始料不及的重重困難，並使他們所預定的1968年的各項任務一再延遲。

相比於1966年，1968年的文革不是點火引爆的一年；相比於1967年，1968年的文革也不是「天下大亂」的一年。1968年的文革，其重心或主要趨勢是「收」的一年，而在1968年之後的文革年月則是「治」的年月。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天下大亂

達到天下大治」。儘管對達到天下大治來說，1968年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性的一年，但是，到了文革結束之際，這種大治也從未完成或達到過。到了1968年，文革所要打倒或整治的對象的任務已基本完成，文革所要奪取的各單位（或部門）、地區的權力的目標也大致實現，那麼1968年的文革自然而然地就面臨著一個如何確立和如何鞏固文革的秩序和權威的問題。自1966年年底至1967年初就已紮根下來並且蔓延開來的群眾運動問題以及不同階層的群眾利益的驅動，根本不可能適時而相應地把文革的任務從「打倒」、「奪權」轉換成「重組」或「安定」，反而以群眾自己的派別「內戰」致使文革極有可能走向完全失控、完全無序並在1968年就有可能破產的境地。「無產階級司令部」多次而又無效地告誡所有群眾組織要克服派性、要實行大聯合、要走入文革「鬥、批、改」的軌道，甚至還有毛澤東本人的警告：現在正是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群眾運動本身就是文革自身的一把「雙刃劍」，不管它昔日如何砍倒了文革對象，也無論它往日怎樣劈開了文革通道，然而當它在1968年的大武鬥已具有「背離」「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傾向時，它也就走到了自己的盡頭。「紅衛兵真叫禍人開始禍已告終！『狗』打跑了，打狗棍的最好歸宿是灶膛」。²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就是文革1968年一個如此的歷史「座標點」。

從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領袖時，林彪畫龍點睛地批評這些領袖「落後」於文革的那句話（「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中，可以確定，1968年文革

²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五冊，頁321。

發生的重大轉折，不僅在於文革的主體以及文革的對象發生了變化，而且更主要的是文革的任務和文革的進程發生了轉變。恰恰後一點，是包括紅衛兵領袖在內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群眾沒有看到或者是難以接受的，因而，他們不願自動退出文革歷史舞台，甚至不願居於文革的「次角」或者「末陪」的地位。

1968年可以說是文革主角發生置換的一年。以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轉捩點，過去在1966年成為文革先鋒和紅衛兵主力的一代青年學生、在1967年成為全國性奪權骨幹或中堅的造反派群眾，不是變為與其所打倒的「走資派、黑幫、知識份子反動權威」多少有些相似的文革對象，而被迫前往農村、農場等「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和改造，就是開始從整體上失落、分解或轉化，很多人成為文革最初清查極「左」份子以及極「左」勢力運動的對象。毫無疑問，1968年之後的文革運動的主體已不是自發的或者自覺的群眾運動以及群眾鬥爭了。

從1967年1月開始的全國性的奪權鬥爭和隨之而來的建立除台灣、香港和澳門地區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區的文革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在進行了長達20個月的曲折而複雜的努力之後，終於在1968年9月底隨著新疆、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文革已進入了一個相對休整和重建黨政領導權力、權威的歷史階段，儘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會於1970年底至1971年8月才陸續重建起來。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結束還預示了這一階段不可避免的到來。在1968年之後，文革的重心或主角已由廣大群眾及其代表紅衛兵青年學生轉向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幹部及管理人員。造反派組織及其個人在整體的衰落，群眾運動由對外造反起家到對內武鬥衰敗的命運，原黨的各級幹部及管理人員逐步而又勢

不可擋地重新回到昔日的領導職位，這些都表明：到1968年年底，文革群眾組織已經「過時」，文革群眾運動的方法已顯「陳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迫切需要文革進行了兩年多之後相對的社會穩定和社會整合，並在此之上大力重建由黨的各級幹部自己（而不是由沒有黨所領導的群眾）來主導的社會各類各級權力及權威。

但是，自1968年文革群眾運動的衰落到1968年之後黨的各類各級權力及權威的重建，中間還經歷了一個必然的過渡階段，這就是當時文革的高度軍事化的「軍管」階段。至1968年9月底成立的除台灣、香港和澳門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中，所有主要領導人的成份，軍人佔了約80%或四分之三。這一點，連一位普通的外國學者也看出來了：「鑒於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受到破壞，是軍隊在牢固地控制著中國」。「毛澤東的這場清除他的敵人和重振革命熱情的運動導致了如此大規模的混亂和狂熱，以致使得軍隊成為唯一的能夠恢復秩序的力量」。³因而可以比較一下，為甚麼毛澤東在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鼓勵和支持廣大群眾去「造」除了中央之外的黨政各級組織及其領導人（「黨權」）的「反」，而在1967年8月之際，又是毛澤東本人堅決刹住那股全國性的衝擊解放軍眾多單位（或部門）及其領導人（「軍權」）的狂潮，並授意清除那些有可能從他手中失控的反軍、亂軍的群眾派別及其代表。然而，恰恰又是毛澤東本人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中號召廣大群眾去打倒所謂包括混進軍隊的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澤東本人

3 克利夫頓·丹尼爾主編、丁祖馨主譯審：《二十世紀大博覽》（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989。

的這些矛盾狀況也反映出了文革在 1968 年前夕的格外混亂和動盪。可以說，至少在 1967—1968 年的毛澤東心目中，「軍權」大於、高於、重於「黨權」，迫於文革的特殊形勢，他已放棄了他本人多年所倡導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宗旨。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軍人成份約佔 40%。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時也提及當時日本和蘇聯對中國此時「軍事官僚體制」、「軍事官僚專制」所進行的批評，毛澤東說：「讓人家去講！」⁴ 由此可見，從文革最初兩年的群眾運動，到 1967—1968 年「軍事管制」及軍隊「三支兩軍」的愈益突出，再到 1971 年林彪事件後，軍隊愈益從文革大局淡化，黨政各級幹部全面重新執掌文革大局，文革進程的重心或主角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

總之，1968 年是文革時期國民經濟損失最大、生產建設最差的一年，⁵ 也是文革群眾運動窮途末路的一年。

二 從中國 20 世紀百年看「1968 年」

中國的 20 世紀是中國歷史急劇地、被迫地從封閉型的農業文明社會逐漸走近開放型的工業文明社會的世紀，是從前現代化社會甦醒過來而向現代化社會邁進的世紀，是經歷了中國封建帝制最後十多年歷史、軍閥混戰近二十年歷史、日本帝國主

義侵略十多年歷史(1931—1945 年)和國共兩黨決戰後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世紀。這一百年來，中國經歷的時代變化、完成的社會轉型和遭遇的種種苦難和危機，完全超過了以往中國數千年歷史的總和。20 世紀對中國和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自新、自立的世紀，是使一個具有數千年古老傳統文明(不同於其他古老傳統文明那樣絕跡)不斷趨向現代化文明的世紀。20 世紀，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都是一個永遠值得我們反思和汲取力量的世紀。

1968 年在使文革群眾政治「內戰」瀕於結束的同時，它使文革發展第一次進入了全面的低谷，預示著文革第一次大規模地開始在民眾心中特別是一代青年學生心中的動搖甚至塌陷。一代青年學生的先知先驅者在 1968 年這個不平凡的年度開始滋生出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的追求，孕育出伴隨著理想危機與批判探索同生共長的信念。這些追求和信念在 10 年之後、20 年之後乃至 30 年之後成為整個中國人民的歷史實踐。在此意義上，1968 年是 20 世紀中國的一個「收穫」了失望而卻又「種植」了希望的年度。

1968 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步履停滯而損失沉重的一年。文革群眾政治「內戰」幾乎使現代化建設夭折而無出頭之日，但是文革自身的發展就否定了它對現代化建設的中斷。1968 年之後的幾年經濟建設(儘管是戰備型經濟)的反彈就是證明。1968 年是 20 世紀下半葉中國和平時期由於群眾政治運動而未能使億萬群眾生活得以改善的一年！

1968 年是中國當代思想史上具有創始性意義的一年。正如朱學勤先生所說：「這一代人的精神覺醒，大致可以 1968 年為界」。「1968 年問題中最令人困惑的焦點」實質上就是：「革命」意味著甚麼？「革命」之後怎麼辦？這些被歷史地命名為「一九

4 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十三冊，頁 35。

5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356-59。

六八年人」，「他們不是知識份子，卻又比知識份子更像知識份子」。「那些『六八年人』——業餘思想家，他們以熱血書寫的思想而不是在紙面上羅列的講義，給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課程」。⁶這些作為「問題中人」而不是「學術中人」的覺醒者，他們以自己的經歷和探索萌動出了中國 20 世紀下半葉歷史上一次最蔚為壯觀的思想解放。在 1968 年這個「萬馬齊喑」的年度裏，在這個思想流放、思想探險和思想傳奇的歲月裏，中國思想的頭腦沒有停止運轉。儘管朱學勤先生對思想史上以 1968 年為標記的先行者的「現代失蹤」和消解而深感惆悵和憂慮，但是可以確信，自 1968 年之後，思想的火炬沒有熄滅、沒有失傳、沒有間斷。正是因為有了 1968 年及「一九六八年人」，思想的頭腦才不會滅絕，頭腦的思想才會綿延。

1968 年是中國 20 世紀下半葉的極「左」理論和極「左」實踐達到登峰造極的一年，也是這種理論和這種實踐病入膏肓的一年。1968 年，已成為中國人民堅決告別和時刻警惕上述禍國殃民的極「左」理論和極「左」實踐的一部「啟示錄」！

1968 年是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歷史借鑒。1968 年作為文革十年史的縮影，對它的不斷反思和批判是激勵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義無反顧地進行下去的一個動力，是顯現出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源流的重要所在。人們應該看到，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儘管其肇因及表現是複雜多樣的，但是最近的源頭幾乎都在對於文革反思的不夠，批判的不力，清算的不徹底。顯而易見，文革的可能和可行涉及到我們社會的、歷史的及體

6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讀書》，北京，1995 年第 10 期。

制的深層次的原因。反思、批判和清算文革的程度關係到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甚至成敗。

勿忘「1968 年」，超越「1968 年」，中國才會在 21 世紀大有希望。過去了的「1968 年」，永遠的「1968 年」！

三 從中國 21 世紀初始看「1968 年」

從中國 21 世紀之初看 1968 年，只能是相對遠地審視和反思 1968 年。確切地說，1968 年對於中國 21 世紀（至少是 21 世紀上半葉），倒有那麼幾點老生常談而又千真萬確的「教訓」：

一、中國的發展再也不能特意地製造社會性的群眾政治運動了。回首 1968 年前後，中國被一系列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政治運動折磨得千瘡百孔，人民大眾被消耗得精疲力竭。製造並進行這類群眾政治運動今後會有可能使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對不高的國家走向崩潰。「1968 年」已使中國在 21 世紀裏決心徹底告別內訌、內耗和動亂性的群眾政治運動。「1968 年」將不斷告誡 21 世紀的中國：任何這類的運動都是社會自虐、自殘甚至自殺性的運動。

二、21 世紀的中國將會實現過去多少代人為之奮鬥的「獨立、統一、富強和民主」這樣一個現代化中國的最基本的目標。1968 年的啟示更多地體現在如何建設富強和民主的中國。1968 年的歷史反反復復表明了，即使在 21 世紀，中國依然必須以經濟建設為立國之基、強國之本。只有在 21 世紀中國真正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的現代化文明國家，人們才真正有可能回首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而把自 1840 年以來、自 1898 年以來、自 1911 年以來、自 1937 年以來、自 1949 年以來、自 1968 年以

來、自 1978 年以來和自 1989 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歷史性進步看作是一個「大歷史」的過程。

三、以人為本，全面提高國民素質，這依然是 21 世紀的中國必須完成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未來進步的任何指標都應確立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這個基礎上。

總之，「1968 年」一定是中國人民在 21 世紀裏不斷反思、不斷批判過去而汲取前進力量的一份寶貴的歷史遺產。

後 記

1968 年深秋，新學期開學之後，剛上小學四年級的我和同學們，被學校告知，我們小學來了一支由五、六位工人組成的工宣隊，學校裏召開歡迎大會。在大會上，我們才第一次知道北京有一所大學，名叫清華大學。7 月底，那裏發生了嚴重的武鬥，打死了人。毛主席派出了工宣隊，並給工人們送去了外國朋友贈給他的芒果表示慰問。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工宣隊是甚麼意思，只是聽說毛主席指示向全國各大、中、小學派出的。我那孩提的心靈當時只是在琢磨那芒果是甚麼味道。然而，這也是「清華大學」的名字第一次通過 1968 年百日大武鬥事件和工宣隊進駐活動而深深刻入我的腦海裏。那時，我沒有想到，十七年後，我來到清華大學，成為一名教師；我更沒有想到，在文革爆發 30 周年和結束 20 年之際，由我本人開始回顧、評述百日大武鬥的前後經過，並研究由百日大武鬥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我們這代人差不多從啟蒙時就開始目睹文革的風風雨雨。儘管我們還不能親自置身於文革之中，但是我們從我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行動中，朦朧地感悟到文革是一場馬不停蹄的、由批鬥會、遊街、大字報、報告會、辯論會直至武鬥等等組成的熱鬧而又有些可怕的「鬥爭」。我們的少年和青少年時期都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我們在文革後期搭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末班車」，然後又乘上了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上

大學的「頭班車」。不論從哪一方面講，文革與我們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聯繫。在我們日後的生活中，文革的諸多因素乃至「文革情結」常常會顯現出來。文革至少對我們這些 20 世紀 50 年代出生、60 年代成長的一代人來說，其影響很有可能是終生的。文革不但對我們這代人，而且對我們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來說，決不是甚麼可忽略不計或者可隨意跳過的「歷史空白」。「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責任絕不應只留給後人」(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年，頁 2)。同樣，研究文革的重心不應過久地限於外國學者及海外學者那裏。在文革的故鄉，應該具有關於文革研究的學術隊伍和不斷深化的學術成果。可以想像，一部不包括文革史在內的中國當代史會是一部甚麼樣的「歷史」！

1995 年至 1996 年，我連續三個學期開設了《「文化大革命」史論》的選修課。從大學生們的學習情況來看，給我們的下一代人講清楚文革是何等重要。這裏僅舉兩件事。在我一次講完文革起因下課後，一位同學前來對我說：「老師，我父親一家就是『大躍進』後河南『信陽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我父親那個村子裏有一百多人，只有我父親等幾個青少年逃走他鄉，其餘全被餓死。老師講文革起因，我深深理解。如果當年不是我父親出走，我今天就不可能坐在這裏聽老師講文革了。」講到這裏，我淚盈眼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關於「信陽事件」，參見鄧力群：〈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載《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1998 年第 5 期，頁 2)。還有一次下課後，一位同學問我，紅衛兵「破四舊」時是不是要拆掉長城、燒毀故宮？我回答說，沒有的事。該同學爭辯說他是從報紙上見到此「消息」的。我請他下次上課時帶來此報。原來這是一份 70 年代末報紙上的一個標題性的東西：「『四人幫』毀我長城……」云云。我給該同學解釋了此

處「長城」之意，係指毛澤東 1967 年 8 月批判極「左」狂潮時所作的批示：「還我長城！」長城者，人民解放軍也。我對同學的提問和誤解並不感到好笑。我更加深切地體驗到，應該讓我們的下一代確實理解：文革，對於中國尤其當今中國，究竟意味著甚麼。

十分感謝劉志琴老師主編「斯年難忘叢書」時給予我的機會。此書也是我的研究課題「文革個案的理論研究——清華大學文革史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該課題曾由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值此之際，我謹向清華大學那些給予我各方面的關心、幫助和鼓勵，並且使我度過困難的老師、同事、同學表示深深的感謝。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終於在 20 世紀結束之前，完成了這部書稿。我期待著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唐少傑

1999 年 1 月底
北京 清華園

補 記

自我的《一九六八年：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看文革群眾運動的轉折之年》書稿寫成後，在「斯年難忘叢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女士以及諸多同仁、朋友的幫助下，多方聯繫出版事宜，歷經數年，輾轉多家出版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故鄉得以發表。這對我這個作者來說，與其說是遺憾，不如說是無奈。

非常感謝劉青峰老師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他們使這個寫於 20 世紀之末的書稿終於有可能在 21 世紀之初問世。我把過去的題目改為現今的題目。本書稿的經歷也可算作中國現今文革研究現狀的一種寫照吧，並「立此存照」。

唐 少 傑
2002 年夏
北京 清華園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 著作、文集

于輝編：《紅衛兵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998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

- 江崇廓、劉文淵、孫敦恒：《清華大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
-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1969年）。
-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
-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獄》（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
- 李輝：《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
-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
-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 沈展雲等主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
-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 周明等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一至六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1989年）。
- 林道群等主編：《告別諸神：從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 1978-198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徐友漁主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
- 許紀霖：《智者的尊嚴——知識份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 莊麗君主編：《世紀清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
- 陶德堅：《風雨人生》（多倫多：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年）。
- 清華大學校史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張志揚（墨哲蘭）：《瀆神的節日》（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
- 曹錦清、陳中亞：《走出「理想」城堡——中國「單位」現象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
-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 萌萌主編：《1999年獨白》，卷一至卷二（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

- 賀黎、楊健：《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
- 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1994年）。
-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
-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楊建利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1997年）。
-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第一卷至第四卷（香港：友聯研究所印行，1971年，1974年，1975年，1979年）。
-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劉小萌等主編：《中國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劉克先、方東明主編：《北大與清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
- 劉青峰主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歷史的審判》（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年）。
-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集體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二 資料

- 丁望主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一卷至第六卷（香港：明報出版社，1967年至1972年）。
- 《大字報選》（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
- 《大字報選》（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大字報選編組）。
- 《井岡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編輯部）。
- 《井岡山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井岡山報》編輯部）。
- 《井岡山通訊》（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通訊社）。
- 《井岡山雜誌》（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雜誌社）。
- 《井岡山參考資料》（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
- 《四一四戰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
- 《重要文件》（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宣傳組）。
- 《紅衛兵資料》，第一卷至第二十卷（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6）。
- 《紅衛兵資料續編》（一），第一卷至第八卷（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80）。
- 《紅衛兵資料續編》（二），第一卷至第八卷（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89）。
- 《情況簡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
-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建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中冊、下冊（北京：國防大學，1988年）。
- 《理論批判》（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作戰部）。

- 《清華校友通訊》，複一輯至複四十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0年至1999年）。
- 《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
- 《新編紅衛兵資料》，第一部分，第一卷至第二十卷（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99）。
- 《整風簡訊》（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辦公室）。
- 《學習資料》（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宣傳組）。

英文部分

- Axel van den Berg, *The Immanent Utopia 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arbara Barnoui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Jack A. Goldstone ed.,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4).
- Liu Lip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Schoo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1996).
- Lowell Dittmer and Chen Ruoxi,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 Melvin J. Lasky, *Utopia and Revolutio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sm, 1961-1966*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7).
- Sreemati Chakrabar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b Pub. House, 1998).
-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a Legacy of Turmoi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V. A. Krivtsov, V. Y. Sidikhmenov ed.-in-chief, *A Critique of Mao Tse-tung's Theoretical Conception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 P.W. Wong, David Zweig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1).
- 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Inc., 1997).
- Yang Xiao-ming, *The Rhetoric of Propaganda: a Tagmemic Analysis of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China* (New York: Peter Lang, 1994).
- Zhou Tsai-chin, *Daughter of Shangha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索引

一畫

一二·二五大行動 7, 34-37

二畫

「十七年」 49, 143, 192, 195, 197-98, 199, 200, 204, 212, 214, 219, 226, 231, 237, 239, 240, 241

「八一五」(重慶) 189

「八二六」(四川) 54, 189

八八派 5

八九派 5, 146

「二七公社」(河南) 189

「七·二〇事件」 ix, 56-59, 120, 194

「七·二一指示」 282

「七·二七事件」 26-31, 107, 127, 245, 279

「七·二四佈告」 250

「七·三佈告」 25, 26, 250

三畫

「三臨」 6, 217

「三鋼」(武漢) 189

「三結合」 11, 106, 141, 173, 182, 227

三七戰團 156

「三個月運動」 65

工作組 1-5, 71, 105, 106, 109, 128, 133, 137, 217

工宣隊 26-29, 71, 105, 106, 107, 108, 115, 246, 277-85, 295

「工造總」(武漢) 189

「山上派」(哈爾濱) 189

大躍進 80, 93

「大翻個兒論」 49, 194, 198, 226, 231, 243

「上海炮打張春橋思潮」 243

四畫

卞雨林 19

六二四戰團 153

「六廠二校經驗」 277

文學宓 12, 25, 222

王力 3, 35, 48, 53, 56, 57, 216,

- 235, 265,
 王毅 xi
 王大賓 16, 248
 王友琴 xi
 王光美 3, 12, 34, 35, 36, 38,
 50-53, 111
 王任重 36
 王良生 151
 王松林 28
 王國維 23
 王紹光 xi
 「天派」(北京) 108, 122, 123,
 294
 「五十天」 212
 「五·一六思潮」 243
 井岡山兵團 7, 34, 36, 39, 50-
 56, 111, 112, 116, 118, 119,
 137, 139, 141, 142, 151-55,
 157, 176
 井岡山兵團的建制 151-57
 井岡山兵團的報刊 154-57
 井岡山紅衛兵 5, 7, 8, 35, 98,
 110, 116, 117, 139
 尤西林 101
 中國共產黨 ix, 76, 85, 90, 92,
 171, 172, 200, 245, 291, 318,
 319
 中央文革小組 3, 5, 12, 25,
 35, 39, 41, 55, 117, 118, 119,
 129, 144, 179, 249, 250, 278,
 290, 291
 毛遠新 76
 毛澤東 viii, ix, 3, 5, 17, 20, 33,
 37, 38, 39, 47, 48, 51, 59, 64,
 65, 67, 71, 72, 73, 76, 90, 92,
 96-109, 113, 114, 115, 116,
 117, 120, 134, 135, 139, 140,
 148, 149, 155, 172, 173, 180,
 182, 185, 187, 194, 195, 196,
 220, 221, 223, 225, 226, 227,
 265,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90, 291,
 293, 294, 297, 307, 316, 317,
 319, 320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5, 7, 118
 「反右」 49, 74, 78, 80, 275
 「反到底」(重慶) 189
 「反軍、亂軍」 55-62, 319
 火燒英國代辦處 62-64, 112,
 113, 162
五畫
 「立四新」 224, 253, 293
 史衛民 xi

- 「北航紅旗」 295
 北京衛戍區 14, 15, 28
 「北、決、揚思潮」 243
 四派 7, 8, 10-31, 61, 62, 63,
 64, 120, 121, 123, 136, 142,
 143-49, 155, 156, 162, 163-
 165, 170, 190-217, 232, 234,
 245, 258
 「四清」 73
 「四二四」(廣西) 250
 「四三」派(北京) 259, 294
 「四四」派(北京) 259, 294
 「四一四思潮」 16, 64, 121,
 145, 155, 162, 188, 189, 192,
 230, 232-244
 「四一四串聯會」 7, 9, 155
 「出身論」 243
 印紅標 xi, 185, 187
六畫
 江青 15, 20, 35, 113, 116, 119,
 120, 195, 212, 236, 247, 248,
 290
 汲鵬 155
 老鬼(馬清波) 300
 「地派」(北京) 108, 122, 123,
 294
 列寧 144, 195
 朱德 59
 朱自清 28
 朱育生 22, 23
 朱學勤 321, 322
 任彥申 155
 任傳仲 131, 25, 151
 安文江 307
 「再教育」 65, 108, 295, 318
 「血統論」 65
 「多中心論」 103, 105, 178,
 280
 托洛茨基 8, 217
 「百萬雄師」(武漢) 189
 百日大武鬥 vii, viii, ix, x, xi,
 1-31, 32, 33, 47, 66, 69, 106,
 107, 123, 124, 125, 151, 161,
 184, 228, 245, 246, 248, 251,
 254, 256, 257, 258, 260, 261,
 287, 294, 317, 318, 325
七畫
 杜平 61
 杜蒲 219
 吳晗 276
 吳德 25, 27, 30, 248
 吳法憲 248

- 李康 12, 25, 222
 李遜 xi
 李輝 xi, 308-309
 李文元 29
 李再含 121
 李伯秋 60
 李秀芙 155
 李鴻章 79
 李澤厚 88
 李鍾奇 28
 「李一哲民主思潮」 243
 余立金 12, 216
 宋永毅 xi
 沈如槐 155
 汪東興 248
 「河造總」(河南) 189
 邵燕祥 113
 呂應中 10, 11, 153
 克羅齊 xiii
 伯恩施坦 269
 「批林批孔」 65, 269
 「批鬥王光美」 51-53, 65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65,
 67, 269
- 八畫**
 武鬥 251-259
- 林彪 11, 20, 56, 57, 77, 109,
 115, 116, 132, 153, 178, 247,
 248, 276, 317
 周揚 223
 周世忠 60
 周赤萍 1
 周泉纓 120, 155, 192, 234-40,
 242
 周恩來 3, 4, 10, 19, 20, 35, 36,
 50, 51, 60, 63, 64, 86, 98, 109-
 113, 115, 116, 139, 247, 248
 周榮鑫 36
 定宜莊 xi
 金春明 70, 78, 114
 季羨林 184, 273
 「兩個估計」 284, 285
 知識份子 213-14, 272-85, 318
 「東方紅公社」 122, 123
 東方紅縱隊 7
- 九畫**
 革命 86-94, 226, 321
 胡風 222
 姚文元 35, 73, 223, 227, 235,
 279-82
 保守派 121, 165-70, 171, 172,
 173, 175, 177, 186, 187, 188,

- 190, 228, 232
 段洪水 19
 胡喬木 99
 「紅成」(成都) 189
 紅代會 53, 122
 「紅教工」 48
 「紅教聯」 47-50, 142-43
 紅衛兵「三司」 7, 41, 117,
 291
 紅衛兵情結 296-306
 紅衛兵運動 287-290, 292-96
 「紅旗戰鬥隊」 122, 248
 《紅旗》雜誌 1967年第5期 8,
 137, 138, 139, 141, 202
 「炮轟派」(哈爾濱) 189
 「省無聯思潮」(湖南) 230,
 243
- 十畫**
 「高司」(長沙) 189
 唐偉 5, 7
 唐德剛 79, 80
 姜文波 16
 馬小莊 151
 馬克思 91, 144, 195, 226
 馬丁·路德 99
 馬基雅維里 89
- 徐友漁 xi, xviii, 114, 167,
 徐向前 55, 56, 57, 59, 112
 袁世凱 120, 235
 記者站 53-55, 121, 165, 166,
 294
 「破四舊」 134, 185, 224, 253,
 293, 326,
 秦始皇 240
 孫怒濤 155
 孫華棟 17
 恩格斯 144
 陸定一 52, 275
 「捉鬼隊」 50, 111
 「特權階層論」 142, 243
- 十一畫**
 康生 20, 116, 119, 120, 217,
 247, 248
 陶森 12, 17
 陶鑄 119, 235
 陶德堅 47
 曹錦清 41
 黃仁宇 xvi
 黃永勝 248
 黃作珍 248
 戚本禹 48, 51, 53, 123, 172,
 173, 216, 228, 230, 235

- 造反派 37, 54, 55, 56, 57, 60, 61, 99, 101, 106, 107, 113, 121, 122, 125, 126, 148, 165-70, 175-77, 181, 185, 187, 188, 190, 193, 228, 230, 232, 235, 258, 259, 287, 290, 294
- 許世友 57, 61, 62
- 許恭生 19
- 國民黨 80, 92, 93, 185, 217, 228, 258, 276,
- 張西挺 54
- 張旭濤 28
- 張抗抗 308, 309, 314
- 張承志 290
- 張春橋 7, 34, 39, 118, 195, 227, 243
- 張國華 54
- 張雪梅 155
- 陳中亞 41
- 陳再道 56, 57
- 陳伯達 4, 20, 116, 119, 120, 131, 216, 236, 244, 247, 248
- 陳育延 18, 151
- 陳家琪 229
- 陳楚三 155
- 陳錫聯 121
- 陳繼芳 151
- 陳凱歌 77, 262, 270
- 「陳里寧事件」 48-49
- 宿長忠 155
- 梁興初 54
- 梅貽奇 82
- 「產業軍」(四川) 189
- 「教育革命」 46, 65, 66, 84
- 「清查運動」 65
- 「清華工總司」 153
- 「清查五·一六」 65, 260, 269
- 「清華大學紅衛兵」 5, 6, 36, 65, 133, 134, 135-36, 186
- 清華附中紅衛兵 5, 186, 290, 293
- 「階級關係大變論」 243
- 「階級關係不變論」 195, 237-38
- 十二畫**
- 彭真 52, 216
- 彭德懷 59
- 斯諾 180, 249, 276
- 斯大林 37, 144, 154, 297,
- 賀龍 112
- 賀鵬飛 7
- 費爾巴哈 225
- 評《水滸》 65,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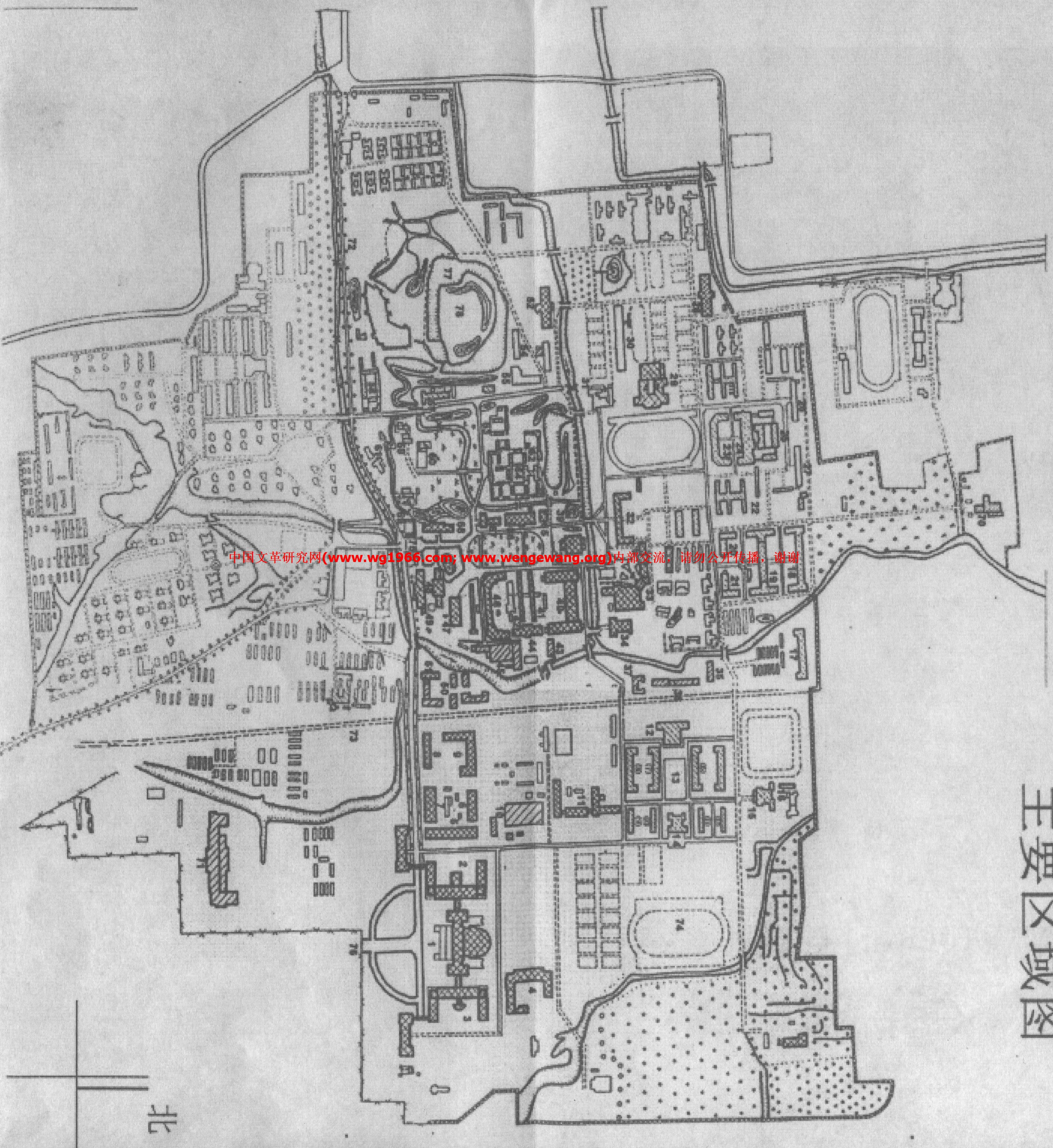
- 評價紅衛兵 307-314
- 馮友蘭 82
- 馮驥才 271
- 董必武 4
- 傅正泰 155
- 傅作義 234
- 傅崇碧 12, 216
- 調查組 53, 165-66
- 「湘江風雷」(長沙) 189
- 「無政府主義思潮」 243
- 「無產階級司令部」 21, 37, 47, 51, 52, 109, 117-20, 128, 129, 137, 138, 154, 166, 176, 202, 212, 235, 236, 248-50, 257, 258, 277, 282, 316, 317
- 「給出路」 65
- 十三畫**
- 葉林 1
- 葉群 248
- 葉劍英 56, 59
- 團派 7, 8, 10-31, 36, 48, 49, 57-62, 102, 103, 106, 107, 112, 121, 122, 124, 125, 142, 143-147, 152, 155, 157, 162, 163-165, 167, 178, 179, 190-219, 230-34, 237, 245, 248, 254, 257, 258
- 楊健 xi
- 楊天放 1
- 楊成武 12, 216
- 楊志軍 23
- 楊述立 23
- 聞一多 22
- 蒯大富 2, 3, 4, 5, 7, 9, 11, 12, 13, 16, 18, 19, 20, 21, 24, 27, 29, 30, 34, 35, 36, 39, 55, 77, 99, 100, 101, 102, 106, 108, 112, 117-19, 126-32, 144, 151, 174, 247, 248, 294, 295
- 「蒯氏人物」 3, 6, 65, 131, 137, 138, 281
- 溫玉成 248
- 溫和造反派 121, 148, 157, 167, 170, 187, 190
- 「幹部堆」 208-209
- 「資反路線」 9, 117, 137, 210, 211, 259
- 「資產階級司令部」 47, 117, 118, 119, 202
- 群眾問題 73-75, 214-16, 227, 260-71,
- 群眾專政 265-67
- 群眾組織界定 158-60, 167-70

- 群眾組織功能 161-66
 群眾組織取向 171-88
 群眾運動模式 45, 260-71
 群眾與非群眾的互動 95-149
 「新北大公社」 122, 123, 257, 258
 「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論」 11, 213-14
- 十四畫**
 華國鋒 235
 赫魯曉夫 197
- 十五畫**
 劉冰 65, 67, 71, 144, 216
 劉濤 3, 6
 劉才堂 99, 151
 劉少奇 3, 11, 34, 35, 37-9, 41, 48, 50, 51, 52, 53, 65, 97, 98, 105, 110, 111, 117-19, 137, 168
 劉少萌 xi
 劉再復 88
 劉志琴 327, 328
 劉青峰 328
 劉承嫻 12, 21
 劉格平 121
- 劉結挺 54
 劉萍萍 50
 劉婷婷 155
 劉萬璋 30, 246, 277
 遲群 30, 246, 277
 鄧小平 4, 11, 34, 35, 37-9, 41, 65, 67, 110, 111, 117-19
 蔣介石 198
 蔣南峰 155
 蔣南翔 1, 18, 43, 50, 52, 102, 146-48, 197, 198, 201, 202, 211, 217, 238
 潘志洪 28
 翦伯贊 276
 德里克 37, 39
- 十六畫**
 錢平華 24
 錢偉長 83
 鮑長康 99, 151,
 激進造反派 121, 148, 157, 167, 169, 187, 190, 230,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65, 269
- 十七畫**
 「聯指」(廣西) 250

- 聯絡站 55-62, 121, 165, 166, 294
 薄一波 36, 50, 52
 韓先楚 57, 60, 121
 韓忠現 29
 韓愛晶 16, 106, 248, 295
 韓銀山 151
 謝晉澄 16
 謝富治 9, 20, 27, 56, 101, 102, 123, 216, 236, 248
- 十八畫**
 關鋒 3, 35, 119, 120, 216, 235
 關海庭 295
- 聶元梓 1, 12, 16, 21, 126, 248, 259, 295, 311
- 十九畫**
 羅征啟 9, 11, 12, 25, 144-46, 192, 222
 羅瑞卿 59
 譚厚蘭 248
 譚浩強 9, 155
 「懷疑一切論」 243
 「騙鬥王光美」 50
 「羅文李饒」案 146, 222
- 二十畫**
 饒慰慈 12, 25, 222

北京清华大学 1968年百日大武斗

主要区域图



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g1966.com; www.wengewang.org)内部交流, 请勿公开传播, 谢谢

- | | | | | | |
|----------------|--------------|------------|---------------|-------------|------------|
| 1. 主楼 | 14. 八饭厅 | 27. 十六宿舍 | 40. 新水利馆 | 53. 校医院荷二病房 | 66. 科学馆 |
| 2. 西主楼 | 15. 九饭厅 | 28. 化学馆 | 41. 二院 (一) | 54. 荷一宿舍 | 67. 第二教学楼 |
| 3. 东主楼 | 16. 东区浴室 | 29. 体育馆 | 42. 二院 (二) | 55. 一员工食堂 | 68. 第一教学楼 |
| 4. 工物系馆 | 17. 十三号楼学生宿舍 | 30. 三十六所 | 43. 电话班 | 56. 强斋 | 69. 校卫队 |
| 5. 焊接馆 | 18. 一号楼学生宿舍 | 31. 校医院门诊部 | 44. 旧电机馆 | 57. 静斋 | 70. 电厂 |
| 6. 压力加工车间 | 19. 二号楼学生宿舍 | 32. 三院 | 45. 综合机械厂 | 58. 供应科 | 71. 九OO三大楼 |
| 7. 铸工车间 | 20. 三号楼学生宿舍 | 33. 图书馆 | 46. 清华学堂 | 59. 甲所 | 72. 通往西门之路 |
| 8. 汽车楼 | 21. 四号楼学生宿舍 | 34. 给排水实验室 | 47. 旧水利馆 | 60. 乙所 | 73. 通往南门之路 |
| 9. 汽车拖拉机实验室 | 22. 新斋 | 35. 焊接车间 | 48. 土木馆 | 61. 合作社办公室 | 74. 东大操场 |
| 10. 通用车间 | 23. 明斋 | 36. 工具车间 | 49. 动力农机馆 | 62. 人事处 | 75. 毛泽东塑像 |
| 11. 土建实验室 | 24. 五饭厅 | 37. 新航空馆 | 50. 设备工厂 | 63. 行政处 | 76. 东门 |
| 12. 七饭厅 | 25. 六饭厅 | 38. 礼堂 | 51. 土建实验室 (二) | 64. 工字厅 | 77. 荷花池 |
| 13. 五—十二号楼学生宿舍 | 26. 十五宿舍 | 39. 网亭 | 52. 生物馆 | 65. 阶梯教室 | 78. 荒岛 |

本書圍繞着1968年發生於北京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這一著名事件，論述了「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諸多問題；並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興衰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了「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運動的由來和走向，群眾組織的結構和取向，群眾派別的分歧和武鬥，群眾與非群眾之間的互助，以及「紅衛兵情結」和紅衛兵運動評價等方面。本書試圖從中國大陸單位性的群眾層面來展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方面面，力求對「文化大革命」種種矛盾的揭露置於群眾性的和基層性的事實之中。

唐少傑，男，1959年11月生於山東省濟南市。

中國文革研究網(www.wg1966.com; www.wengewang.org) 内部交流，請勿公开传播

高中畢業後，以「知識青年」身份下鄉務農。1978年2月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77級本科。1982年9月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研究專業方向為馬克思早期哲學思想。1985年7月至今，先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後於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2002年8月至2003年7月，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有多篇論著和譯著發表。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